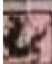
高華繼《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後又一力作

在歷史的風陵渡口

高華 著



九思文存

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高華繼《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後又一力作

在歷史的風陵渡口

高華 著

九思文存

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在历史的风陵渡口

高华　著
香港时代国际出版社

目录

- 在历史的风陵渡口-高华
- 代自序:行走在历史的河流
- 第一篇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
- 第二篇 孙科的宪政理念及其限度
- 第三篇 对“肃AB团”事件的历史考察
- 第四篇 毛泽东与 1937 年的刘、洛之争
- 第五篇　在“道”与“势”之间：毛泽东为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所作的准备
- 第六篇　中共从五四教育遗产中选择了什么——延安教育的价值及局限
- 第七篇 民族主义乎？国际主义乎？
- 第八篇 大跃进运动与国家权力的扩张：以江苏省为例
- 第九篇 历史真实与鞍钢宪法的“政治正确性”
- 第十篇 大饥荒中的“粮食食用增量法”与代食品
- 第十一篇 大灾荒与四清运动的起源
- 第十二篇 北京政争与地方——释读《江渭清回忆录》
- 第十三篇 初读《杨尚昆日记》
- 第十四篇 我为什么研究延安整风
- 第十五篇《七律·有所思》看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运思
- 第十六篇 叙事视角的多样性与当代史研究
- 第十七篇 阶级身份和差异：1949-1965 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
- 第十八篇 在历史中求真实
- 附录1：有关毛泽东研究的几个问题
- 附录2：纪念高华特辑-中文大学出版社
- “书比人长寿”——悼念高华先生

-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出版十年感言
- 高华走了
- 悼念高华

代自序:行走在历史的河流

我的论文集《在历史的"风陵渡"口》出版在即，时代国际出版公司的编辑来电嘱我为这本集子写一篇序言，读着手上的校稿，既有几许欣慰，也不乏一丝苦涩之味，不由得想起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思绪一下从现在又跳回到过去，于是拉拉杂杂写下这篇文字，权当"立此存照"吧。

如果说从进入大学的历史系就算正式学习或研究历史，我在史学领域已呆了二十多年，也在南京大学渡过了自己从青年到中年的人生岁月。我和南京大学最初的渊源，是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结下的，却是和大学原来的意义没有任何关系。我虽然从小就对大学充满想往，很早就读过苏联作家特里方诺夫的《一年级大学生》，但很清楚读大学那是遥不可及的梦，文革前我就知道家庭成份不好，成绩再好也考不上大学。在文革的最初几年，一些著名大学都成了所在地区政治运动的"风暴眼"，它的大门向一切人敞开，文革爆发时，我是六年级的小学生，小学的正常教学已难以为继，我就经常一人去离家不远的南京大学看大字报。1966 年 10 月，我在南大北园第一次看到来宁"串联"的"首都三司"红卫兵张贴的批评刘少奇的大字报。那时文革已进入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阶段，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其中有一张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勒令狗崽子""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自那以后，南大陪伴我从少年走到青年，又走到中年。

我的父母都不是知识分子，父亲因家贫，十二岁就在电镀厂做童工，被累得大吐血，是靠着做伙夫舅舅的抚养，才读了小学和陆续读完初中。父亲爱看书，最爱读的就是历史书籍，诸如蔡东藩多卷本的《中国历朝演义》。可能受他的影响，我在文革前的小学阶段就读了《红旗飘飘》、《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氓》、《三家巷》、《林海雪原》等等那个年代流行的革命书籍，也喜欢读《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五四以来老作家的作品。一个同学家的书橱里有一本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令我羡慕不已。

喜欢读书，加上自己的家庭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很自然地就对学者受难有一份很深的同情，在南京大学北园"文革楼"（文革结束后恢复原名"教学楼"）的阶梯教室里，我亲眼看到南大地理系主任任美锷教授被批斗，也看到"文革楼"底层橱窗里张贴的匡亚明校长手写的"认罪书"和挂着牌子在校园低头扫地的"反动学术权威"。

因为父亲是"右派"，我被禁止参加庆祝国庆17周年的全市小学生游

行队伍，我也没能参加1966年的"大串联"，但是心里总有不甘，也想"经风雨，见世面"。1967年 4月底的一个夜晚，我和两个同学跑到南京的下关火车站的车场，爬上一辆敞篷货车去上海，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去上海。我们担心到了上海后出不了车站，第二天上午就从南翔站下了货车。在那儿我和两个小伙伴分手，他们在上海都有亲戚，我一人再坐车直奔南京路，要去亲眼看看在书本上早就熟悉的这条有名的街道和当时中国最高的建筑---24层楼高的"国际饭店"。那一天，我一直在南京路和外滩游荡，在外滩大楼的墙壁上，我看到了 "炮轰韩先楚"的大标语，晚上我花了几角钱找一家浴室住下。两天后，我又一个人回到南翔，天空下着雨，沿着铁轨走了很远，在一个青年铁路工人的指引下，爬上一辆将要开往南京的货车，躲在蓬布里，回到了南京。短短几天的"经风雨，见世面"，锻炼了我的毅力和勇气。

成长在文革动荡的岁月，作为"黑五类"子弟，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饱受白眼和歧视，高尔基的《在人间》和《我的大学》成了我精神上的向导，南京大学就是我少年时代的"大学"，我在那儿不仅看了无数的大字报，还见识了许多"新事物"。有一次我游逛到北园的一排简易平房，发现里面住着一群来自安徽凤阳的农民，男女老少都有，他们都持有所在公社大队为他们提供的证明，上面写着毛主席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然后是几句话：某某某是贫下中农，因遭自然灾害，外出要饭，请予帮助！

在那个年代，我生活在一个由旧书本构成的虚幻的世界中，虽然都是杂乱无章的读书，却渴望灵魂的自由。1966年深秋我读了一本鲁迅的集子，里面收有《无声的中国》，惊奇鲁迅几十年前的话还是那么有现实性。一本《中国分省地图集》和一本《读报手册》几乎被我翻烂了。我的一个同学的父亲是"挑高箩" 的（南京话，即"收废品"的），我经常去他家翻看他父亲收购来的《参考消息》和《旅行家》等旧书刊。

在我的青少年时代，共产理想主义仍然涣发着强烈的思想魅力，1967 年的秋的一天，在我家隔壁的南京市某汽车配件公司，我很偶然的看到一份《参考消息》，知道了格瓦拉在遥远的玻利维亚被捕遇害的消息，也知道了中国不喜欢他的"游击中心主义"，但心中仍充满对格瓦拉的崇敬。就在我读《讨瞿战报》上刊载的瞿秋白的《多余的话》的同时，《瞿秋白文集》中的那首《赤潮曲》我已能一字不拉的全部背下，至今仍未忘记：

赤潮澎湃，晓霞飞涌，惊醒了五千余年的沉梦。

远东古国，四万万同胞，同声歌颂神圣的劳动。

猛攻，猛攻，捶碎这帝国主义万恶丛！

奋勇，奋勇，解放我殖民世界之劳工！

无论黑白黄，无复奴隶种，从今后，福音遍天下，文明只待共产大同。

看，光华万丈涌！

七十年代初，我家搬到更差的房子，但是对于我而言，这间狭小、阴冷、潮湿的住房却透着光亮，因为被搬到农村去的南京市某重点中学被封存图书的留守处就离我的家不到十米，我的身边竟有这样的宝库，让我兴奋不已！我通过看管图书的老先生，读了大量的中外著作，特别

是俄苏文学的作品。那些理想主义的英雄和共产革命的先驱：拉赫美托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小说《怎么办》中的主人公）、约翰"克里斯多夫、卢森堡、李卜克内西、李大钊、恽代英、刘伯坚、季米特洛夫、台尔曼、伊巴露丽，好像是一座座灯塔，在我心头闪烁。说来非常矛盾，那时的我一方面愤怒于沙俄对中国领土的侵占和斯大林对中国的霸权行径，另一方面，又把 "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已逝去的"中苏友好"的岁月联系在一起。1969年9月胡志明逝世的时候，我正在读瞿秋白的《饿乡记程》和《赤都心史》，看到胡主席遗嘱中针对中苏分裂所写的那些沉痛的话，非常感动，甚至内心里渴望重新回到"中苏友好"的年代。

那时，有关苏联的消息，内容极为单一。1969年底，中国半公开大量发行了一本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书籍，这就是几个日本留苏学生写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作者站在同情、拥护中国文革的角度，披露了一些苏联的现状，我就是从这本书知道了在莫斯科还有一所专门吸收亚、非、拉国家学生的"卢蒙巴各族人民友好大学"。在文革初、中期，只能从蛛丝马迹中捕获更多一点苏联的信息，当时从正面的角度少量披露苏联和东欧情况的只有一个报刊，这就是由越南华侨协会主办的中文周报《新越华报》，上面偶然会刊载一些有关苏、越关系，越南和东欧、古巴关系的报道，我每周都会去市外文书店买一份《新越华报》，有时也会买一份《朝鲜》画报，只因为那时的《朝鲜》画报偶然也会有一些有关苏朝关系的内容。

然而书本终究不能代替现实，我活在当下，这是一个坚硬无比的现实世界，随处都见到赤裸裸的暴力和恐怖。1966 年9月，我亲眼目睹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的红卫兵，押解着南京市近千名被泼了满脸墨水，赤着脚的"牛鬼蛇神"在全市进行大游街。在我家附近的街角口，有一个合作食堂的流动点，一对山东老夫妇每天早晨出摊卖煎饼裹油条，有一天我发现，正在摊面做煎饼的老汉的衣服的前襟上被缝上一块白长条，上面写着"国民党兵痞"。

我从小就生活在南京，这儿的一砖一石，山山水水，都渗透着浓郁的历史沧桑感。我的一个小学同学的父亲是二十年代的共产党员，我和他家也是邻居，老人的经历非常丰富，也喜欢看书，他是黄埔六期的学生，参加过北伐，大革命失败后做过中共苏南某县的县委书记，三十年代初和恽代英同在中共上海法南区委从事地下工作。老人认识许多著名的中共领袖人物，被国民党逮捕后进过苏州反省院，出来后脱党，四十年代后期又回到革命队伍，五十年代因"潘杨事件"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林彪事件"发生后，老人被几个军人带去北京审查一年多，要他交待和一些重要人物的关系。老人从北京回来后，我去看望他，老人说，有关人员一再要他谈康生的历史和对康生的看法，他因知道康生的厉害，始终都没吐一字，所以才能平安回来。在那些年，我每隔几天都会去和老人聊天，山南海北听他聊中共早期的历史，"顾顺章事件"和"海棠村事件"就是他最先告诉我的。

然而我的生活却和"历史研究"无关，和任何"学术"无关。1970 年我初中毕业，当时领导江苏的那位著名的军人司令员一声令下，南京市这一年毕业的初中生全部留城，分配到急需人手的工矿企业，这样从 16 岁半起，我就成了一个工人。1971 年后，大学重新恢复招生，在南京

的街头上经常可以看到戴着校徽的"工农兵学员"，可我知道，自己和他们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

我虽然已工作，但读书却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可以说这是我几十年中读书最认真，最勤勉，最有心得的阶段。1971 年林彪事件客观上大大推动了国人思想的"脱魅"，但给我的思想震动却不是太大，此前，我就已对社会的主流意识多有怀疑，特别是在中共九大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入党章，林彪的部下大量进入政治局，军队影响遍及社会各个角落，我记得父亲说了一句话："物极必反"。在我的单位传达批判《571 工程记要》时，有一个同事，他是 1963 年的高中毕业生，因家庭问题而未被大学录取，他就以半调侃的态度说：林秃子恶毒啊，竟然污蔑伟大领袖是 B-52 轰炸机，还攻击我们是"封建社会主义"，真是死有余辜啊！当他说完这番话后，不少同事竞相视一笑，没有任何愤怒情绪，而是皮里阳秋地说：林秃子没有良心啊！是白脸奸臣啊！反革命啊！大坏蛋啊！这一幕给我留下的印象终身难忘。以现在的眼光看，当年向全民公开《571 工程记要》是大大失算了，作出这个决策，显然太过于自信，也太看低了国人的智力。1973 年后为"评法批儒"，居然毫无掩饰地鼓吹法家学说，在我细读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商君书》、《韩非子》等一批法家著作后，已清楚认识到被包裹在革命词藻下的那个年代主流意识的新专制主义的本质。

在七十年代初中期，上海出版的几份重要刊物，从《摘译》，到《学习与批判》、《朝霞》，我基本每期都看，在这几份刊物中，内部发行的《摘译》最具信息量，成为我了解外邦思潮的重要窗口。那时内部已有许多关于苏联东欧国家的出版物，即所谓"灰皮书"，我对这些出版物特别有兴趣，总是觉得中苏两国有许多相似性。我不仅读过苏联官方理论家阐释"发达社会主义"的论著，还认真读了重点叙述斯大林死后苏共领导层的内部斗争，由北京三联书店编辑的《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记事（1953-1973）》，甚至还读过枯燥乏味的《苏斯洛夫言论选》和金日成著作集。我非常怀念原江苏省歌舞团资料室可敬的凌老师，我读过的许多"灰皮书"的都是她借给我的。在那些年读过的书籍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和《赫鲁晓夫回忆录》。我甚至读过克拉夫钦科的《我选择了自由》，这是一本四十年代后期上海翻译的老书，作者是叛逃到美国的苏联赴美外贸采购团成员，书中披露了斯大林大清洗的内幕，当时震动了西方世界。我因为早读过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一位锡兰共产党员写的《斯大林主义》和《赫鲁晓夫回忆录》等书籍，也读过五十年代曾到过中国访问，受到刘少奇接见的苏联女作家凯特林斯卡娅那本描写共青团员们如何战胜"托匪暗害份子"的破坏活动，在远东的大森林中建设共青城的著名小说《勇敢》，已有了不少苏联历史的"底子"，读这本书时反而没有太多的震动。

追求自由的灵魂，但生活在"阶级斗争"的声浪不断升腾喧嚣的严峻的世界里，思想世界和现实世界交融在一起，生命反而张显出张力，1971 年以后，国内形势有所变化，一些在文革初期关闭的图书馆又局部开放了，我在单位开了一份介绍信，在图书馆办了一个集体借书证。当年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阶级斗争的警惕性非常高，我借的孟德斯鸠的

《论法的精神》等一类书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觉得一个工人，就应该联系本职工作而读书，所以他们不久就打电话给我的单位，说这个人好像有点什么问题。我单位的老书记为此还专门找我谈话，她说你应该多读《毛选》，多读马列著作等等，其实《毛选》我早就通读过许多遍，《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等等我也都读过。我看书从来也没有影响到工作。领导虽然没有多批评我，但还是有一些让我感到很不舒服的地方。1971 年夏，周恩来总理陪同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夫妇到南京访问，我工作的那个单位在市中心临着大街，虽然我当时只有 17 岁，我就不能参加革命群众在马路上的欢迎行列，而是把我和资本家，小业主，"国民党反动军官"一齐集中在小房间里，让我读报纸给他们听。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到南京来访问，我也不能作为"革命青年"去参加欢迎，可每一次公审反革命的大会都要我去参加，我觉得不公平，以后就请病假。

在那个时代，政治和日常生活是交融在一起的，可是即便在那时，也无法完全实现政治对日常生活空间的彻底的占领（所以才有张春桥那篇"宏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革后期，我认识一位非常善良的南大外文系的俄裔教授刘妮娜和她的先生，在六十年代初苏侨纷纷回国之际，刘妮娜选择和丈夫、孩子留在中国。我去看望她的时候，她都会拿出漂亮的俄罗斯茶具，请我喝茶。我们从不谈政治，俄苏文学是我们的话题，从托尔斯泰、普希金、屠格涅父、莱蒙托夫，陀斯妥耶夫斯基到涅克拉索夫的《在俄罗斯谁能欢乐而自由》；从高尔基、爱伦堡、法捷耶夫、特瓦尔多夫斯基，到萧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我到今天还保留了 1959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小开本的小说），在她温暖的家里，我忘记了现实世界，沉浸在俄罗斯文学的河流里，那种温馨的气氛至今还留存在我的脑海里。

受到时代氛围的深刻的影响，一个出身不好的普通工人，关心的都是自己不应去关心的事情。在我的头脑中，共产革命的理想主义，俄苏文学的人道主义、"灰皮书"的批判主义、孟德斯鸠的自由共和思想和当下正肆虐横行的"四人帮"的极左专制主义，彼此交错冲突，而它的交汇点就是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1976 年 1 月 8 日，周恩来总理去世，我难过得留下眼泪，一个人几次去梅园新村周恩来办公处旧址去感受南京百姓对周总理的哀悼。1976 年 9 月 9 日下午，我和同事们去区里开大会，到了后又通知我们回单位去听重要广播，大家纷纷议论，多说是中苏大战打起来了，下午四点，收音机和新街口的大喇叭广播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新闻，行人神情平静，驻足聆听，却没有天崩地裂的感觉，我知道，中国的一页已翻了过去。

就这样走进我的 1978 年，走入我的大学年代，苏联诗人叶夫图申科说他和他的朋友是"二十大的产儿"，那么，1977，1978，1979，这三届大学生也可以称为"三中全会的产儿"，这一代人和祖国的改革开放一起成长，也见证了这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

1978 年后，除去两年的时间，我一直在南京大学历史系，算起来也有四分之一的世纪了。我的研究的兴趣集中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先是参加做集体研究项目，以后决定走自己的路。这条路是颇为艰辛的，发表文章的空间很小，但是生逢历史的转折年代，还是顺着自己的性

情，行走在历史的河流：从民国史，共产革命史，再延伸到当代史，这都是距今不远的过去的历史。

二十世纪的前半期，中国的史学家多研究古代史，许多历史学研究者不认为近现代史是"历史学"。六十余年前，法国遭德国法西斯入侵，年鉴学派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满怀忧伤，开始着手写他的那本杰出的《历史学家的技艺》。他说，在他年轻时，他的高中老师曾对学生说过这样一番话："1830 年以后已无历史学可言，一切都是政治学。"布洛赫说，又过去许多年，人们还是说："自 1904 年或 1940 年以后，已无历史学可言"。马克"布洛赫所说的上述看法，中外皆然，曹聚仁也有言，"二十年内无历史"。如果站在一个长时段的角度来审视，这些话都不无道理，距今较近，治史者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写出"信史"的难度确实很大，况且对距当下不甚远的过去，史家也需要一个沉淀思考的过程，所以我一般把自己研究的时限放在四、五十年前或更久远的过去。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文章合为时而著"，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又都是相对的时间的概念，它们构成了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历史之流，治史者感时阅世，青灯黄卷，上下探究，所得所获，用一定的规范和格式表达出来，即所谓"历史学"或"历史编纂学"。归根到底，历史学终究去不了叙述者的主观性，所以历史学乃人文学，非"社会科学"也。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时代的任何一本史书，都只能是一家之言，完全真实的历史可能永远无法还原。米歇尔"福柯说过，"大写的历史的确是我们记忆之最博学、最警醒、最活跃、并且无疑是最拥挤的区域；大写的历史同样是一个深底：所有存在物都是从这个深底开始存在，并且不确定地闪烁。"就笔者而言，本文集所收的这些文章都留有自己 "闪烁记忆"的印记，正是个体生命和历史的交融，才使我写下了这些文章。我所希望自己的，就是尽量约束主观性，力求做到客观，尽最大的努力去追寻那段真实的历史，而在这个过程中，个人所能做的其实十分有限，也就是把过往的历史现象当成研究的对象，去叙述、分析它的生成和演化的过程，并提供一些个人的见解。我常想，我和我的一些朋友都属于过渡年代里过渡性的那类人，在我们的前面，有群星闪烁的先哲前辈，在我们的后面将会有更多受过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训练的青年才俊，也许未来张力一旦消失，我的这些文章就可归类于"历史考古学"了，这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宿命，也是我的宿命，我会继续走下去。是为序。

2005 年 8 月于南京

第一篇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

19　世纪中叶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转折时期，当时，面临着“五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古老中国步入了前所未有的、与传统的农业社会迥异的、现代性逐渐增长的历史发展阶段。这条道路在中国充满了深刻的矛盾和冲突。在这条道路上，中国既取得过巨大的成就，也一次次丧失了历史赐予的难得机遇，长期在通往现代的旅途中蹒跚而行。中国变革的艰难无疑与前现代社会的历史遗产有关，也与中国政治中枢的政策选择密切相联，同时它还受到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的巨大影响。中国以迥别于其他国家的特有方式实行社会转型，无论它的成功还是挫折都丰富了人类的经验宝库，为众多的后发展国家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和启示。

一、中国社会转型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基础

数十年来，一个长期在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是，如果没有　1840　年开始的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中国能否主动开始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从而完成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在这里，我们尝试性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中国所承袭的巨大的遗产中，包孕着可诱发现代社会的因素，这些积极因素在一定条件的作用下可刺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演变；但是，作为总体特征的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存在着根本性的制度缺陷，它严重阻滞着传统中可现代化因素的成长，如果没有外来刺激，即使中国社会中存在着“资本主义萌芽”，也无法出现资本主义，中国仍将处于前现代状态。

1840　年在亚洲东南沿海与西方列强相通的东方大国中国是长期被西方思想家所钦羡的对象:一个以皇权为核心、职能分明的中央集权官僚政府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下，统治着4.5　亿人口，在　1000　多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国土上有效地行使着治权；儒家学说中的道德主义和礼仪规范起着整合社会各个阶层的特殊功能；美仑美奂的巍峨宫殿和精美绝伦的工艺珍品体现着中国人的丰富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虽然自然灾害不时减少中国人口，但精耕细作的农业还是大体上维持了中国人的温饱。总之，19 世纪中叶之前的中国，尽管不时发生社会动荡和灾荒，但它总是能自我调适，在经历周期性的社会震荡后，重新恢复社会的稳定与繁荣。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被西方长期钦羡、长期保持强大和繁荣、充满自豪与自尊的东方大国，在西方列强的炮舰侵略和随之而来的价值观念的冲击下，却不能再保持昔日的光荣并适时调整自己的政治、经济、社会

结构，重新汇集新的社会力量和自然资源，从而有效地融汇传统与现代因素，以富有活力的转换方式，在西方和近邻日本的成功示范效应的影响下，迈入富强之途。其原因何在？

政治是传统社会的决定因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前现代社会制度构成中最有现代因素的部分就是维系中国社会稳定的支柱——中央集权官僚制，然而也就是它本身的结构性的重大缺陷阻碍了中央集权官僚制向现代政府制度的转换。

中国的中央官僚集权制具有一定的理性色彩。在皇帝之下，内阁、省、县的垂直的行政系统有专门化和职能划分的特点，按照法律和惯例有效地掌管国家行政事务，垂直的监察系统直接受命于皇帝，负责监督各级官吏，以保证政令的执行。不受阶级和财产限制、在科举制基础上建立的官员升迁系统，体现了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和开放性，对维系中国官僚制度的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操作层面上，这样的官僚制度，与依职能分层、各司其责的现代政府制度并不构成严重冲突。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两点:第一，中国的中央官僚集权制对基层的统治力量较弱，朝廷在县以下的支柱是享有功名的乡绅，中央权力并不能完全达到基层，征税及征集劳役实际上依赖于乡绅。处于家族、宗族网核心的乡绅的行为往往严重破坏了中央集权官僚制的合理化因素。所以严格地说，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只存在于县以上的政府机构，县以下的乡村则处于高度分散的无组织状态。显然，这与现代社会所要求的、能够全面协调社会力量处理公共事务的、完善的社会组织结构是相冲突的；第二，中国官僚集权是以儒家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它以道德伦常为基本准绳，在义务与权利的关系上没有明确的界定。儒家规范虽不排斥个人的成就取向，但人情取向更占主要地位。中央官僚集权制的垂直系统固然保证了政令的通行，然而也带来各级官吏不思进取、因循守旧的严重惰性。加之宗族、家族的因素与政治结构互为一体；为派系斗争提供了永恒的竞技场。更为重要的是，儒家意识形态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石，它提供了对世界的全部解释，成为不可逾越的治国安邦的基本原则。它是建立在传统的“中国为天下中心” 的世界观之上的，它的丰富性与普遍性，使中国统治者与士大夫相信儒家学说已穷尽世界一切真理。中国既是天下中心，并有着辉煌的无与伦比的历史与成就，那么中国之外的“夷务”就不在中国人关心的范围之内，[1]　顺理成章，也就对竞争不感兴趣，没有了变革的紧迫感。至于解决中国国内周期性的政治衰败和政治动荡的良方更无需从“异域”寻觅，在包孕万家的儒家学说的众多派别中自有疗救的方案。经过千余年的儒化，这套由科举制为外在体现的儒家意识形态已完全内化于中国人的心理深层，从而成为回应外部世界挑战的巨大的心理障碍。这样，在与外部世界交往时，中国就很难随形势而变化政策，而处处显得迟钝与僵硬。

中国前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一样，同样存在一定程度的可现代化因素，但是，这些积极因素同样因经济结构的制度性缺陷而被吞噬。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研究表明，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具有私人契约关系的土地与劳动力交换的活动一直十分活跃。[2]　一般而言，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并不严重，官营工商业在国家经济生活中也不占主要地位，而个人则享有流动性的选择职业的自由。然而，与这些可现

代化因素相比，中国前现代社会经济结构中的障碍性因素则更为强大。首先，19 世纪中叶之际，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与微弱的商品关系相比，自然经济占决定性优势。其次，中国人的商品经济活动只限于一般的手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的简单交换，几乎不存在以大机械为动力的制造业与加工业。再次，可以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起调节作用的国家，几乎不干预经济行为，也缺乏外贸观念，无法承担起经济起步所必须的资源征集和建立经济组织以及建立与外部世界经济联系的责任，使得分散的商业力量无从集中。因此经济结构中若干积极因素不能拓展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扩大在新质的基础上的生产规模；如果说在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中尚存在若干合理的成份，那么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结构则基本发挥着阻滞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作用。中国的儒家学说是一套极其复杂的、探究有关人与宇宙、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庞大的思想体系。根据近 30 年中国现代新儒家及西方中国学学者对儒家典籍的选择，儒家学说中蕴含着某些与现代社会毫不冲突的可现代化因素。[3] 例如:对人之终极理想的追求，对违反人之终极追求的现存社会现象的反抗等等；更重要的是在孔孟、朱熹的思想中还有着对人之主体生命的高度敬意和对人之自由意志的肯定，这与西方近世推动过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教精神有某种程度的相似。[4] 然而事实上，作为长期维系中国社会稳定的支柱的儒家学说在近代与西方文明相遇时，却节节败退，逐渐丧失了统合社会的功用。尤其发人深省的是，乍看起来似乎与现代民主政治并不矛盾的儒家民本思想始终未能促成向尊重公民自由的现代民主制度的转换。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与现代社会相脱节的根本原因在于它基本上是发挥着维系等级森严的君主专制制度作用，其现实导向具有强烈的权威主义色彩，直接排斥与现代契约关系相联的个人主动精神与公民意识的培育和成长。

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结构，基本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水平，构成了中国前现代社会的基础。当 1840 年中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西方侵略和价值观念的冲击时，中国面临着艰难的抉择，这就是如何根据急剧变化的形势，适时改革中国现存的社会结构，进行大规模的制度创新和观念变革，重新汇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资源，使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在冲突中走向新的融合，从而推动中国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然而当时的中国统治者与绝大部分士大夫却被动地、消极地试图以微小的、局部的政策调整来摆脱中国的危机，选择的是尽量缩小变革规模的道路，结果使中国的转变更充满曲折和动荡，造成中国社会转型进程的跌宕起伏。

二、重建政治共同体的困厄

根据衡量一个社会现代性的强弱的具体指标，即工业化、都市化、识字率、现代契约关系、社会流动性和政治制度化来分析 1840 年后的中国社会变迁，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结构在大约 100 年的时间内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自 1840—1911 年，历经 72 年的变迁，中国已从一个典型的传统社会向具有现代色彩的新式民族国家过渡。自 1911 年中华民国创立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期间的急剧变动甚至更大。因社会转型所引发的国内与国际矛盾的激烈冲突，演化为各种政治力量的新的组

合和分裂。与现代观念散播的同时，新的经济势力和社会力量也急剧增长，而传统的政治、经济结构与观念文化绝不妥协地对新生事物的激烈反抗，使得中国的变革波谲云诡，一波三折。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第一阶段大约历经 72 年，中间经过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其特征是消极、被动地被纳入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之中。

第一时期:1840-1860 年，面临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中国试图在不变动原有制度的基础上运用传统政治、军事、经济资源进行全面抵抗，但反而遭受到更大耻辱与失败。在大约 20 年的时间内，中国历经西方列强强加的两次鸦片战争，丧失了大片国土，被迫开放通商口岸，向列强提供片面最惠国待遇，在民族危机不断加剧的险恶形势下，清廷统治者不思变革，终于爆发了长达 14 年的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彻底暴露了中国传统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弊端及清廷统治者的麻木与愚昧。

第二时期，1860 年左右-19 世纪末，随着西方军事、经济、文化和政治力量在中国的急剧增长。中国传统社会发生了裂变，出现了试图在保存中国传统内核前提下的变革运动。这个时期的变革主体是受西方侵略刺激而图谋改弦更张的清廷开明人士和与西方有联系的部分士大夫与新兴商人。但由于清廷最高统治者抗拒进行制度性的重大创新，严重影响了中国转变的规模和速度，在强大的西方压力下，不仅未能恢复中国昔日的国威，走上富强之道，反而进一步走向衰落。

严格地说，中国的变革始于 19 世纪 60 年代。在西方的刺激和压力下，清廷开始寻求变革，首先是在 1860 年创立处理外交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继之，由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崛起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指导下进行了旨在寻求富强的洋务运动，开办了一批现代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这是中国工业化的最早基地。稍后，一批与官府有密切联系的士绅转而兴办有官府背景的民用企业，中国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早期民族资本家和从农民转化而来的近代工人。这样，中国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饶有兴味的是，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中崛起的湘、淮军势力是最早与西方接触并表示愿意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的社会力量，而中央政权则受到观念、利益等的限制，对变革表现出很大的消极性，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逐渐丧失对国内的控制能力，导致地方势力的急剧膨胀，这些地方势力，在很大程度上又的确是湘、淮军势力的延续。这个时期的变革的中心内容是引进西方的军、民用工业技术，即所谓“器物层次”上的变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体现着调整但不动摇传统这种指导性的变革思想，即被迫承认中国传统不能解决器物层次的进步，尽管它仍是“中国中心论”的一种变种。由于中国传统势力的极其强大，企图变革的、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士大夫阶层试图在“托古改制”的旗号下，悄悄进行一场融汇中国传统与近代西方思想的制度变革，企图从器物层次的变革向制度层次的变革迈出一步。然而这一步却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有可能彻底动摇中国社会的旧有结构。中国守旧的统治者对此进行全面反抗，扼杀了这次变革。百日维新失败的深远意义，也许是变革推动者与扼杀者都未能充分预见的——中国试图走日本道路的希望与机会就此彻底丧失了。

第三时期:大约从 20 世纪初到 1911 年清王朝崩溃、中华民国创立。戊戌变法在血泊中被扼杀并没有使清王朝走向中兴，相反中国向恶性方向急剧发展。义和团运动的彻底失败使清廷的最后一点自尊和傲慢完全被卑怯、投降所替代，庚子协定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经济，从此中国真正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这时，清廷开始较有系统地革新制度，包括制定具有现代色彩的法律、奖励工商、创建政府职能机构、鼓励留学、制定宪政时间表、设立省级宪政咨议机构等。尤其具有重大意义的是，1905 年清廷废除科举制度，转向追求实用科技的现代教育制度，此举彻底动摇了中国前现代社会政治结构的基础。这些变革措施显示，在经过近 60 年西方的严重冲击后，中国统治者终于明白，即使为保持统治阶级自身的既得利益，也必须进行政治改革。但是这些大规模的变革是在清廷统治已严重削弱的形势下进行的，加之变革不可避免地带来社会的动荡，因此清王朝的政治结构几乎濒于全面瘫痪。旧结构的衰微和大规模变革刺激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勃兴，接受了西方思想和日本经验的海外中国留学生，以孙中山为核心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具有完全意义的现代政党——同盟会，成了推动中国现代化的主体。代表了新经济关系及思想价值的社会组织——商会、科学社、各种学会、演讲会等成了刚刚萌发的市民社会的中坚力量。新式学校、报馆、译书馆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近代国家观念和以英、法经验为依归的民主主义思想以通商口岸为中心，把推动变革的意识逐渐散播于社会，形成一股要求彻底变革社会的强大思潮。作为这种思潮与新社会力量互动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中国的变革终于走向制度的层次，1911 年 10 月 10 日，爆发了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创立了亚洲第一个以美国制度为样板的共和国，即中华民国。

数千年帝制的崩溃和共和政体的建立，是中国进入了向现代转变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又可分为北洋政府统治和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两个时期的任务是相同的，这就是建立新型民族国家，以保护经济起飞，实现社会的全面变革，加速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中华民国的创立为大规模的制度变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中国的社会转型开辟了新的前景。辛亥革命的巨大创新精神体现在政治、经济、思想观念各个领域。帝制的瓦解和王权的崩溃，极大地动摇了传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民国初年国会的建立，现代政党政治的初步展开，标志着中国政治制度化的起步。新式教育和大众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为中国人提供了激励变革的新的世界观。民国初年大批报刊创办，一时全国报纸达 500 种，北京一地就有大小 50 多种报纸，就连地处偏僻的四川也有 23 家报纸。在 20 世纪初发展工业的基础上，新式工业(以纺织、食品加工为主)有了迅速发展。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对发展工商业也表现出一定的兴趣，颁布了若干鼓励实业的法规和条令，[5] 一时使企业界“耳目一新”。城市商业活动日趋活跃，并逐渐由沿海、沿江向内地渗透，一个新的全国市场开始形成。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创立，是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重要一步。然而，中华民国的创立，只是为中国的最终现代化提供了某种可能性，中国现代化的展开有赖于国际和国内诸多条件的配合和对旧有结构的彻底更新。问题的关键是，在旧结构的基础上，能否建立起新结构?作为后发展国家，中国能否完成民族独

立和改造的双重任务？正是在这些关键问题上中国遇到了新的挑战。这包括中国所面临的不利的国际秩序与在国内新形势下改头换面的传统主义的全面反扑。

首先，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减轻中国所承受的西方的巨大压力，也没有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增强中国的主权独立。无庸置疑，中国是一个后发展国家，处于以欧美为核心的世界经济圈的边缘，已发展的西方列强与东方的日本在中国的扩张固然刺激了中国现代因素的增长，但同时对中国的转变也构成了巨大的障碍。西方列强在中国攫取的一系列特权严重阻碍了中国现代化所必须的积累:协定关税、租界内的治外法权、片面最惠国待遇、海关和邮政权利的控制、外国在华的驻军和势力范围的存在等等，都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破坏了推动现代化中枢的中国政府的权威。

第二，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是被动的。中国的悠久历史和辉煌文化在中国人的心理上造成一种对西方文明既欣赏又排拒的矛盾心态。民族主义的振兴要求发掘中国传统中的爱国主义资源，激励国人的爱国热忱，保障国家的独立与主权完整，而彻底进行社会改造又要求重新评判中国传统，向西方可取之处学习。1840 年以来中国先进分子长期处于两难境地，他们一直试图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调适点，但屡屡失败，无从解决这个尖锐的时代矛盾。民国肇始，并不能改变这种困境。

第三，清王朝崩溃和继之结束的袁世凯统治使中国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急速衰微，地方军阀乘机崛起，国内政治出现了长期动荡，严重地阻碍了现代发展所要求的集中与分权相调适的机制形成。这使国家的政治、经济资源无法汇集。

第四，中华民国创立后，新的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纷纷建立，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社会多元发展的需要。然而现代化的外装并不能掩盖沉重的传统的全面影响，政府制度化程度低下，缺乏现代政治人物，社会自治组织发育不良，市场经济受到传统方式的严重束缚，都预示着中国社会转型将面临艰难曲折的道路。

这种进步与保守的冲突，又和中国与西方列强、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不仅贯穿于北洋政府的整个统治时期，而且在 1928 年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后，以更尖锐、更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对中国社会的转型带来严重影响。

20 年代以后，随着外国经济势力对中国的进一步渗透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体系加速了分化的过程，社会各阶层的分裂和对抗也日趋激烈。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东南沿海沿江的传统农业和手工业逐渐衰微，众多农民由于受“外力压迫”，兼之“受不良政治的影响，苛捐杂税的勒索”，“土豪劣绅的剥夺”以及“水旱灾荒的损失”，“已陷于破产之境”， 纷纷涌入中心城市，破产农民加入了雇佣劳动队伍，使得工农之间的联系逐渐扩大，相互影响加深，同时也加剧了城市的人口压力，造成大量失业和无业游民的激增。同一时期，西方国家为转嫁震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加紧了向中国倾销商品和输出资本，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在外货倾销的打击下，中国的民族工商业陷于困境，[7] 引发了一系列尖锐的社会问题，造成社会关系的长期紧张。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分化

在思想文化领域内也表现得十分激烈。西方思想的冲击和帝制的崩溃，打破了传统社会原先在政治体制、经济生活和精神价值领域及伦理规范之间的高度整合。“五四”以后，社会变迁逐渐在改变着人口结构，愈来愈多的人口向沿海都市和其它中心城市集中，社会分工加速，社会成员因所处生活环境的不同，文化趣味也开始产生分化，致使社会的文化价值日益趋于分殊和多元化。伴随着现代教育机构的普遍设立，学生人数和自由职业者的急速增长，西方新思潮的竞相引入，报刊的日益普及，一种有别于传统价值观的新型文化观在都市逐渐形成，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作为文化上的新价值，由知识界、教育界通过言论、著述的渠道在社会扩散，并被众多的知识分子所接受。新价值的竞相产生，降低了知识分子和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对中国传统价值的尊崇，同时也激化了新价值与固有价值及传统结构的紧张冲突。 国内政局的长期混乱，一方面为知识界创造新价值及新价值的传播提供了适当的环境；另一方面，价值的分殊和多元发展又刺激了群体自我意识的觉醒，促使新的社会力量的成长和壮大。

传统社会结构的分化过程集中反映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从大革命时期广泛的政治动员中壮大起来的社会运动和继承“五四”时期自由主义资源，从学术专业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自由知识分子以及民族资产阶级，把愈来愈多的工农群体和其他社会群体带到了社会的政治中心，要求维护民族独立，实现社会公正，呼唤建立新的文化价值体系，重构政治共同体，以回应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趋势。

传统社会结构的持续分化和日益广泛的社会群体跃入社会的政治中心对中国政治体系构成了强大的压力，客观上要求创立一种容纳现代性与民族性，能够处理不断变化的社会问题，容纳社会变迁过程中产生的新兴力量的新的制度机制，用以协调、整合社会冲突。这种新制度结构和新价值信仰系统的创立，一方面有赖于有机地融汇现代性和民族性，另一方面，只有通过创造具体制度和新的价值信仰系统，才能具体落实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把现代性的一般取向和民族性的特殊取向结合起来。

在后发展国家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如何调运民族性与现代性是一个既牵涉到民族感情，又涉及社会利益的再分配的复杂问题，处理方法上的得失往往决定了社会变革的规模、范围和整个国家的面貌。毋腐置疑，虽然最早从欧美国家展开的现代化已提供了实行现代化的某种示范，然而非西方国家完全可以从自己的文化背景出发，发展具有自己特征的现代化的形式。

民族主义和民族传统是所有后发展国家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基础，离开自己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特征，照搬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并不能真正使本民族复兴。但是，任何民族特征的社会发展模式又必须具有可与现代文明相通的现代化因素，只有把现代性因素融入本民族文化传统，对传统进行革命性的转换，刺激传统中可现代化因素的增长，才可能为社会变革提供联系历史与现实以及未来的源头活水。然而如何在操作层面具体调适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并不单纯是一个学理问题，它固然与统治阶级是否具有推动社会变迁的明确的意识有关，而且变迁本质上是社会的解构与重构的过程，直接牵涉到社会利益的再分配，因此占据政

治体系中心的统治阶级与传统社会势力的关系及其政策取向，对社会转型中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结合，必然产生决定性影响。

中国在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所遭遇的严重挫折正是统治阶级顽固维护统治集团利益，拒绝以现代眼光看待变化着的事物所必然导致的结果。统治阶级的传统取向使其无法有机融合现代性与民族性，故而不能为中国提供重建政治共同体所必需的新的制度结构，和能被社会各阶层人民共同接受的新的价值信仰系统。

20 年代以后，指导国民党政治行为的基本思路是蒋介石的新权威主义的统治策略。蒋介石的新权威主义统治策略的基本特征是:强调以蒋介石为核心，在中国建立具有中国传统政治色彩，高度集权的新军事强人的统治，以推行兼具历史延续性与变革性的社会发展。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经济落后的后发展国家，促进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对国家的人力与物力资源进行快速积聚，因此，确立权力中枢的权威，由国家对社会实行某种程度的控制性指导，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利用传统建立权威以积累人力与物力资源，并不能真正推动国家的现代化，权力中枢的权威必须建立在社会变革的基础上，只有建立富有活力的政治、经济结构才能真正促进权威的确立，并有效积累社会资源。反之，为了维护统治集团的私利，利用传统抗拒变革，拒绝容纳社会变迁中产生的新的社会力量，忽视社会变革的全面、协调的推进，就很难获得社会成员对现有秩序的支持，执政党和政府的权威既不能真正建立，社会的人力与物力资源也难以集中。

在蒋介石新权威主义统治策略指导下建立的国民党的制度结构，保留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大量痕迹。首先，国民党的政治制度功能分化缓慢，权力高度集中，一切权力最后集中到一个人手中。国民党的政治体系完全排斥权力制衡关系，既不存在党内制约，也不存在社会制约。第二，一党专政的巨大封闭性排斥了带有根本意义的社会变革，蒋氏集团以“中国国情”为由，拒绝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拒绝为中产阶级提供可以影响国家政策制定的参政渠道。为了维持既存的社会结构的稳定，蒋介石把一切要求改革的社会力量均视为是对自己权力的威胁，以“保卫民族传统”为旗号，不惜诉诸武力，一一消灭，选择的是一种中国传统式的统治方法，基本放弃了对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冲突进行调节的和缓方式。国民党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在政治上把被统治者有效地组织起来，因此，它的统治一直缺乏稳定的先决条件，其制度运转的动力并非来自社会各阶层对它的支持，而是完全依赖于军事强权统治。事实证明，国民党对于社会转型的适应是失败的，由于国民党不能把社会变迁的新要求、新内容纳入政治制度的框架，缺乏制度创新的能力，因此国民党不能提供政治制度化的过程，各种群体的要求必然超出这个过程而用其他方式表达出来，逐步形成新的社会和政治中心，最终取代国民党的统治。

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关系紧密。与国民党不能创立新组织架构相适应，国民党也不能为社会提供融合现代性与民族性的新的价值信仰系统。作为国民党的新权威主义思想背景的新传统主义，是一种由蒋介石所倡导，力图在保守儒家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若干西方文化因素，以支持国民党政治实践的意识形态。新传统主义实质上是“中学

为体，西学为用”论的翻版，国民党的既定文化方针是，把肯定儒家思想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竭力以儒家文化作为社会的主流文化，对西方文化则排斥其思想和政治上的多元主义的内容，吸取科技、军事、管理知识。一贯重视从中国传统文化汲取资源的蒋介石，在三四十年代利用政权力量发动了新生活运动和新道统运动，试图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将社会上各种正在滋长的分散的价值纳入官方意识形态的框架，重建民族的新价值信仰系统，最终要求社会成员认同国民党的政治象征，服从或效忠国民党政权。但是这种文化上的努力并不能使民族性与现代性真正得以融汇。作为后发展国家，把若干传统的因素纳入制度框架之中，本是题中应有之义，经过选择和转换的传统因素，可为现代性因素提供赖以发育、成长的土壤；同时，体现了历史继承性的社会变革又可减轻社会转型必然带来的文化脱序和社会震荡。但对传统的借助必须有一个质的规定的限度，一旦越过某种界限，大量传统中的消极因素就可能对现代性因素构成阻滞，最终吞噬现代性因素。蒋介石的新传统主义作为三四十年代中国民族危机和国内政局长期动荡在文化上的反映，它表达了统治阶级和与传统社会相联系的、要求维护固有价值的那些社会力量在文化上的意愿，具有强烈的排斥现代性的取向。被国民党称为民族传统、民族精神集中体现的“礼义廉耻”、“四维八德”之类，完全排斥了现代文明的概念，不仅无法构成民族的新价值信仰系统，反而成了国民党抵御文化自主性发展的政治符号。当蒋介石用传统眼光看待社会变迁时，也只能得出“今不如昔”、“道德沦丧”、“立国精神丧失”的结论。更为重要的是，新传统主义对吸取现代文明所抱持的态度是极端保守的，国民党不是把社会变迁看成是自觉的目标，积极予以促成，而是出于维持现状的需要，欢迎接受现代文明中的物质部分，其着眼点完全基于强化传统的政治和社会结构。

由于固守传统，拒绝了全面的社会改革，新传统主义融合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努力必然遭到失败，国民党的官方意识形态就只能成为口号和说教，根本不能成为民族的精神凝聚中心。国民党集权政治结构的僵硬、保守，决定了它难以整合社会转型中产生的各种新兴的社会力量；官方的意识形态也不能把社会变迁中产生的新价值纳入其主要象征，并植入制度框架；这样，1928 年后建立的政治制度就无法获得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认同，最终国民党不能完成重建政治共同体的任务。独立自主的，能被社会成员在政治上、文化上高度认同的现代民族国家始终未能建立，直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标志着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真正建成。

三、中国现代化的经验与教训

在前现代社会的基础上，中国在与国际社会日益密切的联系中，逐渐从农业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现代社会过渡，这种过渡既有着与一般后发展国家相似的经历，也有中国所独有的特殊性。

中国转变的特殊性受制于过渡过程中的转换机制和转换方式，它充分展现了中国迈向现代社会时所经历的深刻的内在矛盾。中国转变的复杂性集中表现在推动中国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最初阶段的动力并非来自内部，而是来自外部。正是在外部压力的刺历史的风陵渡口激下产生了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如前所述，中国在前现代社会中并无

任何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是一种与忠君思想联系在一起，维系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意识形态，它在历史上虽然发挥过抵御外族入侵的作用，但是在本质上，它与近代国家自主公民所孕育出的现代民族主义有着巨大差别。

从传统爱国主义向现代民族主义转变的中介因素是社会变革，只有社会变革的新因素注入到传统爱国主义中后，爱国主义的内涵才能由忠君、维系帝国统治转移到捍卫自主公民的主权国家的新角度，从而发挥出巨大的社会动员力量。一百多年来，追求统一、富强、民主的强大国家始终是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理想，它与变革、改造传统密切相联，从而产生出一种与传统爱国主义迥然有别的新内容。这个过程始于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的早期维新派，历经康、梁、谭、严，到了孙中山才渐渐成熟。以“民有、民治、民享”为价值目标的孙中山三民主义克服了狭隘的种族论，标志着现代民族主义最终形成。1919 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人走向全面变革的里程碑，从此掀起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巨澜。1938 年由毛泽东揭示的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价值追求的革命民族主义更成了未来新中国的基本原则，对动员广大农民和各阶层人民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发挥了巨大作用。由于近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严重的外部侵略和压力，中国人被迫在追求民族解决与社会进步的变革中把国家统一置于首要地位，迫切要求建立能够有效动员社会资源的强有力的政府，以此作为推动社会转变的中枢。然而，为解决中国所面临的紧迫问题，中国人只能有选择地吸取外来观念，形格势禁，引入的外来观念在与本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许多始料不及的变形现象。这以早期共产无政府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引入中所产生的变形最为严重。1908 年，刘师培最早向国人引入了共产无政府主义思想，刘氏介绍的最大特点，是以中国传统来附会外来学说，结果是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与外来的共产无政府主义学说融汇了，但共产无政府主义学说的原义也就面目全非了。“五四”时期在中国大兴的自由主义在引入中国的过程中也发生了严重的畸变。强调尊重、保护个人基本权利的自由主义在中国被解释为实现富国强兵的有效工具，于是以个人为最后依归的西方自由主义在大多数中国人眼中成为一种失去价值内涵的、属于器物层次的操作工具，导致“民主工具说”、“自由工具说”长期盛行不衰。引致外来观念变形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知识分子深知中国变革的艰难，为了追求富国强兵，使外来观念易于在中国生根，被迫修改原义。这种修正，使社会变革的速度与范围受到严重限制，削弱了对中国传统观念的冲击，使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内核受到的震动大为减弱。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统治阶级出于维护既得利益而作的强制性政策规定，这对中国现代化进程造成了更大的消极影响。国族危亡的形势，虽然会对现代化在各个领域展开的时序产生重大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又不是绝对的，因为统治者可以用不同方式对现代化进程加以引导和塑造，而这种引导和塑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集团的政策取向。例如，1932-1937 年，国民党为了巩固一党统治，有意将抗日救亡与社会变革、个人解放完全对立起来，以“集中国力，抵御外侮”为由发起的“民族复兴运动”，就包含有贬低个人、蔑视个人的强烈的法西斯主义的倾向。[9] 抗战期间，国民党在“抗日至上”、“国家至上”的口号下，公然宣传反民主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

个领袖”的集权主义的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优越论”。其实，现代民族主义的最后依归应为国家统一与人民自由幸福的有机统一，两者互为依赖，缺一不可。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主义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度，如果人民基本权利受到轻视，则极易演变为独裁专制国家，而这种独裁国家并不能走向现代化。同样，现代民族主义不仅包括对国土、主权的维护，而且它也包含对已革新的民族文化的认同，在民族危机的形势下，民族文化尤其能发挥凝聚人民的作用。但是抗拒或限制变革的政治和社会力量的一个惯用方法，就是以保卫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为号召，刺激、煽动狭隘、保守的民族主义情绪，以维持传统的政治秩序和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这就使得中国的变革往往夹缠许多无谓的纠葛，反复循环，不断重演，极大地妨碍了现代化的全面展开。结果，在统治集团的有意识的误导下，尽管新思潮竞相引入，但除知识阶层外，大众心理的变化并不显著，中国人传统的强调差序格局的依赖型的权威人格并未改变。在政治、社会生活领域，人情关系、地域、派系、权谋仍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因素，构成了政治行为与社会人际交往的普遍范式。作为推行现代化的主体的以强调人的自主性为特征的人的观念与行为的现代化的发展程度很低，严重阻滞了现代化的全面展开。这样，如何在强大的国家权力与社会民主之间建立互动的协调关系，始终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造成中国变革曲折、艰难的另一重大原因是百年来的改革仅集中于上层结构，很少波及到下层社会，而农村传统的社会结构根深蒂固，没有受到重大冲击。自 19 世纪中后叶以来，中国所发生的历次改革，由于仅注重上层政治结构的制度创新，屡屡遭到失败。这说明中国的社会转型必须经过农村底层的彻底变革。然而即使 1911 年的辛亥革命也没有对农村产生强烈影响，农村的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以及广大农业人口的生活方式没有得到任何根本性的改变。追求中国现代化的无数志士仁人先是把变革的目标集中于中国传统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以后又致力于改革传统的思想和文化，但很少涉及如何改造以农业为本位的广大的中国农村社会。他们不明白中国所需改革的不仅是上层的政治、法律、思想文化结构，更重要的是改革下层社会结构。占据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数亿农民仍然生活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和少数中心城市的逐步工商化，就构成了社会转型的二重分裂局面。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少数沿海沿江城市的繁荣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的整个面貌。只有在中国广阔的农村进行长期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方式的大变动，以商品经济打破传统的小农经济，才能真正建立起从农村到城市，和从城市到农村的双向变革渠道，从而推动社会真正走向现代化，因此农村底层的重整，就成了决定中国变革最为艰巨而又重要的关键。

总结中国变革的经验，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1）中国的变革与外部世界的挑战密切相联，中国以外的现代化模式对中国变革起着巨大的示范影响。19 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的世界化进程加强了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中国日益卷入与外部世界的广泛联系中。伴随侵略和压力而来的外来观念冲击着中国社会，改变着中国人的观念和行为，刺激了中国人的强烈的变革图存意识和变革活动。外部

世界的冲击具有明显的二元性质，一方面它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现代化的展开(以日本侵华破坏最剧)，另一方面新型的外部现代化成功模式又刺激了中国现代化因素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外部世界的侵略、干预和影响，决定了中国变革的反应模式和中国现代化的规模与速度。

（2）合理地利用注入了变革因素的民族主义，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动力，为中国变革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但狭隘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要求相背离，从而为中国现代化的全面展开制造了无穷的困难。执政者对外部世界的挑战作出反应时，世界观只是一个方面的因素，它固然严重影响了执政者对外部知识的鉴别能力，但维护既得利益则是最重要的因素，统治者只有在变革无碍其统治的前提下才能对变革作出有限的反应，因此在更多的情况下，统治者为了保存既得利益，惯于利用民族主义抗拒变革。

（3）近代以来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的问题上所形成的占压倒优势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维和选择方式，严重阻碍了中国变革的全面展开，使得中国文化的重建难以实现，不能构成现代化的支持条件。虽然在西方世界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的儒家社会在 19世纪末已不可避免走向崩溃，然而在引入西方制度、观念的过程中，由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维和选择方式的广泛影响，儒家社会的基本内核仍保存了下来。致使产生了新形势下儒家传统社会的变形形式:儒家内核加现代化外装。在这种社会形态中，传统的中国农业社会结构仍然十分顽固。政治上的分权制衡与制度建设无从实现，市民社会和全面的市场经济农以健康成长，排斥意见多元和思想自由的独断性的意识形态仍表现出极大的生命力，作为这一切的必然结果，传统中国人的国民性无法得到根本改造。

中国从 19 世纪中叶走上变革之途，至 20 世纪上半叶，有几次现代化的良好机遇。统一的中央权力机构为自下而上的变革提供了保障基础，适时把握住这样的机遇，把传统的连续性和变革的突进性有机结合，进行结构性改革，社会变迁对社会带来的冲击将相对减小，社会也将在稳定与变革的互动状态下，迅速发展。但是外部条件的险恶与内部条件的限制，破坏了这种和平改良的可能性，逼使中国的变革走出另一条途径。然而中国现代化是一历史趋势，客观要求中国人在不断交化的形势下为此目标作出新的选择和探索。1949年国民党政权的崩溃结束了两大统一政权之间动荡的过渡期，新中国的成立又一次为中国现代化的展开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尤其新时期以来中国在新的基础上，以新的思想与精神，置新聚集政治、经济、社会资源，展开前所未有的、深刻的、全面的社会变革。

本文原载《战略与管理》1995 年第 4 期

---

[1] 参见《东华续录》，卷 47，第 15-17 页；另见《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 49，第16 页；苏舆辑:《翼教丛编》卷 6，第 20-21 页。

[2] 参见傅衣凌:《明代前期徽州土地买卖契约中的通货》，《社会科学战线》，1980 年第 3 期。

[3]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1984 年，第 553-557 页，

第 494-495 页。

[4]　　墨子刻（美）:《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 114 页。

[5]　《政府公报》1914 年 1 月 14 日，第 606 号；另见沈家五:《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辑》，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40 页。参见孙科:《筹划救济农村的方法》，载《孙科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第 140页。

[7]　汪敬虞:《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民族工业》，《新建设》，1953 年第 12期。参见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现代评论》，第 4 卷，第 83 期，1926年 7 月 10 日。

[9]　参见刘炳藜:《民族抗日战》，载《前途》第 1 卷第 4 号，1933 年 4 月，第 4-5 页。

第二篇　孙科的宪政理念及其限度

1928　年国民党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后，作为国民党上层集团一员的孙科，面对中国现代化的要求，提出了一系列旨在使国民党摆脱政治困境，以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革新主张。在国家政治体制问题上，孙科最早提出实施宪政的政治主张；在国民党内，孙科强烈反对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呼吁实现国民党的民主化；在经济和民生问题上，孙科从巩固国民党统治基础前提出发，强调用改良的方法尽速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孙科的这些革新主张表现出一定的追求现代化的倾向。然而由于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阻滞革新的思想和势力十分强大，兼之孙科思想的内在限制，孙科的革新努力最终遭到失败。孙科的失败从一个侧面证明，1928　年后在国民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新传统主义思想不能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

（一）

走党治国家的道路，这是包括孙科、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上层集团1928　年对于国家政治体制的一致选择，这不仅是因为孙中山已为国家在进入宪政之前预定安排了一个由国民党以集权的党治形式管理国家的政治阶段，更重要的是，国民党上层集团认为，只有通过党治，才能应付国民党政权所面临的挑战。孙科曾是“以党治国”的积极拥护者，但是随着国内外矛盾的急剧变化和党治弊端的逐步暴露，孙科从一度对党治深信不疑，转而在国民党内最先提出结束党治、尽速实施宪政的主张；到了抗战后期，又近而呼吁实现多党制的民主制。孙科政治主张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他试图为已陷入困境的国民党政权重新寻求政治出路，同时又表明孙科具有蒋介石迥异的迎合世界潮流的倾向。

对于党治问题，孙科的思想曾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1928-1931 年,孙科对于蒋介石以党治确立国民党政治权威的主张和措施虽然在个别之处有所保留，但总的说来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孙科希望通过党治，“造成一个巩固的政局”。[1]但是到了三十年代初，经过几年强调权威的党治实践，孙科发现，国民党并未能使党国权威真正确立，在党国体制下，国民党所面临的困难非但未能被解决，相反却陷入了更为深重的危机。第一，以武力解决地方军事势力，虽有所进展，但终因战事不断，致使国家陷入长期的动荡之中；第二，与前一问题相联系，国家的动荡和国力衰落，促使日本侵华步伐加快，而对于日本侵略，国民党束手无策，“没有丝毫办法”；[2]　第三，单纯依靠武力镇压中共，未能奏效，

以前只有“几千支枪”的江西红军，“现在已有了十万”。[3] 国民党既要垄断政治权力。而事实证明国民党又缺乏能力维持这种垄断，党治弊端暴露无疑。孙科认为，唯一能使国民党摆脱困难的方法就是实行民主政治。

从 1931 年 10 月到 1932 年 12 月，孙科在不同的场合，提出结束训政，“速开党禁”，加快实施宪政的政治主张。孙科呼吁从速实施宪政，是基于以下一些现实问题的思考：

首先，孙科把实施宪政视为争取抗日救国的一个重要条件。孙科认为，“今日最重要解决之问题，莫过于抗日救亡，”可是“要御侮，先要集中力量，培养实力”，然而由于国民党“政权不公开，言论不自由”，人民对国民党党治极度不满，因此国力无法集中。孙科指出：“欲挽危亡”，国民党必须“使政权日渐公开”，“使国民有参与国事，行使政权之权力”。[4]

他强调，只有“建立民主政治”，“于最短期间、结束训政，筹备宪政之开始”，才能“团结国民、集中国力，”[5]“使全国人民之心思才力，咸能贡献与国家之生存。” 孙科说：“主张促成宪政，也就是御侮的方法之一。”[7]

其次，孙科还把促成宪政看成是加强国民党自我调节的一个重要手段。孙科深感“国难日深”，使国民党前途“可胜栗惧”。孙科指出，“数年来之党治，…… 效率低微，国民触望既深，而本党之信仰，亦不免渐致惰失。” 因此人民“批评国民党垄断政权，这是不应责怪的”。[9]孙科说：“以党治国并非以党专政来支配国家，使中华民族在党的训政下讨生活，而是要实施宪政，使人民能够运用直接民权，完成民主政治。”[10] 他进而强调，为了“挽回人心”，国民党必须“进行政治党务改革”，“恢复党的民众立场”，“切实履行本党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各种自由论纲，禁止一切非法干涉，滥行拘捕”，国民党各级党部“绝对不许干涉地方行政及人民组织或言论。”[11] 孙科指出：党治之弊，使“国力无由集中，外侮不克抗御”，唯一的“补救之法”就是促成宪政，[12]否则“本党难辞之咎”。[13]

与国民党内反对实施宪政，认为结束党治将危及国民党统治的人相反，孙科对实施宪政后的国民党前途表示乐观。三十年代初，蒋介石迫与舆论压力，不便在公开场合明确反对实施宪政的主张，但私下却极不赞成孙科的看法，暗中表示“希望他与国民党有较长时间来领导国家”。蒋的亲信黄郛、杨永泰曾建议蒋介石采纳孙科的主张，以减缓国民党所面临的全国各阶层人民要求开放政治的巨大压力，但遭到了蒋介石的“积极反对”。[14]与蒋不同，孙科认为，实施宪政对国民党不是危险而是提供了一个机会，[15]因此对国民党的前景“可以不必顾虑”。他确信只要实施宪政，国民党的政权必能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戴，国民党的政权，“一定可以更加巩固的。”[16]

三十年代初，孙科对于民主价值内容虽有涉及，但更多地是从准备抗日的需要来谈民主宪政。孙科思想的这个倾向到了 1937 年有所变化，而到了抗战后期，他则开始从价值层面和多党制的角度，强调宪政对促进政治现代化的重要作用问题。

首先，孙科肯定了人之应有思想和言论自由是民主政治建成的思想

基础，主张政府应对各种思想以平等的宽容。孙科针对国民党压制言论自由的种种事实尖锐指出，“无言论自由的国家，一定要陷于失败。”[17]孙科批评国民党对“人民从事爱国活动，或发为政治言论者，动辄指涉嫌疑，目为反动”， 要求国民党对于“人民言动，应予涵容”。[18]他指出，除了有关国防军事秘密外，“对于国内政治的主张、意见和批评，…… 都应该可以公开发表”。[19] 他指出，“无限度的新闻检查是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20] “言论统治在历史的风陵渡口太严”，“这就是革命因素。”他呼吁国民党迅速实行言论自由，“绝不能走向法西斯的覆辙”，[21] 不要“制造新的革命，”“自寻苦吃！”[22]

第二，如果承认政府应尊重保护个人的思想和言论自由，那么对谋求实现民主目标的政治参与活动，政府也应承认其有活动的自由。基于这个理念，孙科认为，民主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多党制的确立。他提出，“一党专政是不是民主”。孙科批评国民党“政治没有上轨道”，造成中国政治出现“几种特殊现象”：（１）“一党统治”，“国民党在朝，不容在野党存在”，中国之“政治、军事领导权是握在一个强有力者，即蒋委员长之手”。（２）政府非有人民普选产生。（３）“共产党未能获得法律上的存在。”孙科指出，这些情况，有可能使中国“成为一个极权国家”。[23] 他表示希望“战后中国政治将由几个政党来运用，如果国民党能够保持其真正革命传统，在各政党中仍然是一个最强大的政党，共产党将占第二位，其他政治团体则联合成为一个较小的第三党。”[24]

孙科根据自己对历史的观察，从支持“以党治国”转变到呼吁民主政治的道路，为国民党政权重新设计了一个摆脱困境，走向政治现代化的方案。但是对国民党而言，它自身必须首先具备领导国家走向政治现代化的素质，无庸质疑，国民党的现代化应是实现国家民主化的最重要条件。

（二）

1928 年后，国民党成为中国社会的重心，国民党之成为执政党，并非由选举和议会中的党派竞争中产生，即它不是一般西方型的“内在政党”（inside party），而是由某个政治人物领导的政治运动扩大发展，通过暴力手段，以武力获得政权的 “外在政党”(outside party)。[25]对于这样的革命型政党，在取得政权后，要使党符合现代化的要求，必须具备两个条件：（１）党的民主化问题，即党的组织不是由少数人控制，广大党员必须有自由选择党的领袖并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２）对于党外其他的党派，应允许其存在并和执政党竞争，只有在解决这两个问题后，“外在政党”才能逐渐向 “内在政党”过渡，党的基础才能不断巩固，并能相应促进国家政治民主化的进程。简言之，国民党在取得政权后，是走“革命党”道路，抑或是“民主政党”的道路；是强化“革命”色彩，还是实现向民主政党的转型，不仅决定了国民党政权是否巩固，也关系到中国民主政治的前途。

1928 年的国民党，党的组织结构承接的仍是 1924 年国民党改组后的形式。孙中山吸取苏共建党的经验，确立国民党的组织原则是实行“民主集权制”，与此同时，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解释系统的框架也大致形成，1927 年后，国民党的所谓“革命”已成了专政的代名词，实际控制了国民党的蒋介石使“民主集权制”在实际运用中，完全集中于突出党的领袖权

威，蒋介石还加紧完善党的意识形态系统，以防止其他政治力量接近权力中心。蒋介石的这种方针造成了两种现象：第一，在蒋的个人独裁下，由于缺乏党内民主，国民党党内的各派间的斗争持续不绝；第二，官方意识形态的教化和僵化，使国家政治生活缺乏活力，由于阻滞思想多元化和压制政治参与，国家长期限于政治危机之中。

针对这两种现象，孙科主张，在国民党内应以分权制代替集权制，以选举方式推举党的领导人，防止权威人物以个人权力控制党；对于党外其他政治力量，孙科倾向于在意识形态上持弹性方针，反对单纯依靠武力来解决党派问题，主张为取得对方信任，国民党必须先行“改造心理和作风”。

孙科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对蒋介石的独裁一向不满。孙科与蒋介石的几次冲突皆是由于孙科对蒋的独裁“忍无可忍”，“望无可望”才爆发。[26]在蒋介石个人独裁地位不断加强的形势下，继续维持和蒋的合作局面，使得孙科难以摆脱内心的矛盾和苦闷。[27] 1931年宁粤分裂，孙科对蒋介石多年的不满如大坝泄洪，一时全部释放出来，他发表了大量抨击蒋介石独裁的言论，痛斥蒋介石“以个人支配党，使党成为个人的工具”，把党“改成独裁的党”，[28] 声称，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下，“中国国民党已名存实亡”。[29]

抗战后期孙科出于对国民党前途的严重忧虑，再一次猛烈抨击蒋介石的独裁，要求实现国民党的民主化，孙科批评国民党从 1923 年后，“只是作到集权，却忘掉了民主的意义和方法”，“不允许党外人士批评我们，甚至不允许本党同志的自我批评。”孙科要求健全党的选举制度，孙科批评道：“所谓选举，不管是中央抑或是省部党选举，”“还不是由中央的代表选举自己做代表吗？”他指出，只要党能民主化，国家民主化是可以实现的。为此，孙科呼吁国民党立即改弦更张，“应该坦白地承认过去二十年来，党的机构和作风实在是走错了路”。[30]

孙科在对于其他政党的关系上，这主要具体表现为对待中共的态度，从 1928 - 1946年，虽历经几度变化，但和蒋介石相比，孙科还是表现得较有弹性，较为灵活。从 1927至三十年代初期，孙科虽持反共立场，但在程度上仍与国民党保守派有异。在这之后，由于民族危机加深，孙科与中共的关系逐渐缓和。1932 年 4 月，在《抗日救国纲领草案》中，孙科提出：“除现役军人外，全国人民在不违反三民主义原则下，皆得自由组织政治团体，参加政治”，此已寓含对中共态度的变化。在党化氛围浓厚的三十年代，孙科在对有关三民主义的解释上，也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灵活性，这也为在实际政治层面逐渐调整与中共的关系作了准备。1934 年，孙科提出对三民主义“一定要从主观的感情的宣传”，转向“作客观理智的研究”，即“取法中山先生探求真理的虚心态度，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接受欧洲现代最近代化的思潮”，对三民主义“所包涵的各个问题切切实实下一番研究和补充工作”。既然要“接受”欧洲最现代化的思想，那么马克思主义就回避不了，孙科称赞“马克思能发出前人所未见，”“给欧洲的社会主义者一个具体的实际行动方案”。[31]孙科在三十年代的政治环境下，不能也不愿公开反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但是他在意识形态上善于变通，在他力所能及的工作范围内，曾庇护了一批左翼分子，曲折地反映了他对共产党态度的变化，成为下一阶段公开呼吁

国共合作的前奏。

抗战前夕，孙科共产党态度发生重大转变，他在 1937 年 2 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与宋庆龄等联名提案，呼吁恢复“三大政策”。抗战前期，孙一度对中共怀有疑惧，并曾公开追随蒋介石攻击中共，但到了抗战后期，当预感反共将危及国民党政权前途时，孙科随即改变态度，公开呼吁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反对再打内战。

孙科深知，用武力不能“消灭”中共，“所谓剿共其实是没有法子去做的，因为头一件事未必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所以，“再打内战的时机已经过去了，再走回头做这个工作是不可能的”。[32]为此，孙科强调，对于中共，只能求“政治解决”，而政治解决的障碍即在于国民党具有浓厚的“党国特殊集团”的心理与作风。

孙科批评国民党 1928 年后“自视为一特殊集团”,[33]l 其宣传与政治实践严重脱节，使全党“大失信于国人”。孙科指出，“大凡一个党，或是政治上的一个势力，一旦大权在手，如果不能保持民主的态度，自成了统治阶级，便会成了革命的对象”。他提醒国民党：“不要以为我们的党有几十年光荣的革命历史......便应该永远占着执政党的地位，永远成为中国的统治阶级，”孙科警告道：“这种独尊专制的态度，是当今普天下的人民，不惜流血牺牲，以求其毁灭的。”[34]

抗战后期，国民党内一部分人士希望，通过国民党的民主化，在党内形成一股民主力量，从而分割蒋介石的权力，乃至最后排斥蒋介石，把国民党改造成民主的政党。[35]孙科有关国民党民主化的主张，反映了这种寄希望于现有基础上实行国民党自我革新的思想倾向，它的提出，活跃了国民党的政治过程，反映了孙科追求政治现代化的努力，对于孙科的这种政治态度，中共曾给予欢迎，董必武就曾指出，国民党内要求实行民主，“其中肯讲话而又能讲话的要算孙科。“[36]

（三）

对于 1928 年后的国民党，面对中国现代化的要求，是重视发展经济，关心解决民生问题，抑或是仅强调维护现存社会结构的稳定，忽视经济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的紧迫性，这对国民党政权的前途必定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在国民党上层集团中，孙科是谈论经济和民生问题较多的人。从二十年代末起，孙科或撰文，或演讲，不断呼吁国民党注重经济建设，抓紧解决民生问题，孙科认为.,这个问题能否解决,关系到国民党能否与共产党争取群众，能否巩固国民党政权的基础。

二十年代末，孙科呼吁发展国家经济，主张以经济建设的成效来防止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和中共革命的发展。孙科认为，北伐完成，统一实现，为“国家改造”提供了一个“千载一时的机会”。[37]他强调，“如果革命而没有建设，实在可说是完全失掉了革命的真意义。”和因镇压了共产党而踌躇满志的国民党内大多数人相反，孙科认为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思想“断非一味以消极的武力镇压”就能扑灭下去。”　[38]在孙看来，只有经济建设才能“永塞”共产主义产生的“源泉”，为此，孙科提出要以积极的方法，“消除共产主义之根苗”。他大声疾呼：国民党必须利用刚获取政权后的“千钧一发的时机”，“转移目光”，“商量怎样把三民主义新国家建设起来”。[39]此时，孙科虽然也谈到平均地权问题，但由于共产党

武装力量和农村革命刚刚兴起，他对解决民生核心的平均地权问题尚无紧迫感，相比之下，孙科更把“实业计划”，“发达国家资本”放在建设的首位。孙科声称：“本党今后经济建设第一件事，还是在乎建设国家资本。”[40]

三十年代初、中期，面对“社会动乱，社会危机的加速”，孙科关于先发展国家资本，后实行平均地权的主张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共产党力量的壮大，促使孙科转而把解决土地问题放到突出位置。孙科惊呼“国步艰危、民生凋弊”，“民国以来没有如今之甚至！”[41]广大农民由于“受不良政治的影响，苛捐杂税的勒索”，土豪劣绅的剥夺以及“水旱灾害荒的损失”，加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外力压迫”，早已陷于破产之境。他指出，“农村经济日益衰弱、……整个国民经济根本动摇”，“所以整个国家，竟陷入于震荡的状态中”。[42]孙科以东南沿江沿海一带农村破产为例：由于“东南一带自耕农、佃农、……经济生活最为因苦、社会地位最为低下”，遂使“抗租风潮层出不穷”，而究其原因，“不可不谓租佃制度之不振、佃农生活之过于惨苦而造成。”[43]孙科惊呼，土地问题不解决，对国家“前途是不堪设想的。”孙科承认国民党对于民生政策，“不管是从积极建设方面，或是消极治标方面均没做到”，尤其对“平均地权”到“现在还没有实施”；孙科说，为此国民党“应该在总理遗像前请罪”。[44]

孙科在分析农村经济破产的情况时，对共产党力量在农村的发展极为恐惧。他认为共产党之所以能壮大，“就是以暴动的手段，把土地从地主手中夺取过来，分给一般无以为生的农民”；“农民得到经济上的利益，当然要参加他们的运动”。孙科声称，共产党“攻城掠地” - “这完全是经济的原因”。孙科鼓吹对付共产党和红军“不能单靠军事力量来彻底解决，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用政治的方法，尤其是经济的方法”。孙科强调，平均地权不实现，“非但革命不能成功，恐怕连现在努力所取得的结果，将来亦保不住”。[45]此时，孙科已完全把“平均地权”放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前了。

孙科提出了他的解决土地问题的基本设想：

第 1， 认为解决农村危机的方法在于“调正现有之租佃关系”。[46]此时，孙科批评“地主侵取不当”，指出：“农民经济之崩溃”最终原因，在于农民“无土地以资耕种”，“而地主坐享其成”。[47]一方面，孙科承认农村大地主是反对平均地权的，“因为民生主义实行以后，他们垄断土地的益权，便要受到打击”，但又强调土地所有制问题“错综复杂、颇难分析”。虽然他本人一再呼吁要“迅速实现”耕者有其田，然而在他看来，对于地主的“侵取不当”，只要适当预予以“调正”即可使“人尽其力、地尽其利”、“投机者无所取巧，劳动者各有其地”，[48]这实际上仍是纸上谈兵，完全没有进入到具体改革的实际操作层面。

第　2，　提出一系列改良主义方法，试图缓和地主和农民的严重冲突，以稳定国民党在广大农村的统治。孙科回避了地主土地所有制这个关键问题，提出一些具体的改良方案。孙科的解决方法包括：从速实行累进地价税，向地主发行土地债券，由政府把从地主手中征收的,转让给佃农，由农民分年摊派农产品，抵还所得土地的本息；政府组织土地金融机关，向农民发放耕地资金；成立各种类型的“农民产销合作社”和“消

费合作社”等等。孙科认为，如此“不难使农民恢复其最低限度自给的生活”。[46]

尽管孙科的这些主张出自维护国民党统治的苦心，然而在三十年代根本得不到蒋介石的重视。1934 年 1 月 31 日，孙科提议在全国经济委员会内设立中央地政署，要求从美国棉麦借款款项下，拨出专款，有于土地法的实施。[50]但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对孙科建议议而不决，不了了之。而在这不久，中央政治会议却决定，给在江西进行“剿共”战争的蒋介石，提前拨棉麦借款一部分，作为“剿匪资本”经费。[51]相比之下，孙科的改良主义主张降其格仅是“治标”的方法，因此，不可避免被束之高阁。孙科为加强国民党统治基础的一片“苦心”只能再次落空。

时至抗战后期，随着国民党腐败日益加深，农村民变蜂起，孙科对农村的焦虑感更加强烈，他的态度也随之更趋激进，孙科竟接过共产党的口号，呼吁以打击地主豪绅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希望国民党统治集团迅速采取革新措施，来缓和农村的尖锐的阶级矛盾。

孙科认为，国民党拖延实施平均地权和乡村基层组织全部被土豪劣绅占据，是危及国民党统治、造成新的社会革命的最大因素。孙科分析道，国民党基层政权的蜕化和土地问题难以解决是互为因果的，因为“县以下基层组织都操纵在土豪劣绅手里”，尽管他们“作威作福”、“对人民的生命财产是视同儿戏”，但国民党却把征兵、征粮授权他们办理，“更增加了他们鱼肉乡民的机会”。孙科质问道：“为什么拿这些土豪劣绅作基层的力量？”“为什么还是使土豪劣绅居其位剥削老百姓？”[52]孙科断言，目前存在“很大的危险”，这就是“假使党将来果代表地主阶级和地方上的恶劣势力，我们的革命也要随之变质，国家也要变质”，孙科提出对此“要特别的警觉提防”。[53]

孙科对国民党解决土地问题的保守态度极为不满，他批评国民党对于土地问题的解决，“既没有采取革命的方式，和平方式又行不了，十多年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他指出，由于国民党在乡村依靠大地主和土劣，使“坏人潜伏在政府里面为所欲为”， “土地问题一千年都没有办法解决；即使依靠行政院地政署来办，再办一百年也不行”。[54]

孙科掩饰不住对国民党前途的焦虑，他慨叹土地问题无法解决，“这真是不得了”，“这将会弄到农民暴动，会发生新的社会革命！”他直言不讳道：“本党成功与失败的关键就在于是否能和中共争夺群众的拥护。”国民党“已给反对党以可乘之隙”，“国民党愈不行，政治愈腐败，……就愈是他们宣传的机会”，国民党“已不知不觉在替人家造机会”，“造什么机会？革命的机会，革谁的命？革我们自己的命！”[55]

那么有何种方法来解救国民党在农村的严惩危机呢？孙科提出“解决土地问题，一定要靠老百姓才行”。可是他又清楚，在“国民党现在的作风下，”平均地权根本无从实行。孙科呼吁革新基层政治力量，可是拿什么新生力量去替代基层的土劣呢？对此孙科也是一筹募展，尽管他曾批评过三青团“类似盖世太保”，但他还是提出派几十万三青团员“深入农村”，把土劣“换掉”，“镇压下去”。孙科认定“革命是不必的”，“因为政权还在我们手里，”[56]但是，在既有的基础上又无法解决这些矛盾，孙科陷入了不可摆脱的困境。

（四）

1944 年 11 月，孙科在《纽约时报》撰文，畅谈他长期以来对在中国实现英美民主制度的理想。他写道，中国要“实现孙逸仙博士的理想”，“必须先有贤明的政治领导，使中国及其人民迈向民主政治的目标前进”。孙科并十分具体地描绘了在“贤明的政治领导下”，中国未来的景象：“建立民主的代议制政府”，“扫除封建地主及富豪军阀压迫和剥削农民的行为，而鼓励其将精神和资本从事于现代工业”，“改变广大的农业人口使之成为中国未来工业的国内销场”。[57]这些话反映了 1928 年后孙科自居“贤明领导”，主张以渐进的方式促进国民党革新以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的思想特征。然而，孙科的一系列有关宪政和革新的主张始终不被国民党最高统治者蒋介石所重视和采纳。1946 年下半年，随着国内政治环境的急剧变化，孙科从自己原来的立场全面后退，停止革新宣传，转而支持蒋介石的政策。这样，孙科长期为之努力的推进宪政，革新国民党的活动也就失去了全部意义，宣告彻底失败。导致这样的结果的原因是复杂的，它是由孙科所处政治地位的特殊性，他的思想的内在矛盾等诸因素与当时政治环境互为作用而促成的。

笔者认为，考察孙科的宪政理念和他的革新活动的成效得失，必须对其在民国史上的特殊地位有所认识：

第一，孙科是中华民国开国总统、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唯一的儿子。国民党奉孙中山为“国父”，孙科有“国父哲嗣”的特殊家世背景，使得孙科从政或发表政见，都比别人有较多的自由度和便利条件。

第二，孙科自青年时代起即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尽管与其他人相比，他的革命历史并不雄厚，但是孙科较早涉足政坛，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孙科历任要职，是国民党统治集团重要成员之一。

第三，孙科青少年时代长期在美国接受教育，受美式自由、民主思想的浸润较深，其思想、作风具有显著的“西化”色彩。

上述三个方面的特点决定了孙科在民国政坛上的际遇和其所扮演角色的特殊性。

孙科的特殊身份使其始终处在民国政治的中心，国民党内的各种政治力量、社会上的不同的政治派别，都希望得到孙科的支持，他长期是各方争取的对象。

孙科虽较早参加革命，但他在政坛上的高位却非个人努力所得，他从未有过基层工作的经验，更无军方的背景。虽位居显赫，但政治与组织资源有限。因而，孙科在军事性格突出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中，始终处于非主流的地位。

孙科是国民党内自由派的代表，他的政治理念具有较为鲜明的自由主义色彩。他的举止作派、行事风格也具有美式政客的特征。1928 年后，蒋介石占据了国民党的中心，蒋的统治方式具有较为浓厚的中国传统政治的特征，在这种环境下，孙科的思想理念，美式作风与国民党的主流文化显得格格不入。

由于孙科始终未能成为国民党的重心，他在政治上的高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孙中山先生的崇高声誉而得到的，孙科虽然有政治上的抱负，但他的周围只是松散的聚集着一批文职官僚，尤其在国民党军队内没有支持力量，这使孙科在和蒋介石的争斗时，缺乏有力的后盾。1927 年后国家的统治权掌握在蒋介石手里，他不和蒋合作，就不能发挥他在

政治上的作用，为了不与蒋介石破裂又不能不作出一定的妥协。蒋介石深知孙科的弱点，对其采取一打一拉的策略。蒋介石一方面要借用孙科“总理之子”的金招牌，故对孙不时施以小惠加以拉拢；另一方面，又不满孙之“离经叛道”，不断指使手下向孙科施放冷箭。在危局重重时，蒋介石起用孙科，用以推卸责任，一旦渡过难关，又将孙一脚踢开。更多的时候，只给孙科一个位尊而无权的空位，对其实行“冷冻”。1931 年初和 1948 年年末——1949 年春，孙科两任行政院长，为时皆极短。最后一次，国民党政权已是夕阳残照，孙科扮演的已是皇陵看守的角色。于是，孙科被迫辞职出走。由于孙科政治性格的软弱，他在和蒋介石的关系上，下野时是一种态度，被蒋介石拉拢时，又是另一种态度。这种政客作风使孙科在社会视听上，一直印象不佳。孙科的动摇性和软弱性在与蒋介石冲突时表现尤为突出。

孙科的宪政理念和革新主张也有其内在的矛盾。

（1）孙科的民主思想具有明显的不彻底性，由于较多地从形式层面理解民主的意义，导致歪曲民主政治的全面含义，从而形成了与国民党主流思想的沟通之处。

孙科在理念上一向欣赏英美民主制度，但他又不认为中国一定要以西方政治体制的形式为样板。孙科多次宣称，民主主要是法律制度与选举程序的完善，他尤为强调民主之所具有的手段功用。三十年代中期，孙科在主持起草《五五宪草》时，反复强调，一部宪法对于现代国家政治稳定的作用。从理论上讲这并不错，然而宪法的意义并非仅仅在于其具备完善的法律条文，宪法应以维护人权为前提，即在法律之后还应有一个更高的原则，正如海耶克所说，应具有“超于法律的信条”，表现为一种尊重人权的政治理想，所以宪法的价值并不仅仅在条文完备的形式方面。但是在孙科那儿，这一切均在考虑“中国国情” 的托辞下，遭到严重的扭曲。孙科声称，中国只能从“中国国情”出发，“自出心裁”制定宪法。[58]　那么什么是中国“国情”呢？孙科说，国民党的“政治背景和革命历史”就是中国“国情”，[59]结果根据这种中国“国情”制定的宪草，虽具法律形式，却无民主内容，只是给党治披上了法治的外衣，致使《五五宪草》“其极权趋势实超过现代任何总统制之民主国家。”[60]正如著名历史学家郭廷以指出的，中国现代化所以不够彻底，乃是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内容了解不多，认识不足，结果“西方文化的内容也就所剩无几了”。值得注意的是，孙科并非不了解西方文化，只是他一意为维护国民党利益而强调中国“国情”，恰在这点上，孙科与基于同样目的也强调中国“国情”的蒋介石构成了共识。

从现代化的要求看，对意识形态的频频强调，往往会扼杀民主之需要的思想多元化的发展。在诉诸意识形态的问题上，与蒋介石等相比，孙科确实较为灵活，但最终还是难以摆脱国民党意识形态的桎梏。孙科相信惟有三民主义可作为社会的统宰思想，这种唯我独尊的立场自然排斥其他思想，极易演变为政治上排斥异己的行动。

（2）国民党内的新传统主义主流思想的力量过于强大，构成了妨碍改革的巨大阻力，由于孙科缺乏广泛的党内和社会的支持，在新传统主义的进逼下，只能步步退缩，无法在国民党内形成对决策有影响力的压力集团。

1928 年后，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代表，形成了一种保留了大量传统痕迹，试图在现代与传统中寻求妥协的新传统主义，蒋介石并不主张复古，但强调认同传统，倾向于以传统的方式建立社会政治和文化秩序，在统治方法上具有中国传统政治的浓厚色彩。面对时代的压力和现代化的要求，蒋介石可以赞同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主要集中在管理、技术层次，如三十年代启用一批受西方教育的专家主持经济工作），但更强调用确立国民党权威的方法来维持既有秩序的稳定。1928 年后，国民党试图在内外压力的环境下建立一个新秩序，以权威的确立为国民党的首要任务。蒋介石把中国传统文化和孙中山作为整合社会的精神资源，强烈地排斥共产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三十年代以后，面对国土的破碎，蒋介石更重视用传统文化来弥补民族主义的缺损，在蒋介石、戴季陶、陈立夫等推动下，文化上的本土主义与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互相补充，新传统主义成为国民党决策层的基本理念。1933 年，孙科在制定宪草初稿时主观上是希望确立某些民主原则的，但遭到保守派的限制，戴季陶写信给孙科，告诫要考虑中国“国情”，“立法不可作悬想”，[61]逼迫孙科在宪草中减少对总统权力的限制。在戴季陶等的压力下，孙科只得步步退让，草案每修改一次，总统的权力就扩大一步。与国民党主流思想拥有广泛的党内基础相比，孙科的基础极为薄弱。五四以后，英美自由主义在中国虽然一直受到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的拥护，但无法深入民间。随着中国政治的剧烈变化，自由派知识分子分化十分明显，其中大部分人投入激进的革命运动方面，而少量温和的知识分子又难以形成一种超然于政治之外的具有独立思想倾向的自治团体。因此，孙科无法从这些人处得到有力的支持。孙科在国民党内本来就势单力薄，在他身边的一个政治圈子是基于利益追求、政见相似以及慕仰孙科显赫的家世背景等因素结合起来的，一旦缺乏利益保障，其成员流向主流派势在必然。更重要的是国家统治权已掌握在蒋介石手国，孙科既不可能重起炉灶，那他只有在获知于蒋介石之后，才有可能实现其理想。为了不与蒋破裂，孙科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妥协，这就使他政治态度游移而善变，虽然谈了许多政治理想，但在现实上却更倚重于与蒋介石的关系。加之孙科既有西方色彩，又具有中国特色，两者之中和产和产生的能量有限。诸种因素相互作用，所以，孙科及其政治圈子在国民党内注定难以形成对决策产生影响的压力集团。

（3）孙科面临一系列无法摆脱的矛盾，这些矛盾使孙科陷入困境，只得屈从于国民党的主流势力。首先孙科无法解决民主政治所要求的扩大政治参与，和国民党鼓吹民族危机加深应加强集权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三十年代初，孙科开始进行积极的民主宪政的宣传，然而此时日本侵华步伐日益加剧，国民党内随之兴起一股模仿德意法西斯，以图民族复兴的极权主义运动，一批蒋介石的亲信、学生在“复兴民族”的旗号下，制造对蒋介石的个人崇拜，散布“在中国实行民主还不成熟”的论调，[62 与此相呼应，社会舆论界也存在一股要求实行极权的思潮，部分知识分子赞同国民党为加强权威而采取的措施，认为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下，强权政治或许是抵御外来侵略的有效途径。三十年代中期，关于中国是走民主或独裁道路的讨论即反映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对实行民主政治的怀疑和困惑。这种以“复兴民族”的面目出现的要求实现极权的社会

舆论，对孙科形成很大的压力。面对这种打着民族主义旗号向民主主义的进攻，孙科无力抵御。

孙科面临的又一个困境是，民主政治实现所要求的稳定的社会环境与现代中国缺少这种环境的矛盾。孙科尽管一直醉心于英美式民主制度，但民主成长所要求的稳定的社会环境在中国三十—四十年代根本不存在。托克维尔说："民主不能在风暴中产生"。四十年代后期，国共双方冲突加剧，国统区政治经济日益不堪，形格势紧，在危机中，国民党的权威性格更加明显，孙科等只得噤口。在国民党统治即将陷入总危机的状况下，由于孙科与国民党的深厚历史渊源，其在感情上和国民党已难解难分，他只能选择与国民党政权共沉浮的道路，孙科的革新主张遂丧失全部功能，最终汇入国民党主流思想。

孙科的失败证明，新传统主义不能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1928 年后，国民党排斥了中共，试图单独领导中国现代化。国民党以新传统主义作为思想和政策导向，在维持现存的社会结构的前提下，虽然也作出了有限度的变革，但又竭力限制变革的范围、规模、速度。国民党不能正确处理权威与政治参与的关系；同时不能有效解决政治稳定与乡村土地改革的关系，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并非一味因循不变，满足农村多数人对土地的要求，即可带来政治稳定。本来政治中心权威之建立是现代化进行的一个必要的条件，但是，对权威的强调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就影响到对现代化其他条件的调适。五四以后，民主的要求并非是个别或局部的现象，但国民党以种种借口（诸如人民缺乏实行民主的心理准备等）拒绝迅速开放政治。尽管在社会各阶层的压力下，国民党曾被迫许诺开放宪政，但是又尽量推延，对民主实是口惠而心不至。蒋介石自任肩负实行孙中山理想的历史使命，自我圣化，又具强烈的军事性格，将一切要求自由的力量均视为对自己的威胁，不惜诉诸武力，一一消灭，选择的是一种类似极权主义的统治方法。实施极权在特定条件下只能是一权宜之计，况且国民党完全缺乏实施极权所必须具备的机动性和高度效率。面对这样的状况，国民党并不思转变和自我改革，结果导致国内政治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客观上促成了反对力量的成长。国民党一直试图借助民族主义的若干符号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抗战初期，全民拥戴国民政府，使国民党的政治权威接近于形成。但权威即使形成，也很脆弱，还需要进一步的革新措施来培植权威的基础。国民党对此不予努力，"一切因循守旧"，于是当民族主义的最初冲动沉寂后，国民党制度上的保守与僵化很快就耗尽了民族主义的感情，造成人民普遍的心理受挫，引发了人民对国民党的失望。实践证明国民党融合传统与现代化的努力未能成功。由于国民党丧失了自我改革的能力，无法作出适应现代生活所需的变通，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终至崩溃。

孙科在民国史上的际遇表明，在蒋介石占主导地位下的国民党上层集团中，国民党内的自由派不能真正影响国民党的决策。在国民党内，蒋介石为代表的传统主义占压倒优势。一党专政、领袖至上、崇拜武力成为国民党的统治性格。孙科在国民党内本来就势单力薄，活动天地狭小，一直未能形成气候。另外，孙科自由主义的高峰时期是美国对华影响较大的抗战后期，此亦表明国民党内的自由主义的非本土性。一旦美国出于自身需要调整方针，国民党内的自由派马上就陷入困境。

至于孙科本人原乃一读书人，身上颇具某种书生气质。其在民国政坛上咤叱风云几十年，风云际会，扮演各种角色，也许是一场历史的误会。他的名声很大，事功却不显著。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孙科的主张尽管未能实现，但他向我们展示了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时期，在中国错综回流的环境下，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国民党上层人士在追求实现民主政治的目标上所能企及的高度。孙科有其政治抱负，有所追求和期待，但囿于环境、地位的制约，他有时能固守自己的观点，有时又向现实妥协，然而这种矛盾在孙科那里可以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孙科的思想常常一波三折，前后互异，这恰是他的地位、性格与环境等因素互相作用的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这些表现使孙科具有现代政治人物若干特点：多变、不独断、不固执、意识形态色彩淡化、对事物持弹性态度。这种态度活跃了政治过程，向社会公众展现了中国政治人物向来缺乏的一个侧面，从而反映出过渡年代中国自由主义命运的某些基本特征。

注释：

[1] 孙科：《倒蒋之理由与趋势》，《中央导报》，第 3 期。

[2] 孙科：《三民主义的建设》，《孙科文集》第 25 - 26 页台湾商务印馆 1970 年版，（以下简称《文集》）。

[3] 孙科：《今后的党务工作》，《中央导报》，第 12 期。

[4] 孙科：《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中国的前途》，第 210 页，重庆商务印馆 1942
年版。

[5] 孙科：《担任立法院长的使命与今后的希望》，《文集》第 258 页。孙科：《实行宪政之意义与国民应有之认识》，《文集》第 256 页

[7] 孙科：《担任立法院长的使命与今后的希望》，《文集》第 259 页。孙科：《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中国的前途》，第 210 页，重庆商务印馆 1942 年版。

[9] 孙科：《担任立法院长的使命与今后的希望》，《文集》第 260 页。

[10] 孙科：《在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的闭幕词》，《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执委会第一次会议记录》，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二档馆藏。

[11] 孙科：《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中国的前途》，第 210 页；孙科：《抗日救国纲领草案》，上海《时事新报》，1932 年 4 月 24 日。

[12] 孙科：《实行宪政之意义与国民应有之认识》，《文集》第 257 页。

[13] 《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中国的前途》，第 211 页；孙科：《抗日救国纲领草案》，上海《时事新报》，1932 年 4 月 24 日。

[14] 邓元忠（邓文仪之子）：《新生活运动政治意义阐释》，载《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文集》，第 31 页；另见刘建群：《银河忆往》，第 233 - 34 页。

[15]Lloyd E.Eastman,The Abortive revolution,p164,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16]　孙科：《担任立法院长的使命与今后的希望》，《文集》第 261 页。

[17] [20]、[21]孙科：《怎样促进民主》，《三民主义新中国》，第 52 - 53 页，重庆商务印馆 1942 年版。

[18] 孙科：《请特赦政治犯案》，《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执委会第三次会议记录》，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二档馆藏。

[19] 孙科：《说左右》，《三民主义新中国》，第 78 页。

[22][52]、[54]、[55]、[56]、孙科：《一得之见》，《三民主义新中国》，第 85 - 87页，第 91 页。

[23]、[24]、[57]孙科：《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前途》，《三民主义新中国》，第 24 - 26页。

[25]Maurice Duverger, Politics Parties : Their Organiz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fate,转引自胡佛：《论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载《现代化与民族主义》，第93 页，台湾中国论坛社 1980 年版。

[26]、[29]孙科：《倒蒋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前途》，《中央导报》第 1 期。

[27]　孙科：《在广东省党部纪念周的报告》，《广州民国日报》1931 年 5 月 26 日。

[28] 孙科：《以民主集权制消灭独裁》，《中央导报》第 5 期。

[30] 孙科：《政治民主化，经济计划化》，《三民主义新中国》，第 30 页。

[31] 孙科：《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发刊词》，《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创刊号，1934 年1 月 1 日。

[32] 孙科：《怎样应付当前的困难问题》，《三民主义新中国》，第 67 - 68 页。

[33] 孙科：《世界潮流和我们的作风》，《三民主义新中国》，第 61 页。

[34] 孙科：《政治民主化，经济计划化》，《三民主义新中国》，第 31 页。

[35]　参见甘祠森：《回忆三民主义同志会》，《近代史研究》，1982 年第 4 期。

[36]董必武：《大后方的一般概况》，载《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情况资料》，第181 页。

[37] [40] 孙科：《三民主义的建设》，《孙科文集》第 25 - 26 页第 24 - 24 页。台湾商务印馆 1970 年版，（以下简称《文集》）。

[38] 孙科：《训政与建设》，《再造旬刊》，第 24 期，1928 年 12 月 7 日。

[39]　孙科：《建设大纲草案及其说明》，《再造旬刊》，第　21 期，1928 年 10 月 7 日。

[41] 孙科：《请迅速改革租佃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案》，《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执委会第二次会议记录》，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二档馆藏。

[42]、[47]、[49]孙科：《筹划救济农村的办法》，《文集》，第

637 - 640 页。

[43] 孙科：《请迅速改革租佃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案》，《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执委会第二次会议记录》，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二档馆藏。

[44] 孙科：《由亡国的路转到救国的路》，《文集》，第 30 页。

[45] 孙科：《由亡国的路转到救国的路》，《文集》，第 30 页。

[46] 孙科：《请迅速改革租佃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案》，《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执委会第二次会议记录》，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二档馆藏。

[48] 孙科：《“土地政策述要”序》，《文集》第 1305 页。

[50] 《中国国民党党中央执委会政治会议第 391 次会议记录》，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二档馆藏。

[51]《中国国民党党中央执委会政治会议第 394 次会议记录》，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二档馆藏。

[53] 孙科：《向民主宪政的大道前进》，《三民主义新中国》，第 48、49 页。

[58] 孙科：《我们需要何种宪法》，《文集》，第 263 - 264 页。

[59] 孙科：《宪草的精神》，《文集》第 269 - 274 页。

[60] 陈茹玄：《增订增订本中国宪法史》，第 232 - 233 页。

[61] 戴季陶：《为宪法事至孙院长书》（1934 年 3 月 7 日），载胡春惠编：《民国宪政运动》，第 747 页，台湾正中书局 1978 年版。

[62] Maria Hsia Chang, The Chinese Blue Shirt Sosiety, pp.121-122,University of Calitornia Berkerly Press,1985.

第三篇　对“肃AB团”事件的历史考察

距今 69 年前，一场大规模的革命恐怖浪潮席卷中共领导的江西苏区。在一轮名曰「肃AB 团」的大清洗中，几千名红军官兵和根据地内的党团员及普通群众惨遭杀害[1]。干此事的并非中共的死敌——蒋介石和国民党，而是根据地的中共党组织和由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这段史实以后随着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地位的上升被完全改写。直至80-90 年代，在撇开毛的个人责任的前提下，当年这场事件的大致轮廓才初步显现，但仍有许多晦暗不明之处。本文所要研究的是：毛泽东为何要在红军和根据地内发起「打 AB团」？毛为大清洗寻找的依据是什么？大恐怖与建立新社会有什么关系？为甚么毛在掌握中共实权后不再采用「打 AB 团」的方式解决党内矛盾？

一、事件的起因：以暴力维护领导权威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革命运动中声誉鹊起始于 1927 年国共分裂后，最先走上武装反抗国民党的道路，从此成为中共武装革命的著名领导人。在这之前，毛虽是中共建党元老之一，但是在 1921-27 年，党的声光全被陈独秀等所占，尽管毛被公认为农运专家，然而还是属于年轻一辈，对党的决策不起任何主导作用。

国共分家，中共潜入地下，革命的中心地带逐渐从城市转向农村，党的斗争形式、组织构成和党的性格均发生了深刻变化。由于中共已从合法政党转变为秘密政党，列宁主义党的民主集中制已完全制度化，中共中央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司令部的权威也基本确立，由此中共开始了军事共产革命阶段。进入军事共产革命阶段的主要标志在于 1927 年后，中共破天荒地有了自己控制的地盘——红色区域，从此中共可以在这些地域公开推行自己改造中国的革命政纲，这是中共自成立以来从未遭遇过的新情况，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崭露头角、声名大振，使党的声光逐渐聚于其身。

毛泽东无疑为中共革命立下最大的功勋，他在江西农村的努力及其实践为中共开辟了一条新路。但是在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初，毛只是党领导下的武装同志，必须接受来自上海的中共中央的领导，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毛不仅不是党的名正言顺的领袖，甚至在江西苏区，毛的个人权威也还未彻底巩固。

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是靠熟悉农村和农民情况、善于领导军事斗争起家的，然而中国现代革命战争与历代农民战争有一个重大区别，即反抗

国民党的武装革命是受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党为武装革命提供了意识形态的义理系统，并拥有对这套义理系统的充分解释权。党还为武装革命提供组织框架和干部来源，党不仅有建立革命武装的发号施令权，也有任命干部、调动干部的组织指挥权。尽管毛在创建红军、开辟红色根据地方面功劳盖世，但他仍受到党的制约。

1927-29 年，毛泽东在江西辛勤开拓，对受制于上海中央虽多有不满，但基本上对中央持顺从的态度。毛在理论方面虽不时有越轨之举，但其言论大致均在中共中央意识形态的框架之内。毛在组织关系上，也未有明显的越权行为。毛经常向上级党委和中共中央书面汇报根据地的斗争情况。

中共中央是以颇为欣赏的态度看待毛泽东在江西创造的这番事业的。1928 年中共在莫斯科召开六大，在毛未出席的情况下，将毛选入中央委员会。总的来说，上海中央对毛的活动，包括毛在江西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是乐观其成的，尤其在 1929 年发生的朱德与毛泽东的争论中，中央表态明确支持毛，促成了毛在江西苏区领导地位的确立。

1929 年古田会议后，毛泽东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已经初步形成，促成毛领导权威形成的两个最重要条件都已具备：一、中共中央对毛的明确支持为毛的权威提供了法理基础；二、毛的事功突出，在他的领导下，根据地地盘扩大，人口增加。一度与毛意见相左的朱德，因军事失利，威望有所损失，毛的军事成功则为毛的权威提供了事实基础。作为毛领导权威的具体体现，1930 年，毛担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在统一的苏区党领导机构尚未建立的形势下，毛所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成为江西苏区最高领导机构。在战争环境下，军队是维系苏区存在的最重要的柱石，军-党-苏维埃政权，已实现高度的一体化，毛于是成为江西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上海中央的指示只有通过毛才得以在苏区贯彻。毛所具有的这种特殊地位，使其获得了很大自由——毛从此拥有对中央指示的灵活解释权，毛完全可以把自己的意见与中央的意见合而为一，以中央的名义强制推行。然而毛毕竟不是中共中央，在苏区内部仍有部分红军和党组织援引中共中央来消极对抗毛的新权威。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初是中共武装革命的草创年代，一时豪雄四起，在反抗国民党的大目标下，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被暂时掩盖。但根据地内，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矛盾、留苏干部与国内干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干部与农民出身的干部的矛盾仍然存在，使之可以凝聚的唯一力量来自于中共中央的权威，包括中央提供的意识形态义理系统的理论权威。只是此时的中共中央远离乡村，城市中央对根据地的领导必须通过毛泽东来体现，因此，毛个人的识见、智能、人格因素和作风态度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毛是江西苏区所有武装同志中最具政治眼光、意志最为刚强的，且最善用兵打仗，但其人作风专断，使许多军中同志对其「敬而畏之」[2]。在 1929 年的朱、毛纷争中，朱德因其为人宽厚、作风民主，得到红四军（红一方面军前身）多数干部的同情和支持。1929年 7 月陈毅赴上海汇报请示中央对朱、毛纷争的意见，中共中央明确表态支持毛。陈毅返赣后，亲自请毛出山，朱德、陈毅为忠诚的共产党员，一切服从中央，重新理顺了与毛的关系，使红四军内部的分歧和矛盾得以化解。但

是，毛与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分歧却因各种原因而尖锐化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发生了毛泽东「打 AB 团」的大清洗。这场事变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刚刚建立，却遭到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挑战，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违抗自己权威与意志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而不管这种反对力量是来自红军内部或是地方党组织。为了维护自己在根据地的权威，毛一举挣脱党道德和党伦理的约束，不惜采用极端手段镇压被他怀疑为异己力量的党内同志。

毛泽东用流血的超常规手段解决党内纷争，究竟要达到甚么目标？一言以蔽之，毛要做江西苏区的列宁，由于此时毛尚未成为中国党的列宁，不具号令全党的法理权威，他才不惜采用极端手段镇压党内的反侧。

二、镇压「反革命」，何愧之有

将大规模的恐怖施之于党内和军内，与党道德和党伦理存在巨大冲突，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毛泽东自有办法。他声称：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党和红军已被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所控制，为了挽救革命，必须对之进行彻底改造，这样，毛的镇压就有了思想的旗帜。

李文林是知识分子出身的赣西南党与红军的创始人之一，与毛泽东及红四军的关系一度十分密切。但是到了 1930 年初，经历多次组合的江西地方红军和赣西南党团机构在若干问题上与毛泽东产生了意见分歧，和毛泽东的关系也日趋紧张。

赣西南方面与毛泽东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1）土改政策问题。赣西南方面主张执行中共六大关于「没收豪绅地主土地」的决定，反对毛泽东提出的「没收一切土地」的主张。（2）军队及地方党机构的归属及人员配置问题。

1929 年 11 月底，毛泽东提出合并赣西、湘赣边界两特委，成立新的赣西特委，毛并决定将李文林领导的红二、四团合并到彭德怀部另成立红六军。赣西南方面则认为此决定须经中共中央及中共江西省委批准才能生效。1930 年 1 月，毛泽东任命红四军干部刘士奇、曾山组成赣西特委作为领导赣西南等地的最高机构，但是却受到赣西南方面的抵制。

为了解决与赣西南地方红军、党团机构的矛盾，毛泽东于 1930 年 2 月 6-9 日，在赣西特委所在地吉安县陂头村召开了由红四军前委和赣西南方面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江汉波也以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身份参加会议，刘士奇等作为助手配合毛泽东组织了这次会议。

在「二?七」会议上，两个月前经中共中央批准恢复了对红四军领导权的毛泽东，在刘士奇、曾山的帮助下，发动了一场对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团机构负责人的激烈斗争，这场斗争为日后掀起「肃 AB 团」运动埋下了火种。

毛泽东等列举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团机构负责人的「严重政治错误」主要有两项：（1）毛等批评赣西南负责人江汉波、李文林提出的仅「没收豪绅地主土地」的主张，是「完全走向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的路线」，指出「由此发展下去势必根本取消工人阶级争取农民的策略，走上托拉茨基陈独秀的道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全部」。（2）毛

等指责江汉波等用「非政治的琐碎话，煽动同志反对正确路线的党的领袖」[3]——这里所提到的「党的领袖」，是指毛泽东派任赣西特委书记的刘士奇。

由毛泽东主持的「二?七」会议将赣西南方面的负责人扣上「富农份子」的帽子，宣布开除江汉波的党籍，李文林被调离出主力部队，转任地方工作。2 月 16 日，由毛任书记的红四军总前委发出《前委通告第一号》，正式宣布开展「肃清地主富农」的斗争，通告指出[4]：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败。联席会议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的布尔塞维克化。

「打倒机会主义领导」在此前还是一个党内斗争的概念，这个 1927 年「八?七会议」前后始出现的概念，也只是宣布改变陈独秀的路线并中止其在中央的领导职务。在这之后，中共虽已愈益强调思想统一，但党内还保留了若干大革命时期民主传统的痕迹。依那时的党道德和党伦理，不同意见仍可在党内争论，中共中央或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则拥有最终裁判权，未闻有将持不同意见的党内同志予以肉体消灭的事例，但是到了 1930 年，毛却将「打倒机会主义领导」与肉体消灭结合起来。将一个党内斗争的概念转变成一个对敌斗争的概念，这中间需要过渡和转换，毛泽东轻而易举就找到了这个中介环节。他宣布，党内机会主义领导本身就是地富反革命份子，从而将对敌斗争的口号——打倒国民党、消灭地富反革命，与党内斗争的概念「打倒机会主义领导」顺利地衔接起来，一举获得了镇压的正当性，所谓镇压有据，消灭有理。1930 年春，在苏区内已流传国民党「AB 团」进行渗透破坏，其组织已被陆续破获的消息，根据地的对敌警惕气氛空前高涨，在这样的形势下，毛完全可以用「镇压反革命」来要求红军和根据地的党组织、苏维埃政权全力支持和服从镇压「AB 团」的政策。

1930 年「二?七」会议后，革命恐怖的气氛在江西苏区已逐渐形成。赣西南特委在书记刘士奇的领导下，遵照红四军前委《第一号通告》的精神，率先发动「肃 AB 团」的宣传攻势。6 月 25 日，中共赣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印发了《反改组派 AB 团宣传大纲》，命令各级组织：如发现群众中有动摇表现不好的份子，应捉拿交苏（维埃）政府究办，凡出来生疏的经过赤色区域必须严格检查，如有嫌疑应即拘捕交苏维埃政府，赤色区域内的民众流通应持所属苏维埃通行条子。

工农群众只有阶级之分，不要顾至亲戚朋友关系，凡是来到自己家里或发现其它地方有行动不对的人不论亲戚朋友，应报告苏维埃拿办。

《大纲》同时号召「实行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以「肃清红旗下的奸细」：「现在各级苏维埃应加紧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捕杀豪绅地主反动富农份子以示警戒，但是杀人要有反动事实可证，严禁误杀。」[5]这份《大纲》虽然提到杀人要有证据，严禁误杀，但是恐怖大门一经打开，事态很快就失去控制。

1930 年 7、8 月间，「肃 AB 团」迅速从基层清洗转移到上级机关。8 月，李文林出任根据李立三攻打大城市命令而新成立的江西省行

动委员会书记。在「打 AB 团」的积极性方面，李文林并不输于前任特委书记刘士奇，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赣西南特委在 1930年 9 月 24 日印发的《紧急通告第 20 号——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 AB 团》文件中宣布：「红旗社列宁青年社，赣西南政府，都有 AB 团的小组……所有混入在党团特委的赣西南政府的 AB 团份子全部破获。并将各县区的组织通通供报出来了。」

这份《紧急通告》还详细规定了「肃 AB 团」的审讯方法和处决人犯的基本原则：「AB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招供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去继续不断的严形（刑）审问，忖度其说话的来源，找出线索，跟迹追问，主要的要使供出 AB 团组织，以期根本消灭。」一经发现「AB 团」份子，下一步就是枪毙。《紧急通告》要求 ：对于首领当然采取非常手段处决，但须注意，在群众大会中由群众斩杀。……富农小资产阶级以上和流氓地痞的 AB 团杀无赦。……工农份子加入 AB 团有历史地位，而能力较活动的杀无赦。

赣西南特委厉行「肃 AB 团」，到了 10 月，在赣西南三万多共产党员中已「开除的地主富农有一千多人」（「二．七」会议要求把「党内代表富农份子不论其阶级如何及过去工作如何，无情的坚决的开除出党」），消灭了一千多「AB 团」[7]。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 1/4 被打成「AB 团」，也大多被杀 。

在赣西南特委大张旗鼓「肃 AB 团」时，毛因忙于主持军中事务，并没有直接插手地方的「打 AB 团」，进入 10 月后，毛的态度发生转变。1930 年 10 月 14 日，毛泽东在江西吉安县城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通报他对赣西南党的状况的看法及准备采取的措施。毛在这封信中继续发展了他在「二?七」会议期间对赣西南党团机构的基本观点，指出：近来赣西南党「呈一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 AB 团份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 AB 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毛申明，为「挽救这一危机」，决定进行一场以「打 AB 团」为号召的肃反运动，以对赣西南的党团机构「来一番根本改造」[9]。

毛泽东真的相信有如此多的「AB 团」吗？答案是似信非信。1927 年后，为生存而奋斗的中共，长期处在被封锁和剿杀的极端残酷的环境下，作为一种自卫反应，毛习惯对国民党的反共行为给予严重的估计，在诸如国民党向共产党区域派遣破坏特务，国民党利用「自首政策」胁迫中共人员充当特务等问题上，毛看得尤其严重。

在激烈的国共斗争中，毛已形成一种思维定式：即对于国民党在共产党区域的活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若从「警惕性」方面而言，中共高级领导人当中未有超过毛泽东者。在另一方面，连李文林等人也大打「AB 团」，毛就更没有理由不相信有大批「AB团」。

然而毛泽东又绝对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十分清楚，苏区不可能有如此多的「AB 团」，既然恐怖闸门已开，正可顺势引导，将所有公开和潜在的反侧一并镇压下去，毛作出了一个惊人之举：在镇压李文林等赣西南领导人之前，率先在自己指挥的红一方面军（红一、三军团）进行大清洗，开展「打 AB 团」运动。

1930 年 10 月，毛率红一方面军攻占吉安，旋又退出，毛并动员彭

德怀在打下长沙后退出。毛的这些举措引起部分红军指战员不满，军中一时思想混乱。为了消除军中的不稳定情绪，毛在率军退出吉安后，于 11 月下旬至 12 月中旬在一方面军迅速发动「快速整军」——其主要内容就是在师、团、营、连、排成立肃反组织，捕杀军中地富出身的党员和牢骚不满份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四万多红军中肃出 4，400 余名「AB 团」份子[10]，其中有「几十个总团长」（指「AB 团」总团长），这些人都遭处决。

红一方面军内部的「打 AB 团」极为惨烈，地富或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过去曾与毛意见相左的同志，人人自危，朝不保夕。黄克诚当时任红三军团第三师政委，该师组织科长、政务科长都被当作「AB 团」被肃掉。宣传科长何笃才在大革命时期加入共产党，参加过南昌暴动，后随朱德上井冈山。只因何笃才在古田会议前的朱、毛争论中站在朱德一边，从此便不被毛重用，不久即被调出红一军团，在黄克诚手下当个宣传科长。何笃才与黄克诚交谊，「两人在一起无所不谈」。何笃才认为，毛泽东这个人了不起，论本事，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毛泽东，他的政治主张毫无疑问是最正确的。但毛的组织路线不对头，「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何笃才并举例说，一些品质很坏的人就是因为会顺从，受到毛的重用，被赋予很大的权力，干坏了事情也不被追究[11]。果其不然，这位聪颖过人、毫无过错的何笃才不久就被扣之以「AB 团」的恶名遭到杀害。

毛泽东既然对自己直接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也大开杀戒，那么对一贯与自己唱反调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就更不会有丝毫顾惜了。如前所述，李文林在「肃 AB 团」问题上态度十分坚决，但是到了 1930 年 10 月，随着「肃 AB 团」中暴露出的乱打乱杀现象的日益严重，李文林的态度开始转趋冷静，10 月底，省行委发出通告，批评「肃 AB 团」斗争中存在的简单化错误，强调对工农群众扩大自首范围，对捉拿老同志更要小心谨慎，如案情重大，则必须将人犯押往省行委肃反委员会审理，解除了县以下基层组织的处决权[12]。令人奇怪的是，当李文林的肃反狂热降温时，毛泽东却开始升温了。

1930 年 11 月，毛泽东的「根本改造」的利刃终于刺向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及其所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此次行动更因李文林等坚持执行李立三中央的路线，反对弃攻南昌的主张而更加惨烈。

1930 年 5 月，赣西南代表李文林赴上海参加由李立三主持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此次会议要求集中攻打大城市，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李文林返回后，于 8 月上旬主持召开了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部署贯彻李立三的精神。「二全会」不指名地指责了毛的一系列的观点和做法，撤销了拥护毛的主张、被毛派至赣西南特委任书记的刘士奇的职务，并建议上海中央开除其党籍。这一切惹起毛的极大愤怒，毛早已习惯以中央在江西苏区最高代表行事，岂能容忍有人在自己眼皮下以拥护中央为名反对自己[13]？此时毛尚不知「立三路线」这个词语，于是认定「二全会」是「AB 团取消派」的会议。

1930 年 10 月，红一方面军攻下吉安，在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文件中发现了一张据称是李文林的地主父亲用真名签字的便条[14]，虽然这张

字条究竟内容如何已不得而知，然而将李文林与「AB 团」联系在一起已经有了所谓证据。10 月中旬和月底，李文林又在峡江会议和罗坊会议上公开反对毛提出的「诱敌深入」的军事作战方针，主张执行李立三有关攻打大城市的指示，与毛的冲突全面激化，由此毛认定李文林就是「AB 团」首领。1930年底 11 月底，李文林在宁都县黄陂被拘押[15]，紧接着一批与李文林有工作联系的人相继被捕。毛泽东根据犯人被刑讯后的口供，于 1930 年 12 月 3 日写信给改组后的江西省行委，认定段良弼（省行委常委，赣西南团特委书记）、李白芳（省行委秘书长）等为「AB 团」份子，命令「捕捉李白芳等并严搜赣西南的反革命线索，给以全部扑灭」。毛在这封信中要求省行委接到此信后「务必会同李同志（即李韶九）立即执行扑灭反革命的任务，不可有丝毫的犹豫」，对「各县各区须大捉富农流氓动摇份子，并大批把他们杀戮。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个区域的党与政府必是 AB 团，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16]。

李韶九携着毛泽东指示信于 12 月 3 日前往富田，5 日毛又派两位红军战士将第二封指示信送给已出发的李韶九和省行委。毛在信中指示彼等要从已被捉人的线索中「找得更重要的人」，为了督促贯彻两封信的指示，毛又派出总前委秘书长古柏赶往富田「协助肃反」。

12 月 7 日下午，时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的李韶九代表总前委，到达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向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负责人面交了毛泽东的指示信，随即将省行委和红二十军八个主要领导人段良弼、李白芳、金万邦、周冕、谢汉昌、马铭等人予以逮捕。李韶九对这批同志施用了「打地雷公烧香火」等多种刑法，被打同志「皆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据当时资料记载，被害同志「哭声震天，不绝于耳，残酷严刑无所不用其极」。12 月 8 日，李白芳、马铭、周冕的妻子来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当作「AB 团」抓起来，被施以严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17]。在惨酷的刑讯下，段良弼供出李文林、金万邦、刘敌、周冕、马铭等「是 AB 团首领，并供出红军学校有大批 AB 团」。对于这次刑讯逼供，萧克将军在1982 年曾回忆道，「即便过了半个世纪，也不能不令人惨然一叹。我们这些「过来人」也觉不堪回首」。[18]

12 月 7 日至 12 日晚，在短短的五天时间里，李韶九等坐镇富田，厉行肃反，抓出「AB团」120 多名，要犯几十名，先后处决 40 余人[19]，其中李韶九在未动身前往东固前亲自布置将 25 人处决。李韶九等的残酷行动终于引发 1930 年 12 月 12 日震惊苏区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的爆发，造成江西苏区内部的严重危机，对毛泽东的声誉损害极大，毛亲自出马，毫无愧怍，于 1930 年 12 月 20 日草写〈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在这封答辩信中，毛坚持「肃 AB 团」均是有根有据的。他说：红军中「AB 团」要犯的口供「多方证明省行委内安了江西 AB 团省总团部，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为其首要」。毛认定段良弼等为「AB 团」首犯乃是证据确凿，他说：「如果段、李、金、谢等，是忠实革命同志，纵令其一时受屈，总有洗冤的一天，为甚么要乱供，陷害其它的同志呢？别人还可以乱供，段、李、谢

这样负省行委及军政治部主任重责的，为甚么可以呢？」[20]毛明知将段等定为「AB 团」全靠刑讯逼供，却对刑讯逼供无只字批评，反而指责段等不能为革命一时受屈，而不能为革命受屈，就一定是心中有鬼。照毛的逻辑，只要段良弼等承认是「AB 团」头子，即可证明彼等是货真价实的「AB 团」——毛的这种逻辑和思维方式，成为日后极左的审干肃反的常规思路，是逼供信屡禁不绝的最重要思想根源。在这样的思路下，毛坚持「肃 AB 团」不仅无错，反而是对革命的巨大贡献。他说：「AB 团已在红军中设置了 AB 团的总指挥、总司令、军师团长、五次定期暴动，制好了暴动旗，设不严厉扑灭，恐红军早已不存在了。」毛声称富田事变将「叛逆的原形完全现出来了」，号召对事变进行坚决镇压[21]。

毛泽东理直气壮乃是他认定自己就是红军和党的象征，毛就是根据地的中央，就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22]，反毛即是「AB 团」，所杀的皆是反革命，何愧之有！在毛的眼里，只要目标崇高——扑灭「AB 团」就是保卫革命，即使手段严厉一些，也无关紧要。在大恐怖中，总前委和毛的个人权威完全确立，毛就在大恐怖中成了江西苏区的列宁！

三、革命恐怖与纯化新社会

毛泽东放纵「打 AB 团」是否还有其它目的？换言之，毛是否另有企图，即通过大恐怖来重建根据地的新社会？从各方面资料分析，在 20 年代以后，毛泽东已成为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忠实信奉者，毛领导开辟江西革命根据地本身就含有创建无产阶级新社会的明显目的，而创建这样一个新社会的首要前提就是要将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依照这种思想逻辑，旧世界的代表和象征——地主豪绅及其依附于他们的知识分子，就必然成为革命的对象，于是为工农打天下就和消灭地主豪绅反革命成为一体两面的事情。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1930 年的赣南根据地有很大的发展，即将与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经过几年的经营，新社会的形貌已大致形成，其主要特征是，根据地内绝大多数地主都已逃亡或被清洗，但是为数尚多的富农及地富出身的共产党员仍在根据地内生活和工作。

1930 年后，新社会改造的主要目标集中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全力打击残余的地富份子及其子弟，包括清洗党内出身于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党员。

在「肃 AB 团」中，地富出身的党员首当其冲，成为被消灭的对象，即表明这种斗争所具有的「纯化」的性质。

在中共党内，毛泽东长期以反教条、反极左而闻名，并由此获得全党的拥戴。

但是在 30 年代初，毛却并非如此，在某些方面，毛的极左与共产国际不相上下，这尤其体现在对待富农的方针上。

1929 年，共产国际开始推行「反富农」的新方针，随即迅速传至中国，毛泽东在苏区积极贯彻并发展了共产国际这项「反富农」的方针。1930 年 6 月，毛主持制订了《富农问题决议案》，虽然强调了「抽多补少，抽肥减瘦」的分田原则，但是在对待富农的问题上，毛的态度与共产国际的有关方针并无任何差别，甚至更为激烈。毛猛烈抨击富农，宣称「富农的剥削比较地主更加残酷」，「这个阶级自始至终是

反革命的」。毛甚至还将打击的矛头指向那些未出租土地、也不雇工的富裕中农，指称他们是「第三种富农」，号召「坚决赞助群众没收他们的土地，废除他们的债务」。更有甚者，毛居然发明了「富农共产党员」的概念，把赞成中共六大「没收豪绅地主土地」的同志，一律视为「党内的富农成分」，要求将他们从党内「洗刷出来」，「无条件地开除富农及一切富农路线的人出党」[23]。

这样看来，毛泽东决意发起「肃 AB 团」确实包含多重目的，镇压赣西南红军和党组织不仅在于翦灭组织上的离心势力，同时也是为了先行扫清党内的障碍，以推行毛的改造社会的理想。在毛的世界里，镇压是和「纯化」互为联系的，其最后目标是建立一个由毛主宰的新天地。

毛泽东的这套思想逻辑究竟从何而来？就「纯化」的层面而言，毛应受到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理论的影响，尤其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影响。1928 年 1 月 24 日，毛亲自为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书写了这样一幅对联：「想当年，你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到今日，我宰杀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24]若就清洗党内反对力量的「镇压」层次而言，则无法找到毛受苏联经验影响的直接证据，因为苏共镇压党内反对派的经验此时正在形成之中。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初，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斗争还未发展到肉体消灭阶段，斯大林发动大清洗还在以后几年。

可以得出的判断是，毛在党内大搞清洗，基本上源于他在打江山中获得的经验与体会，在这方面，毛似乎更多的受到历代农民造反经验和《水浒》一类的影响，或者根本就是毛自我体悟的产物。这样，毛就在国际共运中首次创造出了将对敌斗争方式用之于党内的模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肃 AB 团」具有原创性。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军和党的核心层，在新形势下，党内、军内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然而毛改变了策略，他已不再运用「肃 AB 团」那样极端的方式来解决党内和根据地内部的矛盾。难道毛泽东已认识并改正了自己过去的错误吗？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简单。确实，毛在 1945 年中共七大的讲话中曾提到一句：「肃反，走了极痛苦的道路。反革命应当反对，党没成熟时，在这个问题上走了弯路，犯了错误」[25]，但毛从未就自己与「肃 AB 团」的关系问题作过详细的解释和「自我批评」，「肃 AB 团」不仅一直被肯定，富田事变也被作为「反革命暴动」的铁案，长期不得平反。尽管如此，在毛掌权后，确实已不在党内再搞「打 AB 团」一类的肉体消灭。

真正的原因乃是毛泽东已实际控制了中共中央，他已有了号令全党的合法性，已不再需用极端手段来维护自己的领袖权威。1935 年后，毛占据了中共中央领导层的核心地位；1938 年，毛又得到共产国际对他中共领袖地位的承认。随着毛在党内地位的加强，他的主张和意见也成为中共意识形态义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毛从而也获得了党的意识形态的法理性。现在，针对党内的革命恐怖更多是以威慑的形式出现，而较少诉诸赤裸裸的暴力。在一般情况下，革命恐怖只是作为配合毛的政治教育的一种辅助手段。在以后的岁月里，作为革命策略大师的毛泽东已能收放自如地掌握革命恐怖的机器，就像中药师配制药方一样，知道如何根据现实需要来调配这两方面的比重，在毛的操纵下，革命恐怖

机器已具备了某种「智能性」。1944 年，毛果断地宣布中止延安和各根据地的抢救运动——那场运动曾经使根据地的许多老党员误以为又要再来一次「肃 AB 团」式的大清洗，但是他们错了，毛无意也不愿再重演当年的斗争，当毛的目标已基本实现后，针对党内的革命恐怖机器立刻停止运转。在刘少奇的支持和协助下，毛又掌握了一种新方法：通过在审干——抢救运动中建立的制度机制，动用党机构来洗刷共产党内部，从而使党永远处在一个不断被「纯化」的持续状态中。

如此看来，30 年代初的「肃 AB 团」已成绝响。从延安时期开始，毛不断重申「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可是毛终究难忘那如火如荼的「肃 AB 团」的紧张岁月，对当年的「肃AB 团」，毛还是作出了他自己的「批判与继承」——在党内中止肉体消灭，同时保留、发扬群众性肃反的革命传统，从此镇压与「纯化」又有了新的形式，并与党机构的审干肃反措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于是，抢救运动之后，又有反右、文革。

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1999 年 8 月号总第 54 期

注释：

[1]江西苏区的「肃 AB 团」运动前后历经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30 年「二?七」会议后至 1931 年 1 月；第二阶段：1931 年 4 月至 1931 年末。在第一阶段「打 AB 团」的 1930年 10 月至次年 1 月，毛泽东及其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据初步统计，在这一阶段，仅红一方面军被杀官兵就达 4500 人，而至 1930 年 10 月，赣西南特委已消灭「AB 团」份子 1000 余人，这一数目尚不包括在这之后根据地内党政机构被杀党员的人数。主持江西苏区「肃 AB 团」第二阶段的是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和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被杀对象主要是参加富田事变的赣西南红军的干部，以及赣西南地方政权的干部，具体的死亡人数不详。资料来源：一、毛泽东：＜给总前委的一封信＞（1930 年 12 月 20 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4 册（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1985），页 634；二、＜萧克谈中国苏区初期的肃反运动＞，载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82 年第 5 期；三、＜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1932 年 5 月），载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页 477-78、480；四、＜赣西南会议记录——关于组织问题＞，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 631；五、廖盖隆 1981 年 9 月 23 日说：「红一方面军当时在苏区不过三、四万人，前后两次肃反，搞了六千多人，其中一半是杀掉了，就是说，十个红军中有一个被杀掉了，而且差不多都是干部」。廖盖隆在 1980 年 12 月 10 日又引用毛泽东的话：「毛主席说，我们杀了四千五百人，但我们保存了四万红军。」引自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资料通讯》（1981 年合订本）（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页 89、144。

[2]龚楚：《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页

171、205-207、348、357。

[3]＜前委开除江汉波党籍决议＞（1930 年 4 月 4 日），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 576-77。

[4]＜前委通告第一号＞（1930 年 2 月 16 日），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页 173。

[5]《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页 634-35；646；648-49；110。

[7]《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 626、631。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页 319。另参见戴向青、罗惠兰：《AB 团与富田事变始末》（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页 93。

[10][20][21]同注[1]毛泽东：＜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

[11]《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页 100-101。

[12]赣西行委：＜通告西字第 7 号＞（1930 年 10 月 21 日），转引自陈永发：＜中共早期肃反的检讨——AB 团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17 期，上册（1988 年 6月），页 203。

[13]毛泽东：＜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中强调「二全会议主要反对二七会议，开除刘士奇，就是反对二七会议，反对毛泽东。」

[14]参见注[2]龚楚，页 353；但据 1987 年中共吉水县党史办的调查报告称，李文林的父亲只是富裕中农，且早在 1927 年 5 月就病故。参阅＜关于李文林被错杀情况的调查＞，载中共江西省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江西党史资料》，第 1 辑，页 326。

[15]李文林在 1930 年 11 月底被总前委秘密逮捕，项英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获释放，于 1931 年 2 月被派往万太河东肃反委员会工作。任弼时率领的中央代表团抵达后，推翻项英的决定，李文林于 1931 年 7 月再次被捕。1932 年 5 月 30 日，李文林被冠于「AB 团首犯」遭处决，至 1987 年尚未平反。

[16]转引自注[9]戴向青、罗惠兰，页 98。

[17]＜省行委紧急通告第 9 号＞（1930 年 12 月 15 日），转引自上书，页 105。

[18]见注[1]＜萧克谈中国苏区初期的肃反运动＞。

[19]曾山：＜为「富田事变」宣言＞（1931 年 1 月 14 日），转引自注[9]戴向青、罗惠兰，页 105-106。

[22]1931 年，毛泽东与从苏联返国的无线电技术干部涂作潮即如此说，参见涂作潮：＜我跟毛主席发的一次火＞，《百年潮》，1999 年第 5 期，页 25-27。

[23]＜富农问题——1930 年 6 月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决议＞，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页 398-99，400、402、404、410、413。

[24]转引自余伯流、夏道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页 124。

[25]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一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

＞若干问题说明》（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页 121。

第四篇　毛泽东与　1937　年的刘、洛之争

1937 年春，担任中共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两次上书洛甫，就 1927 年后中共的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系统地提出了自己不同于中共中央既定结论的看法。刘的观点引起毛泽东的共鸣，但当时作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洛甫并不同意刘的意见，刘、洛因而在同年 6 月召开的中共白区工作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如何看待党的十年政治路线的问题。在刘、洛争论中，尽管毛泽东有其明显的倾向性，但囿于特殊历史条件的制约，毛只是有节制地表明了自己对刘少奇观点的支持，而未全面阐述他本人对十年政治路线的总体看法。

一

1937　年初，毛泽东、洛甫、周恩来、博古等通过对西安事变的处理，使中共的命运出现了决定性的转折，国共之间长达　10　年的内战实际已经结束，国内和平基本实现，中共终于争取到了休养生息，发展壮大的宝贵时机。在与国民党的交涉取得重大进展后，毛泽东开始从指导国共谈判的具体事务性工作中脱身，而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党内，试图利用对日全面抗战将要而未爆发的这一短暂的和平局面，加紧对中共重大方针、政策的调整，并加强和发展自己在中共核心层中已获得的相对优势地位。对于毛泽东而言，抓紧每一有利时机，调整党的方针政策及交替处理重大军政和党内外问题，是其在遵义会议参与中共最高决策后一贯使用的工作方法，唯因这次面临的环境与以往全然不同，毛所希望调整的范围又较过去有所扩大，故而形成了对　1935　年遵义会议后确立的毛泽东与洛甫政治结合的冲击。

建立在反对由博古、李德等组成的原中共最高权力核心“三人团”基础上的毛、洛政治结合，是在遵义会议上及其后形成并逐渐巩固的。为了反对博古等人的“左”的领导，从 1934 年 10 月起，毛泽东加紧了与洛甫的联络，在毛的启发和帮助下，洛甫和王稼祥这两位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产生的重要领导人相继从原中央政策的拥护者转变为批评者，成为毛要求改变中央领导的重要的支持力量。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鼓励洛甫与博古、李德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让洛甫在会议上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会议决定由洛甫起草决议，此举使洛甫在党的核心层内的作用明显突出。1935 年 2 月 5 日前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洛甫取代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至此洛甫成了事实上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把原“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的洛甫安排为中共中央第一把手，是在

当时的形势和条件下，毛泽东所能作出的最佳安排。由于洛甫与莫斯科有较深的历史渊源，且是中共一个较长时期内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此举不仅可以减缓莫斯科对中共领导层变动可能产生的不安和疑虑，更可以向全党，尤其是向那些与近几年党的方针、政策有较多牵涉的军政干部显示党的路线的连续性，从而尽量减少中央改组在党内引起的震动，加强党在极端困苦条件下的团结和统一。在洛甫成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之后，1935 年 3 月 20 日后不久，毛泽东也取代了周恩来在红军中的最高军事指挥地位[1]，至此，毛泽东与洛甫，一个全力掌管军事，一个集中精力于党务，两人开始了政治上的密切合作。

无疑，毛泽东属于那种以自己的思想改变历史进程的“以其道易天下者”[2]，“道” 者，个人对中国社会改造所抱持的理想、抱负、志向也。作为一个从青年时代就矢志拯救国家与民族，并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坚定信仰的革命者，毛泽东深刻地了悟自己所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而当 1927 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上了井岗山后，他所选择的道路就成了通往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因此，争取革命胜利的理想与毛对革命的坚强领导事实上已融为一体，密不可分。换言之，毛的领导地位的确立和巩固，毛的“决志行之”绝非是一般意义上的个人行为，而是关系到革命目标能否实现的重大问题。然而，欲在反动势力极其强大的旧中国推行和领导革命，则必先有其凭藉，1935 年毛的唯一凭藉就是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遵义会议及其后陆续发生的中共核心层的人事变动，虽然使毛第一次在党和军队的最高决策和指挥系统获得了发言权和决定权，可是离执掌“最后决定权” 的距离尚远，毛虽置身于中共核心层内，但主要偏重于军事领导。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毛主动放下党内的意见分歧，有意避开对敏感政治问题的争论，而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对付国民党的军事追击，此既是毛的明智，也是形势使然。

1935～1936 年，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中共及其军队的生存是压倒一切的头等问题，但对毛泽东而言，事实上却存在两条战线。

第一条战线是对付国民党的外部战线。不言而喻，“易天下”即是易国民党统治之天下，当时直接威胁中共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力量是国民党。因此，如何回击并战胜国民党，不仅是毛无时不刻所予思考的首要问题，也是凝聚全党的最重要的政治信念和驱动力。

与第一条战线相比，第二条战线虽不那么凸显，却同样重要这即是党内斗争的战线。勿庸置疑，欲易国民党统治之天下，若不牢牢掌握中共及其军队，一切则无从谈起，而易国民党之天下，又必先改变凡不利于夺取国民党政权的中共方针、政策、精神气质等各个有形、无形方面，是故，第一条对外战线与第二条对内战线两者之间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1935～1936 年，毛泽东将其侧重点主要放置于对付国民党的第一条战线，在毛的努力下，红军阻遏了国民党对陕北的军事进攻，使中共的生存环境获得了明显的改善。毛在军事上的成功，加强了他在党内和军内原先就十分雄厚的政治基础，使其在军事上的影响迅速向政治和党务领域延伸。

从主要担负军事领导责任，到一身兼负党和军队的决策和指挥责任，毛泽东在党和军内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此既是战时环境的产物，

又与毛所占据的特殊地位，他所拥有的独特的政治资源有关；同时，它还是毛顽强努力的结果。

中共领导体制在战时环境中发生的变化，对毛泽东顺利地将其在军事指挥领域的权力延伸至党的领域有着直接的影响。中共在江西瑞金时期，曾模仿苏联体制建立起以党为核心的党、军队、政府三套相对独立的系统，但在长征前夕，为了适应战略大转移的战时需要，党和政府系统全部并入军队，而中共全部权力完全集中于“三人团”。遵义会议虽取消了“三人团”，而代之以新的最高领导核心，领导成员的组成虽发生了变化，高度集中的体制却继续保留。在紧张的战时状态下，军队与党实际已溶入一体，由于党存在于军队之中，当毛置身于领导军队的关键地位时，他也同时处于可以领导党的有利位置。

毛泽东作为中共军队的主要缔造者和中共最大一块根据地中央苏区的开辟者，不仅在中央红军中拥有广泛的干部基础和情感基础，他还拥有极其雄厚的政治资源、毛曾亲自参与建立中共，是仅存的几个中共一大代表之一，其在党内历史之长，在军中基础之巩固，除张国焘之外，1935～1936 年的中共领导层中的任何人无法与其比肩，毛完全可以依靠其在党内的资历和地位，就党的全局性的方针、政策和其他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而不致担心遭受越权的指控。

正是由于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1935～1936 年，毛泽东使自己在中共领导层中愈来愈处于最有实力、最具影响力的地位，毛和洛甫建立起密切的合作关系，毛洛政治结合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就是联合挫败了张国焘“另立山头”的分裂活动。在双方合作共事的几年里，洛甫对毛十分尊重，在几乎所有关于党的重大问题的决策上都事先征求毛的意见。有关党的重要文件虽由洛甫和毛联署的名义发出，但毛在其中起主导作用。

在大敌当前，全力指挥军事的同时，毛对党的全局性方面的工作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关心。一方面，毛严格遵守共产国际的有关纪律，努力维持领导层的团结；另一方面，又不失时机，巧妙地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小心翼翼，有条不紊地对党的领导结构进行局部的调整。

(1)在中央最高层，毛继续维持同原“教条宗派分子”的合作，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形成的政治局的格局保持不变(在正常情况下，改变政治局事先须经共产国际的批准)。然而从莫斯科返国的同志的具体工作大多只限于党的宣传系统，技术性的党务工作系统和地方工作系统，“教条宗派集团”基本失去了对军队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个别军队同志被吸收参加了政治局，而一批重要的军事干部经常列席政治局会议，逐渐形成了惯例。

(2)毛将原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调作其他次要工作[3]，将因进行长征而不复存在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易名为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并派自己在瑞金时期的秘书王首道担任该局的领导，将这个关键组织直接隶属于自己的管辖之下。[4]

(3)毛任命王首道负责刚刚恢复建制的中共中央秘书处，并同时领导中央军委机要科、中央社会部机要科，将党、军队、秘密工作等全部机要通讯系统置于自己统一管理和严密监督下。[5]

(4)毛直接掌握与莫斯科的电讯交通，其他任何人不得插手。尽管毛

在对党的领导结构的局部调整中获得长足进展，但是仍有一些棘手问题一时难以顺利解决，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即是毛被迫长期违心接受对过去党的政治路线的评价。“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结论，这是横亘在毛面前的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这不仅因为它来自于莫斯科，也因为它是遵义会议参加者所一致拥护、接受的正式结论，它同样是毛泽东与洛甫政治结合的基础，[7]在军事压力紧迫的 1935 年 1 月，毛为了长远目标和出于现实的考虑，可以同意这个结论，但是到了 1937 年，一切都斗转星移。

这个结论之所以必须推翻，是因为非此，便无从剥夺“教条宗派集团”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更无法打破党内已形成的浓厚的教条宗派气氛，毛就难于顺利地推行他改造党的一系列设想，毛的新概念的地位也无从建立。

然而推翻此结论存在很大的难度，除了共产国际这一外部障碍外，在国内最大的障碍就是洛功。洛甫作为六届四中全会后产生的重要领导人，与这条路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断言“党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将直接打击他和其他一大批领导干部的威望，严重动摇他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必然遭到洛甫的强烈反对。

1937 年初，党的发展、毛和洛甫的政治结合以及毛的思路皆处在一个十分微妙的变化过程中，国内时局已发生大的转机，解决战时状态下无暇顾及的若干重大问题的机遇正在出现。与此同时，遵义会议后确立的毛主军、洛甫管党的格局早已发生变化，毛的地位已获得明显加强，洛甫已显示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党的理论和宣传教育领域，毛与周恩来建立起融洽的合作关系，博古也安于自己在中共核心层中的新的角色，[9]张国焘在党内斗争中的失败已成定局。但是，毛仍不便在条件尚未完全成熟的情况下将自己对过去党的路线的评价公开托出，这样将使自己处于和洛甫及一大批党的高级干部发生正面冲突的境地，从而影响到党的团结和个人威信。然而，在新的时空环境下，再继续违心接受自己根本反对的意见，也实在勉强。就在这关键的时刻，刘少奇及时站了出来，刘的出现打破了中共中枢层沉闷多时的僵局，并最终导致了毛、刘政治结合的确立。

二

促成毛刘政治结合的契机是 1937 年 2 月 20 日、3 月 4 日刘少奇就中共历史问题向洛甫陈述自己纲领性意见的两封各长达万言的信。刘少奇在这两封类似政治意见书的长信中，对中共中央多年来的路线、方针公开表示自己的怀疑，大胆地突破了共产国际和遵义会议关于“中共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结论，尖锐批评了 1927 年之前及 1927 年以来，尤其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共“左”的错误。

刘少奇的长信触及了当时中共中央的几个禁区：

(1)刘少奇认为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不仅是“右倾的陈独秀主义”，而且还有“右倾机会主义之反面的错误‘左倾’错误”，[10]刘少奇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猛烈抨击了广州、武汉时期工人及民众运动中已达“骇人”地步的“左倾”狂热[11]。刘的上述看法与共产国际和中共六大以来的历次决议严重相违。

(2)刘少奇虽然没有直接宣布中共十年来执行的是一条错误的政治路

线，但反复抨击中共“十年来一贯地犯了‘左倾’错误”，并且强调十年错误已形成“一种传统”[12]，刘少奇特别集中抨击中共十年白区工作的方针，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全盘否定十年政治路线。[13]

(3)刘少奇要求在党内公开讨论党的十年历史，[14]并且详细述说自己因坚持“正确” 主张而遭“打击”的经历，把批评的矛头直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政治局，暗示中央有关领导人要为错误承担责任，透露出要求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明显意图。[15]

刘少奇在 1937 年 2 月 20 日、3 月 4 日给洛甫写信之前是否征询过毛泽东的意见，或得到毛的鼓励，至今虽无确切的史料证明，但根据现有资料分析，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1935 年 12 月 29 日，中共中央常委会会议派刘少奇为中共中央驻北方局代表，[16]1936年春，刘少奇偕其妻谢飞，从陕西临潼乘火车前往北方局机关所在地天津，于 1936 年 3月抵达，1937 年初，刘少奇又随北方局机关移往北平，至 1937 年 4 月返延安，这期间刘少奇虽并未返陕北，[17]但是 1936 年后，在北方局和陕北之间已建立了电台和信使联系，毛刘通过电台交换有关对全局性问题的看法，已具备基本条件。[18]

且不论毛泽东是否曾对刘少奇写信的举动表示过支持，刘少奇决定向洛甫陈述自己政治意见的动机，一方面是刘少奇多年来就不满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政策，另一方面与刘少奇在北方局工作期间遭遇到的党内左倾分子的对新政策的强烈抵抗有关。[19]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1937 年的中共中央正处在调整政策的关头，中共中央内还未真正形成某个人的绝对的政治权威。洛甫虽是党的总负责人，但其权力有限，其他中共领导人大都是独当一面，毛泽东尽管处于上升状态，但当时也并非大家一致共认的唯一领袖。[20]因此给洛甫写信，不仅不会遭遇到党的历史上屡屡发生的党员因向中央陈述意见而被打成“反党分子”的厄运，相反，却有可能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刘少奇很清楚，在对党的十年历史的看法上，毛泽东与自己有很多共同的语言。

刘少奇的长信在中共中央核心层引起轩然大波。1937 年 3 月 23 日、4 月 2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开会都讨论了白区工作问题。洛甫对刘少奇的意见极不以为然，一些同志随声附和，认为刘少奇对大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是替陈独秀洗刷，刘“反共产国际，反中共中央”，是陈独秀的“应声虫”。还有人指责刘少奇受到了张国焘的影响。对于刘少奇有关八七会议后中共犯了十年“左”的错误的看法，中共中央政治局大多数成员也都认为言过其实。在一片责难刘少奇的声音中，只有毛泽东一人站出来替刘少奇讲话，称“刘并没有反对中央的野心”。毛没有直接卷入具体问题上的争论，而是竭力调和刘、洛之间的意见冲突。这样，刘少奇虽然受到洛甫的严厉批评，但由于说了毛想说又不便公开说的话，引起毛泽东的共鸣。毛的态度鼓励了刘少奇，使刘少奇敢于采取下一步重大行动，在 1937年 5～6 月中共中央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上，向洛甫发起面对面的挑战。

三

1937 年 5 月 17 日～6 月 10 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白区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由于刘少奇与洛甫的激烈争论，其间曾一度中断，后在毛泽东的有倾向的调和下，会议才得以继续进行。

从 1937 年 5 月 17 日 ~ 5 月 26 日，是白区工作会议的第一阶段，会议围绕刘少奇的《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刘少奇报告的主要内容是重复 3 月 4日给洛甫信中的精神，着重批评十年来党在白区工作指导中的“左”的传统。刘的报告激起强烈反响，柯庆施指着刘少奇的鼻子骂他是“老右”。[21]许多代表反对刘少奇提出的白区工作“损失几乎百分之百”的观点，不同意刘对白区工作的总体评价，坚持认为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白区工作的“总的路线是正确的”。[22]

由于会议上出现的紧张激烈的争论，中央书记处宣布会议暂停。1937 年 6 月 1 ~ 3 日，中央政治局就白区工作会议讨论中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召开会议，集中讨论十年来的白区工作，毛泽东在关键时刻助刘一臂之力。毛一反不久前回避刘洛争论的态度，明确表示刘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称赞刘在白区工作方面“有丰富的经验”，说刘系统地指出了党在过去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是一针见血的医生。[23]在 6 月 3 日政治局会议上，毛又作了支持刘少奇的重要发言。毛避而不谈十年政治路线问题，而是针对反对派集中批评刘少奇只讲缺点、不讲成绩，首先谈了中共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在谈论了党的优秀传统后，毛着重指出党内“还存在着某种错误的传统”，强调“这是不能否认与不应否认的事实”(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从而全面肯定了刘少奇的观点，在刘洛争论中有力地支持了刘少奇。[24]由于毛泽东在发言中回避了容易引起分歧的有关过去白区工作指导方针是否犯了十年一贯的“左”的错误这个敏感问题，因此毛的意见得到包括洛甫在内的与会者的一致同意，并成为下一阶段白区工作会议的主调。

1937 年 6 月 6 日，白区工作会议继续开会，会议进入第二阶段。洛甫有意识地淡化毛泽东在 6 月 1 ~ 3 日讲话的倾向性，抓住毛讲话中对自己有利的内容，坚持自己的观点。他根据自己理解的 6 月 1 ~ 3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作了《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洛甫强调“实践中的某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中共在白区工作所犯的错误的性质不是政治路线错误，“不是由于什么一定的政治路线或政治倾向”，“而是在领导斗争中有时犯了策略上的错误”，这种错误“不过是整个领导群众策略与群众工作方式中的某些部分错误，而不是整个领导的错误，”党“坚决领导斗争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25]洛甫坚决反驳刘少奇对中共中央在白区工作中反对“合法主义”的批评，坚持认为“过去党反对合法主义的斗争，仍然是对的”，强调指出，“过去一切非法斗争，是必要的与正确的，而且过去主要的斗争方式只能是非法的”。洛甫不无影射地批评刘少奇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一样，“以每次革命斗争的成败的结果来判断革命斗争的价值”，把失败的斗争看成“无意义”或“谩骂一顿‘盲动主义’完事”，指责刘少奇“看不到每一次革命群众的革命斗争，就是结果失败了，仍然有着他的巨大的意义”。[26]洛甫批评刘少奇把“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作为“钢鞭”，全盘否定中共十年白区工作成就，强调指出，“每一斗争在胜利或失败之后，必须详细的研究其经验与教训，切不要拿简单的空洞的帽子(如盲动主义、冒险主义、机会主义)去代替对于最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对党内所存在的“各种不正确思想，应有确当的估计，不要夸大或缩小，或任便给同志们‘戴大帽

子’”[27]。

洛甫的报告获得参加白区工作会议代表的一致拥护，在暂时不利的形势下，刘少奇被迫退却。6 月 9 日和 10 日，刘少奇在会议作结论报告。刘表示同意洛甫的报告，并且对自己的前一报告作了解释和自我批评：“我在会上作的报告，着重是批评‘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并不是否定过去的一切，因为主要是批评错误这一方面，没有说到其他方面，并且对某些问题缺乏具体分析，有些地方说过火了”。[28]

四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刘少奇、洛甫围绕党的十年历史和白区工作评价问题展开的争论并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的解决，刘少奇试图通过检讨党的历史问题，改变对十年政治路线评价的目的暂时遭受了挫折。但是刘少奇、洛甫的争论给中共带来了深远影响，它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前奏和一次针对“教条宗派分子”的短促突击，为以后毛泽东、刘少奇全面批判六届四中全会政治路线，联手打倒王明等制造了舆论。毛泽东从这次争论中吸取了丰富的经验，他终于体会到“教条宗派分子”在党内的广泛影响绝非一朝一夕经过一次会议就能清除。打倒“教条宗派集团”除了需要在理论上进行细致深入的准备外，还要在组织上进行精心的准备。

刘少奇与洛甫争论的另一结果是扩大了刘少奇在党内的影响和知名度。刘少奇虽属党的老资格领导人之一，但因长期从事白区工作，在江西时期的两年仅负责领导全国总工会执行局，较少参与重大军政问题的决策，刘与当时重要的政治领导人周恩来、洛甫等的关系又较为疏远，因而在一个时期内，刘少奇在党和军队的影响力不大，与洛甫的争论充分展现了刘少奇的思想深度和理论水平，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刘少奇有了新的认识。

对于刘少奇与洛甫的争论，毛泽东的态度既明确又微妙。初期，毛置身于争论之外，但对刘少奇明显表示同情，毛希望刘少奇的意见能被中央领导层所接受；后期，则担心刘少奇承受不住洛甫和党内的巨大压力，于是，在 6 月 1～3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声援刘论点的重要讲话。但是当毛看到刘的有关看法遭到普遍反对，遂决定从长计议。毛在这次论战中发现了刘少奇的杰出才干，首先是刘在白区工作方面的丰富经验；其次，毛也看到了刘的理论能力，刘甚至能够引人入胜地分析十年“左”的传统和根源之一乃是“思想方法与哲学方法上的错误”，即“形式逻辑”对党员思想方法的广泛影响。刘宣布“形式逻辑”是造成“许多错误的根源”，这给毛耳目一新的感觉。然而毛并没有把自己的威望全部投放在对刘少奇的支持上，因为时机还不成熟。现在毛更愿意做党内争论的最高仲裁者，既然僵局已经打破，矛盾的盖子已被揭开，洛甫受到了强烈震动，自己的威信反而因对争论所持的折衷调和态度而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因此下一步的目标就是团结洛甫。为了防止洛甫和将要回国的王明重新结合，加速“教条宗派政治组织上的分裂”，维持和加强与洛甫的合作，既有必要，又有可能。由于有了这些考虑，白区工作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并没有立即被提拔进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委会)，而于 7 月 28 日被派到太原，继续担任已从北平迁至太原的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的职务。

刘少奇虽然暂时离开中共中央中枢，然而毛刘政治结合却因刘、洛争论而正式形成了。毛刘与毛洛同是政治上的结合，但是两种政治结合之间却有显著区别。

第一，毛洛结合是战时非常状态下的临时组合。1935 年初，为了共同的政治目标，毛泽东和洛甫有意忘却昔日政治上的分歧走到一起；毛刘结合也是一种政治结合，但在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不存在政治观点上的分歧，正是对原中共中央政治路线及其领导人的不满，使毛与刘走到了一起。而早在 1932 年，毛刘之间就围绕此问题彼此交换过意见，并达成了一致的看法。与毛洛结合相比，毛刘结合具有更深的思想基础。[29]

第二，毛泽东与洛甫没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但是毛刘不仅有同乡之谊，而且，早在 1922年毛刘就有工作上的密切联系。

第三，毛洛结合是两个地位相近的政治人物的平行结合，但 1937 年，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则远逊于毛。因此毛刘结合是一种以毛为核心，刘为辅助的政治结合，而非两个地位相当人物的平行结合。

毛刘结合的上述特点保证了毛以后在向“教条宗派分子”发起挑战时可以得到刘少奇的全力支持。毛刘的结合也预示毛与六届四中全会后产生的政治领导人的两年多的合作已接近尾声。毛泽东在错综复杂的新形势下，在领导全党全军全力对外的同时，将进一步加紧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以随时准备选择最佳时机，向“教条宗派集团”发起新的攻击，从而实现其改造党，进而改造全中国的政治理想。而这一切，不仅将决定中国共产党的前途，而且将决定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前途。

【原文出处】南京大学学报：哲学 人文 社科版 199304

注释：

[1]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 277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2]参见梁漱溟：《再忆初访延安》，载《我的努力与反省》，第 319 页，漓江出版社 1987年版。

[3] 1935 年 9 月下旬，邓发改任由原中央机关，红军总政治部等机关组成的陕甘支队第三纵队政委，11 月，红一方面军番号恢复后，邓发主要负责红军的筹粮工作，1936 年 4月，被委以中共代表的身份派往苏联。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 293、306页。

[4]长征开始，国家政治保卫局除少数负责人随首脑机关行动外，其他工作人员均被并入各军团，国家政治保卫局只留下名义，工作权限已大大缩小。1935 年 10 月，王首道被任命为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部长，原执行部长李克农被调作联络西北军和东北军的统战工作，该年年底，国家政治保卫局建制被正式取清，其工作由方面军政治保卫局接替。

[5] 1934 年 10 月，红军长征前夕，中共中央秘书处，军委秘书处均被裁撤，其遗留工作由中央军委机要科承担。1935 年底中共中央迁到陕北瓦窑堡后，中共中央各部委及秘书机构渐次恢复，原来仅有的机要机构中央军机要科一分为三，成立了中共中央秘书处机要科。中央军委机要科和中央社会部机要科，上述三个重要机构统归王首道领导。参

见《中共秘书工作简史（1921～1949）》，第 186～187 页，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另参见《王首道回忆录》，第 197 页，解放出版社 1988 年版。参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 203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版。

[7]洛甫在 1943 年整风期间写的笔记中指出，“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参见《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1943 年 12 月 16 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5 年第 1 期，第 13 页。事隔 20 多年后，毛泽东在谈到有关纠正“王明路线”的历史时，再次提及洛甫的思想转变过程。毛说，“洛甫开始不承认错误路线，七大经过斗争，洛甫承认了路线错误”，参见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 1959 年 8 月 2 日，载《毛泽东论党的历史》，第46 页；其实，对于这一问题，洛甫早在延安整风开始不久，就有较深的认识。洛甫分析了遵义会议有关过去党的政治路线的评价对自己的深刻影响，他说，由于遵义会议肯定了过去中央政治路线的正确，因而使自己“在长久时期内不能彻底了解自己的严重错误”。参见《文献和研究》1985 年第 1 期，第 13 页。

[9]博古（秦邦宪）在 1935 年 2 月之后仍继续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红军抵陕后，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办事处主任，1936 年 12 月后主要配合周恩来从事联络国民党的统战工作。

[10]参见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1937 年 3 月 4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 11 册，第 802 页。

[11]参见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1937 年 2 月 20 日载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1980 年第 5 期，第 3 页。

[12]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1937 年 3 月 4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 11 册，第 805、806～817 页。

[13]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1937 年 3 月 4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 11 册，第 805、806～817 页。

[14]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1937 年 3 月 4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 11 册，第 805、806～817 页。

[15]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1937 年 3 月 4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 11 册，第 805、806～817 页。

[16]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 297 页。

[17] 1937 年 3 月 4 日，刘少奇致洛甫的信写于北平，3 月 18 日前刘仍在北平。周恩来在 3 月 13 日，3 月 18 日于西安两次致函刘少奇，并转河北省委，要刘少奇等负起对留居平、津地区的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 358～359 页。

[18]刘少奇前往天津就任中共中央驻北方局代表时握有与陕北联络的无线电密码本。据当时曾作过刘少奇译电员的郭明秋的回忆，她经手翻译的刘少奇给陕北的电报，上款大都是洛甫（闻天）、恩来，“有时也直接发给毛主席”，署名则是胡服，（胡服是刘少奇在党内长期使用的化名。由此可以判断，1936～1937 年毛与刘少奇是有直接联系的。参见郭明秋：《少奇同志在北方局》，载《怀念刘少奇同志》，第 185 页，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19] 1936 年 3 月，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到达天津，不久又担任了北方局书记，着力纠正北方局“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刘少奇领导的纠偏工作，除了思想纠偏之外，还包括对北方局领导机构的大幅改组，因而引起北方局内部的争论。刘少奇上任后，任命彭真（在 1928 年彭真与刘同在天津的中共顺直省委工作）取代柯庆施担任北方局组织部长，任命陈伯达为宣传部长。刘的这些措施激起柯庆施等一批原北方局领导人的不满，刘在党内刊物频频发表文章，不指名批评柯庆施等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错误”，从而埋下柯庆施与刘少奇长期不和的种子。

[20]刘少奇在 1937 年 3 月 4 日给洛甫的信中只字未提毛泽东，刘且写道：“我国还没有中国的斯大林，任何人想作斯大林，结果都划（画）虎不成。”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 11 册，第 817 页。由此可见，当时毛的权威并未得到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中共领导人的一致承认。

[21]杨尚昆在 1987 年改定的《怀念少奇同志》一文中，虽未点出柯庆施名，但他所称的“那个顽固坚持‘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人”明显是指柯庆施。参见《缅怀刘少奇》，第 5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

[22]出席白区工作会议的代表主要是北方局及所属北平、天津、河北、河南、山东、绥远等地党组织的负责人及广东代表约 30 人。彭真作为华北代表团团长，是主持会议的刘少奇的助手。华北代表团的代表有柯庆施，高文华（原河北省委书记，兼原北方局书记职能），吴德、李昌、李雪峰、黎玉、乌兰夫等。据参加过这次会议，1936 年 5 月被任命为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黎玉回忆，刘少奇的报告“对‘左’的错误提得很急，提得也很高”。有关“白区损失百分之百”的说法“有点过头”，因为参加会议的“北方党组织的代表这么多，就说明白区的损失不能说成百分之百”。黎玉的看法反映了当时参加会议的部分代表的观点。参见黎玉：《抗战前夕在延安召开的白区工作代表会议》，载《革命回忆录》增刊（1），第 42～43 页；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另参见陈绍畴：《党的白区工作会议述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7 年汇编本），第 295 页，档案出版社 1991年版。

[23]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1937 年 6 月 3 日，参见陈绍畴：《党的白区工作会议述略》，载《文献和研究》（1987 年汇编本），第 296～297 页。

[24]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 1898—1969》上卷 183 页中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另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第 372 页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 年版。

[25]洛甫：《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1937 年 6 月 6 日在白

区党代表会议上报告之一部分，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 11 册，第 234、235、236、238、239、261、263 页。

[26]洛甫：《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1937 年 6 月 6 日在白区党代表会议上报告之一部分，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 11 册，第 234、235、236、238、239、261、263 页。

[27]洛甫：《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1937 年 6 月 6 日在白区党代表会议上报告之一部分，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 11 册，第 234、235、236、238、239、261、263 页。

[28]参见陈绍畴：《党的白区工作会议述略》，《文献和研究》（1987 年汇编本），第 298页。

[29]据 1931 年秋～1932 年底与刘少奇同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一度与刘少奇夫妇同住的张琼的回忆，刘少奇曾在 1932 年底就白区工作的策略问题写信给毛泽东，批评中共中央的左倾错误，不久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写来一封很长的回信”，表示赞成刘少奇提出的稳建主张。参见张琼：《刘少奇同志在上海革命的活动片断》，载《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 2 辑，第 48、47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第五篇　在“道”与“势”之间：毛泽东为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所作的准备

在中共与中国现代历史中，1942 年春在中国共产党内全面展开的整风运动是与毛泽东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毛在整风运动中，依据自己的理想今面改造了至那时为止的中共所有有形和无形的方面，不仅完成了党的全盘毛泽东化的基础工程，而且还建起一整套烙有毛泽东个人鲜明印记的中共新传统——其一系列概念和范式在 1949 年后改变并决定了几亿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然而人们较少注意的是，1942-1945 年延安整风运动中所发生的一切，均是一段时期内中共党内所发生变化的合乎逻辑的延伸，而这一切变化，完全是毛泽东根据其理想、凭藉其地位加以有力引导的结果。对于毛为发动整风而进行的持续且精心的准备，以往论者大多忽略，少数论着偶尔提及，也只是强调毛的思想演变的方面。笔者认为，具有强烈救世情怀的毛，和作为政治家的毛从来都是统一的。而本文所要论述的“准备”，也并非指毛早有计划，有意要在某个特定时段发起这场运动，——“准备”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它最初表现为 1935-1937 年间毛泽东运用其在中共领导层中获得的相对优势地位对中共政策及其领导机构作出的局部调整；这种局部调整在 1938 年后，迅速转变为毛对中共政治路线、精神气质及组织机构等方面所进行的一系列重大改变。毛泽东在这横跨两个阶段、长约 7 年的漫长“准备”过程中，为实现其改造中共的理想，运用高超的政治智能，突进迂回于个人理想和各种利益冲突之间，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阶段性的成果，为最终发动延安整风运动，确立自己的新概念在党的意识形态中的领导地位，建立并巩固其在中共党内的最高权威廓清了道路。笔者认为，毛为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所进行的准备，集中展现了他的政治性格的多重侧面，重新梳理这一历史过程，将有助于世人加深对毛政治性格之复杂性的认识，同时，对重新审视延安整风运动这一重大现象也不无裨益。

一

毛泽东自为“以其道易天下者”[1]，“道”者，个人对改造中国社会和世界所持的理想抱负、志向也。那么，30 年代前期，毛所企盼实现的“道”，其具体内涵又特指哪些方面呢？作为一个已接受共产主义基本概念的中国人，致力于结束国家分裂混乱局面，创建一个以共产主义为价值符号的公平、正义的社会，这或许距毛当时所要实现的“道”不至相

差太远。然而，此“道”与彼时一般共产党人之“道”并无多少差别。毛的“道”之特殊性，即此时的毛已开始萌发若干有别于莫斯科“正统”理论之片断想法。毛基于多年在农村领导农民革命之体验，已具体感受到在共产国际指挥下之中共中央诸多政策和实践与中国社会环境之间存在严重冲突，而由此冲突显示出的中国社会环境对莫斯科理论之拒斥，将严重阻碍中共在中国社会扎根，断送中共取国民党天下而代之的大业宏图。

对于胸怀济世之志，如毛这样的聪秀之人，“道”之产生并非太难，其乃源于对现实的直接感悟，只要将其略加提升，“道”即可了悟于心，困难者，实现其“道”必先有其凭藉，即所谓有道无持，道乃虚空，有恃无道，其恃也忽。只有融“道”（思想、理念），术（策略、方法），势（地位、权力）于一体，方可出现运动中的良性循环，并渐次向理想境界迈进。如果说，1927 年以前的毛对上述三者之有机关系尚无直接感触，那么到了 1935 年，在历经开创红色中央根据地的万般辛苦和多年党内斗争的沉浮后，毛对其间关系之体认就深镂于心了。所幸天佑中共，毛泽东这个“本来很灵”，“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的“菩萨”，在遵义又开始“香起来”[2]，并被大家捡了起来，原就素有“救小人”之志的毛，果然义不容辞，在遵义会议后立即就行动了起来。

极具现实感的毛泽东深知，在 1935 年，他实现其道的唯一凭藉就是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然而，遵义会议及以后陆续发生的中共核心层的人事变动，只是使毛在中共最高决策和指挥系统第一次获得了发言权和决定权，离执掌党和军队的“最后决定权”的距离尚远。毛虽置身于中共核心层，但仅侧重于军事领导，这种状况虽非今毛满意，但在当时，也只能如此。在中共面临危急存亡的紧急关头，毛选择了“见好就收”的方针，主动放下党内分歧，将全副精力用于对外，此既是毛的明智，也是形势使之然。

1935-1936 年，面对国民党的军事追击，中共及其军队的生存，是压倒一切的头等问题，但是对毛而言，事实上却存在着并行的两条战线。

第一条战线是对付国民党的外部战线。不言而喻，“易天下”即是缚国民党之“苍龙”。在中共未夺取政权之前，威胁中共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力量只能是蒋介石政权。因此，如何回击并打败国民党，不仅是毛须臾不能忘怀的首要问题、也是毛用以凝聚、驾驭和统一全党的最重要的政治理念和驱动力量。

与第一条战线相比，第二条战线虽不那么凸显，却同样重要——这即是党内斗争的战线。显而易见，欲易蒋介石政权之天下，若不牢牢掌握中共及其军队，则一切免谈；而易国民党之天下，又必先改变毛所认为的凡不利于夺取国民党政权的中共方针、政策等各个方面，是故，第一条对外战线与第二条对内战线，两者之间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1935-1936 年，毛泽东将其侧重点主要放在对付国民党的第一条战线，在毛的努力下，红军阻遏了国民党对陕北的军事进攻，使中共的生存环境获得了明显改善。毛在军事上的成功，对其政治生涯有极重要的意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毛只是以擅长指挥军事而着称于中共党内，人们看重毛，主要也因他深谙中国传统兵法并将其灵活用于开创中

共根据地和发展中共武装[3]。毛在遵义会议上之所以复出，最重要的原因也是中共军事行动屡屡受挫，军事指挥己捉襟见肘，党和军队的前途万分危殆，中共政治局一班人迫于无奈，请毛出山，试看毛能否使中共脱离险境。而在当时，党的上层，从来也未将党领袖之名义与毛的名字联系起来，更遑论想象毛登上军事指挥岗位即再不下来，并将其在军事指挥上的影响力迅速向政治和党务领域延伸。

从主要担负军事领导责任到一身兼负党和军队的决策以及指挥责任，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此既是中共领导体制在战时环境下变化的产物，又与毛所占据的特殊地位，他所拥有的独特的政治资源有关。同时，这也是毛顽强努力的结果。

中共领导体制在战时状态下发生的变化，对毛泽东顺利地将其在军事指挥领域的权力延伸至党的领域有着直接的影响。中共在江西瑞金时期，曾模仿苏联体制，建立起以党为核心的党、军队、政府三套相对独立的系统，在这三个系统中，党机关的权力至高无上。博古虽是一介书生，对军事指挥完全外行，但他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却完全将军事系统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担任军事领导的周恩来、项英严格遵循共产党纪律，在作出任何重大军事部署前，均请示征得博古的同意。李德发挥的作用虽然很大，但他并不参与政治决策，其对红军的军事指挥往往也是首先向博古通报，并知会周恩来后，再发出作战命令，尽管他的个人意见一般均是最后意见。长征前夕，战况瞬息万变，形势极端危急，为了适应战略大转移的战时需要，党和政府系统全部并人军队，而中共全部权力完全集中于博古、李德、周恩来领导的“三人团”。遵义会议虽取消了“三人团”，但在 1935 年 3 月，又根据毛的提议，为便于“应付紧急军事行动”，重组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然而，“新三人团”的体制却不同于老“三人团”，代表党的洛甫并不在“新三人团”之列。遵义会议原来决定，周恩来是代表党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者，毛泽东辅助周工作[4]，但到 1935 年春夏之交，周恩来与毛泽东调换了角色——周成了毛的辅助者！本来，王稼祥因伤重，很少参与决策，这样毛成了事实上的中共最高军事指挥者。毛与周角色的互换对毛有重大意义，在紧张的战时状态下，军队与党实际已溶入一体，当毛置身于领导军队的关键地位时，事实上他己处于随时可以领导党的有利位置。

毛泽东作为中共军队的主要缔造者和中共最大一块根据地——中央苏区的开辟者，在中央红军中拥有广泛的干部基础。毛所拥有的与中共军队的这种特殊关系能够确保毛即便在政治上失意之时，也可以对军队发挥一定的影响力。与绝大多数中共领导人不同，毛还是参与建党的元老，他是硕果仅存的几个中共一大代表之一，其在党内历史之长，在军中基础之深厚，除张国焘之外，1935-1936 年中共领导层中的任何人都无法与其比肩。毛完全可以依靠其在党内的资历和地位，就党的全局性的方针对策和其它非军事性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而不致担心遭到越权的指控。

正是基于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毛泽东在 1935-1936 年使自己在中共领导层中愈来愈处于最有实力、最具影响力的地位。毛和洛甫建立起密切的政治合作关系，但洛甫只是一个弱势的合作对象，其政治资源主

要来自于莫斯科和他在 1934-1935 年在政治上对毛的支持。洛甫在军内还无基础，因而在毛、洛联盟中，天平必然向毛的方面倾斜。从毛这方面看，毛洛联盟的最重要成果就是通过与洛甫的合作，联合了暂时还占据党机关的"教条宗派分子"博古、凯丰等，运用党的权威挫败了当时毛的头号对手——张国焘"另立山头" 的分裂活动。在毛、洛双方合作共事的几年里，对毛个性已有了解的洛甫尽量避免与毛发生正面冲突，对毛的咄咄逼人和峭刻嘲讽一再忍让[5]。洛甫之对毛奉命唯谨，主要是出于对共产党事业的考虑，在另一方面也与其性格温厚有关，但同时亦是因为他已为自己创造了毫无依托的虚弱地位，洛甫乃一"红色教授"型领导人，置身于严酷的战争环境，只能唯毛马首是瞻，尽管洛甫还坚持着最后一两个阵地决不轻易放弃。

在大敌当前，全力指挥军事的同时，毛对党的大政方针和全局性方面的工作保持着高度的关心。一方面，毛不敢冒任何风险，谨慎地在莫斯科划定的禁区前穿插迂回，努力维持着中央领导层的稳定；另一方面，毛又不失时机，利用战时状态提供的组织机构变动频仍的机会，巧妙地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和特殊地位，有条不紊、小心翼翼地对党的重要机构进行局部调整。

（1）在中央核心层，毛继续保持同"教条宗派分子"的合作，至少在形式上，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形成的政治局的格局保持不变（在正常情况下，大规模调整政治局需事先报经共产国际的批确）。但是，从莫斯科返国的干部的具体工作，大多只限于党的宣传系统、技术性的党务工作系统和地方工作系统，"教条宗派集团"基本失去了对军队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个别军队领导被吸收参加了政治局，而一批重要的军事干部经常列席政治局会议则逐渐成了惯例。

（2）毛将与周恩来等关系密切、且和莫斯科有较探情感联系的原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调作其它次要工作 ，将原内政治局直接领导、因长征而不复存在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易名为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并派自己在江西瑞金时的秘书王首道担任该局领导，将这个关键机构予以恢复，并划归于自己管辖之下[7]。

（3）毛任命王首道负责刚刚恢复建制的中共中央秘书处，并同时领导中央军委机要科、中央社会部机要科，将党、军队、秘密工作等全部机要通讯系统置于自己的统一管理和严密监督之下 。

（4）毛深知掌握与莫斯科来往秘密电讯对其政治生涯的极端重要性，从 1935 年底开始，毛就直接控制与莫斯科的电讯交通，而不容其它任何领导人插手[9]，从而确保自己在讯息掌握、研判及利用上获得任何人无法得到的优势及便捷。

1936 底-1937 年初，毛在求"势"的过程中，熟练操用各种谋略，已将许多重大权力集中于其个人手中。然而毛的胸臆仍难以抒解——在以其道易中共路线方针方面，毛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在莫斯科和中共党内的压力下，他只能强忍内心的不满，被迫长期违心接受对中共过去政治路线的评价。

"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这是隔亘在毛面前的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这不仅因为它来自莫斯科，也因为它是遵义会议参加者所一致拥护和接受的正式结论，它同样是毛泽东与洛甫政治结合的基础[10]。在

军事压力紧迫和毛急于出山的 1935 年 1 月，他为了长远目标和出于现实的考虑，可以同意这个结论，但是到了 1937 年，斗转星移、时过境迁，再继续然持这个结论，就愈发显得强人所难了。

这个结论之所以要修正，是因为它关系到毛泽东能否实现其“道”，从而在政治前途上开辟一新的境界。不推翻此结论，便无从催毁“教条宗派集团”的政治合法性基础，更无法打破今毛感到压抑的、弥漫于中共党内的浓厚的俄化氛围，毛就难以顺利地推行他改造党的一系列设想，毛的新概念的地位更无从建立。

然而，推翻此结论存在很大的难度，除了共产国际这一外部障碍外，在国内最大的障碍就是毛的政治合作者洛甫。作为六届四中全会后产生的中共领导人，洛甫几乎本能地将自己政治前途与这个评价联系在一起，断言“党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将直接打击他和其它一大批领导干部的威望，严重动摇日前洛甫在党内的地位，因而必然遭到洛甫强烈的反对[11]。

1937 年初，党的发展、毛和洛甫的政治结合，以及毛的思路皆处在一个十分微妙的变化过程中，随着国内和平局面的到来，国民党军事压力的舒缓，解决战时状态下无暇顾及的若干重大问题的机遇正在出现。与此同时，遵义会议后确立的毛主军、洛甫管党的格局早己发生重大变化，洛甫显示出他的作用仅限于党的理论和宣传教育领域，而毛与周恩来也建立起融洽默契的合作关系。现在毛己十分具体地感受到洛甫给他带来的困窘，在新的时空环境下，继续违心接受今其厌恶的对过去政治路线的评价将越发勉强，可毛又惧于在条件尚未达到之前，和盘托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从而将自己置于和洛甫及一批党的高级干部发生正面冲突的尴尬境地。就在这关键的时刻，1937 年春夏之际，刘少奇站了出来，就党的十年路线问题向洛甫发起挑战。

一向未被史家注意的 1937 年的刘、洛之争对中共历史有着重大影响，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如何看待中共 1927-1937 年的政治路线及是否改组中共领导构成的问题。尽管毛泽东完全赞同刘的观点，但囿于党内的强烈反对和洛甫激烈的抵拒，毛只是有节制地表明了自己对刘少奇观点的支持，而未全面阐述他个人对十年路线的总体看法。刘洛争论虽以洛甫意见占上风而告结束，但毛洛联盟从此正式解体，而毛刘长达 30 年的政治结合的基础却因此次争论而告奠定[12]。

二

对于 30-40 年代中共党内的斗争，毛泽东所采取的一贯策略是决不打无把握之仗，当形势对己有利时，主动出击，能斗则斗；而当形势晦暗不明时，则退避三合，决不采取正面对抗的姿态，以避其锋锐。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国内形势急剧转变，历史遗留问题尚未解决，党内又就与国民党统一战线的政策和八路军军事战略方针问题发生了新的分歧，毛泽东陷入了 1935 年以来最严重的困境。

1937 年 8 月下旬，在洛川会议上，毛提出的利用抗战时机全力发展中共及其武装、八路军不采取与日军正面对抗态势而以游击战为其主要作战方式、将军队主要力量用于开辟敌后中共根据地等一系列主张遭到中央核心层部分成员冷遇，周恩来且带头对毛的主张表示异议[13]。这是遵义会议后，毛在中央核心层所遇到的第一次挫折，此次事件不仅

标志着毛的政治权威尚未完全确立，更预示与毛密切合作已 3 年的周恩来极有可能与将要回国的王明重新会合，从而严重动摇 1935 年后毛在中共核心层已获得的政治优势。这一事件对毛造成的另一冲击是，由在党和军队中享有崇高威望、且在军内拥有较深干部基础的周恩来等提出的"运动游击战"方针受到军方领导人的一致拥护，毛面临军方与其疏离的现实危机[14]。

1937 年 11 月底，王明身负莫斯科要求中央转变方针的重大使命，以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书记的身份飞返延安。王明返国，打破了 1935 年后逐渐形成的以毛为重心的中共政治格局，党内关系立即开始了新一轮的转折和重组。12 月政治局会议的召开，实现了1931 年后党的政治局委员（国内部分与国外部分）的首次会合。从形式上看，政治局作为集体领导机构，其权威得到了恢复，军方人员列席政治局会议的惯例宣告结束，一时党权猛然上升。王明且以天子门生自居，口衔天启，传达斯大林要求中共全力加强与国民党合作的新方针，受到周恩来等的一致拥裁。周且在 1937 年 12 月政治局会议上，不指名批评毛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而没有实行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15]。

面对来自莫斯科的巨大压力和政治局内的一致声音，毛泽东虽然隐约其辞，但最终还是迫于无奈，只得取与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相一致的立场，对王明的新方针随声附和，此亦所谓"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16]。毛甚至还能放下其极强的自尊心，少有的对王明吹捧几句，将其誉为"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17]。

1937 年底毛在政治上遭受的挫折，主要是由于他的思路与斯大林及中共政治局绝大多数同事相冲突。在对抗战与中共前途关系之认识上，毛的眼光确比周等看得更深远，用毛的话说，即决不做赔本买卖。在毛看来，拿中共历经千辛万苦才保存下来的这一点血脉——不到三万的红军去和日军拼命，岂只是头脑简单，简直是发政治热昏症！可叹的是，大多数政治局同事被"爱国主义"冲昏了头脑，竟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抗战前途若不与"人民的胜利"相联系，那又与中共有何意义！中共难道还要重蹈大革命时期为国民党作"苦力"，旋被国民党打入血海之复辙！

对于在中共最艰苦的岁月躲在莫斯科作寓公，如今又"挟天子以令诸候"的王明，毛从心底排斥与厌恶。而从王明这方面看，却颇有自知之明，王明知道自己在党内基础薄弱，倒也一贯注意与毛加强和改善关系。早在 1934 年，王明就对毛作出一系列亲善举动，在莫斯科主持出版了烫金的毛泽东讲话集，又多次在共产国际大会的讲台上盛赞毛泽东。1937 年后，王明与毛意见相左，实缘于两人背景、思路、处境及个性之悬隔太远，却非王明蓄意对抗毛。

王明返国对毛泽东造成的冲击既深又远。1937 年 12 月后，在中共党内事实上形成了毛、王共治的局面，毛的影响相对下降。继 1937 年 12 月政治局会议后，在 1938 年 2 月底至 3 月 1 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由于得到周恩来等的支持，王明的意见又一次在政治局占了上风。中共出现了两个并行的中心，即由毛泽东、洛甫、刘少奇、康生、陈云等组成的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和以武汉长江局为中心的，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组成的事实上的"第二政治局"。令毛尤其不安的是，

华北八路军领导人彭德怀竞主动向武汉长江局请示工作，而远在皖南的另一政治局委员、新四军政委——毛的政治老对手项英更是一切听命于武汉长江局，毛几乎丧失了对新四军的影响力。

1937 年未至 1938 年夏，这是毛在遵义出山后政治上最失意的时期。毛自称，在这段时间“鬼都不上门”，此话可能言过其实，因为，毛始终牢牢控制着中央的保安、机要和组织部门，毛也不遗余力地加强对华北八路军的指导，但其政治影响相对减弱却是事实。

虽然毛泽东在政治上遭到严重的挫折，但他并未就此罢休，“道法自然”了，在暂时处于孤立状态的这大半年里，毛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以后的卷士重来。

1937 年底至 1938 年夏，是毛韬晦养气、以力逆境、以“道”造势的重要阶段，在王明、周恩来等正轰轰烈烈、频频爆光于国内和党的政治舞台的日子里，毛一则不动声色、潜心观察，随时注意各项事态的发展；另则，他又进行各项准备，为挽回颓势竭尽一切努力。

在毛的各项准备中，理论的准备占据重要位置。毛深知“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18]，若不建立起自己的有说服力的概念系统，便无法在新的形势下使其同事折服。而要拿出这一套概念系统，又必须在莫斯科的菜单里进行精心选择，并加以自己的佐料，使其既有莫斯科可以接受之外观，又有自己的灵魂。

此项工程难度甚大，非大手笔无以完成。1935 年前，毛尽管已萌生种种想法，但多属对当时党政策之直观反应。只是到了抗战阶段，当毛已研究了一批列宁、斯大林著作，毛的一套想法才在与其政治对手的较量中逐渐系统化和概念化。与王明等的分歧更刺激了毛理沦思维的活跃，促使他创造出几个极具攻击力的概念术语。

（1）“阶级投降主义”或“新陈独秀主义”。

针对洛川会议后中共党内逐渐占上风的主张全力与国民党合作的主张，毛从列宁和中共历史中寻找到依据，发明了此新语汇，将其赠与王明及其追随者。

（2）“速胜沦”。

毛针对已被八路军华北军分会接受的“运动游击战”方针、和王明、周恩来在武汉为配合国民党而展开的“保卫大武汉”之种种活动，反复强调开展游击战对发展中共和进行持久抗战之极端重要意义，并将王明等的观点概括为与“亡国论”相对应的“速胜论”。

匆庸讳言，毛决非一单纯学院式观念思想型人物，他首先是一个实践家，其发明的说辞主要是针对其现实中的政治对手的。

新口号既已发明，但仅有“道”而无势，则“道”之不行。于是，以术谋势就成了 1938年春夏之际支配毛之一切活动的兴奋中心了。

（1）运用一切方法，全力争取共产国际的支持。自 1935 年底莫斯科与中共电讯交通恢复后（初期电讯仍不稳定，1936 年初即完全正常），莫斯科就成了套在毛头上挥之不去的金箍咒。尽管毛控制了与莫斯科的电讯，从而在讯息获得及解释方面赢得了比较充分的主动权，但当王明返国后，面对参与新方针制定的王明，使毛原己获得的解释上的自主权，顿时相形见绌。中共政治局的大多数同事，如久旱望云霓般，将王明传达的斯大林指示视为甘霖，而将毛的肺腑之言撇之一边。若改

变这一状况，其重要途径就是加强毛在莫斯科的影响力，对王明实行釜底抽薪。1938 年苏联正处于“肃反”大风暴中，政治的发展瞬息万变，王明的后台米夫已遭斯大林清洗，此事已为毛在莫斯科的活动提供了空间。1938 年3 月 5 日，任弼时被政治局派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自王明返国后中共执行新方针的工作。在任弼时向莫斯科提供的汇报提纲中，主要反映的是中共政治局 12 月会议精神[19]，但也同时夹进毛有关加强在统一战线中独立性的意见。当这个折衷性的汇报提纲被共产国际通过后，毛在争取莫斯科的支持中就已取得初步胜利。而当王稼祥与季米特洛夫会面并获得季氏对毛支持之口信，则不啻为毛的巨大胜利了。季氏之口信在 1938 年的中共发挥效力之巨大，非局外人所能想象，它简直就是一份莫斯科对毛之政治地位的承认书。至于王明，一旦遭莫斯科之冷遇，则完全丧失了政治上的同旋余地。1938 年季米特洛夫对王明的轻慢有其复杂的原因，尽管季氏与王明私交甚笃，王明唯一的女儿在其返延安前即托付给季氏，但在 1938 年席卷全苏联的大恐怖之血风腥雨中，饱受寄人篱下之苦、且常遭斯大林之轻侮的季氏于惊恐中钦羡毛泽东之功业，尽在情理之中。季氏与斯大林毕竟非一人，从各方面资料看，斯大林对王明关怀备至几十年可谓不变。1938 年季氏搞的小聪明竟把斯大林也蒙混了过去。这也是毛以后念念不忘季米特洛夫的原因。

（2）积极引导军队领导人，促使军方改变战略方针。1937 年洛川会议后，毛不断急电彭德怀等，指示彼等尽最避免与日军正面冲突，而将主要工作用于开辟根据地和群众工作方面[20]。但当八路军依运动游击战方针配合国民党军取得平型关之役胜利后，毛也表示嘉许。在毛的耐心争取下，1938 年春夏，华北军分会主动将历动游击战的方针转变为深入敌后，全力开辟中共根据地的游击战方针，在发展中共武装力量这一关键问题上，军方与毛原就完全一致。自太原失守，日军强敌压境，国民党军队撤退殆尽，中共军队失去友军配合作战的客观环境时，八路军事实上就采纳了毛的战略方针，当八路军在不到一年内从不足 3 万发展到 30 万人后，军队将领业已主动信服于毛。

（3）加紧联络党的高级干部。在王明返国、新政治格局出现的形势下，毛鉴貌辨色，小心谨慎地发展与在延安政治局委员的政治联系。1938 年 3 月底，毛将刘少奇调回延安，刘成为毛在政治局中最亲密的盟友，而刘领导的原北方局从此成了毛向长江局“斗争的根据地”[21]。毛同时还拉紧洛甫，不仅使洛甫在对国民党之方针的意见上与自己完全一致，而且加速了洛甫与王明等的进一步分裂。对于和自己素无交往，且与王明长期共事的康生，毛也经过一段时间的认真考察，让康生在延安的中央职工委员会坐了一阵冷板凳，在证实了康生对自己的忠实后，与康生建立起密切的关系。

1938 年 3-4 月，毛联合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与以王明、周恩来为首的长江局就中共向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发贺电事，展开了电报战，虽然一时难分胜负，但毛却在此次交锋中，巩固了与在延安政治局委员的团结，打破了王明在政治局曾一度拥有的完全支持。

（4）推迟召开中共七大。自 1928 年中共在莫斯科举行六大后，由于环境极其险恶，中共迟迟未能召开七大。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中

共成了合法政党，1937 年政治局会议决定在“最近时期内”召开七大，并成立了由毛和王明共同主持的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1938 年 3 月政治局会议再次重申近期召开七大的决定，洛甫并代表中共中央专门就此于3月 10 日起草了“告全党同志书”。然而，毛决不愿意在形势对己不利的状况下召开七大。洛甫已经拟就的“告全党同志书”被束之高阁没有发出，于是，1937 年 12 月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近期召开中共七大的决定被一再推迟。

由于毛在固守既有阵地的同时不断出击，其政治之优势逐渐形成，毛的韬晦养气终获成功。1938 年 8 月，王稼祥返国带来了季米特洛夫支持毛为中共核心的口信，毛乘势立即召开中共六中全会，就此出台一系列重要举措：

（1）利用有利时机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新概念，将其“道”在全党和全国完全公开。毛明确表示，中国不仅从马列主义，而且还要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吸取精神资源。毛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其荦荦大端而言，即在于他吸取、运用马列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思想和苏共党的组织结构形式，将其与中国历史重大遗产——农民造反、“马上打天下”的传统融汇统一，使之转化为由共产党领导的、推翻国民党统治的现代农民大革命。作为中共摹本的俄式革命理论及经验，虽在毛将中国传统遗产转化为现代农民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俄式理沦及其经验与毛的观念和行动又常有不合之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口号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注人了民族主义的活力和色彩，它不仅为毛所有的观点提供了合理性的解释，也给毛提供了自由活动的广阔空间，它更有助于改变“中共乃外来观念之产物”这一在当时颇为流行的观念，而大益于中共在中国社会的生根。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抗战阶段，毛抓住“中国化”的旗帜，立时使王明等陷于窘境而无以自拔。

（2）将刚刚获得的政治优势迅速落实到对中共权力结构的组织配置方面。1938 年 11月 5-6 月，毛惜周恩来携其给蒋介石亲笔信赶赴武汉，王明、博古赴汉参加国民参政会而未能出席六中全会闭幕式之机会[22]，乘机对王明等的“阶级投降主义”进行猛烈地抨击，借以冲淡和挽回其在《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对王明等观点的妥协。会议后又以武汉失守为理由，撤销长江局，缩小其后继机关南方局的权限，继而以“工作需要”之名，调王明回延安，将其置于自己密切的监护之下；复正式委任康生为中共社会部部长，使康生成为名符其实的中共的叶若夫兼贝利亚；继之，再派刘少奇去中原，以箝制和着手分阶段解决项英和新四军问题；最后，大力扶植与留苏派毫无渊源的高岗，将高岗树为陕北党和红军的旗帜，以巩固中央后方。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之召开，终使毛正式成为党的领袖。会后，毛开始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此时的书记处类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势既造成，其威乃现，一度与王明密切合作的周恩来旋即离王而去。对于周恩来的翩然而归，毛当然求之不得，周之杰出才干和欲易国民党天下之共同需要，使毛与周再次走到一起。

三

从 1935-1938 年，经过 4 年的艰辛努力，其间虽有曲折和暂时的失意，毛毕竟在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大道上一路凯歌行进，到了 1938 年底，毛已将中共军权、党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然而，仍有一件事使

毛如骨刺在喉，须臾不得安宁——这就是毛还未获得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中共理论和思想宣传部门仍控制在留苏派的手中。

解释权——给词语下定义的权力，这是人类最重要的权力之一。在共产党内，解释权则尤其重要，谁获得对马列经典的解释权，谁就控制了党的意识，换言之，即使拥有军权和党权，若无意识形态解释权的支持，对党和军权的控制也难持久。解释之重要，不纯取决于词语本身的内容及其意义，更在于词语与现实的联系，以及词语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长期以来，在留苏派的经营下，俄化概念在中共党内早造成一特有的精神气质和浓厚的亲苏气氛，成为笼罩在党之上、阻遏一切创新精神的沉重低气压，王明、洛甫等不仅凭藉这种氛围扶摇直上，且沾沾自喜，俨然以圣杯看守人和谐法大师自居，将一切独创思想均视为旁门左道而必欲除之而后快。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毛对此除了愤慨而毫无办法，彼等出自莫斯科正宗嫡传，在他们的眼中，自己的那一套岂只是离经叛道的"狭隘经验主义"，简直就是难登马列之堂奥的"野路子"。

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的毛决意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且一鸣必求一言九鼎之效，使其政治对手就此噤口。还在 1910 年，当毛还是湘乡东山学堂学生时，他就借一首"咏蛙"诗而明其心志："独坐池塘如虎距，缘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23]而在毛已初建其大业之后，他就更不能容忍中共党内还存有的那种精神指导系统。素怀"传教"之志，兼有办事之才的毛，对自己及对手之特长均有极其清晰的了悟，他深知目前自己之优势非在于此——马列经典读得毕竟比那些洋学生少；但毛又极具自信，他之基于对中国历史及其文化传统深刻洞悉和体认，而对马列几个重要概念的融汇，在其实际功用价值上远胜于那些食洋不化的迂腐书生的纸上谈兵。当然，毛作为"策略大师"，更知道如何区分在掌握实际权力与精神指导权力之间的轻重缓急关系。1935-1938 年，毛既是顺其自然，又是自觉促成，对洛甫领导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并不表示任何异议，毛的当务之急是将留苏派从权力核心地带引开，先巩固军权，进而夺取党权。毛很清楚，一旦有了军权和党权，再获取意识形态解释权乃水到渠成。毛也要让自己的政治对手彻底明白，究竟谁是真正的大英雄和大手笔。在毛看来，留苏派"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其胸中茫然无有"，仅是凭藉莫斯科的栽培，先控制意识形态，继而夺取了党权和军权。毛却要反其道而行之，凭其个人的意志和智能先掌握军权和党权，最后攻占意识形态阵地。

1938 年 10 月，当毛已先学了一批马列著作和斯大林主义的解释课本——米丁、爱森堡的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之后，毛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讲台上向全党发出开展"学习运动"的号召。

学什么？一言以蔽之，学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之产物：毛的新概念以及毛的态度和工作方法。可是当时既无"毛泽东思想"这一正式概念，又不便在斯大林远距离观察下直接鼓吹毛的新贡献，况且，毛也难于将其内心的真实想法和盘托出。毛真正陷人到欲语又止的境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学习运动"之展开，竟使得六中全会之后颇感失落、压抑、反被毛圈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和中央统战部几间窑洞里度日子的王明有枯木逢春之感。王明似乎感到施展自己马列才华的机会再

次来临，竟然四处报告，居然受到延安各机关、学校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

王明之风头仍健，其实并无任何意外。六中全会之后，王明仍是书记处和政治局成员。更重要的是，毛在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包含了王明的大量政治观点，毛为了向斯大林显示其政治忠城以及为了扩大中共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影响，通权达变，比王明更积极地主张加强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毛甚至提出中共可以集体加人国民党，并"将加入党员之名单提交国民党的领导机关"的正式建议。[24]（毛以后拒不将《论新阶段》收人《毛泽东选集》）。六中全会的政治决议案也是由王明代表政治局起草[25]，至于毛有关加强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观点只是闪烁于政治报告中，与其主旋律并不协调。六中全会后，王明只是感到在政治上的失势，而无意识形态受挫之感。

毛对王明等的大出风头一时也无可奈何，站在共产党的角度，"学习运动"不学马列又学什幺呢？于是毛泽东眼看着马克思著作在延安一本本翻译出版，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如饥似渴研读原典，只能更加反感那些控制党的意识形态部门的"学阀"、"党阀"对"学习运动"的别有用心的误导。其实，1938　年后毛在中共意识形态所占空间己大幅增进，掌管党的理论和宣传工作的洛甫主动给毛让出了最重要的权力：据当时洛甫的副手吴黎平（即吴亮平）回忆，六中全会后，中央内部已有规定，凡在延安发表重要文章（《解放周刊》、《共产党人》）一概须经毛事先审阅批准[26]，而毛的讲话、文稿莫不刊登在党刊之首要位置。

然而毛所要求意识形态部门的决不仅是这些，他的终极目标是改变中共气质。他要实现对意识形态的全部占领——包括控制和超越于控制之上的完全占有。将毛文章放在头版头条，或使毛拥有审稿权，并不能立时改变中共党内早己固定化的那种以俄为师的精神气氛，毛所要打破的正是在他个人与由洛甫等营造的气氛之间所存在的那种隔离状态，这种隔离状态与毛毫无亲和性，却能制造无数"又臭又长"充满腐气的"党八股"，且使留苏派从容操纵全党的精神信仰系统。在这堵巨大的精神壁垒面前，毛氏新概念和新文体根本无从普及和推广，更遑论取其地位而代之！

然而这一切之于历经无数风浪的毛，又实在算不了什么。

1938-1941　年，毛为夺取意识形态解释权，巩固并扩大其在党和军队内的基础，开展了一系列新的活动。

首先，毛起用陈伯达和胡乔木作为自己的理论助手。陈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他擅长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古代哲学概念，这有助于毛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理论化和系统化[27]。至于胡，毛看重他走笔成章的文字表达能力和他领导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经验。

其次，为配合正在形成的以毛为中心的体制，由任弼时具体筹划，将体现等级差序原则的大、中、小灶干部待遇制度进一步明确化和固定化。此制度的作用，不仅在于它能够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确保对党的高级干部的物资供应，更在于它可以在敏感的"价值"和"承认"问题上，直接打击党内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王明最热烈的听众——自视清高的傲慢。

第三，毛亲自主持加紧编纂"党书"——党的历史文件集。毛在胡乔

木的具体协助下，从 1940 年底开始，编辑《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为建立以毛为中心的中共新党准备理论依据[28]。

在上述准备的基础上，1940 年 12 月 25 日，毛正式提出他隐藏在胸中多年的观点，在以后以《论政策》之名发表的给党内指示中，第一次宣布，中共在苏维埃运动后期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提及其在十一个方面的表现。在这里，毛放了一只观测气球，他使用的是比较笼统、含混的“苏线埃运动的后期”的概念，而没有明确指明其时间段是从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 1935 年遵义会议召开之前；他用“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来代替“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正式判断。

毛之所以选择在此时提出自己的观点，是基于他对其政治对手内部分裂状况之准确把握。毛十分清楚，在中共领导层顽强坚持对原政治路线评价的人，并不是王明，而是与毛长期合作共事、且在 1940 年仍与毛关系密切的洛甫。至于王明，已在 1940 年 11 月就提出中共在苏维埃运动后期犯了严重错误的看法[29]。尽管王明只是重复其 1933-1934 年在莫斯科即曾表明的观点，但王明在此时旧事重提，却完全是为与在国内的原同事博古、洛甫撇清关系。对于王明、博古、洛甫等互相攻讦，竞相推卸责任，毛看在眼里，却丝毫没有表明他个人对王明的欣赏和支持，毕竟使毛感到威胁的是在国际共运中声名远扬的留苏派之精神领袖王明，而非王明昔日之朋友、且早已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自己站在一边的洛甫。眼下形势早己变化，王明正不时向毛示好，且将毛从“中国革命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升格为“伟大的理论家”[30]。只有洛甫一人还在顽强抵拒毛为修正历史结论所作的努力，果然，洛甫对毛放出的气球作出剧烈的反应，可是，教条宗派集团已四分五裂，势单力孤的洛甫又怎能一人抵抗毛的进攻？

一旦观测到留苏派虚弱之所在，尤其是留苏派的后台斯大林竟也毫无动作，毛迅速将阵地从党的十年历史问题转移到当前。这次毛不再将王、洛分开，让这些“理论大师”呈现原形。毛决定彻底摧毁王明等颇以在党内坐大的基础——他们所拥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兼圣杯看守人的名号！

1941 年 5 月 19 日，毛当着王明等的面，向王明发起新的一轮攻击，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他要求彻底扭转 1938 年后开展的学习运动方向，“废止孤立地、静止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而代之以学习当代最高综合的马列主义——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在向王明发起的最新挑战中，一组组最具隐喻性和挑战性的新语汇被毛创造出来——“言必称希腊”、“希腊和外国的故事”、“教条”、“留声机”，尽管皆有其针对意涵，却并不明确所指，这就更加容易在词语与现实之间引发疑问和联想，从而猛烈动摇王明等的老语汇的神圣地位，为毛通过改变词语，夺取意识形态解释权扫清障碍。

从 1935 年遵义会议后到 1941 年春，毛泽东在长达 7 年的时间里，依据时局环境及政治发展所能提供的空间，为改变中共发展路向，取代明等留苏派而确立其对党之绝对领导，进行了持续而细致的准备。

毛泽东的“准备”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包括了思想和舆论的准备，组织和人事力量配置方面的准备，军队和保安等强势机构的准备，

以及打通莫斯科的高级政治公关和掌握与“远方”秘密电讯，对信息来源控制及再解释方面的准备。

在极端复杂、瞬息万变的动荡形势下，毛将不容拂逆的个人意志和灵活、练达的策略手段紧密结合，使其“道”、“术”、“势”三种资源水乳交融、互相贯通：“道”为根本，以“道”开路，先声夺人；“术”为手段，以“术”课“势”，“势”乃形成；“势”既获得，以“势”护“道”，“道”遂大行。在“道”、“术”、“势”互动回流的过程中，毛的政治智能和驾驭复杂事物之才俱得以全面展现。毛将敢于突破常规、取而代之的雄心魄力与缜密、谨慎的组织、筹划才能紧密结合，既抓住每一稍纵即逝之机遇．又凭藉其个人拥有之资源，每每创造有利于中共发展的时势。毛在对实情的掌握及其政治对手心境的揣摩方面几达化境，终在风云际会中，通过不断的纵向位移和横向凝聚，在突进和迂回之间积小胜为大胜，接连赢得阶段性的重大战绩，在发展和壮大了中共实力的同时，又将自己的权力空间大大拓展：从先下手持兵符，继而掌握党权，复而争夺意识形态解释权，再图实现意识形态解释权之扩张，军权和党权之再巩固，最后达到集领袖与导师于一身——“君师合一”之境界。

1941 年春，实现毛泽东目标的日子已经迫近，毛已成为不可动摇的中共第一号领袖，现在毛不仅是军事家、政治家，也开始成为党的理论家。尽管毛泽东还未获有中共总书记或党主席的正式头衔，王明等还端坐在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主席台上，但是“坚冰已经打破”；包围圈正在紧缩，一场彻底改造全党——从组织结构到精神气质，从语言到思维方式——的大风暴，延安整风运动已经来临！

注释：

[1]参见梁漱溟：〈再忆初访延安〉，载《我的努力与反省》，漓江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19 页。

[2]毛泽东接见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等日本社会党人士的谈话，1964 年 7 月 10 日，载《毛泽东论党的历史》，第 4 页。

[3]周恩来在 30 年代前期对毛泽东的评价主要也是侧重肯定他的军事领导才能。1932年 10 月上旬，周恩来在宁都召开的苏区中央局会议上发言，认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提议毛泽东留在前方，参与指挥战争，但被与会者所拒。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31 页。

[4]参见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 年 2 月或 3 月）〉，载《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2 页。

[5]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现代史料编刊社 1981 年版，第 332 页。毛泽东对洛甫的轻蔑态度在 50 年代后期完全公开，其代表性的文字是 1959 年 8 月 2《给张闻天的信》，直至 70 年代初，毛还不断数落洛甫。1935 年 9 月下旬，邓发改任由原中央机关和红军总政治部等机关组成的陕甘支队第三纵队政委；11 月，红一方面军番号恢复后，邓发主要负责红军的筹粮工作；1936 年 4 月他被委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派往苏联。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

293、306 页。

[7]长征开始，国家政治保卫局少数负责人随首脑机关行动外，其它工作人员均被并入各军团，国家政治保卫局只留下名义，工作权限已大大缩小。1935 年 10 月，王首道被任命为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部长，原执行部部长李克农被调作联络西北军和东北军的统战工作。该年年底，国家政治保卫局建制被正式取消，其工作由方面军政治保卫局接替。1934 年 10 月，红军长征前夕，中共中央秘书处，军委秘书处均被裁撤，其遗留工作由中央军委机要科承担。1935 年中共中央迁到陕北瓦窑堡后，中共中央各部及秘书机构渐次恢复，原来仅有的机要机构——中央军委机要科一分为三，成立了中共中央秘书处机要科，中央军委机要科，中央社会部机要科，上述三个重要机构统归王首道领导。参见《中共秘书工作简史（1921-1949）》，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86-187 页。另参见《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97 页。

[9]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第 345 页；另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版，第 203 页。

[10]洛甫在 1943 年整风期间的笔记中指出，“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参见〈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1943 年 12 月 16 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5 年第 1 期，第 13 页。

[11]事隔 20 多年后，毛泽东在谈到有关纠正“王明路线”的历史时，再次提及洛甫的思想转弯过程。毛说：“洛甫开始不承认路线错误，七大经过斗争，洛甫承认了路线错误”。参见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1959 年 8 月 2 日），载《毛泽东论党的历史》，第 46 页。其实，对于这一问题，洛甫早在延安整风开始不久，就有较深的认识。洛甫分析了遵义会议有关过去党的政治路线的评价对自己的深刻影响，他说，由于遵义会议过去中央政治路线的正确，因而使自己“在长久时期内不能彻底了解自己严重错误”，参见《文献和研究》1985 年第 1 期，第 13 页。

[12]关于刘少奇与洛甫争论对中共的影响可参阅拙文＜毛泽东与 1937 年的洛甫之争＞，载《南京大学学报》1993 年第 4 期。

[13]有关洛川会议上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意见分歧，可参阅《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 378 页；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第 386-391 页；另可参见《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02-203 页。

[14]毛泽东在 1937 年 8 月 1 日与洛甫联署发给周恩来的电报中，首次提出红军（此时尚未完成改编）作战方针应是“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8 月 5 日，毛部分修改了自己的观点，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提出了红军担负的作战任务中“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但到了 8 月 18 日，毛、洛甫以中央书记处名义发出给朱德、周恩来等的《训令》，正式提出“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在总的战略方针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但是在周恩来的影响下，1937 年

10 月 8 日，华北军分会（八路军最高领导机构）明确规定以“运动游击战”作为八路军的战略方针。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 373-74、375、377；另参见《彭德怀自述》第 223 页。

[15]《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 393 页。

[16]语见《孟子"离娄下》，毛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引述了孟子此段论述，载《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22 页。

[17]参见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87 页。

[18]参见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 年 8 月 23 日），载《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85 页。

[19]例如任弼时在向共产国际提供的报告大纲的说明和补充中指出，造成国共摩擦的原因之一，即是“我党对国民党转变和两党合作长期性认识不充分，过分强调了独立自主、民主与改善民主的要求。”载《中共中央抗日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 1986年版，第 122 页。

[20]毛泽东的上述电报均载于《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 年版。

[21]1938 年春，刘少奇多次向中共中央秘书处的王首道表示他个人及北方局对毛泽东的全力支持，参见《王首道回忆录》第 212-213 页。

[22]周恩来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二天，在作过统一战线工作报告后就离开延安赴武汉，于 10 月 4 日面见蒋介石，转交 9 月 29 日毛泽东致蒋亲笔信件。毛在给蒋的信中，声称自己及国人对蒋之“盛德”“钦佩无既”，“无不崇仰”。1938 年 9 月 29 日，毛泽东致蒋介石手稿影印件见《抗战建国史研讨会论文集》（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1985 年 12 月出版，第 325 页。

[23]参见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25 页。

[24]参见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 年 10 月 12 日-14 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第 629 页。

[25]王明：《中共五十年》，现代史料编刊社 1980 年版，第 76 页。

[26]参见吴黎平：〈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出版的前前后后〉，载《怀念刘少奇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91 页。

[27]Raymond F. Wylie, The Emergence of Maoism——Mao Tse-tung,Chen Po-ta 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Star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P.102-03，104，110-11.

[28]毛泽东称其主编的《六大以来》为“党书”，他在 1943 年 10 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1941 年 6 月编了党书，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故可能开九月会议（指 1941 年9 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大家才承认错误。参见《党的文献》1990 年第 3 期，第 75 页。

[29]王明〈论马列主义决定策略的几个基本原则〉，原载延安《共产党人》1940 年第12 期，引自《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 4 卷，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88 页。

[30]王明：〈学习毛泽东〉，延安《新中华报》1940 年 5 月 7 日。

第六篇　中共从五四教育遗产中选择了什么——延安教育的价值及局限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教育方针及理念基本形成的时期，本文所称的「延安教育」特指抗战阶段中共在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革命根据地内所推行的教育方针及其实践。延安时期产生的有关教育的一系列概念和措施，在一定的程度上决定了新中国教育的性质和面貌，并由此影响了几代人的思维、知识结构和行为方式。

然而，延安教育又是在五四教育的大背景、大环境下产生的，同样受到五四教育多方面的影响。对于这方面的情况，以往论者较少关注，本文试图探讨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中共从五四教育遗产中选择了什么？延安时期革命意识形态在选择五四遗产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延安创造的新教育的性质是什么？延安教育有哪些价值和局限？

一、延安时期中共对五四教育遗产的态度

1937　年国共合作实现，中国共产党成为合法政党，并陆续开辟了几大块比较固定的战略根据地，在新的形势下，党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开始大规模兴办教育，因而立即面临着对过往教育方针的调整问题。

从阶级论的角度出发，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前的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对五四教育遗产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三十年代初，中共早期教育理论家杨贤江、钱亦石首次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教育的性质和作用，他们认为，教育属上层建筑，在阶级社会，「教育权跟着所有权走」，「教育成为支配阶级的工具」，从而主张无产阶级必须夺回教育的领导权，让教育成为“被支配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1]　基于这种认识，左翼理论家不仅认定五四后占主导地位的新教育是亲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教育，甚至把平民教育、生活教育、职业教育也一概视为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教育主张，一并加以否定。

在排拒了五四新教育后，中共从苏俄接受和引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及其制度。在 1927-1937 的十年间，党在江西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参照苏俄经验，相继建立起苏区的共产主义教育制度，其基本方针是教育为革命战争服务，教育面对工农劳苦大众，教育与劳动相结合。为了落实这个教育方针，中央苏区在 1933 年成立了教育人民委员部，由瞿秋白、徐特立分任正、副部长，各基层政权机构也都设立了主管教

育的机构，尽管处于紧张的战争环境下，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还是开始了大规模的共产主义教育的实验活动。

瑞金时代所兴办的教育是和五四教育性质完全不同的另一类教育。党从现实政治斗争和革命动员的需要出发，首次在中国将教育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类为提高干部政治和军事、业务素质的干部教育系统；第二类为培养青少年而建立的传授政治和文化知识的普通学校教育系统；第三类为针对广大劳苦群众而开展政治动员和扫除文盲的社会教育系统。在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这三类教育都得到长足的发展。在干部教育系统，建立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郝西诗红军大学(郝西诗为苏联驻广州副领事，因被指控参加了广州暴动而被国民党政府杀害)，以及其他各类军政干部学校和训练班；在普通教育系统，有列宁高级师范学校和各县、区、乡、村近万个列宁小学；在社会教育系统，从中央到苏区各省、县、区、乡都建立了扫除文盲的组织机构，在中央一级成立「消灭文盲协会临时中央干事总会」，各县、区、乡则普遍建立「消灭文盲协会」，在农村中广泛开办了夜校，半日学校和识字班。

瑞金时代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的教育完全体现了共产党的阶级论教育观的基本特色。党和苏维埃政权首先将教育定性为进行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员的手段，坚决拒绝五四后兴起的「教育独立」的思想，同时也否定学校作为传授知识单位而单独存在的观点。主张学校不是简单传授知识的读书机关，而要成为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者，[2] 「教育工作应该为战争与进行广泛的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教育服务的观点出发，教育为着战争……用教育工作帮助战争的动员」，为此，党和苏维埃政权要求一切教材要带政治鼓动性，[3] 以此「去提高广大工人与劳动群众的阶级觉悟」。 [4] 在教育对象方面，也摒弃了五四教育的全民性的内容，强调教育主要面对广大的劳苦大众，规定实行工农阶级教育优先的政策，地富子弟虽可进入小学学习，但严格禁止厂主、地主、富农子弟升入初中。[5] 从阶级论教育观出发，各级苏维埃政权对教师也有特别的政治要求，禁止农村中原有的私塾先生从事教书工作， 乃是因为“学究学生”无法在新形势下扮演政治宣传者和鼓动者的角色。

瑞金时代教育方针及其实践的最显著特色是它的阶级性和群众性，这为延安教育打下了底色，在整个苏区的教育工作中，无论是干部教育，还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无处不渗透着强烈的政治色彩。1933 年 6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发《识字班工作》训令，动员广泛展开苏区扫盲工作，湘赣省苏维埃政府文化部随即拟定统一生字，要求在 3 个月迅速推行突击扫盲任务。在所颁布的 3 级生字表中，兼顾了政治教育与生活实用原则：第一级生词共 27 句，均为日常生活和劳动用语；第二级生词 30 句，计有政治词汇 19 句，第三级生词 29 句，政治词汇达到 14 句，在总数 86 句生词中，政治宣传词语竟有 33 句，[7] 占总语汇比重的约 40%。中共重视群众教育获得了很大的成果，据毛泽东在 1934 年 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作报告称，在中央苏区内的江西、福建、粤赣三省中共有补习夜校 6，462 所，学生 94，517 人，有识字组 32，388 组，组员15 万 3 千余人，妇女中的文盲数目得到减少，参加兴国县夜校学习的妇女占了总学习人数

的 69%，而兴国县识字组的妇女比例高达 60%。

十分明显，若从大的背景观察，瑞金时代所推行的教育方针与实践是与五四教育的总体精神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的，但是若仔细辨别，在瑞金时代党的教育理念与实践的背后，仍然潜藏着一条与五四教育沟通的渠道。在中央苏区的社会教育系统，许多措施与五四后兴起的平民教育、职业教育思潮并无根本矛盾。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党在瑞金时代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新需要对原有的教育方针进行了修改补充，逐步形成了新的教育方针，这就是：教育为抗日战争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从字面表述上看，延安时期教育方针与瑞金时代并无大的区别，党仍然强调教育的政治鼓动功能，和教育为生产劳动服务的功能，但是，这个口号在实际贯彻中已出现了相当的弹性，显示了中共教育方针已发生了若干重要的变化。

延安时期各抗日根据地教育的内容有了新的扩大，在坚持阶级论教育观的同时，国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比重大幅度增加，由此与国内主流教育的思潮发生了联系。

在教育对象方面，虽然继续强调教育为工农大众服务，但已宣布地主、富农子弟也可入学的新政策。

对于教师的政治思想和阶级成份的要求也出现了松动，陕甘宁边区政府宣布只要拥护中共政策，私塾先生仍可继续教学，各根据地也不像瑞金时代那样，强令关闭一切私塾、旧学，而是允许予以保留。

上述这些变化显示了抗战时期中共对五四教育遗产采取了新的态度。延安教育虽然继承了瑞金时代的传统，继续坚持「教育随所有权走」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观，但对五四教育遗产中的平民教育，劳动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思潮采取了欢迎和接纳的态度，换言之，到了延安时期，党对五四教育遗产终于有了明确的选择。

抗战阶段，各抗日根据地所面临的环境对选择五四教育遗产有重要影响。中共摒弃五四教育中的精英主义内容，除了有其意识形态的考虑外，还因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基本不具备创办正规教育的条件。据边区主席林伯渠 1939 年 1 月的报告，在 1936 年以前边区 150 万人口中识字人数仅占全体人员 1%，某些县，如华池县，识字率仅占两百分之一。全边区只有 120 个小学。中学生屈指可数，社会教育则绝无仅有。[9] 除此之外，边区物质条件极其落后，严重缺乏师资，也给发展边区教育事业带来极大的困难。经过几年的文教建设，边区教育有了较大的进步。1937 年建立了鲁迅师范，1938 年又建立了边区师范，至 1941 年全边区共有中等师范 7 所，小学也发展到 1941 年的 1，341 所，共有 43，625名学生，边区还兴办了 5，843 个识字组，吸收 39，983 人扫盲，使文盲比率下降至总人口的 93-95%。[10] 尽管边区教育已有进步，但总体落后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如此情况根本不允许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脱离现实去和国统区的正规教育接轨，只能转而寻求在现有基础上对教育状况进行逐步的改善。正是基于这种现实，五四教育中的平民教育、劳动教育的价值和意义才显现了出来，那个时候在人们的眼中，这类教育思潮虽有缺点，但略加改造和转换，还是可以为边区教育服务的。

中共从边区文化落后，文盲众多，师资力量缺乏的实际出发，全面否定国统区占主导地位的新教育，却又欢迎、接纳平民教育、职业教育的思潮，是与其一贯的阶级论教育观相符合的。由此，党在延安阶段的教育就保持了意识形态的一贯性和连续性，尽管大的环境已改变，阶级论的教育观的实质却未发生真正的变化。

二、意识形态对选择五四教育遗产的支配作用

党的意识形态在抗战期间发生重大变化，反映在教育理论方面，即从工农性质共产主义教育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所谓新民主主义教育，即中共领导的以反帝反封建为目标的，为革命战争服务，强调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教育，与中央苏区时代所奉行的共产主义教育相比较，新民主主义教育已被赋予了较多的中国民族特色。

1942 年 4 月 17 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署名＜反对教育工作中的急性病＞的社论，这篇社论在强调党领导的教育应坚持正确的「立场」的同时，也提出应从古往今来优良遗产学习的问题，社论明确表示：「古今中外的一切合于科学的，有益于大众解放事业的，鼓励人类向上发展的事业、道理、善行与美德，都将为我们所吸取与发扬」。社论认为，共产党员既要「站稳立场」，又要「不囿成见」，这样就可以「随时随地地都努力去发见并采集有利于革命事业的财宝」。[11]

可是，「有利于革命事业的财宝」究竟有哪些，《解放日报》社论并未具体指明。远在江苏苏中抗日根据地的革命教育工作者吴天石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旧教育中也有不违背民族利益的进步因素，这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我们有从旧教育仓库中发掘出来加以接收、改造的责任，这就叫做批判的接受旧教育」。[12]

从上述言论看，党的新民主主义的教育与以往的共产主义教育在解释方面已不完全相同，但是在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旗帜下，阶级教育、共产主义教育仍然是延安教育的基本精神，尽管已宣布现阶段党的政治目标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然而党坚持认为思想、意识形态是可以超前的，即在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仍应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所以在调整教育方针和具体政策的同时，阶级论的教育观事实上并没发生实质改变。

阶级论教育观的体现之一是继续强调教育的政治功用方面。延安时期出版的大批教育论述反复宣传教育与政治的密不可分，从教育依属政治、服务政治的观点出发，中共认为，在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必须将干部教育放在教育的第一重要位置，社会教育放在第二位，普通教育(国民教育)放在第三位。[13]这种依政治需要将教育对象划分等级的做法与瑞金时代如出一辙，体现了党所领导的教育一贯坚持的阶级第一的政治立场。

阶级论教育观的另一体现是在边区的教育内容上，延安教育完全依照革命意识形态的要求，将政治教育、政治动员放在突出地位。在三种类型的教育中都体现这一原则，以加强受教育者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并进而改变受教育者的思想意识。

延安教育唯一可与五四教育接轨的仍是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普遍推行的社会教育。在边区政府各级机构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开展

了普遍持久的冬学活动、识字活动，据不完全统计：1942 年后，识字、教育活动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加识字班、夜校和半日学校的农民有 34，000 余人。[14]抗日民主政权热心大众教育，完全出之于革命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从瑞金时代面向劳苦大众的教育，发展到延安时期群众路线下的普遍的群众性的扫盲活动，不仅保持了阶级论教育观的一贯性，也体现了党对五四平民教育思想、劳动教育思想新的开放、接纳的姿态。

在延安时期，党和边区政府还积极推行了一场体现其激进社会改革理想的新文字运动。早在 20 年代末，著名共产党人和教育家吴玉章就开始在苏联远东地区进行了试行新文字的试验。吴玉章等认为，为了彻底改造中国旧传统，特别是为了解决中国普通百姓学习中国汉字的困难，应用拉丁化新文字取代汉字，从而解放广大劳苦人民，使人民获得文化和知识上的翻身。1939 年吴玉章返回延安后，得到中共中央的支持，随后在边区和华北根据地全力开展了新文字运动。

中国共产党推行新文字运动是其一贯的主张彻底改造旧中国和重视大众教育传统的自然反应。党和边区各级政府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进行这场史无前例的试验。1940 年，边区政府开始在群众性的冬学活动中试教新文字。1941 年，明令在初小一年试教新文字，随后在边区 7 个县市兴办新文字冬学。同年，边区政府正式承认新文字的合法地位，规定新文字书写的契约文件，与汉字同样具有法律效用。[15]为了培养新文字教员，延安开办了新文字干部学校，出版了「新文字报」。1942 年，边区政府还规定，各地有新文字教员者，应一律教新文字，不得新文字、汉字混合去教。[16]延安的新文字运动对党领导的其他根据地也产生了影响，冀中根据地从 1940 年开展新文字运动，饶阳县还创办了新文字书店，在冀中地区的饶阳、安平、深北、定南先后举行过新文字训练班。[17]

1942 年，延安教育又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转变。中共中央号召在教育领域必须“ 打破旧的一套”，[18]全面清理教条主义对党领导的教育工作的影响。伴随着这年春开始的整风运动，延安理论界、教育界开始全力肃清教育领域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影响，最终完全形成了「毛泽东主义旗帜下的新民主主义教育」。 [19]

在中共党内，意识形态宣传，包括教育工作，自三十年代初就一直掌握在左倾教条主义者手里，博古等全面贯彻了全盘俄化的路线，在中央苏区模仿苏联教育的模式，建立了中共的教育理论及其制度。瞿秋白、徐特立等虽然并非教条主义者，但他们在政策制定方面并不起任何重要作用，这种由左倾教条宗派控制意识形态的格局在遵义会议后的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并没发生变化。抗战爆发后，在张闻天的领导下，沿着瑞金时代阶级论教育路线的惯性，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大规模兴办教育，由于抗战阶段中共的局面已大大改善，尤其在边区已获得相对和平的环境，因此张闻天主张现阶段的教育应向正规化过渡，在继续突出政治思想训练的同时，也要加强文化知识的系统学习。在这种指导思想的影响下，边区在 1938 年后将一些分散的学校合并，成立了一批完全小学，除此之外，也创建了几个中等师范学校。然而，这些努力以后都被指责犯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

1941 年 9 月后，延安开始系统检讨几年的延安教育的经验和教训，《解放日报》批评边区教育对于实际斗争「几乎麻木到没有感觉」，[20]认为边区的受教育者已被完全荒废了，已被错误地教育成为「大时代的废物」。[21]边区政府领导人李维汉抨击边区教育自 1939 年后因「学与用脱节」已陷入「沉闷与软弱无力」。[22]在这以后，边区通过各种政治学习和 1943 年召开的整学会议，全面清理「教条主义」在教育工作方面的影响，最终形成延安教育的几个重要倾向：(1) 十分强调教育的实际功用性，反对「片面追求」教育的正规化和知识传授的系统性，主张「干中学」，对降低学校教育的作用估计不足；(2) 从政治、军事斗争的需要出发，反对单纯重视儿童教育；(3) 站在阶级论教育观的立场，将人的自由发展、兴趣、个性、天才等一概视之为旧教育予以全面否定。至此，延安教育已被完全改造。

三、延安教育的价值和局限

延安教育是党领导的战时状态下的革命大众主义的动员教育，这种教育是一种强化意识形态灌输的教育，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鼓动性，它以革命政党的世界观和路线、方针、政策为教育的宗旨和依归，突出教育的政治思想训练，和基本生活和生产技能学习的实际功能。延安教育又与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思想斗争相依相随：经过整风运动、延安教育排除了另一种阶级论教育观- 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从而形成了烙有毛泽东印记的具有中国革命特征的阶级论教育观。这两种教育观在本质上并无明显区别，但是，苏联教育模式在强调政治第一的前提下，比较重视学校的正规化和知识传授的系统性；而延安的阶级论教育观因受到战争环境的影响，更注重政治和生产技能训练的实用性，从而更加排斥传统教育的形式和内容。

延安教育又是中国革命战争环境的产物，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政治动员、教育内容也制于为革命战争和为生产服务，表现为教育内容的简单化和学制的灵活性，为战争和生产服务成为延安教育的基本精神。

延安教育也是大众主义的。面对工农大众的教育是党的阶级论教育观的主体部分，也与五四的平民教育相契合。在群众路线的口号下，延安及其他根据地的一切教育措施都以普及为主，大众生活可以成为教育的内容，大众也是教育的主体(广请老农作教师，以替代「那些对战争和生产劳动无知识也无兴趣的教师」[23])，教育形式更是采取大众化的形式。延安时期普遍创办的冬学、夜校、识字班、民办小学，以后成为党领导的社会办学的基本模式。

经过改造的延安教育实现了毛泽东对教育的要求，以阶级论为中心的教育起到了统一干部思想，统一群众思想的作用。广大党员和干部经过不同形式的干部学校学习或在职学习，已经充分掌握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教育界更是完全确立了阶级论教育观的指导地位，从而在几个基本问题上达到了思想的高度一致：(1) 教育应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2) 知识分子应该长期改造思想，必须彻底批判「教师是自由职业」、「教师清高」的旧观念。(3) 旧教育必须彻底改造，必须坚决反对盲目追求正规化的错误。(4) 党应该领导教育。经过不断的思想改造，边区和其他根据地的教师也都从「自由职业者」转变为「毛主席的教育战士」。

从实际效果看，延安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党在边区和其他根据地培养了一大批适合其现实需要的人才，边区人民的文化和卫生水平也有一定的提高，农民生活得到相应的改善。

然而延安教育也存在那个时代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在阶级论教育观的贯彻和实践中，五四教育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遭到过份打击，在教育思想、教学内容、学制和学校管理方面均有所体现，从而有损教育的全面性。即使是社会教育，也始终强调突出政治，苏中根据地的冬学教育就明确规定「明理第一，识字第二」，即将政治教育放在首要地位。[24]在这种思路的影响下，有时会因突出政治思想的训练而冲击和取代其他知识和技能的学

习。

在战时环境下，一味追求正规化和知识传授的系统性固然会产生偏差，但若走向另一极端，一切仅从眼前需要出发，也会造成教育的短视和片面性。延安时期将普通教育列为教育等级上的第三层地位，明确宣布，在目前根据地，不发生升学问题，甚至将普教的出路归结为培养不从事生产的「二流子」，正面鼓吹教育只限于培养「能读会算」，「认识路条」即可，所谓「能写会算即毕业」。[25]这种“需要第一」的教育在当时情况下或许适应现实斗争和生产的需要，但作为一种革命教育的经验，以后被加以神圣化，则对未来的教育带来不良影响。

延安教育忽视受教育者兴趣，个性、天才的发展和培养，在今天看来，也是失之偏颇的。由于认定办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社会斗争，生产斗争的实际需要」，进而认为教育注重兴趣、个性等是「失去了分寸」，从这个观点引申下来，一些教育工作领导者反对将儿童教育放在重要地位，其理由是重视儿童教育是欧美和「中国封建的办法」，[26]而且批评重视儿童教育「完全是本末倒置的现象」，即认为儿童年龄太小，不能马上参加社会和生产斗争，不如干部教育那样，可以马上「立竿见影」。[27]这种过分急功近利的思想及其措施，事实上是有碍于边区教育的全面发展和青少年的长期成长。

延安教育十分强调「学用结合」、「学中学」、「干中学」，在实际操作中又经常流于只重视生产劳动而忽视系统知识的传授。在那几年，「百年树人」、「培养建国人才」的观点，被斥之为「空洞」，[28]讲授自然科学诸如太阳系、人的神经系统被批评为教条主义。[29]延安对国统区的教育也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指责大后方的「别有用心的教育家」鼓励青年埋头在物理、化学、教育等等书库里。[30] 这种风气一开，在一段时期内，学校教育几乎被完全否定，据有关资料披露，1943 年下半年延安的普教系统的知识学习已经完全终止，而转变为参加生产劳动，这就从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走向了取消学校教育的地步。

延安时期党对从事教育的知识分子采取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吸引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参加教育工作，在严重缺乏师资的边区和其他根据地，这些教师为发展教育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那时的流行观点认为，这些教师旧的教条知识多，解决新问题的实际知识少，[31] 因此对知识分子「教育、改造」有余，重视、团结不够，不少知识分子在「抢救运动」中遭受严重打击，阻碍了他们工作积极性的发挥，并且给许多人的心灵带来很大的伤害，这对以后新中国教

育的发展也有负面影响。

近代以来教育改革与国家现代化紧密联系，五四时代，一批先贤先哲为中国的教育现代化作了很大努力，使中国教育面貌发生重大改变，对国家的进步起了促进作用，教育自身也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中共致力于社会改造，坚持走一条独特的革命道路，从瑞金时代的照搬苏联，到延安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教育，逐渐探索出一套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教育理论，在这个理论中，中共对五四教育遗产作了重大选择，对其有利于革命的一面作了继承、改造和转换，同时也抛弃了很重要的内容。延安教育是一种大规模的教育改造的实验，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亦有负面性，这就是教育的泛政治化和极端功利化，这些都对 1949 年后的教育产生了复杂的影响。然而，延安教育又是二十世纪中国教育遗产的重要部分，它留给人们丰富的启示，给中国教育未来的变革提供了某些重要经验。

注释：

[1]杨贤江：《新教育大纲》，《杨贤江教育文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页418-420.

[2]《湘赣省苏维埃政府训令抚字第十九号》（1933 年 1 月 26 日于永新城），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1），页 95.

[3][4][5][6]《鄂赣省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文化问题决议案》（1931 年 9月 23 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页 103 、101.

[7]《湘赣省苏文化部关于识字运动的又一指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页 278-279.

[8]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页 18-19.

[9]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1939 年 1 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页4.

[10][15]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 1941 年 11 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页 19.

[11]《反对教育工作中的急性病》，《解放日报》，延安，1942 年 4 月 17 日。

[12]吴天石：《苏中四分区的教育改进会》（1943 年 12 月），《老解放区教育工作回忆录》（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页 3.

[13]《陕甘宁边区教育厅指示各县关于 1943 年教育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1943 年 2 月14 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页 91.

[14][25]李鼎铭：《文教工作的方向》（1944 年 12 月 6 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页 45、44.

[16]《本年教育中心工作》，《解放日报》，延安，1942 年 1 月 5 日。

[17]亦敏：《冀中教育建设概况》，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页 159.

[18][20]《打破旧的一套》，《解放日报》，延安，1941 年 9 月 11 日。

[19][31]刘季平：《论抗日民主立场学用一致精神》（1944 年 8 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页 56、71。

[21][26][27]《论普通教育中的学制与课程》，《解放日报》，延安， 1944 年 5 月 27日。

[22]罗迈（李维汉）：《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文教运动》（1944 年 11 月 15 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页 34. （23）＜根据地普通教育的改革问题》，《解放日报》，延安，1944 年 4 月 7 日。

[24]张正屿：《苏中抗日根据地冬学回忆》，载《老解放区教育工作回忆录》，页 97.

[28]《中共冀鲁豫分局关于普通教育改革的指示》（1944 年 10 月 27 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页 103.

[29]周而复：《人民文化的时代》，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页 141-142.

[30]《提倡自然科学》，《解放日报》，延安， 1941 年 6 月 12 日。

第七篇　民族主义乎？国际主义乎？

1948 年 6 月，斯大林与铁托闹翻，以苏共为首的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指控铁托为民族主义者、孟什维克和反苏分子，宣布将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东欧各国纷纷跟上，齐声谴责南斯拉夫和铁托，不久也纷纷挖出本国领导集团中的“铁托分子”，大多都被推上了断头台，个别“铁托分子”如波共的哥穆尔卡则被打入黑牢。远在东方的中共，虽没有跟着莫斯科的指挥棒在中共党内大挖“铁托分子”，但也对斯大林作出了回应。

1948 年 11 月 7 日，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在《人民日报》发表《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文，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对南斯拉夫的谴责。刘少奇重申，中共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拥护斯大林领导的苏共和伟大的苏联。

刘少奇的这番话并非只是一种作给斯大林看的政治性的表态，而是实实在在见诸于具体行动的。1948 年，新华社派往考察东欧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记者，本来正准备从布拉格前往贝尔格莱德采访，在情报局决定颁布后，马上取消了访问计划。而早在 1947 年11 月 1 日，在驻旅大的苏联军政当局的强烈要求下，中共在东北的领导机关将中共旅大地委第二书记兼关东行政公署副主席刘顺元、旅大总工会主席唐韵超等几位领导干部调离出旅大，公开的罪名虽然没有正式宣布，但彼等犯了“反苏”错误，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

这些行动初看起来很有些费解，中共并非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成员，也与南共素无来往，谈不上对铁托有什么深仇大恨；毛泽东甚至还从不同渠道对铁托领导的南共革命略知一二，“铁托是靠自己的武装打下南斯拉夫的”，这就是当时毛泽东对铁托与南共的基本判断。毛虽然对斯大林与铁托冲突的内情不甚清楚，但他对铁托领导的南共抱有同情，却是事实。既如此，刘少奇又为何急于在苏南冲突中匆忙表态？中共又为何不声不响地将被苏联人指称为“反苏分子”的自己的干部调离出原有的工作岗位？

刘少奇的文章当然代表毛。此时毛向斯大林作出这番举动就是要向莫斯科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中共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中共坚决与民族主义划清界限。而在那个时代，忠实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就是忠实于苏联和斯大林的代名词。

毛的这番举动是符合现实政治逻辑的，却与其思想逻辑并不一致，

因为就在这前几年，毛在延安领导开展了一场以肃清斯大林在中共代理人为目标的思想和组织重建的工程。在那几年，毛并不那么在乎斯大林，也不看其眼色，硬是在全党刷清了积存多年的苏联崇拜

情结，并把党内的“国际主义”代表人物赶下了台。但是，1948 年的情况已大不同于1942-1945 年，现在中共正急需争取苏联的支持，尤其在东北。

与王明等人相比，毛是可以将感情与理智完全分开的人，这一点并不像他在 1959 年庐山和彭德怀等人谈话时所称的那样，他是感情与理智相统一者。正因毛有这种政治风格，以至外界在颇长的一段时间里，对毛有些迷惑不解，甚至还误以为毛是苏联在中国的“代理人”。

就在莫斯科宣布开除南斯拉夫的时候，中国的第三大党—民主同盟的领袖张澜老先生竟然也对此作出了反应。张澜在接受西方记者访谈时表示，希望毛泽东也做铁托。张澜还请即将前往解放区的马寅初代转几句话：共产主义外，还要加一点民族主义，“共”字上必须有一个“中”，才能名副其实地成为中共。

美国人呢？他们当然对毛的复杂性知道一些，但在 1948 年冷战的大格局下，美国人还是情不自禁将毛划到了苏联阵营一边。深谙中国文化的美国司徒雷登大使竟也告诫民盟的罗隆基和叶笃义说：中共是国际主义，你们应保留中国的爱国主义。

从以后的事实看，毛泽东对张澜老先生的拳拳爱国心还是领情的，毛并没有因张澜说的这番话就将其打成“反苏分子”，相反，一直对张澜礼遇有加。对于司徒雷登，毛就没有那么客气了，毛不仅写了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还旗帜鲜明地宣布新中国就是要实行对苏联“一边倒”的国策。司徒雷登虽然在华几十年，还长期担任燕京大学校长，却不能真正明白毛—毛毕竟不是王明，不是那么容易一眼就能看得清楚的。

一直被苏联人称为是“国际主义者”的王明等人在对苏联的态度上，始终是感情与理智相统一者，说的、做的倒是完全一致。

在 30 年代初期的中央苏区，确实是全面、真诚地贯彻了全盘俄化的路线。苏区有列宁师范、列宁小学，各单位还辟有宣传鼓动栏—列宁角；在党的教育系统，有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在红军系统有少共国际师和郝西诗红军大学（郝西诗为参加广州暴动而牺牲的苏联驻穗副领事）；在文化系统，有苏维埃剧团，即蓝衫剧团（十月革命后苏联工人业余剧团）；在肃反系统，有国家政治保卫局；在青年系统，不仅有共青团，还有“皮安尼尔”—少年先锋队，凡年满 16 至 19 岁的红色青少年，皆可申请加入“皮安尼尔”。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代表党领导苏区的青少年工作，从共青团到“皮安尼尔”，再到共产儿童团。中央苏区还经常召开群众大会，有时纪念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有时纪念苏联红军节，凡开大会皆要成立主席团，甚至“皮安尼尔”开会，也要花不少时间选出会议主席团。在重要会议上，被选入主席团的经常还有外国同志：斯大林、莫洛托夫、片山潜、台尔曼、高尔基。那是一个国际主义旗帜高高飘扬的年代，从红色的莫斯科到红色的瑞金，真好似一根红线连接着，中央苏区的话语系统和制度框架与莫斯科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在偏僻贫困的赣南和闽西，真像是又一个苏式社会的翻版。

毛泽东受不了这些，毛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那以后的七、八年

中，毛悄悄地且又是有条不紊地对中央苏区那一套话语系统和制度框架进行了转换。当然旧的一套退出历史舞台需要一个过程，1939 年延安举行了中国女子大学的隆重的开学典礼，校长王明还是抑止不住要宣泄他满头脑的苏俄崇拜的情愫。大会会场正中虽高悬毛泽东的画像，却又模仿苏联，在毛像的左右挂起了王明、朱德、周恩来、博古、刘少奇等所有政治局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的画像。王明身为女大校长，总忘不了国际共运那些女革命家，于是校门两边的墙上又悬挂起蔡特金、伊巴露丽、克鲁普斯卡娅的肖像……一时间，似乎又有些瑞金时代的气氛了。

但是，时光毕竟不会倒转。当毛有力量以后，他就绝不愿听到什么"皮安尼尔"。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早已改名为中央党校，不久，延安的马列学院易名为中央研究院，再早一些，国家政治保卫局这个完全俄化的名称，也被改为中央社会部和边区保安处，甚至延安的托儿所也名之为"洛杉矶托儿所"，却不叫"莫斯科托儿所"，至于"皮安尼尔"，则早已不复存在，边区有的只是儿童团。然而，毛泽东对洋名词也并非一概排斥，例如，毛就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留了"布尔什维克"这个词语。一来这个词流传甚广，早已深入人心；二来这个词也并非王明一人就能垄断，毛泽东也可以使用，于是，这个词的寿命比较长些，差不多到了 50 年代中期，才逐渐退出流行政治语汇，与此相联系，"布礼"（布尔什维克的敬礼）也让位给了"革命的敬礼"。（记得 20 年前，王蒙曾写有一篇名曰《布礼》的小说，相信王蒙对这个词的演变史亦有相当的了解）。

1942 年后，毛泽东已完全获得了意识形态解释权，就在苏联驻延安观察员的眼皮底下，毛与刘少奇联手，将"孟什维克"的帽子给王明等戴上，党内一些原"国际主义者"也纷纷与王明划清界限，站到了毛泽东一边。在这个阶段，毛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即使他的好朋友、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给毛发来密电，告诫、提醒他，康生不是好人，毛仍然照样信任、重用康生。

然而毛毕竟是毛，他心里清楚得很，只要斯大林不干预中共党内的事务，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共都应与莫斯科搞好关系，于是，毛人前人后都对斯大林表现出充分的尊重，毛甚至给坏人王明也选好了婆家，宣布王明的后台是斯大林的敌人布哈林！在那个年代，全党上下，除了个别人，谁都不知道毛对斯大林的真实想法，毛更不用直接的语言将他内心的想法表达出来，公开的话仍是"联共党史是共产主义的百科全书"一类。被毛唾弃的王明只能满含委屈，在延安冷清的窑洞里，遥想着莫斯科克林姆林宫的红星，独自吟唱着《莫斯科颂》。

1945 年抗战胜利后，毛才真正与苏联打起了交道，地点就在东北。毛十分明白，以中共当时的实力，要想占住东北，并进而取得更大的发展，必须得到已进入东北的苏联红军的理解和支持。对于这一点，毛从未含糊过。虽然他多年来一再告诫全党一切应该自力更生，但毛实在是希望得到苏联的支持，即使苏联在很长时间内对中共并无具体援助，毛仍不怨不恼，并不时向苏联表示一下善意。1941 年 4 月苏日签订中立条约，延安表示予以理解。1941 年后，延安派往东北、华北的地下工作人员间或也与苏军情报组合作。浇灌多时，终有花开一日，1945 年 8 月，苏军攻入东北，客观上为中共在东北的发展提供了机

会，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机会，八路军才能马不停蹄抢先进入东北，占领了各战略要点。

斯大林虽然对毛泽东在延安搞的一套多有不满，但中共毕竟是一家人，苏联红军打进东北后，当然要找八路军。1945 年 9 月，苏联红军大校驾机飞往延安，主动与中共方面联络，以后又对开进东北的八路军多方照顾。但是苏联受到中苏条约的限制，在美国和国民党的压力下，最后还是逼迫中共军政机关退出沈阳等大城市，八路军不少领导干部虽然不高兴，却也毫无办法，于是一直退到哈尔滨，隔着松花江，与国民党军对峙着。但是毛心里明白，八路军占着哈尔滨，事实上仍是沾了苏联的光，因为得到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军队再往前开，就要钻到苏联的鼻子底下了，而斯大林是不乐意看到这种情况的。

苏军自以为有恩于中共，傲慢无礼，在与中共同志交往中，无时不流露一副大国主义的派头，其士兵在东北军纪败坏、胡作非为，激起百姓强烈不满。苏军且把大批工业设施当作战利品搬迁至苏联，国民党利用此事掀起 1946 年 3 月反苏大游行，也乘机攻击中共，在这种形势下，毛别无选择，只能反击国民党的“反苏反共”。

毛大事小事都绝不会糊涂。1945 年“8.15”后，进入东北的八路军高级干部卢冬生被苏军士兵无辜枪杀，毛只当不知道。但是有人却沉不住气了。东北汉子萧军虽非党员，却也是从延安来的老干部，党出资让他在哈尔滨办了一份《文化报》，萧军在《文化报》上热情宣传党的政策，即便对当时引起东北人民普遍反感的苏军军纪败坏问题也总是委婉地予以解释。但萧军确实不赞成“无条件地拥护苏联”，他试图把俄国人分成两类，即“真正的苏联人民”和犯有罪恶行为的俄国人。于是苏联人不高兴了，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刘芝明迅速组织对萧军的大批判。1948 年 11 月 2 日，《文化报》终于被迫停刊，萧军也被打发到煤矿办俱乐部去了。

刘芝明的顶头上司东北局宣传部长是在中共七大上落选的前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凯丰的上司则是七大政治局委员高岗。林彪率四野南下后，高岗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王，但此人却非一贯的亲苏分子。高岗是土生土长的共产党，没有留苏经历，早在延安时期就在毛与王明之间作了选择，从而深受毛的信任和重用。但套用一句老话，“人是会变的”，现在高岗亲眼见到苏联的实力，也就对苏联加深了感情。王明说，高岗在东北受到凯丰的影响，成了积极主张对苏友好的“国际主义者”，此说没有提供具体事实作依据，只能留待日后再作详考。总之，高岗不允许在东北有任何对苏联“不友好”的言论和行为。

其实高岗对待“反苏”言论的态度与毛及东北局其他领导人并无大的冲突，高岗错就错在与苏联人打得太火热，且四处张贴“高主席”的肖像，甚至以自己的名义给斯大林发电报。高岗似乎有些忘了，他是毛委任的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而不是斯大林派任的“新关东总督”。

尽管高岗对苏联的态度热情友好，但是在中共掌舵的毕竟是毛而非王明，因此，在处理“反苏”一类问题时，还是十分讲究内外有别：东北局公开批判了萧军（1948 年 7 月，萧军提出入党申请，得到东北局和中共中央的批准，但紧接着《文化报》事件发生，萧军的党籍也就彻底告吹了），但是对被旅大苏军当局驱赶出来的刘顺元却只是调离东北，

另行分配工作，并没有在党内、更没有在社会上大张旗鼓开展对刘顺元的批判。与刘顺元一起被迫离开旅大的原中共旅大地委五人常委中的三人，也只是被调离工作而已，暂时还未受到党纪处分。

有意思的是，被苏联人视为“反苏分子”的康生此时也成了中苏友好的捍卫者。苏联人对康生知之甚详，此公在 1933 - 1937 年旅居莫斯科时，也位居“国际主义者”之列，但返回延安后，逐渐与莫斯科离心离德，尤其在整风运动中大整王明等“国际主义者”，搞得王明等叫苦连天。苏联驻延安观察员把这一切都密报回国，莫斯科对康生恨之入骨，无奈康生属毛营，莫斯科手再长，也伸不到延安，对康生竟也毫无办法。几年后形势大变，毛审时度势，在需苏联支持的时候，康生已不适合再出头露面。康生识趣，主动提出要下乡搞土改，于是先在晋西北、后在胶东搞了一场极左的土改。1949 年，康生成为中共山东分局第一书记，但毛却有意让康生这个老政治局委员受中央委员、华东局书记饶漱石的面节制，搞得康生长吁短叹，极不舒坦。

康生虽然很不得志，但在山东却仍然是说一不二的人物。1948 年春，刘顺元被调入山东，先被任命为中共华东局宣传部长，继之又被委任为中共济南特别市市委书记。康生初对刘顺元颇为客气，甚至还在会议上表扬刘顺元敢于在旅大顶苏联人，很有骨气。但是，到了 1948 年 11 月，刘少奇的文章发表之后，康生对刘顺元的态度马上转变了，不仅处处打击刘顺元，还在背后骂刘顺元是“反苏分子”。1949 年 10 月，苏联名作家法捷耶夫、西蒙诺夫率代表团访问中国，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访华的第一个苏联大型代表团，刘少奇亲自布置有关参观访问日程和所有细节，议程中法捷耶夫、西蒙诺夫代表团要访问济南，北京命令刘顺元必须回避，并需写出书面检讨，交苏联代表团带回莫斯科。康生得知北京信息后，马上开会，以“反苏”的罪名，宣布撤销刘顺元的济南市委书记的职务。

然而颇为蹊跷的是，正在热情准备迎接苏联代表团的康生，在代表团抵达济南和在济南逗留期间，竟忽然“生病”了。显然，不管康生如何使出全身解数向苏联人大献殷勤，也是白搭，因为毛知道，在斯大林的帐本上，康生早已是一名“臭名昭著的反苏分子”。不管他给斯大林大元帅送的象牙雕多么精美（康生请代表团转送给斯大林的象牙雕，“装有一直径 10 公分许的玲珑象牙花球，该球自表至里共雕透 20 层，每层均能转动，每层均雕有异常细致的花眼。”），在斯大林的眼里，康生还是一个可疑人物！接下来的情况是，在建国初“斯大林—毛泽东”的一片欢呼声中，“国际共运的老战士”康生下岗了。康生只能蜷在青岛的海滨别墅和北京医院里吟诗作画，苦捱日子。

就党内地位而言，刘顺元不可与康生相比。康生虽被暂时打入冷宫，但他的政治局委员的头衔仍然保留，刘顺元则需要为中国革命的最高利益作出个人牺牲。1949 年 12 月下旬，刘顺元奉命进京听取中央领导人的指示，刘少奇在中南海接见了他，对他讲了一番“加强中苏友好”的道理。刘少奇说：搞好中苏关系，是我国目前的最大利益所在，是头等的政治问题，所以我找你来，不是劝说你，而是命令你，从搞好中苏两大党、两大国关系的高度，认真地写一份检查。听了刘少奇的话，刘顺元已完全清楚，“为了照顾与苏联的关系，我以后不能再受党重用

了”。刘顺元在 1950 年 1 月 2 日给中共中央的书面检查中写道：“中央命令自己写检讨，这表明了中央的高度原则性和严肃性……是从中苏两大党、两大民族的团结问题已经成为头等的政治问题，而又有帝国主义与铁托分子的反苏运动可作为前车之鉴的情况下产生的”。

就在刘少奇与刘顺元谈话的那些天，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也和应邀访苏的毛泽东见了面。斯大林问毛是否知道在东北有黄逸峰这个人，并说，此人连苏联人也瞧不起。毛初听斯大林提到黄逸峰，头脑中一片茫然，不知此人乃何方神圣，竟然惊动了斯大林。事后，周恩来向毛细细道来，才知此君乃中长铁路总局中方副局长，因对苏方个别人员大国主义行为不满，被苏联人在斯大林处告了刁状。于是，毛记得了黄逸峰的名字，但并没对黄怎么样。黄逸峰随东北铁道纵队进关，随即奉命接管华东铁路，成为建国后第一任上海铁路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以后，刘少奇还是和黄逸峰谈了话，批评他看问题“太简单，太天真了”，然而刘顺元的境况一时却比黄逸峰差得多。

刘顺元检讨交出，组织处理的决定也出来了：刘顺元被连降三级，在华东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下属的规划局任副局长。刘顺元在大连的老搭档唐韵超更是霉运不断。当年他与刘顺元一同被苏联人从旅大驱赶出来，到了 1948 年被调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劳动总局局长，一直在“高主席”的治下，1951 年 11 月，东北局宣布开除唐韵超的党籍，罪状之一是“1946 年任大连总工会主席时期，经常散布对苏联不满的言论，曾因此引起苏联同志对他政治上的怀疑，而提议把他调离大连”。

在刘顺元被贬谪的几年，党内已不再有任何人敢发表“反苏”言论，党外却还有人不知利害，仍在那嘀嘀咕咕。1951 年，刘王立明居然在民盟内部的会议上批评起苏军当年在东北的行为，遭到严厉批判当是在意料之中的。

1953 年斯大林终于死了，在全国上下经历了失去“伟大导师”的哀痛之后，刘少奇想起了刘顺元。1954 年刘顺元复出，被任命为中共江苏省委常务书记。一年后，1949 年易名为马列学院的原中共中央党校改名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在江苏，性格耿直的刘顺元还是难改脾性，经常直言无忌，不时惊动中南海，但总算得到几年平安。黄逸峰此时却没有刘顺元那么幸运了，1953 年初，黄逸峰在三反运动中以犯了“压制批评”、“强迫命令”的错误被华东局开除党籍。但是几年前斯大林向毛提到的那几句话却无意中帮了黄逸峰的忙。1954、1956 年，毛泽东几次提到“可以允许人家改正错误，譬如黄逸峰”。1956 年 12月，黄逸峰被批准重新入党，以后他一直蹲在上海经济研究所，终于成了一名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专家。唐韵超呢？他先被抓入监狱，出狱后在社会底层劳动了 20 多年，一直到文革后当年老战友刘顺元复出，转任中纪委副书记，在刘顺元的鼎力相助下，唐韵超才在80 年代初获得平反。

民族主义？国际主义？似乎都谈不上，政治是最现实不过的。还是那句话：一切从需要出发。

第八篇　大跃进运动与国家权力的扩张：以江苏省为例

1958 年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席卷全国的大跃进运动，是一场具有空想乌托邦性质的政治运动。今天人们忆及当年的大跃进，马上会联想到「高产卫星」、「全民炼钢」、「公社食堂」等带有荒诞色彩的景象。然而大跃进并非仅仅是一场乌托邦运动，在大跃进期间，国家权力借着这场运动的推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急速地向社会各个领域扩张。大跃进运动使国家权威得以扩大和强化，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也大大加强了民众对国家权威的认知。本文即以江苏省为例，试图勾勒出江苏省在大跃进期间国家权力扩张的图像。

一

国家权力，国家控制社会的能力和影响力之谓也。本文所称的国家权力，特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国家象征为形式、以党的权力为主导的党和政府的权力。1949 年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依据列宁的国家学说和苏联的建国模式，并参照中共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创建了一个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新国家体制。在这个新国家的架构内，党和党的具体化身毛泽东位居核心地位，围绕这个核心，有党领导的政府和军队，党领导的意识形态等系统。随着这套新国家体制的建立，国家的力量急剧增长，并快速向社会各个方面渗透。

中共重建国家和社会的途径、方法，与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不尽相同。中国的党和政府实现其权力的途径不仅仅是依靠党和国家的各级机构，中共更习惯于运用政治动员、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贯彻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共运用政治动员、群众运动夺取革命胜利的模式，此时已成为党的一个新传统，并被视为一种可以运用于不同历史时期，且百试而不爽的成功经验。建国后，中共领导了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肃反、反右等政治运动，这些运动不仅实现了毛泽东的预期目标，而且极大地强化了国家权力。

50 年代初，随着新秩序的巩固，中共开始重建省一级的党与政府的机构。1949 年春，江苏境内的国民党政权被摧毁后，中共并没有马上建立省一级的党委和行政机构。由于苏北是老解放区，苏南是新区，两地的基础与任务不同，加之南京是原国民党政权的首都，被认为情况特别复杂，因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分设中共苏南、苏北两个区委和南京市委，另成立苏北、苏南行政公署和南京市人民政府。1952 年 9 月，北京决定将原中共苏南、苏北两个区委和南京市委合并，组建江苏

省委；苏北、苏南行政区与南京市合并，组建江苏省。1953 年 1 月 1 日，省人民委员会正式成立。统一的江苏省党和政府机构的建立，为贯彻落实北京的精神提供了有效的保障。江苏建省后，国家权力在各项政治运动的推动下，借助于各级党和政府机构，进一步向城乡各个领域扩散。

在城市：在建国初开展的「城市民主改革」的基础上，普遍建立了工会、青年团和民主妇联等组织。1951 年在江苏省各主要城市建立了以宣传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为主要任务的「宣传网」和报告员制度，在城市基层建立了居民小组和居民委员会。1951-1952 年，江苏省所有城镇，以机关、群众团体、工厂、企业、街道为单位，都成立了治安保卫委员会。为了改变建国初期不少城市中的居民委员会主任多由资本家或知识分子家属担任的状况，1954 年，江苏各城市对居委会进行调整和充实，根据「以劳动人民及其家属为主，以妇女团体为支柱的原则」，将原资本家家属等清除出居委会领导岗位[1]。同年，旨在强化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由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和公安派出所所组成的三位一体的城市综合治安管理体系建成。至此，国家权力延伸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在新国家的强大政治攻势下，人民的生活习俗发生了根本转变。城市居民纷纷自动交出麻将牌、参加读报组，仅南京市玄武区居民就交出 2，600 多副麻将牌，有 4，500 多人参加读报组，6，500 多人参加夜校学习[2]。

在 50 年代中期，国家对城市经济生活的控制也得到加强。1954 年 9 月 1 日，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镇江、常熟、南通、新海连（连云港）等 9 个城市开始实行粮食定量供应。为了缓和统购统销政策实施后出现的粮食短缺的矛盾，各级党和政府把「节约用粮」当作一项经常性的工作予以强调。1954 年后，江苏各城市开展了「爱惜粮食，节约用油」的政治动员，要求城市居民在「道理懂，思想通，全家同意」的基础上重新制订粮油计划。1956 年，南京、无锡等 6 个城市开展了节约粮食运动，使粮食销售量仅在 5、6、7 三个月就减少了 3 万吨。1956 年 12 月，根据南京市委统一部署，各区委又成立节粮领导小组，仅南京市玄武区就在以人定量的基础上，每月再节粮 15 万斤[3]。

在农村：废除保甲制，实行村组制，普遍建立起党的基层组织，把国家的权力全面延伸到乡村社会。1953 年又通过实行「统购统销」，初步将农民纳入国家控制体系。在政治层面，为了体现新国家的阶级性质，对农村中的地主、富农份子建立了「定期训诫会议制度」[4]。经过政治与经济方面的一系列巨大变动，50 年代中期，一个由国家支配的新社会已基本建成，国家已实现了对社会生活绝大部分领域的控制。

在新国家和新社会的环境中，民众的意识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1954 年江苏省人民广播电台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关于建立广播收听网的决定，在全省 272 个区建立了收音站，在 363 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和 201 个互助组里建立了收听组[5]。经过长期密集性的思想灌输，城乡大众已能充分认识代表国家权力的一系列象征符号。民众对党和政府的权力有了十分具体生动的感性体会。「毛主席」、「党委」、「书记」、「人事秘书」、「党员」、「干部」、「派出所」等词语的含义已被群众内化，并用来指导自己的日常思想和行为。在 1958年大

跃进运动之前，国家权力主要通过党和政府的机构来体现，由政府控制的各项运动促进了国家权威向社会基层的扩张，但在全国城乡仍有个别领域国家权威尚未完全占领，这种情况在大跃进期间发生了重大转变。

二

与以往历次政治运动相比，大跃进是一场规模更大的群众性运动，这场运动不仅促使国家权威向城乡全面渗透，而且在社会生活所有领域都建立、巩固和强化了国家权力。

城市虽是国家权力控制最严密的地区，但是在 1958 年以前，仅南京市就仍有 5.3%的工业、5.8%的商业和 5%的手工业未实现社会主义化 。在各城镇仍保留有少许的私人修配摊点和私人诊所，仍存在私人出租的房屋。城市的寺庙教堂虽然统属政府宗教事务管理部门领导，寺庙教堂内也成立了民主管理委员会，但是个别庙庵仅有一两僧人主持，以致无法落实该项制度。

虽然 1958 年以前江苏的农村已全部实现社会主义化，但农民尚保留有自留地，各农业社仍可根据本地的情况决定耕种何种农作物。在政治方面，对地富份子的管制还不十分严密，在苏南经济富庶的农村地区，某些地富份子尚可自由进入茶馆议论时事，地富子女在升学和就业方面也未受到特别限制和歧视。综合各方面资料分析，利用发动大跃进运动占领国家权力尚未完全控制的领域或许不是毛泽东的意图，毛发动这场运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其乌托邦的理想。大干快上、赶英超美，是毛在大跃进期间思想的主流，但是毛在 1958-1959 年确有不少强调国家权力方面的论述。在毛的理念世界里，一个权力无限扩张的国家和一个「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社会是有机地重迭在一起的。

根据薄一波回忆，1958 年毛在谈到国家职能时说，今后「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毛又说：「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那里将会逐渐没有政权。」[7] 但是，毛又在不同场合表示他对军事化管理方式的赞赏。在 8 月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强调要把「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 ，并对河北省徐水县委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表示支持和称赞[9]。尽管毛泽东未将强化国家控制作为大跃进的重点，但是这场运动使「控制」成为不可逆的趋势。在大跃进期间，国家意志透过强有力的政治动员和组织措施得以全力贯彻，国家权力在这个过程中急速扩张。

1958 年 2 月 12 日至 15 日，中共江苏省委召开三届七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名曰「双反」（「反浪费、反保守」），实际上是落实毛泽东在年初南宁会议上对「反冒进」的批评，为正式发起大跃进运动制造舆论准备。省委扩大会议之后，在十天之内，江苏各地纷纷举行党代会和三级干部会议，传达北京对「反冒进」批评的精神，全省有 83，000 多名基层干部集中进行了学习。

在毛泽东一再批评「反冒进」的紧锣密鼓声中，全面发动大跃进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于 1958 年 5 月 5 日在北京召开。5 月 8 日，中共江苏省委发出《关于学习和宣传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报告和决议的通知》，要求立即在全省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一个学习和宣传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运动。5 月 23 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闭幕，出席会议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立即

返回南京，马上部署筹备召开江苏省委三届八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实现了「三大突破」：「一是大破了农业生产不能高速度发展的迷信，肯定了农业可以『一翻再翻』；二是大破了办工业的神秘观念，地方工业可以自力更生大发展；三是大破了对科学技术和科学家、技术人员的迷信，地方也可以大办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事业。」[10] 会议结束后，一场大规模的宣传鼓动大跃进的运动迅速在江淮大地掀起。

江苏各地各级党组织立即召开会议，传达部署落实省委三届八次会议精神，南京市有20 万人参加宣传大跃进的活动[11]。所有宣传员、报告员全部出动，各种宣传舆论工具积极配合，文艺、歌舞、曲艺、黑板报、墙报、标语、有线广播、宣传车、展览会纷纷上阵。在大跃进运动不同的阶段，宣传的侧重点也相应不同：大跃进初期，以鼓动落实《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为中心，继而宣传「排山倒海除四害，造福子孙万万代」，再宣传「全民炼钢」和迅速实现「人民公社化」。在强有力的政治鼓动下，工农商学兵和城市街道居委会全部行动起来，基层细胞高度活跃。江苏各个城镇的职工、学生和居民纷纷上街，敲锣打鼓。4 月 27 日，南京市玄武区举行「火炬歌唱大游行」，数万与会者唱着「东风压倒西风」等三首指定必唱的歌曲，载歌载舞，表示热烈拥护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为了加强对基层运动的领导，江苏省的党政部门根据中央的精神对原有的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1958 年 4 月，江苏省委决定：今后有关全省性的方针、任务、规划问题，由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和决定统一规划、统一安排，并决定成立工业、农业、政法、党群、文教五个小组，在省委统一领导下，代表省委处理有关方面的日常工作。依照此例，江苏各地、市、县委纷纷对原有机构进行调整。南京市玄武区区委将区机关各部门按工业、财贸、文教、肃反、政法、街道六个系统组织起来，分别成立领导小组，实行所谓「下去一把抓，上来再分家」的新工作方法[12]。此项决定的意义在于，作为组织安排全省经济生活的各级政府的工作权限实际上已被党委完全取代，换言之，原先由党和政府共同组成的国家权力象征，今后将主要由党来体现。

进入 1958 年后，要求加强党对工农业和文教科研工作的领导，成为来自北京的不断重复的声音。江苏省委将 12 名省委委员、候补委员和 21 名省委部长、副部长调往地方。副省长韦永义、周一峰分别调往无锡市委和南通市委任第一书记，原省委组织部部长高啸平被调往扬州地委任第一书记。4 月，南京市委又抽调六百余名干部分配到学校工作[13]。向知识分子集中的文教单位「掺沙子」，其实早在反右派运动后就已着手进行。1957 年 9月下旬，江苏省委就已从工矿企业抽调了 500 名干部派往省内的学校、医院、报社和其它文化单位。1957 年 12 月，江苏省委又选调五十余名领导骨干，分别到省内各高校担任党委书记、副书记和系总支书记等领导职务。

在这期间，根据中央的指示，江苏省委在党政机关内部就开展第二批审干工作作出部署。南京市玄武区对全区工业、手工业、财贸、文教、卫生、公安、中小学教员 3，124人进行了审查，经初审发现有33.2%的人需要进一步弄清问题。为此，玄武区委在 1958 年2 月成立了新的审干办公室，各系统成立了审干小组[14]。

3 月 13 日，玄武区又成立审干委员会和肃反领导小组，由区委副书记兼任主任和组长。自然，那些被认为「有问题」或「待查」的干部是不会被派往基层担任领导的。大跃进高潮中，从上级机关下放到地方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或从工矿企业选调到文教单位的干部，作为权力和权威的化身而受到基层单位的尊崇，他们的到来使基层单位更生动地体会到国家权力的力量。大跃进期间，国家权力通过大兵团式的兴修水利工程和「全民炼钢」也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强化。在中国历史上，较大规模的治水工程多由国家督导建造，因为重大的水利工程，只有依靠国家力量调集人力和物力才能完成。江苏北部是历史上水患严重的地区，中共在建政前，苏北根据地地方政府在战争环境下就曾领导建造过一些中小型水利工程。建国后，苏北行政公署领导修建了一系列的治水工程，在这一类的活动中，北京的水利部曾派遣过准军事部队水利营前往苏北[15]，但治水的主力是当地的民工。由于民工人数众多，当局对民工的管理带有准军事性质，要求实行较为严格的统一劳动、统一作息的制度。

大跃进运动全面展开后，省委要求实现「三年全省水利化」，「在严寒刺骨的风雪中，数百万群众穿梭般地忙碌来往」[16]，在全省各水利工地奋战。民工往往每天劳动长达 12-15个小时以上[17]。1958 年 3 月，分淮入沂，淮水北调工程开工，这是迄至那时江苏历史上最大的水利工程。在准军事化的管理下，一年共挖掉 34 亿土石方，如果包括农田水利部分，江苏全年共完成 43 亿土石方，相当于 1957 年的 13 倍[18]。以军事化或半军事化的管理方式推动生产的突出事例是大炼钢铁运动。由于毛已将他的个人声望与国家威权全寄放于实现「1，070 万吨钢」的指针上，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因此大炼钢铁就完全成了一种国家行为。在 1958 年 6 月间，土法炼钢、炼铁已在南京、苏州、常州等地出现。6 月下旬，南京市玄武区在市委领导下成立了钢铁领导小组，各行各业已试办小高炉。6 月 29 日，南京大学建起第一座小高炉。1958 年 8 月北戴河会议后，江苏省全面展开「全民炼钢」。为了保证钢铁「元帅」升帐，数百万工人、农民、干部、学生、军人、城市居民日夜奋战，大搞低温炼钢——炒钢（把废钢铁熔化后拌一下就作为新钢）。10 月以后，南京市玄武区办了一个以土高炉为主的玄武钢铁厂和一座以「洋」高炉为主的高速钢铁厂，区委还出版了不定期的《高速报》以指导全区的炼钢运动，区内迅速形成「男女老少齐上阵，家家户户为铁忙」的局面。刚刚实现公社化的武进县抽调二万余人大炼钢铁。徐州专区更抽调 30%的农村劳动力用以支持钢铁战线。在任务最紧张的 11 月，全省农民组成的炼铁队伍共达到500 万人。如果没有国家威权做后盾，在短时期内是不可能让数百万农民自带口粮、不分昼夜地侍候钢铁「元帅」升帐的。

如果说全民炼钢体现的国家权力主要表现为以国家为后盾、动员人民追逐某种具有空想乌托邦的计划，那么国家法权机关的大跃进则直接强化了国家权力。大跃进期间，公安部门与其它部门一样，也展开了大跃进运动。公安部门除了修建小高炉、搞「土法炼钢」和为群众做好事以外，更搞实实在在的强化管理和肃反。1958 年 1 月，国务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明确规定由公安部门主管全国公民

的户口登记工作。此条例的正式颁布，标志着建国后的户口管理制度正式完成。江苏省各级公安部门将加强户口管理列为大跃进的重要内容，迅速在全省范围内重新检查、审核住户户口，使全省居民个个皆有户可查。公安部门还强化了各单位、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农林基层单位的治安保卫系统，基本达到了「无一死角」。

在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形势下，北京对公安工作发出新的指示，要求把全国「每一个角落都打扫一下」[19]，其具体方法就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一步展开内部肃反和社会镇反运动[20]。在 1955-1957 年，全国进行了机关、企事业单位、工厂的三次肃反运动，大跃进运动展开后，遵照北京的指示，江苏省又在全省公私合营工矿企业、手工业合作社等其它基层单位共 141 万人口中进行第四次肃反。「这一次肃反任务比第一、二、三批的总和要大一倍以上」，可谓任务繁重。但是，经过批判「肃反只能慢慢搞」的右倾保守思想，「促进了肃反运动的大跃进」。在这次肃反期间，全省共收到检举材料四十余万件，对地富反坏份子普遍地开展了一次审查评议工作。1958 年 3 月，江苏省在镇江、常州召开了各地、市、县的肃反现场会议[21]。6 月下旬，南京大学进行「肃反补课」。在大跃进的形势下，第四次肃反进展尤其顺利，江苏全省「搜出各种反动证件三万一千余件」，给一些「翘尾巴」的地富反坏份子重新戴上帽子。在强大的国家威权的震慑下，全省有 25，000 名「反、坏份子」投案自首，或补充交代了问题。到了 1958 年 11 月，又在大跃进新建、扩建单位共 77 万人中继续开展肃反运动，直到 1959 年第三季度才结束。经过这次肃反运动，实现了「三见底」：「反革命组织见底，外来人口、长期外出回归人员政治情况见底，现行破坏事故见底。」[22]大跃进期间，作为国家权力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安力量，其地位得到明显的突出。1959 年，为了加强对城市基层的进一步领导，南京市各公安派出所支部与街道支部合并为街道党委，多数党委书记由原派出所长担任，公安部门与所辖地段的所有单位建立了经常的工作联系，对城市社会的控制已全面渗入到每一个角落。

三

在大跃进期间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下，群众已普遍对国家权力的象征符号加深了认识，人人知道大跃进的含义，人人知道议论、怀疑大跃进将会犯不可饶恕的错误。江苏的大跃进与全国其它省份一样，都是以大批判开道，以反各种右倾保守思想为推动力。1958年 3 月，根据北京的精神，江苏省开展了「反右倾、反保守」的「双反运动」。大跃进运动全面兴起后，又通过所谓「鸣放辩论」，着重打击对大跃进的浮夸目标抱怀疑态度的「观潮派」、「算帐派」。在这种辩论中，上级部门选择事实上和假想中的对立面，动员群众以大字报、斗争会的形式，理直气壮、大张旗鼓地宣扬大跃进的各种具有空想色彩的目标和计划。进入 6 月以后，江苏省的大批判已开展得如火如荼，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批判靶子。在工业部门，针对不少干部群众对打破生产管理秩序、违反操作计划的担心和忧虑，大批「唯条件论」、「科学技术神秘论」和所谓「先进不可超越论」。「全民炼钢」运动掀起后，批判对象又增加一个所谓「炉前摇头派」。

在农业领域，大跃进的「敌人」则是对密植持异议的所谓「稀植

论」和「密植减产论」。江苏省以常熟县为推广密植的试点地区，继而在全省农村推开密植运动，「有的县组织 15万人的大兵团突击深翻」[23]。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增产声浪中，江苏省又在全省三万多个农业合作社展开一场早已定论的所谓「三麦要不要赶水稻，能不能赶水稻」的社会主义大辩论，在这场自问自答式的大辩论的推动下，全省开展了一场「踢翻老历本」、培植三麦的突击运动。常熟县 23 个乡党委向全省各兄弟乡发出倡议书，提出要大力批判「怀疑成倍翻番论」，实现「三麦赶水稻，水稻翻一番」的计划。

1958 年 7 月下旬，江苏省委召开各地市县委书记会议，「号召继续立大志，鼓大劲」。会后，组成万人检查团分赴各地检查跃进指针落实情况。检查团所到之处，「满山遍野红旗招展，五级干部将近百万人会师田头」[24]。然而，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年代，产量翻一番很快就成为「右倾保守」的代名词了。公社化运动兴起后，江苏在全国一片高产卫星纷纷上天的压力下，不久也放出了自己的亩产 2 万斤的大卫星。到了亩产几万斤的大卫星纷纷上天之际，各种大批判已欲罢不能，再也无法降温。

在大跃进年代中，江苏文教单位的大批判也虎虎有生气，与其它战线相比毫不逊色。尽管各高校也普遍修建了小高炉，并动员广大师生在高炉工地日夜奋战，但高校毕竟不是生产单位，因此，高校的大跃进依然是以思想改造、思想批判为中心。高校的大跃进早由北京制订了明确的方针，这就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具体落实的方法则是「拔白旗，树红旗」。「白旗」者——名教授、名学者和每个知识分子都具有的「轻视劳动，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坏思想和坏作风。江苏各高校师生不仅纷纷检查自己的个人主义坏思想，还轻装上阵，向被学校领导挑选出的「白旗」展开批判斗争。为了表示革命师生已具有全局性的「拔白旗」的雄心壮志，一些大学还主动参与批判全国性的「白旗」。1958 年，尚钺教授（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金日成青年时代的马列主义启蒙老师）被认定犯了反马克思主义的严重错误，南京某著名大学历史系的教师们主动请战，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编写了一本批判尚钺修正主义史学观点的论集。

「拔白旗」是为了给「插红旗」开道，高校的「插红旗」就是大搞「教育革命」、批判「参加劳动是浪费人力论」和「教材神秘论」。1958 年上半年，江苏各高校学生平均每人劳动达 300 个小时左右。一些院校的中文和历史系还取消了「训诂学」、「中国历史文选」等课程。为了赶上全国教育革命的新形势，革命师生打破框框，自编教材和讲义。新编教材往往一两个月就能大功告成。随着一本本速成教材的问世，被拔的「白旗」——教授、学者们那些所剩无几的学术自信心也就彻底荡然无存了。尽管知识份子已表现出对大跃进的强烈激情，但国家似乎不太相信他们的那份激情，于是又有 1958 年在全国知识界和民主党派人士中普遍展开的「交心」运动。江苏省及南京市各民主党派成员两千多人，分别于 3 月 9 日和 4 月 1 日先后两次举行了社会主义大跃进誓师大会，表示坚决接受党的领导，加速组织和个人的改造[25]。3 月 25 日，南京大学的民主党派、无党派教师以及南京林学院全体教师联合举行改造促进大会，他们抬着「大红心」的标志上街游行[26]。4

月 4 日，南京市各高校师生与科研机关的民主人士共三千余人，高举「把心交给党」、「把知识交给人民」的旗帜在南京市举行大游行。游行后，又举行了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4 月21 日，南京市工商界三千多人召开大会，宣布「立即开展向党交心运动」，民建中央主席黄炎培亲临会场予以支持[27]。4 月 22 日，南京市工商界和民主党派提出向党「交心」要「快、透、深、真」的口号，表示要把「接受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三心二意，跃进到一心一意」。江苏省宗教界人士也开展了「交心」运动，天主教界通过「自选」、「自圣」主教，「使全省天主教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28]。在「交心」运动中，全省 11 个城市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人士 4，106 人，共交心 47 万条。据当时的记载称，这次交心「大量暴露了他们长期隐瞒的腐朽思想和反动行为」[29]。对于工商界和民主人士的「交心」，组织上规定的原则是「自梳自理，求医会诊」。先让他们对照要求、自我批判，然后引导他们恳请党员和领导对他们的「坏思想」有针对性地进行批评，并鼓励他们打破庸俗的情面观，「比先进，比干劲」，互相展开批评和思想斗争，以使「交心」落在实处，防止「交心」走过场。

根据毛泽东的一贯主张，凡展开政治批判斗争皆需有一个对立面，批判各种右倾思想不能仅满足于思想教育，还需揭露出右倾思想的代表人物，这样就可以使斗争有了目标，并且推动各项中心任务的实现。1958 年 8 月，中共江苏省委召开三届八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议题之一就是批判省委委员、南京工学院院长汪海粟（自 1952 年院系调整后即任南京工学院院长）和省委委员、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刘少侥（自 1955 年以来任此职）在整风反右斗争中的「错误」。1959 年庐山会议后，江苏各地又有一批领导干部约两百多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给予撤销职务的处分。另有 2，500 余名干部被公开点名和「会诊」、「擦背」[30]，基层的干部与群众被冲击的人数则更多。1961 年 10 月后，江苏省为从 1958-1960 年受到错误批判处分的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党员进行了甄别。至 1962 年底，共甄别、平反 21 万余人，约占受批判、处分干部党员总数的 98%。另外，还全部平反或部分平反了受批判、处分的群众 22.9 万多人[31]。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对为数众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公开批判和惩罚，只会进一步加强民众对国家威权的认识和对大跃进的支持。

在火热的大跃进的形势下，领导机关「有破有立」，在批判和处理了有问题人员后，各级组织大量吸收公社化运动中的积极份子入党。自 1958 年 9 月以来，全省农村在 4 个月内就吸收了 2.51 万名新党员[32]。现实的经验对广大干部和群众是最好的教育。人们已从生活中学会如何保护自己，在大跃进的弊害已公开显现后，由于「一手右倾帽，一手高指针」，使得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都不敢言——人们似乎普遍患上了「失语症」。领导干部也深知大跃进符号的巨大威力，许多人都口唱赞歌，生怕稍有不慎就会跌入「右倾机会主义」的深渊。在大跃进期间，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新符号认识的水平迅速提高——诸如「党委决定一切」、「正确掌握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保卫总路线」、「保卫三面红旗」已化为人们的常识，并迅速调整自己与这些新符号的关系。

在那个时代，国家威权与语言禁忌互为依靠、相互支撑。当大量农民因饥饿纷纷死亡时，在内部报告中、只是冠之以「非正常死亡」。1960 年后大饥荒蔓延全国，北京号召「低标准，瓜菜代」，开发「粮食代用品」。江苏随后就开发出「人造肉精」和「食用小球藻」等一批「粮食代用品」，并在城乡普遍推广以节约用粮为目的的「新式蒸饭法」（用较多的水放在较少的米中，使米膨胀，反复蒸煮，达到有较多米饭的视觉效果）。由于有强大的国家力量作后盾，尽管大跃进造成空前的经济危机，但国家权力不仅没有受到削弱，反而利用大跃进得到扩张。在城市，党的领导进一步被强化，文教更加政治化，寺观教堂数量减少，私人出租房屋已被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户口制已经全面巩固，公安治保系统警惕地注视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四类份子」（地、富、反、坏）定期向派出所汇报改造情况已成为一项被固定下来的制度。

1960 年，大跃进再现高潮，尽管这时的城市人民生活已非常困难，但并未影响以国家权力为动力的各种政治运动的推行。自 1959 年下半年始，江苏省城镇粮食供应已日趋紧张，根据省委指示，为「减少粮食浪费，缓和供应矛盾」，全省各级政府设立粮食办公室，对城镇户口粮食供应计划进行全面检查，南京市玄武区政府历两个月完成检查任务，全区共减少月供应计划 41，920 斤[33]。1960 年 4 月中旬至 5 月上旬，城市人民公社化在粮食一片紧张的情况下形成高潮。江苏各主要城市区一级政府纷纷挂牌宣布成立区一级人民公社。与此同时，江苏各城市又掀起大办公共食堂的运动。至 4 月下旬，仅南京市玄武区就办起各类食堂 454 个，平均每个居委会有两三个大中型食堂、四五个院落食堂，搭伙人数达 52，927 人，占应搭伙人数的 72% （1961 年 7 月玄武区的人口是 242，542 人）[34]。据当时的报导，城市居民热烈拥护公共食堂这个新生事物，称赞在食堂就餐方便了工作和生活。就在实现城市人民公社化和「节粮」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的形势下，1960 年下半年为缓解城市粮食压力，江苏遵照北京指示开始动员城市人口下放农村落户，并以大跃进后进入城市的「新工人」为重点。这项工作进展十分顺利，南京市委要求动员 10 万人下放，玄武区至 10 月底共动员 11，898 人上山下乡，为市下达计划的 99.2%[35]，1961-1962 年又动员了 4，672 人回到农业生产战线[36]。至 1962 年 6 月，南京市减少城镇人口 49，800多人[37]。同期，全省压缩城镇人口 46 万[38]。下放人员胸戴大红花，在敲锣打鼓声中被送往饥饿的农村。随着经济形势日益恶化，1961 年 7 月，江苏省各城市再次压缩城镇人口粮食供应，仅南京市玄武区 8 月份销粮就比 7 月份减少供应粮 20 万斤，人均供应由 27.11斤／月下降为 26.33 斤／月，全年少销粮 71.9 万斤。[39]

江苏在大跃进期间创办的 71 所大专院校，到了 60 年代初已难以为继。1962 年初，江苏省对高校规模进行调整，仅保留 26 所高校[40]；中等专业学校从 281 所压缩到 37 所[41]。失学青年或被动员下乡，或被安排在城市的小型单位就业。在强大的国家威权下，失学青年都冷静地接受了现实。大灾荒下的江苏农村也十分平静。在实行严格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下，国家通过阶级斗争不断调整农村的社会关系，对地富份子的管制更加严格，阶级出身问题开始被反复突出强调。1960 年 2 月，遵照北京的指示，江苏省委发出通知，决定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

育运动，进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思想斗争。1961 年11 月13 日，北京又发出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在 1959 年冬至1960 年春，江苏的兴化、宝应、高邮、高淳、宜兴等县虽然相继发生因缺粮而导致的严重死亡事件（仅宝应县就死亡 35，391 人，占农村人口的 6.2%[42]，该县因死亡、病亡、外流而丧失的劳动力就约占农村总劳力的 30% ）[43]，但由于江苏省领导机关采取了救灾紧急措施，农村情况迅速得到缓和。

在大跃进的大背景下，江苏省在当时施行的各项活动和措施，只是奉命办事。与其它省相比，江苏只属中等状态，并无自己的「发明创造」，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甚至称「江渭清思想右」、「江苏省委右」[44]。对北京的指示，江苏省虽照办不误，但又留有余地。江苏没有兴办如甘肃引洮工程那样耗资巨大、害民伤财且毫无功效的超级水利工程，也没有像河南、山东、安徽、广东、甘肃、青海等省那样，揪出省级主要领导干部作为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靶子。江苏省放的各种「卫星」比较少、也比较小，因此在三年特大经济困难期间，江苏省的「非正常死亡」的数目也远较其它省份少。江苏省国家权力在大跃进期间的扩张只是全国类似情况的一个缩影。

大跃进虽为一场乌托邦运动，但在落实、巩固、强化国家权力方面却丝毫没有浪漫主义色彩。毛泽东的空想乌托邦虽未能实现，但全国已成为一座大兵营。1960 年下半年后，大跃进的狂热已逐渐降温，然而政治运动的快车并未减缓速度。1960 年 5 月，新一轮「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又在江苏各地掀起……在毛泽东一手创建的兵营式社会主义体制下，国家力量笼罩一切，社会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是到了 20 年后，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中国才出现划时代的转变，社会逐渐挣脱国家的控制，开始成长发育，才有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国家与社会。

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1998 年 8 月号 总第 48 期

注释：

[1] [2] [3] [12] [14] [33] [34] [35] [36] [39] 南京市玄武区委党史办公室，南京市玄武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南京市玄武区历史大事记（1949.4-1987.12）》（苏宁出准字第 0381 号，1992），页 38；14；58；74；70；82；92；96；115；108。

[4] [16] [18] [19] [20] [22] [24] [26] [29] 中国科学院江苏分院历史研究所：《江苏十年史（1949-1959）年》（草稿）（南京：1959 年 11 月），页 165；194；197；167；166；167；167-68；202-03；179；179。

[5] [32] [40] [43] 《当代中国的江苏》编委会、江苏省档案局编：《江苏省大事记（1949-1985）》（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页 90；168；193；194。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春风七年金陵路——1949 年至 1956 年南京党史专题研究》（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页 11。

[7] [9]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页 747；706；739。

[10] [42] [44] 参见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页 424；448；470。

[11] [13] [25] [27] [37] 南京市档案馆：《南京大事记（1949-1984）》（南京：无出版时间），页 105；115；102；104；145。

[15] 参见惠浴宇口述，俞黑子记录：《朋友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页201。

[17] [23] [28] [38]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江苏》，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页 96；95；315；106。

[30] 中共组织史资料江苏省编撰组编：《中共江苏省组织发展史纲要》（南京：南京出版社，1993），页 167；另参见注[1]，页 117。

[31] 参见《中共江苏省组织发展史纲要》（南京：南京出版社，1993），页 168。

[41] 《当代中国的江苏》，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页 22。

第九篇　　历史真实与鞍钢宪法的“政治正确性”

近几年海内外某些学人似乎有一种新的研究趋向，这就是主张重新发掘毛时代的「积极价值」，再配之以其他新的思想资源，用于指导当今的中国改革。崔之元提出，「只要不用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毛泽东思想，毛的思想中的确有许多有待发掘的积极因素」，他并认为，鞍钢宪法即是体现了「以广大劳动人民取代少数经济政治精英对社会资源的操纵」的「经济民主」的重要范例。在读到这些论述时，我是颇为惊讶的。我对这些学人提出上述判断的事实基础是否确切有很大的疑问，我认为彼等将某些概念从具体的历史事实中剥离开来，再赋予这些概念以「政治正确性」的判断，已和当年的历史事实大相迳庭，对鞍钢宪法的新诠释就是这类以理想化的态度看待过往经验的一个突出事例。

一

谈起鞍钢宪法，人们自然就联想到那个「两参一改三结合」。从 60 年代初开始，鞍钢宪法已和「两参一改三结合」紧紧联系在一起，然而「两参一改三结合」并非由鞍钢首创，早在 1958 年大跃进初起阶段，鞍钢以外的其他城市的若干企业就已经初步「创造」出这个经验，并于 1958 年 12 月形成「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正式表述。1960 年 3 月，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概念赋予鞍钢，并把鞍钢在大跃进期间实行的以政治挂帅为核心内容的一套做法誉为「鞍钢宪法」，这才使得鞍钢获得「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发明权，从而被认为是毛泽东找到了一条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的批示使鞍钢宪法声名远扬，但那几个最先发明「两参一改」的企业则早已被人们遗忘。今天研究鞍钢宪法和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的海内外学者又何尝知道，在他们的书斋 生命力持久的「两参一改」，当年却是由一个百余人的公私合营的济南小厂——成记面粉厂最先创造出来的。当时该厂还有另外一项创造——由老工人王学锐制成的小麦脱皮机的经验，与「两参一改」合称为「两项经验」。

由济南成记面粉厂最先产生的「两参一改」，原先主要是一个精简干部、提高生产效率的措施。成记面粉厂原有干部、职工共 138 人，开展「两参一改」后，取消了所有脱产干部，全厂干部职工人数也被精简为 119 人。该厂的「两参一改」具有十分质朴的特色，干部参加生产仅是做生产辅助性劳动，干部下车间劳动主要是顶替那些请病事假的工人。此举仅是著眼于提高生产效率，并没有被上升到「缩小脑力劳动与

体力劳动差别」的高层次，更没有人已意识到这个由他们创造的新经验不久将被视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新模式。

成记面粉厂的「两参一改」被推出后，很快，陕西庆华工具厂的「两参一改」经验也问世了。与只有百余人的济南成记面粉厂不同，庆华工具厂是一个大型国营企业，该厂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至 1958 年，仍有苏联专家在该厂工作。庆华工具厂推出的「两参一改」不再是成记面粉厂的干部顶班劳动一类低层次的「生产中心主义」，而是破除了在产品质量上的「右倾」观点，大胆地向苏联专家确立的工艺流程开刀，从而焕发出「破除迷信，敢想敢干」的时代精神，与大跃进的主旋律完全结合了起来。

陕西庆华工具厂对「两参一改」的充实和发展，使得这个先进经验日趋成熟。到了 1958年 12 月，「两参一改」已正式上升到「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更高层次，首先贯彻这项经验的是重庆长江电工厂。从 1958 年上半年开始，重庆长江电工厂就开始推行「两参一改」，至 11 月，厂党委根据 放出的 30,700 多条建议和意见，制订了「彻底推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案」。其主旨是全面落实干部参加生产的措施，将原先占全厂职工总数 8%的干部下降到 3%。

从济南一个百余人的公私合营小厂孕育出的「两参一改」，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发展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两参一改三结合」，事实证明，它是毛的主观理念强力引导和催生的产物。1958 年，毛号召政治挂帅、破除迷信，两条腿走路。同年，在毛的推动下，全国各大中企业全部废弃一长制，改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在工厂管理方面，则是大破苏联专家确定的生产工艺流程，用群众运动的方式组织生产。一个「两参一改三结合」，一个「党委 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就成了毛对苏联模式的突破，正因为「两参一改三结合」具有如此鲜明的毛的个性色彩，苏联方面立即表现出不快和排斥。

苏联专家对大跃进期间工人技术革新的价值极表怀疑，陕西某厂工人在短期间提出几十万条合理化建议，苏联专家无动於衷，甚至「捂起耳朵直摇头」，他们认为中国工人的合理化建议大多是为提而提，流于形式。苏联专家根本不相信，中国工人自行检验产品可以保证产品质量，他们对中国报纸上宣传的「提高工效几万倍」更是嗤之以鼻。

苏联专家和在华的苏联人对中国方面赋予「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巨大意义也极不以为然，他们根本不认为此举有助于消除「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针对苏联专家的怀疑与指责，有关部门进行了检讨，得出的结论是：专家的思想偏差和中国同志「对专家的政治工作没有政治挂帅有关系」。饶有意味的是，大跃进时期，在鞍钢的苏联专家的意见却不多，难道鞍钢在大跃进的高潮中置身于外？

二

在 50-60 年代初的中国大型企业中，鞍钢占据著最重要的地位（大庆油田以後取代了鞍钢的地位），堪称是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龙头老大。1949 年 8 月，应中共中央的请求，斯大林派出数百名苏联专家随秘密访苏的刘少奇抵达东北，其中大部分的苏联专家被安排在鞍钢。

「一五」期间，是鞍钢发展的重要阶段，中共中央出於加速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战略安排，把钢铁等重工业列入国家经济建设的头等重要位

置。在苏联专家的全面指导下，鞍钢系统地引进了苏式工业管理模式，成为新中国的钢铁生产基地。

苏式工业管理模式的核心就是实行一长制，鞍钢所属各个厂矿全面落实了一长制的经验，并相应建立起总工程师、总工艺师、总化验师、总检验师、总会计师的制度。由于鞍山市的主体部分就是鞍钢，因此，中共鞍山市委书记同时兼鞍钢党委书记和经理，在党的关系上，鞍山市委和鞍钢党委直属中共辽宁省委领导，但北京的国家计委、经委、建委和国务院的冶金部都对鞍钢有十分具体的业务指导关系。

在整个 50 年代，鞍钢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种象征，甚至吸引了一些文艺家选择鞍钢作为他们的生活基地。著名女作家草明在鞍钢落户十年，挂职于某钢铁厂任党委副书记，于 1959 年写出配合政治斗争的长篇小说《乘风破浪》；四川作家艾芜也长期在鞍钢体验生活，并写出长篇小说《百炼成钢》。今天的人们也许早已遗忘了这些作品，但它们却是那个时代鞍钢生活的某种写照。

1958 年，北京号召「以钢为纲」，「为实现 1,070 万吨钢而奋斗」，冶金部部长王鹤寿雄心勃勃，向毛主席立下军令状，鞍钢工人也全力以赴，要为钢铁元帅升帐作大贡献。但是大炼钢铁的基调是土法上马，搞全面开花的小土群，而鞍钢是特大型现代化企业，只能把工作重点放在增产、增效、厉行节约、降低消耗上面，这样，在大跃进第一阶段的 1958年，鞍钢没有产生什么轰动全国的「先进经验」。

在你追我赶，每天都有先进经验爆出的大跃进年代，产生不出先进经验就是保守、落后、右倾。鞍钢虽然不能搞小土群，但还是有其他潜力可挖。1958 年，鞍钢在工人中普遍开展了「献工」、「献点」活动——就是动员工人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改变工时制度和休息制度，主动延长工作时间。但这也谈不上是什么「创造」，因为大跃进期间，全国各厂矿的工人都普遍加班加点。于是鞍钢党委只能另辟蹊径，创造出一套具有鞍钢特色，既能与大跃进精神相适应，又能体现出产业工人政治觉悟的新经验。就在这时，传出上海求新船厂等企业「工人自动要求取消计件工资」的消息。受到这些消息的启发，鞍钢党委迅速在各厂矿发起是否取消津贴的「大辩论」，不言而喻，这类大辩论是不存在对立的两方真正争辩的，因为所有人都明白这种大辩论的含意。在一边倒的形势下，任何思维健全的人都不会逆潮流，提出「应保留津贴，不应取消津贴」等一类意见。

取消津贴、取消计件工资称得上是体现共产主义思想的新创举，问题是，鞍钢采取的这项改革，究竟是出自工人自发自愿，还是 导强力引导的结果？

至 1958 年 11 月底，占鞍钢公司生产工人总数的 65%，原先实行计件工资的 27 个厂矿，已有 24 个取消或准备取消计件工资。在这之前，计件工资占鞍钢工人工资总收入的18.83%，加上各类津贴，一共占工资总收入的 27%，最高者能占到 40%左右。取消津贴和计件工资后，相当数量的工人收入马上减少。

当年的一项调查资料显示：1、「同意取消」者占工人总数的 20%；2、「大势所趋随大流」者达 50%；3、「反对取消或有抵触情绪的」占 20%。取消津贴和计件工资后，损失最大的是技术熟练工人。统

计数字显示，占工人总数 40%的五级工以上的工人收入都不同程度地削减了收入：八级工每月减少工资 21.50 元；七级工每月减少工资 15.50 元；六级工每月减少工资 12.50 元；五级工每月减少工资 6.50 元。由于五级工以上工人收入被减少，相应的占全公司工人总数 60%的四级工以下的工人收入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改革的结果是收入相对高的熟练工人的工资与非熟练工人的工资的差距缩小，问题是，那些减少了收入、家庭人口众多的熟练工人的困难谁来解决？鞍钢的领导者想出了一条妙计：作为取消津贴和计件工资的一种补偿形式，每天「向所有工人免费提供一顿大锅饭」！不知这是否可称为「经济民主」？

大跃进的主旋律就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鞍钢工人在这期间提出了几十万条有关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的「合理化建议」，但是进入 1959 年以后，鞍钢的生产情况开始显现危机，由于原材料、电力严重紧张，致使鞍钢的生产时断时续。1959 年 2 月，鞍钢三个轧钢厂被迫停工，其于几个主要轧钢厂也只能开两班。更为严重的是，由于 1958 年一年高度紧张，许多工人吃住在车间，大量的献工、献点，使生产第一线的工人疲惫不堪，再继续坚持下来，有难以为继之虞。

最大的困难是当时已显露迹象的粮食与主副食品的供应困难。计件工资和津贴取消后，已使许多工人收入减少，加之粮食和食品困难，工人体力急剧下降，造成生产事故不断。为了减缓生产第一线工人的特殊困难，1959 年 5 月鞍钢为炼钢工人调整了粮食供应的比例：每人每月供应大米 10 斤，高粱米 10 斤，白面两斤，小米两斤，其余为粗粮，但是肉类仍无法解决。

长期奋战，供应减少，体力下降，引来了工人们的「牢骚怪话」。许多工人留恋「八小时工作制」，甚至羡慕苏联工人的生活，说什么「如再苦战，就把老人战死了，青年人战倒了」。更多的工人对吃粗粮有意见，认为「粮食丰收了，粗粮反而多了，真不像话」。还有工人直接否定大跃进成绩，埋怨说「小麦产量压倒了美国，就是吃不上」，「费了好大劲，弄了一堆废品」。甚至有人公开说（都是成分好的工人）：「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就是吃不饱。」

面对上述新情况，鞍钢领导拿起「阶级分析」这个显微镜和望远镜。鞍钢的工人阶级是党的阶级基础，但这并不意味著鞍钢的职工就进入了「红色保险箱」。首先，鞍钢有大量技术人员。依照 1958 年的新观点：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属於剥削阶级；鞍钢的工人来自四面八方，1958 年又扩招了一批新工人，这些人家庭背景各异，有一些人是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即使家庭出身好的工人也有思想觉悟高低之分，例如有的工人就对将知识份子划为剥削阶级「感到接受不了」。所有这些都说明，即使对工人阶级也要划分左、中、右，阶级成分固然极端重要，但仅仅是阶级成分纯正还不够，政治思想是否正确才是关键。

根据上述不同情况，鞍钢各级领导采取不同政策，以示区别对待：1、批判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对大跃进的怀疑和动摇；2、在所属各厂矿设立肃反机构，开展肃清反革命的斗争；3、对一般工人根据思想和政治表现进行「排队摸底」。一言以蔽之，就是以大批判开道，推动大跃进。在各种批判、教育中，对一般工人进行的「排队摸底」是最有创意的。依照过去的习惯，「排队摸底」的对象基本限于知识份子或民族工

商业者以及从旧社会过来的社会知名人士，但在大跃进期间，「排队摸底」已普遍运用于广大产业工人。鞍钢的方法是将工人分为三类：1、先进层；2、中间层；3、落后层。区别的主要标准是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态度，干劲大小，有无牢骚怪话，是否具有共产主义主人翁精神，以及是否愿意主动加班。分类结果是：先进工人多为老工人，中间工人多为青工，落后工人多为徒工。下一步就是在工人中开展「大辩论」和「拔白旗」，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开展「大辩论」后的一段时间，工人的思想觉悟和生产自觉性会有所上升，但是不久，又有牢骚怪话出现，于是，再进行一轮「大辩论」。不知这是否可称之为与「经济民主」相配套的「政治民主」？

三

1959　年夏召开的庐山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号召全党全民「保卫三面红旗」，反击「右倾机会主义者」对三面红旗的污衊，骤然打断了1959　年上半年工业战线上对大跃进混乱局面的纠偏，使刚刚受到抑制的瞎指挥等又重新泛起，且更加理直气壮、变本加厉。鞍山市委也乘著这辆反右倾的快车，将大跃进以来鞍钢的各项经验加以总结提高。1960年 3 月，终于获得毛泽东的亲笔批示，毛认定纠正了过去「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而大搞政治挂帅和群众运动的鞍钢的一套作法就是「鞍钢宪法」[1]，从此，「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就在东方地平线上升起！

在 1959 年 1 月至 7 月，尽管鞍钢各级组织仍不时在工人中开展「大辩论」，但是，鞍钢领导层也意识到前一年的跃进出了不少问题。当然，鞍钢的 导绝不会在中央下达新精神前自行纠偏，正是由于毛泽东在两次郑州会议和 1959 年 3-4 月的上海会议上提出「降温」问题，鞍钢的领导才愿意面对这些困难。1959 年 5 月 20 日以后，鞍钢分别召开了工人小组长以上干部会议，「职工们对过去不说真话，弄虚作假，都作了检查，对领导听喜不听忧、主观主义、强迫命令作风也提出了批评」。在这种大背景下，鞍钢以外的其他一些钢铁企业甚至对工人疾病的情况也开始著手调查，北京石景山钢铁厂的数据是，由于长期苦战，患各种慢性病的工人占工人总数的 27%。

1959 年上半年的纠偏逐渐触及到 1958 年创造的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若干领域。在黑龙江省委工业部召开的干部讨论会上，虽然所有与会者都肯定干部参加劳动的做法，但一涉及到工人参加企业管理，就出现了争论。多数人指出「群众管理太多，什么事情都要工人管理，工人负担重而不愿干」。大多数代表同意工人应参加一些「简单的、带有群众性的管理工作」，至于复杂的工作，诸如工资计算、产品检查、设备维修，则主张仍应由专职人员管理。个别人在纠偏空气的鼓舞下直抒胸臆，提出目前「企业管理混乱，就是工人参加管理的结果」。及至反右倾运动兴起后，所有这类言论顿时绝迹。

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2 月，毛泽东开始细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一次全面论述了「两参一改三结合」。毛说：「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2]　3　月，毛将「两参一改三结合」赋予「鞍钢宪法」，大大提

高了鞍山市委报告的理论层次，因为在他们给中央的报告中，竟没有一句「两参一改三结合」的表述。毛的指示下达后，鞍山一片欢腾，已经沉寂多时的工人「双革」（技术革命、技术革新）建议又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每天都要实现数千件技术革新建议」。当时的笔杆子是这样描述接到毛主席指示后的鞍钢工人的心情：「过去是一长制，不敢革命，是人民币挂帅；现在是大搞群众运动，大闹技术革命，是政治挂帅」，「1958 年以前，脑袋上好像戴上个『紧箍咒』，不敢想，也不敢干」，现在则是「思想大解放，右倾一扫光，革新闹高产，心花大怒放」。更有工人在听到传达后思想大飞跃，马上体悟到「鞍钢宪法就是毛泽东思想」，他们热情称颂主席思想「赛过太阳万倍强」。

尽管毛泽东的批示给鞍钢注入了强大活力，但是大跃进的快车到了 1960 年还是不得不放慢了步伐。1960 年 4 月上旬，全国钢铁生产出现大滑坡，4 月份 1-20 日的平均日产量比 3 月份同期减少 3,400 吨。1960 年 8 月，北京号召「保粮保钢」，同时宣传「当前大好形势」，「粮食生产大跃进是肯定的」；但是，眼前生产下降，人民生活困难的事实又如何解释呢？不久，群众被告知形势还是大好的，造成困难的原因有三：1、帝国主义封锁；2、气候恶劣；3、敌人破坏。上海工人阶级在保粮保钢运动中说：「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对的，一个指头的毛病是出在我们手上。」

平心而论，鞍钢的工人阶级是对得起毛主席的。1960 年 5 月以后，鞍钢工人再掀跃进高潮，但是跃进实在难以为继，以致先进经验有「越推越少」的趋势。8 月，辽宁的粮食供应已极为困难，辽东发生大水灾，铁路交通受阻，包括鞍山在内的辽宁十个城市的粮食库存量仅可供应八九天，北京紧急调运粮食支援辽宁，但仍无法根本扭转粮食危机[3]。

严重的粮食困难已使几个月前迎接毛主席指示的欢快气氛不复存在，更有甚之，大量的牢骚怪话又纷纷出笼，许多人甚至公开半公开地抱怨，「大好形势」是「形势不好」。作为消极现象的集中反映是出现了建国后鞍钢从未有过的现象：鞍钢大批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得了营养性浮肿病。据鞍钢卫生处在 59 个单位，14.2 万余职工中做的调查，共有 4,000余名职工患浮肿病。在患病人群中，干部、技术人员的比例最高，工人较少，享受保健待遇和高温作业的工人得病率小于一般工人，在鞍钢所属 26 个工厂的炊事员中，仅有七人得浮肿病。到了 1961 年 3 月，距毛主席发出有关鞍钢宪法的指示一周年，鞍山地区工人患浮肿病的比率又大幅上升。

粮食的空前紧张犹如泰山压顶，鞍钢的部分工人误认为农村情况要好于城市，于是向领导提出返乡务农的申请，第一炼钢厂平炉工人有 3%-4%要求返乡。还有一些工人不辞而别，私自跑回家乡去「保命」。鞍钢工人逃跑回家并非始于 1960 年，早在 1959 年就有不少新进厂的工人因害怕苦干和工伤事故而私自逃跑回家，只是 1960 年 8 月的农村情况远比 1959 年恶劣。1960-61 年，辽宁农村已普遍发生断粮、绝粮的现象，当跑回家的鞍钢工人发现这一点时已太迟。

鞍钢领导再一次寄望于大抓阶级斗争和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效能，这其中又包含两个层面的任务：1、在「成分不纯」的单位和知识份子

集中的部门进行阶级排队，例如当时的鞍钢无缝管厂就被认为是职工队伍严重不纯。1961 年 8 月前后，上级部门又以召集「神仙会」的名义，邀请鞍钢设计院 39 名党外高级知识份子开会，其目的是为了「摸底」。经过「反覆动员」和「交代政策」，终于让那些知识份子「说出了心里话」。这些人竟将「暂时困难」的原因称之为「七分天灾，三分人为」，批评大跃进「成绩伟大，缺点不少」。更有人公开宣称「鞍钢宪法并不比马钢宪法好，实行鞍钢宪法大搞群众运动缺乏科学依据」，又说「大搞群众运动，不是群众要求，而是上边硬贯的」。碍于当时经济形势的极端困难，上级部门才没有立即对他们开展斗争，但已将他们的言行记录在案，几年后，他们都遭到了批判和清算。2、对于一般思想认识「模糊」或有「错误」言论的工人，则进行具体分析：对于一般思想认识问题，对之耐心帮助，限期改正；对于属于两条道路斗争性质的错误，则发动群众揭发批判，「坚决搬掉阻碍运动的绊脚石」。

根据上级的统一部署，鞍钢针对群众中对「大好形势」的普遍怀疑，在 1961 年还开展了一场回忆对比的活动，动员群众通过回忆旧社会的苦，激发对社会主义的爱。只是这场活动的效果十分有限，因为大多数工人都很实际，只会从眼前的粮食短缺以及百物皆无的角度来观察「苦」和「甜」的问题。

1961 年是鞍钢最艰难的一年，虽然还在宣传鞍钢宪法，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主体——工人群众，早被饥饿和浮肿搞得意志消沉，再也提不出什么「双革」建议了。在这年中，鞍钢有些厂还宣布停产（化工总厂），工人群众中的「模糊思想」和「不正确」的议论更加突出，有人竟埋怨党「过去对轻工业重视差，所以物资供应紧张」，更有不少工人产生「弃工务农」思想，以致到了经济形势开始好转的 1962 年初，还有工人准备春节回家请长假，如果农村情况好就不回鞍钢。

北京在 1961 年初终于对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困难作出反应，中央宣布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紧接著又下发了《工业七十条》，一批大跃进中上马的无效企业纷纷下马——从表面上看，工业格局已全面向 1958 年前复归，然而，完全的复归并不可能。1961 年 3 月，毛泽东又发出指示，在工交企业建立政治部，以加强党对工交企业的全面领导。从一年前的「两参一改」发展到一年后建立政治部的指示，说明毛始终没有放弃他的理想：以思想革命化来推动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以阶级斗争来保证他的理想的推行。现在毛已不太关心那些使他头疼的数字了，尽管眼下的特大困难令他有些消沉，但是他并没有后退，而是「硬著头皮顶住」。毛终于坚持到了经济开始恢复的 1962 年下半年，在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发起了凌厉的反击。

1962 年 12 月，东北局经济委员会根据十中全会精神召开了工业企业政治工作会议，提出每个企业都要把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会议宣布在困难时期有错误言行的工人占工人总数的 17%左右。现在，鞍钢宪法的主旨已经按毛的最新思想转化为更加突出强调阶级斗争，具体领导各企业进行阶级斗争的组织就是按照毛的指示建立的政治部。

综上所述，「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是毛主观世界的产物，经由毛的强力推动，「两参一改三结合」在 1958 年后的一段时期内成为中国工业化管理的一种新方法，毛期望以此来规划中国社会主义工业

化道路。然而，遭到毛唾弃的马钢宪法并非资本主义的歪门邪道，它和鞍钢宪法一样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向重工业倾斜的生产管理方式，只是鞍钢宪法已用「政治中心主义」代替了「技术中心主义」而更具主观性。

大跃进期间的鞍钢工人没有争取「经济民主」的思想意识，「两参一改三结合」与「经济民主」不搭界，所谓「经济民主」只是当今学人理念世界的产物，与当年鞍钢工人无涉。时下某些学人从预设的立场出发，将自己的想像附丽于历史，以某种理想化的态度来构筑过去。按照这种思想逻辑，过往的年代的许多概念都会在「后现代」闪烁出光辉，因为只要抽去这些概念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特定内涵，再将其诗化，根本无须费力去「开掘」。这样，毛时代的许多概念马上就会熠熠生辉。顺便说，大跃进年代与鞍钢宪法相匹配的还有农业战线的「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除了那个密植的「密」有待商榷，其他哪一项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所以，今天经某些学人演绎的、被认为是体现后现代「政治正确性」的「鞍钢宪法」，只能是一个历史名词，它只存在于学人的书斋里。幸欤？悲欤？

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0 年 4 月号 总第 58 期

*　本文基本资料来源于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所藏中国当代史史料，谨致谢意。

注释：

[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9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 89-90。

[2] 《毛泽东谈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五），载《党的文献》，1994 年第 3 期。

[3] 孙业礼、熊亮毕：《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 194

第十篇　大饥荒中的“粮食食用增量法”与代食品

从 1960 年起的两年多时间里，在中国广大地区先后开展了两场与粮食问题有关的群众运动：“粮食食用增量法”和代食品宣传推广运动。前者是在大饥荒已经蔓延，当政者仍确信粮食大丰收，由地方党委和政府发起，并得到中央认可和支持的一场节粮运动。后者是中央已意识到大饥荒的现实性，但已无粮食用于赈灾，因而主动发起的一场救灾运动。对于这两场和粮食危机有关的运动，国内外学术界在有关大饥荒的研究中均较少涉及，本文拟对这两场运动的起因、过程和后果作出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确信粮食大丰收，“粮食食用增量法”登场

“先进烧饭法”或“粮食食用增量法”最先是由地方党委和政府创造的。1959 年 5 月，辽宁省黑山县卫星公社三台子管理区副业生产队创造出将“玉米先蒸、后磨、再煮”的“玉米食用增量法”。报道称，食用了用增量法制作的玉米面后，“群众红光满面，生产劲头十足”。这个经验经辽宁省委上报后，得到中央的肯定，并批转全国。1960 年 1 月，上海市川沙县推出旨在提高“出饭率”的“先进烧饭法”，将原先粳米一斤的“出饭率”，从 2 斤提高到 2 斤 8 两。同月，河南省创造出更具科学术语规范性的“粮食食用增量法”一词。具体操作程序是，将原粮煮到六七分熟后，从汤水中捞出，再用水磨将原粮磨成糊状，把酵母放在面糊中，发酵后送入蒸笼蒸熟。其结果是，用传统方法蒸馍，1 斤面只能蒸出 1斤馍，最多只能蒸出 2 斤，采用增量法后，1 斤面可蒸出 5 斤馍。河南同志兴奋地将这种馍命名为“跃进馍”，他们甚至创作了一首歌谣，表达对“跃进馍”的喜爱：

“跃进馍真正好，既顶饥又顶饱，节约粮食营养多，利国利民好处多。”[1]

川沙县和河南省的经验分别代表了以食米为主的南方和以食面为主的北方的两种不同的节粮方式。继而，层出不穷的增量法纷纷问世，也都贴上了“营养多、易消化”的宣传标签。其中有：

北京市密云县的“烫面”、“双蒸”、“水磨”做饭法；

辽宁省抚顺市的“油水混合”的“食油食用增量法”，其工艺特点是，“用土超声波使油水乳化”；

湖南省的“一炒、一泡、一蒸做饭法”；

四川省邛崃县、莆江县的“火米（蒸谷子）增量法”、“三开一煮

法”；

武汉市的“蒸米做饭法”；

重庆市的“冷水发饭法”；

兰州市的“水发面蒸馍法”；

西安市的“纯面增量法”、和“碗蒸馍增量法”；

河南省鲁山县的“煮后干磨烫面增量法”；

……

各地创造出的“粮食食用增量法”五花八门。虽然在 1959 年庐山会议前中央曾向全国批转过辽宁省黑山县的经验，但在批判彭、黄、张、周之后，这项工作就被搁置了下来，直到 1960 年 3 月，领导层才真正重视起粮食食用增量法这个新发明，开始在全国全面推广。3 月之后，湖北、河北、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内蒙、江西、广西、陕西、四川、辽宁和北京、天津、上海等省市采用增量法的伙食单位已高达 50%至 90%.[2]

推广“食用增量法”是否表明领导层已经意识到全国出现严重的粮食危机，并准备采取相应的解救措施？检讨 1960 年头几个月领导层的政策举措，却无法形成上述判断。事实是：北京认定全国粮食取得了大丰收，仓禀饱满，不仅可供国内需求，还可用于出口换汇；同时，领导层相信节粮与丰收并不冲突，越是粮食大丰收，就越要节粮。由此，下一个问题自然就被提了出来，即领导层对 1958 年大跃进以来各地普遍发生的浮肿、非正常死亡、人员外流等现象，究竟有何反应？

（1）对浮肿病的反应

1958 年大跃进运动兴起后，各地有关浮肿病的内部通报，除了庐山会议后的几个月，在大多数时间里，一直保持着畅通状态。据不完全统计，仅在 1958 年一年，就有河南、四川、云南、甘肃、山东、湖南等 6 个省存在着浮肿病严重蔓延的情况。[3].

1959 年浮肿病在更大范围加快蔓延。据零星资料统计：[4]

山东省荷泽地区：1959 年入春以来，水肿（即浮肿）病人达 72.7 万人，死亡 1558 人。

广东省海南岛：1959 年 7 月，海口市与其它 6 个县有浮肿病人 4.3 万人。

至 1960 年，浮肿病已成为遍及全国城乡的流行病症，4 月中旬，仅湖北省水肿、干瘦、妇女子宫脱落人数达 35.9 万人。江苏省浮肿人数达 12.6 万人。6 月，江苏省浮肿、消瘦人数达 89.2 万人。[5]

对于各地浮肿病蔓延的现象，各省及中央经过一段时间，方弄清发病原因。起先认为，是食用了不洁食物引起消化吸收障碍而导致，后认为是食盐过多而引起浮肿，最后才判定是营养不良导致浮肿。北京要求各地解决群众疾病问题，但一般不减免地方的粮食征购任务。

（2）对人口外流的反应

1958 年 4 月，山东、甘肃农民就开始大量流入内蒙河套地区。

到了 1959 年，大量外地农民开始流入北京、沈阳、呼和浩特、包头等城市。4 月，流入上海的人口已达数万。据不完全统计：

河北省：外流人口 28 万；

山东省：外流人口 32 万，其中青壮年 10 万人。[7]

1960 年 1 至 4 月，无票乘火车的盲流农民达 17 万人次，比 1959 年同期增加 3 倍，大部分来自鲁、冀、豫。前往东北的占 60%，前往西北的占 20%，其它城市占 20%.同年 1至 6 月，流入内蒙的盲流达 60 万人，同期辽宁农民外流 30 万人。

对于农村人口外流，北京持明确反对的态度。1959 年 3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其后，在各个交通枢纽普遍设立收容站。对于流入北京等大城市郊区的外流农民，可免粮票供应饭食，但需进行人员登记，其后一律遣返原籍。

（3）对经济下滑严重影响对港副食品供应和出口供应的反应

1958 年 11 月后，由于农副产品供应紧张，内地供港的副食品急剧减少。[9]北京对此的反应是，动员群众少吃肉、蛋，1959 年 5 月，国内城乡市场基本已不供应猪肉、鲜蛋。在大城市，除保证特种供应外，将居民供应压缩到最低限度，或停止供应，以全力支援出口。河南省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提出口号：国庆节前不吃肉，不吃蛋，或少吃蛋。湖北省规定：从县到省，除特殊需要外，一律停止供应肉食。1959 年 4 月，武汉市将停止肉食供应的范围扩大到餐馆、合作食堂、点心铺。偶有供应，群众排队如长龙。[10]

（4）对大城市节日供应困难的反应

1959 年 1 月至 4 月，上海市市民的猪肉供应减少了 35.92%，家禽减少 75.19%，蛋减少 79.56%，鸡、鸭、鱼则早已停止供应，原每人每月肉供应 6 两（老秤）已不能够维持。长期销售不旺的代乳粉、代藕粉成为畅销品。粮店开始出售部分山芋丝、苞米粉，作为居民的定量口粮。[11]全国首善地区北京市的节日供应也捉襟见肘。1959 年春节，在各地大力支持下，北京的食品供应仍比 1958 年减少。1959 年端午节，马寅初因没买到鸡、肉，只吃了几个粽子。他说，活了 78 岁，第一次没过端午节。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傅鹰在家养了 50 只小鸡。

与大城市相比，小城市的供应更加困难。1959 年山东省枣庄市黑市地瓜干 8 毛钱一斤，洋槐叶 5 分钱一斤。[12]对此，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反应是，号召勤俭建国，开展新旧社会对比活动。

（5）对非正常死亡人数激增的反应

1957 年 12 月，各地就有非正常死亡的内部通报。1958-1959 年后，情况日趋严重，据不完全资料反映：[13]

1959 年冬至至 1960 至 4 月，江苏省宝应县 35391 死亡，其中绝大部分为饿死，该县县城内拾到的弃婴有 927 名，其中死婴 153 名。[14]；1960 年 1 月至 2 月，江苏省高淳县非正常死亡 1171 人[15]……

对于此类非正常死亡事件，北京的基本态度是，认定事件起因是“民主革命不彻底”，[16]要求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反击阶级敌人的破坏，同时责成地方妥善安置灾民，处理好善后工作。

北京领导层对上述所有“消极现象”的总体判断是：

（1）认定现在全国粮食形势一片大好。1960 年 1 月 26 日，国务院下发文件宣布，1958、1959 年粮食获得特大丰收。当前粮食形势好得很，国家粮食库存在 1959 年 6 月底 343 亿斤的基础上，1960 年 6

月底将达到 500 亿斤，而 1960 年 6 月底的实际库存仅为 127 亿斤。[17]

（2）认定消极现象仅是“一个指头”的问题，其它“九个指头”都是好的。

（3）坚持大办公社食堂的政策。庐山会议后，重又没收农民自留地；1960 年 3 月后，统一将粮食分配到食堂（不分到农民手中）。到了 4 月，全国农村已有 4.4 亿人参加了食堂。

（4）将社会各界对粮食供应方面的意见，一律视为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把群众对粮食供应方面的不满定性为“闹粮”。而“社会主义不会饿死人”则成为一条铁律，所有现实都必须经此条铁律的过滤。

基于以上判断，北京对于各地粮食告急，并未予以充分重视，反而认为，造成“粮食紧张空气”的重要原因是，农民和基层社队“瞒产私分”。此即是 1959 年以来一直未间断进行的“反瞒产斗争”。具体到粮食问题，北京领导层采取了四项措施：

（1）继续出口粮食。1958 年的出口量为 266 万吨，1959 年激增为 415 万吨，仅 11月，就出口粮食 18.8 亿斤，比第三季度粮食出口总和 15 亿斤还多了近 4 亿斤，创下了粮食出口新纪录。1960 年则安排了 272 万吨的出口计划，实际出口 265 万吨。东欧国家鉴于中国宣传粮食大丰收，要求中国在 1960 年供应 84.7 万吨，比 1959 年提高 50%.[18]

（2）继续高征购。1958 年的征购比例为粮食产量的 29.4%，1959 年上升为 39.7%，1960 年为 35.6%.[19]到 1959 年 11 月 27 日，全国征粮 1077 亿斤。其中，1959 年 10 月，全国收购入库粮食 241.8 亿斤，比上一年同期增加 153.7 亿斤，即增长一倍半。[20]

（3）减少城乡粮食销量。1959 年 7 月至 11 月，全国农村销售 127 亿斤，比上一年减少 40 亿斤；城市销售 346 亿斤，比上一年减少 40 亿斤。[21]

（4）调动宣传工具，阐述“好日子当苦日子过”的新概念。这个思想来自最高当国者。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提出，要“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宽日子当紧日子过，计划用粮，节约用粮，粮菜混吃，吃饱吃好”，同时要“纠正部分农民多分多留多吃粮食的想法”。

北京的这些判断和措施与资讯渠道不尽畅通有一定联系。根据现有资料反映，高层虽然知道部分省、区饿死人的情况，但从大跃进以来，地方报灾系统部分失灵。其中又以河南省信阳地区为最。1959 年冬，信阳地区已“遍地哀鸿”，但当地领导仍封锁消息，“灾荒报丰收”。[22]一些地方领导匿灾不报，致使北京高层无法了解到饿死人问题的普遍性。

地方领导的匿灾不报又和庐山会议后反右倾的大环境有关，因为报灾就意味自我否定。因此，一些地方官眼见百姓大批死亡，也不放粮（一些地方粮库仍存有粮食），而且铁了心拒不报灾。更重要的是，最高当国者存有忌灾讳荒的心理，一些地方官对此心领神会，干脆匿灾不报。

最后，在某些当政者看来，节粮与出口粮食并不矛盾，多年来一直

如此，这就是“动态平衡”或“综合平衡”。于是，领导者就这样沉浸在了自己构筑的“意底牢结”逻辑分析中。

但是，粮食问题似乎又很严重。在此背景下，1960 年 3 月，北京对各地缺粮问题正式作出反应：在坚持既定原则下（没收自留地，粮食分配到食堂，不停止出口粮食），通过“组织人民经济生活”，推广粮食食用增量法，以达到节粮和支持出口的目的。

二、何谓“组织人民经济生活”？

从 1960 年 3 月开始，“组织人民经济生活”一词频繁出现在中央文件和各种报刊，在当时的语境下，这个词汇包含两层涵义：

（1）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向群众解释当前各项经济政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重点解释“为什么粮食大丰收了反而需要节粮？”[23]

（2）通过各级党组织具体落实增产节约、计划用粮的措施，“打击阶级敌人的造谣破坏活动”。 “组织人民经济生活”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官方宣传与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之间的巨大反差。1960 年后，《人民日报》等不断宣传 1958 年、1959 年取得了空前大丰收，但群众的生活却每况愈下。群众对“三面红旗”的不满，已经从城市发展到农村和边疆。一些零星资料对此有所反映：

福建省晋江县深沪渔民“攻击”粮食政策说，毛主席当主席，一顿吃四两；刘少奇当主席，一顿吃三两；以后再一个主席，不知吃几两？晋江县华侨侨眷八九千人，“争着要出国或跑香港”。[24]沈阳“有一些坏分子扬言”，给饿饭的孩子照个像，给毛主席寄去。包头钢铁公司有几个工人甚至要把带沙粒的小米饭送给毛主席。[25]……

针对各地出现的大量不满言论，各级党委把加强专政和思想教育结合起来。公安部长谢富治要求各地专政机关“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重点打击五类分子的 “造谣”、“诬蔑”和“反动言论”。[26]在打击、震慑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同时，各级党委重点向群众宣讲“十年伟大成就”和“今后的幸福远景”，以澄清群众的“模糊观念”：

一，粮食究竟有没有取得大丰收？正确答案是：“坚信粮食取得了大丰收，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任何动摇”。[27]

二，为什么粮食大丰收了，还要号召节粮？为什么各条战线都取得了胜利，却买不到日用品？正确的答案是：“不是粮食少了，而是吃得人多了”，“不是东西少了，而是买得人多了”。[28]

三，小家有小家的困难，国家有国家的困难，群众应设身处地，站在国家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不应一讲节粮就埋怨、发牢骚。

四，社会主义绝不会饿死人，说农民被饿死完全是阶级敌人的造谣、诬蔑。

上述种种充分说明，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的意识形态，在修复和具有极其强大的功能。同时，这种具有强制性质的意识形态，也有它“柔性”的一面，它能够以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类平民化语言诉诸并调动群众的情感，使其服从于自我克制。现实世界早已是满目萧肃，但经过意识形态的过滤，就变幻为“万紫千红”，“满园春色”。只是这种意识形态的遮蔽效果实在过于强大，竟也误导了领导者的常识思维，严重影响了他们对形势作出正确判断。

1960 年 5 月，北京领导层开始逐步知晓粮食问题的严重性质。事

情的起因是，辽宁工业基地和津、沪的粮食供应已难以维计，但直至此时，北京对粮食和农村危机的深度和广度仍模糊不清，而仅将问题理解为调运粮食出现了困难。28 日，中共中央向各地发出紧急调粮指示。6 月 6 日，中共中央再度发出《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令人惊奇的是，即使到了这一步，一些领导干部仍在继续隐瞒饥荒的真相。周恩来以后回忆道，在 1960 年夏天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他本人“已经意识到粮食有问题，但大家不承认，结果把真实情况给掩盖起来了”。[29]周恩来所说的“大家”既有中央干部，也有省级大员。就在这次北戴河会议期间，毛泽东召见李富春、薄一波、陈正人谈话，要求全国大搞小洋群、小土群，今冬要动员 7000 万人来大炼钢铁。[30]毛的这个指示很快就具体化为 1960 年 7 月后兴起的“保粮保钢运动”。

“保粮保钢”运动的核心是试图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提高钢产量和解决农村粮食问题。虽然中央到此时对各省的粮食情况仍不摸底，[31]，但大致已知道粮食出了大问题，这才有了“全党动员，大办农业，大力粮食”。无庸置疑，在全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饥肠辘辘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完成 1860 万吨钢生产的任务，而在继续坚持公社食堂制度的前提下反五风，动员干部下乡整社，对解决大饥荒显然也无济于事。

就在“保粮保钢”运动全面展开之际，农村饿死人现象已发展到令人恐怖的程度。仅山东省章丘县黄河公社一地，从 6 月初至 8 月 15 日，已死亡 642 人。其中 8 月 1 日至 15日，死亡 229 人，平均每天死亡 15.2 人。[32]

在非常形势下，北京高层终于完全清醒。9 月 7 日，中央发出《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的指示》，规定除少数重体力劳动者外，城镇居民每人每月降低 2 斤口粮。文件首次承认“夏收之后，浮肿病、非正常死亡和人口外流现象继续发生”。

三、大饥荒日趋严重，全面掀起代食品推广运动

粮食空前紧张，广大农民食不裹腹，就连较为富庶的江苏省扬州地区，也到了“天天喝粥，有粥无菜”的境地，泰兴县在 1960 年 5 月 10 日至 8 月 15 日的 96 天里，每人口粮仅 82 斤。[33]1960 年底，东北三省农村人均口粮已减至 232 斤，比 1957 年减少了 55%.[34]至于豫、皖、川、鲁、甘、青、桂、黔等农村部分地区，则早已是道殣相望，村室无烟。而国家的粮食库存已到了最低警戒线——1960 年 7-8 月粮食库存比上年同期减少了 100亿斤。[35]作为应付迫在眉睫的粮食危机的一项直接措施，北京正式向全国发出号召，要求各级党委政府、机关、学校，全力开展征集代食品活动。8 月 10 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说，秋收力争要多打粮食，无论哪一个省、哪一个县、哪一个公社，多打粮食，多搞菜，多搞代食品（野生的），总之，韩信点兵，多多益善。[36]毛泽东虽没问粮食为何打不出来，但他毕竟明确提出要“多搞代食品”，这样，宣传机构又有了新的工作目标。

从前一阵铺天盖地的宣传粮食大丰收，到眼下鼓动全民大搞代食品，这个弯子实在转得太大，竟使得意识形态机构一时还不知道如何向人民解释这一切，只能空洞地开展“三大万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宣传活动。直至 1960 年 10 月，《人民日报》在国庆社论中才

对形势作出了新的解释。社论称，“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粮食严重减产”。社论并宣称，“人民公社已使我国农民永远摆脱了那种每遭自然灾害必然有成百万、成千万人饥饿、逃荒和死亡的历史命运”。社论作者当然知道，就在这篇社论发表之时，全国各地农村正在发生大面积饿死人的情况，但事实归事实，宣传归宣传，他们选择采取了“硬着头皮顶住”的方针。

然而，面对各地饿死人的警报，总得想出解决问题之道。1960 年 11 月 3 日，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12 条），在继续坚持公社食堂的前提下，对农民作出了一些让步，希望通过政策调整，迅速扭转饿死人的现象。11 月 14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根据中国科学院的建议，向全推荐了一批代食品。《紧急指示》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组长的中央瓜菜代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正式提出“瓜菜代，低标准”的口号。在各省成立“除害灭病”领导小组，普遍建立“人民生活情报网”，具体落实瓜菜代的任务。

所谓“瓜菜代”，就是以瓜果、蔬菜代替粮食作为主食。其实，在饥馑遍地的 1960 年的广大农村，早已无瓜无果，百姓且已把树皮、树根、野菜、观音土代替粮食吞进肚里，所以瓜菜代小组的真正任务是动员开发代食品。

在现代汉语中，“代食品”一词最初出现于 1955 年。在统购统销运动中，广西灵山县数千人因缺粮上山采取野果、树皮充食。这种非谷粟类之物质从此就被冠之以“代食品” 之学名，开始出现在官方通报中。之所以将野菜、树皮等名之曰“代食品”，其关键的考量是意现形态所要求的政治立场问题。从“无产阶级政治立场”出发，旧社会劳动人民吞糠咽菜不能称其为食用代食品，而社会主义集体化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农民所食的稻秸、橛根、玉米芯一类必须称之为“代食品”。以后相延成习，“代食品”一词逐渐进入现代汉语语汇。

在统称为“代食品”的各类物质中，大致可分为两类：

（1）自然生产类的动植物

小球藻，及其它水生植物（红萍等）；各类农作物（玉米、水稻、小麦、高粱等）的秸杆；各类植物（蚕豆、豌豆、洋芋等）的橛、根，土伏林等；冷树皮；各种野菜（野口头、鹅子草、泥鳅稿、野芹菜、野池米、毛姑、豆瓣菜等）及野生菌类；各类作物枝茎（红薯秧、豆角皮等）；各类野生果实（橡子、栲槠、芭蕉等）各类昆虫……

（2）合成类（用霉地素、链孢素作基本原料）

人造肉精、人造肉精粉；人造肉（又称人造成型肉）、人造肉丸子、人造肉汤；人造奶；人造食用油脂…

在上述各类代食品中，小球藻得到了中央和各级领导机关的特别重视。小球藻原是一种水面浮生植物，1960 年上半年，上海等地最早将其用于猪饲料的食用。由于粮食空前紧张，生猪存栏量急剧减少，严重影响出口和人民的副食品供应，小球藻的开发一度被认为有助于提高猪饲料的营养成份，可缓解猪饲料短缺的困难。于是这项发明在上海等地迅速得到了推广。至 1960 年 7 月底，全国二十七年省、市、区（西藏除外）都已程度不同地开始了小球藻的培养试验和大面积的生产。

小球藻从猪饲料的辅助食物一下跨入人类食物领域，时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胡乔木在其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1960 年 10 月，胡乔木呈书毛泽东，建议在全国推广小球藻代替粮食。胡称，推广小球藻，既可治浮肿，又能“保证不饿死人”。毛泽东闻知此物有如此功效，遂于 10 月 27 日将胡乔木的信批转全党， [37]要求全面推广。

毛泽东的批示及胡乔木的报告下发后，全国立即掀起了群众性大办小球藻的热潮。小球藻生长的关键要素是采集小球藻培养液。各地稀释小球藻培养液的种类繁多，最常见的方法是：用人畜粪尿。北京、湖南的经验是，以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的稀释人尿为最佳配方。

机关、学校、工厂、街道普遍建起了培养小球藻的水池，城市居民更是利用家中的瓶罐，培养小球藻。许多家庭让孩子每天在餐前喝一两勺小球藻水液，相信小球藻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实际上，这只是粮食极度匮乏的年代中人们的一种预期心理，与科学原理毫不相干。

在大办小球藻的同时，北京市还发明了一项“大白菜快速生长法”，将大白菜的疙瘩、带心芽的菜根，栽在盆子里，据说在 15 度的室内气温下，能较快地生长成菜。

在各类代食品中，比较具有实际效用的应是“人造淀粉”。所谓人造淀粉，就是将经过整理的秸、根、叶、茎、球等磨成粉状，通常将其混入玉米面、高粱面，做成馍或窝头，食后胃腹部有某种充实感或肿胀感，而不象饮了小球藻液后那样虚无缥渺。[38]

四、组织、意识形态与代食品推广

代食品推广运动是在各级组织的精心布置下全面展开的。1960 年下半年后，解决群众吃饭问题成为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头等大事，在坚持人民公社制度和公社食堂的大框架下，各级党委和政府运用常规的政治动员方式，全力贯彻中央关于瓜菜代的措施。

各级党委纷纷制定采集代食品的指标，各省都向中央汇报了采集代食品的预期数目。1961 年初，青海省提出两项承诺，农民口粮全年人均不得少于 180 斤；在 1961 年 8 月底生产人造肉、小球藻干粉 300 万斤，叶蛋白 1500 万斤，人造精制淀粉 2 亿斤。1960 年底，中共中央东北局对 1961 年 1 至 9 月的全区农民生活作出安排，力争每人口粮达到 120 斤，每天 2 两干淀粉（代食品）。[39]湖北省崇阳县发动群众 2.5 万人上山采集野果。中科院昆虫所在短期内搞出可食昆虫 1200 多斤，并将取得的经验向全国推广，即，“采食昆虫是补充营养的一种途径。”[40]

在各级政府的全力推动下，人造肉精的商业性生产取得很大进展。据轻工业部、商业部、化工部不完全统计，到 1961 年 4 月 15 日，已生产人造肉精干粉 479 吨，其中轻工部第一批试点厂济南酒精厂、沈阳啤酒厂等十个重点厂生产了 446 吨。从 1961 年 3 月起，天津全市已在 17 个二级饭馆出售人造肉炒菜。云南省用小球藻液 70 吨，生产冰棍、稀饭、汤供应市场。

黑龙江、吉林、辽宁十个市已供应 195 万斤人造成型肉。四川省铜梁县利用代食品生产糖果 33 万斤、糕点 19 万斤，还供应叶蛋白汤圆、小球藻羹汤、肉精水饺。[41]

为了推动代食品运动向纵深方向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还用召开“吃

饭大会”或“节粮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的形式宣传代食品的优越性，消除党内外干部在推广代食品运动中的“模糊认识”。

推广代食品的关键是干部，然而不少干部在推广代食品问题上却表现消极。他们先是对“绿水”（群众称小球藻为绿水）可以代替猪饲料表示怀疑，以后更不相信可为人食用。河北省隆化县委遵照中共中央华北局和河北省委的布置，召开推广代食品的“吃饭大会”，将榆树叶、槲树叶混入玉米面做成窝头，让全县五级干部集体食用。[42]地处西南的四川省纳溪县也曾召开过“吃饭大会”。县委书记要炊事员做了十几样代食品，让全县干部品尝，并大声问道，“代食品好不好？” 参加吃饭大会的县社干部，只有少数人大声称“好”。[43]

在推广代食品运动中，科研部门与宣传部门发挥了重要作用。大跃进浮夸风重灾区河南省，在宣传代食品优越性方面走在全国前列。该省科研部门对玉米皮、红薯秧的“营养成分”作出鉴定，其结果是：

玉米皮：含水分 7.09%，蛋白质 3.92%，淀粉 33.36%，糖 1.62%，粗脂肪 0.44%

红薯秧：含水分 39%，灰粉 1.84%，淀粉 63.17%，

最后的结论是，玉米皮、红薯秧质量很好，适于人体食用。[44]

湖南省电力学院发明了用稻草粉和面粉各半制成的馒头，声称“经过医学院的化验，营养价值超过北京标准面”。湖南、四川、广西还将石灰水煮稻草再研制成粉，声称稻草的淀粉量达到 30%至 80%，并将这种淀粉起了一种学名，曰“稻草淀粉”。[45]在 1960 年11 月后的一段时期内，意识形态宣传部门将代食品的“优越性”推到了极致，“甚至说得比真粮的营养价值还高”。他们说，双蒸饭易于消化，更易于发挥食物的营养价值，是对人类膳食结构改革的重大贡献；小球藻、精制淀粉则不含胆固醇，有益于防止心血管疾病。

尽管宣传媒介将代食品和双蒸饭等的优越性吹得天花乱坠，但各地不时传来群众误食代食品导致中毒的消息。1960 年 4 月，中央卫生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禁止宣传苍耳子。此前河南省兰考县群众 5900 余人误食苍耳子，致使 1100 余人中毒，38 人死亡。在此前后，各地农村因误食有毒植物中毒死亡的事件接踵发生。5 月，山西省 3800 人吃苍耳中毒，54人死亡。

各地农民还因吃了腐变的蔬菜，患了青紫病。由于中毒现象较为普遍，1960 年下半年后，全国各制药厂纷纷赶制解毒剂“60 号中药”，随即又开展了防治青紫病的宣传活动。[46]

在代食品推广运动中，同时进行防治青紫病的卫生防疫工作，显示了意识形态在解释现实问题上所面临的巨大困境。这种矛盾性也充分体现在各地领导干部的公开与私下言论中。

作为党政首长，他们在公开场合动员大搞代食品，但常识理性又使他们自己也不相信意识形态对代食品的宣传。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就指责过负责代食品生产的北京市商业局副局长：“净出么蛾子（北京土话，指坏主意），叫人吃这个行吗？”他也不满“双蒸饭”，说“一两粮食蒸来蒸去不还是一两粮食吗？”[47] 刘仁讲这些话时，已是 1961 年。在这年年初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中央重又提倡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与此相连，有关代食品优越性的宣传开始逐渐降温。科研部门

对代食品的“营养价值”又作出了新的测定。四川省测试出 40 种代食品的有毒成分。中科院生理所对橡子粉、稻草的“营养成分” 作出检验，结论是基本没有任何营养价值。中科院有机化学研究所、生物化学研究所和中国医学科学院的最新研究证明，稻草、玉米根、玉米芯、玉米秸营养价值很低，“不能产生热量，不能消化吸收，不适合大量掺食”；而所谓“粗淀粉”的真正淀粉含量只有 0.8%至 2.96%，蛋白质 0.27%-0.6%，将其喂小白鼠，三天内体重下降 31%，解剖后发现胃扩大和胃壁变薄。[48]

在刘仁等作出不公开批评及科研部门在内部重新对代食品作出营养评估时，一般的普罗大众则更直接、更明确地表达了他们对代食品和相关政策的不满。

学生：沈阳医专有学生说，“勤俭建国真正好，又吃野菜又吃草”。太原市五中、三中、十中的干部子弟拒绝吃野菜，说“那是给猪吃的”。广州大学生“发牢骚”：“形势好得很，为什么天天吃无缝钢管（通心菜）？”他们还“攻击”国家的援外政策是“打肿脸充胖子，瘦狗拉硬屎。”[49]

工人：在 1960 年下半年降低口粮标准时，抚顺发电厂工人的主食是用杏条面做的窝头，工人说：“这东西喂鸡，鸡都不吃，可为了装饱肚子，不吃又怎么办呢？”[50]鞍钢有些工人说，“过去给地主扛活还管饱不限量呢！”“旧社会不好，鱼虾酒肉都能吃着；新社会好，什么都买不到。还不如从前给地主当雇工，也比不上过去的猪狗。”[51]

农民：上海市青浦县农民说，“蒋介石手下受苦，吃饭；毛主席手下享福，吃粥。”安徽省宣城县农民不满道，“什么毛主席，比茅缸板还臭！害得我们饭都没得吃。”[52]江苏省海安县农村儿童传唱一首歌谣：“毛主席，大胖脸，社员饿死他不管！”[53]

高级知识分子：经历过 1957 年反右运动，绝大多数高知都做到了谨言慎行，但在1960-1961 年，中科院仍有一些科学家，因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向组织上提出了出国探亲的申请。[54]

在社会各阶层的普遍不满中，城市低收入群众的不满最为突出。从 1961 年 11 月 15日起，全国各省会城市率先执行陈云有关大量生产高级点心和高级糖果，以回笼货币的指示。当天北京售出高级点心 12.2 万斤，高级饼干 1.9 万斤，高级糖果 12.1 万斤。高级糕点最高价格为 7.6 元一斤，最低 3 元一斤，但数量很少；高级糖果 5 元一斤，最高 16 元一斤；高级饼干分 4 元一斤和 5 元一斤两种。这类高级食品的购买者虽有一般市民，但大多为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 1962 年初七千人大会后，国家将 1960 年 11 月制定的优惠享受副食品供应的范围从高级干部、民主人士头面人物、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一下扩大到 17 级以上中级干部。规定：17 级以上干部每人每月补助供应糖一斤、豆一斤；13 级以上高干，每人每月增加供应肉 2 斤、蛋 2 斤。此举虽然得到中高级干部的普遍拥护，却极大地挫伤了一般干部和广大群众。北京市的一般干部讽刺道，“高薪人员猪肉炒鸡蛋，低薪人员一锅菜叶熬稀饭”，“现在干部分三等，一等是吃肉的，二等是吃糖豆的，三等是喝汤的”。[55]一时间，各种“牢骚怪话”如潮水般涌了出来。

对 17 级以上高中级干部予以副食品补助反映了中央对干部阶层的

体恤关心，正式的说法是："干部是国家宝贵的财产"。[56]1962 年初，对干部阶层的照顾，除了供应糖豆、肉蛋等副食品，还有其它的形式。在北京，"党中央决定举办 17 级以上党员干部学习班"，主要目的，一是"为了统一党内思想"，二是为了让干部得到营养补充。这种学习班带有"保养性质"，"每期两个月"，每天的饭食有"富强面粉的馒头、花卷，有大米饭，还有市场上少见的猪肉、鸡蛋和香肠等荤菜"，"每天的伙食标准一元钱"。[57]（当时，省会城市一般家庭成员一月的最低生活标准是 8-10 元；在全国工资类别最高地区的上海，收入较高的纺织厂工人的月工资一般仅为 40 多元。）[58]辽宁省委照顾干部的方法是，安排他们轮流"住在宾馆，看看马列主义的书，同时改善伙食。"[59]对农村县社基层干部的补助水平，则远逊于大城市。一些省地市县经常以开会为由，让县社一级干部在县食堂补餐，"进城开会期间，三两天有一顿猪肉，开四五天会，可吃两次肉……几天不吃药，肿就消了"，因而许多农村基层干部"最盼的就是到县上开会"。[60]由于干部进城开会，吃住在县城，农民根本不知干部进城开会补养身体的事。

以常理观之，领导层用制度的方式对 17 级以上干部实施照顾，是希望他们努力工作，更好地"带领群众抗灾救灾，恢复生产"。但部分地区却更热衷于借着"照顾 17 级"的东风，将这个门缝越挤越大。据有关资料反映，1962 年上半年，河北省唐山、承德等七个专区，大大突破"照顾 17 级"的范围，规定 17 级以上干部，每人每月供应食糖 1 斤、大豆 3 斤、食油 0.5-3.5 斤，肉 0.5-3.5 斤，鸡蛋 0.5-2 斤，纸烟 2 条，下水 2-3 斤，水产 3-5斤，粉条 3-5 斤，豆腐 3-5 斤。丰南县还别出心裁地将该县 200 余名负责干部分划为"三等九级"。县委书记处书记一级，平均每月吃掉鸡、鸭、猪羊肉 40 多斤，而县委第一书记一个月则分到了 70 多斤肉。[61]

17 级以上干部虽然较群众先吃了一步，或多吃了一些，但毕竟表明现在已经有了可吃的食物。1961 年底，国家增加了城市人口的粮食定量标准。第二年初，虽然还有消极现象——仅河南商丘、开封、新乡、安阳、信阳 6 个专区外流饥民就达到了 32 万，[62]但全国经济形势已出现好转迹象。以浮肿病现象为例，1962 年初江苏省浮肿病人达到 39.3 万人，虽比 1961 年底增加了 8 万多人，但比上一年同期仍减少了许多[63].伴随经济的逐步恢复，城市居民的副食品供应也相应得到改善，代食品逐步退出人民生活领域。促使粮食供应好转的关键因素并不是"粮食食用增量法"和代食品，而是中共中央分别于 1960 年 11 月和 1961 年 6 月作出的恢复农民自留地和解散公社食堂的决定，以及从 1961 年初从国外大量进口的粮食。据统计，仅 1961 年就从国外买进粮食 500 万吨，1962年又进口 300 万吨。增量法和代食品在缓解粮食危机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62 年的国庆节，全国各大城市的节日供应已明显好转。从 9 月 25 日至 10 月 2 日，仅北京市场就销售了脱销两年多的鸡鸭 30 万只。在此期间，北京市民每人供应鲜肉 3 两（平时每人每月肉票限量供应 2 两，多为冻肉），全市居民共购买了 160 万斤鲜肉。[64]北京市一些冷清了多年的著名饭庄又重新红火了起来。"沙锅居"恢复了烧、燎、白煮等32 个品种。门框胡同的爆肚肠、豆腐脑白，菜市口的羊头肉，"金生

隆”的豆腐脑、炸丸头都恢复了供应。高收入者喜爱光顾的“月生斋”的酱牛肉，“普天楼”的扒鸡、叉烧、烧肉，“福玉楼”的酱猪肉也已敞开供应。

然而，美食虽好，却非人人都能享用，在高收入者大快朵颐之时，北京市的一些底层群众却买不起节日计划凭票供应的副食品，致使某些平时难得一见的副食品滞销。9 月 25月至 10 月 5 日，北京市向市场投放了 80 万只鸡鸭，可保证每户居民购买一只，但到了 10月 2 日，仅销售了 30 万只。[65]

但不管如何，几年特大经济困难，终于“尽力设法混过去了”，[66]领导层最担心的情况总算没有发生：几年间，尽管“粮食少，死了一些人，可是没有出大问题，没有出‘皇帝’”（宋任穷语）。[67]全国城市的代食品的噩梦也在 1962 年上半年大致结束。

综上所述，在大饥荒降临之际，发起“粮食食用增量法”和代食品推广运动实乃迫不得已之举。中国历代政府对于饥荒问题都有一套应对方法，到清代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报灾、勘灾制度，朝庭通过放粮、免征、出贷、移民就粟、以工代赈等减轻百姓痛苦。[68]建国后，在五十年代初中期，政府在勘灾、救灾方面也取得很大成绩，但 1958 年的大跃进和接踵发动的反右倾运动破坏了报灾、救灾机制，造成了令人痛心的后果。

1960 年下半年后，当国者逐渐面对现实，却苦于已无粮食可用于赈灾，遂运用意识形态和国家权力全面发起代食品运动，显示出了巨大的功效。在这艰难的几年里，绝大多数干部也能做到与群众同甘共苦，只是百姓尤其是广大农民的克制和牺牲，并没有使最高当国者有所愧疚或改弦易辙，在其戮力坚持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依然长期缺衣少食。农民的吃饭问题，一直要到 1980 年代初邓小平启动农村改革才得以真正解决，其间的教训值得世人永远铭记于心。

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2 年 8 月号总第 72 期

本文的基本资料来自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所藏当代中国史资料，在此谨表示诚挚的谢意！

注释：

[1][2][3][4][7][9][10][11][12][13][15][16][17][18][20][21][23][24][25][26][27][28][32][40][41][42][44][45][46][48][49][51][54][55][61][63] [64][65]引自香港中文大学所藏当代中国史资料。

[5][14][33][62]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中共江苏地方史》第二卷（南京：2001），页 365，365，368，380.

[19]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页 884.

[22]陈敏之、丁东编：《顾准日记》（北京：经济日报社，1997）页 57.

[29][34][67]宋任穷：《宋任穷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页 369-370、368、385.

[3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页 872；另参见杜虹：《20 世纪中国农村问题》（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页 450.

[31]中共中共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页 365.

[35]谢春涛：《大跃进狂澜》（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页 202

[36]杜虹：《20 世纪中国农村问题》，页 458.

[3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北京：中共文献出版社，1996），页 327.

[38]朱正：《小书生大时代》（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页 195.

[39]强晓初、李力安、姬也力：《马明方传略》（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页86.

[43][60]邓自力（邓小平族弟）：《坎坷人生》，（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页156，157.

[47]中共北京市委《刘仁传》编写组：《刘仁传》（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页 409-410.

[50]周维仁：《贾拓夫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页 197.

[52]丁学良：＜革命回忆录之五。我最早遇到的“持不同政见者”＞，载香港《信报》财经新闻，2001 年 2 月 13 日，第 24 页。

[53]王觉非：《逝者如斯》（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页 426.

[56][59]韶华：《说假话年代》（长春：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页 60，61.

[57]金凤：《历史的瞬间——一个新闻记者的回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页 116.

[58]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 11 卷。当代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页 170.

[66]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页 89.

[68]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页 23-25；另参见：袁林：《西北灾荒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4），页 304、307；曹幸穗等：《民国时期的农业》（南京：《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3），页 295-302.

第十一篇　大灾荒与四清运动的起源

近 20 年来，围绕 60 年代初大灾荒与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关系已出版了若干论著，但学术界却较少注意四清运动与大灾荒的关系。本文依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其他相关资料，对这一问题作了初步研究，形成的基本看法是：四清运动虽然初兴于 1963 年，但是早在大灾荒趋于顶点的 1961 年初，四清的基本概念及其措施已相继出台，毛泽东认定造成大灾荒的主要原因是阶级敌人破坏和民主革命不彻底，并着手部署反击"资本主义复辟"。只是由于 1961 年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已陷于极度困难，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事实上将毛泽东有关大搞阶级斗争的指示悬置起来，才未使之演变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1962 年下半年，经济复苏已成定局，毛泽东重拾一年多前提出的那些概念，并迫使中央核心层接受了他的意见。在毛的全力推动下，1963 年春夏之后，四清运动在全国迅速铺开。

一、毛泽东对大灾荒的反应

进入 1960 年，由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引发的国内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已经全面形成，各地普遍出现粮食紧张、人员外流、浮肿蔓延和"非正常死亡"人数激增等现象。但是对于中央领导层而言，这些并非是 1960 年产生的新情况，早在一年前若干省份就曾向北京作出汇报。[1]现在毛泽东要求全国各级党组织注意解决此类问题，并研究了解决问题的对策。

1960 年 3 月，毛泽东针对粮食紧张的问题作出批示，要求全国一切公社推行"用植物秸、杆、根、叶大制淀粉"。[2]毛泽东对"非正常死亡"现象也作出了反应。1960 年 3 月，毛批阅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文件，在山东的文件中有反映该省农村已出现"非正常死亡"的内容。毛批示："这些问题，各省、市、区都有，如不注意处理，定会脱离群众。"毛指出，用召开六级干部会议的方法处理此类问题较好。[3]同月，北京对甘肃通渭事件作出正式判断-自 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2 月，通渭、陇西、和政三县出现大量饿死人现象，中央批转甘肃省委解决通渭问题的意见称：造成事件的原因是机会主义分子与反革命分子搞在一起，"从县到基层都混进一批反、坏分子，干部队伍不纯是发生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4]在此前后，中央也向全国通报了宁夏自治区党委处理中宁事件的意见，认为 1959 年冬到1960 年春发生的中宁县"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宁民主革命不彻底，建党根子不正，党

组织严重不纯"。[5]

面对粮食紧张和"非正常死亡"等现象，毛泽东的态度是"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 他要求解决某些缺点和错误，然而毛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召开六级干部会议一类并不能真正舒缓农村的紧张情况，因为这些会议的主题是贯彻中央反右倾、鼓干劲的精神，诸如坚持社会主义阵地公共食堂等，在"继续跃进"的形势下根本无从解决饿死人的问题。

但是在毛泽东看来，所有这类消极现象都是前进中的暂时困难，不应妨碍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在毛的全力推动下，1960 年 1 月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三年完成《农业发展纲要 40 条》，五年赶上英国，同时着手部署在城市大办人民公社。到了 3 月，杭州会议更号召：实现"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紧接着，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兴办起人民公社。

在全国经济正急剧恶化的形势下，毛泽东的乐观态度客观上助长了省一级领导的新一轮浮夸风。1960 年 3 月，由张平化任第一书记的湖南省委向毛和中央报告：该省群众的福利和健康普遍较好。[7]在由舒同任第一书记的山东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虽然也承认该省存在水肿、饿死人现象，但却把坏事当作好事汇报，这就是，即便有缺点，也是在正确路线上，报告认为全省"当前形势无限好"。 由吴芝圃任第一书记的河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则强调该省如何"深入学习毛著，系统总结大跃进丰富经验"，以及如何提高领导水平云云。[9]吴芝圃向毛报喜讯：河南全省人口 99%已入食堂，办得好的的食堂占总数 66%。吴芝圃且声称该省创造的三级书记进食堂，搞"试验田"的措施，巩固了社会主义的食堂阵地。毛对河南报告大为赞赏，称其"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和科学性的文件"，[10]并表扬三级书记搞食堂"试验田"："这些办法极好"。[11]1960 年上半年，贵州已出现严重的饿死人现象，由周林任第一书记的贵州省委却向毛汇报：全省食堂办得好和比较好的占总数 80%。毛又予以赞扬，说贵州的经验"是一个科学的总结"。[12]

几个大跃进红旗省大办食堂的先进经验使毛泽东大为振奋，他甚至将黑龙江省的经验写成通俗易记的四言诗，诗云："加强领导，全民食堂，猪菜丰富，计划用粮，指标到户，粮食到堂，以人定量，凭票吃粮……"。[13]毛强调食堂问题"极端重要"，表扬豫、湘、川、云、贵、沪、皖等省市做的最好，要求全国学贵州，学河南，"一律照此办理"。[14]

各地的这类浮夸报告是否对毛泽东构成"误导"？笔者认为即使有些影响，也不大，因为毛可以通过各种信息渠道了解全部情况。重要的是，他需要这类报告和经验总结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毛的这种态度对各地影响甚巨，各省纷纷报来缺点、错误已被克服或战胜的消息。由王任重任第一书记的湖北省浮肿和饿死人现象极为严重。1960 年 3 月，黄冈浮肿人数 5 万，却宣布一周后即扑灭水肿 1 万。襄阳竹山县有 5500 人浮肿，一周后传出消息，大部分已被"扑灭"，只剩 80 人。[15]

1960 年 4 月以后，毛泽东在继续鼓动跃进的同时，对狂热的宣传已略有不安。4 月 28日，毛在一份批示中提到：在宣传报道方面，"要善于藏一手"，"防止发生不切实际的浮夸风"。[16]毛的这个批示只是提

到宣传降温的问题，并不涉及已大量出现的"非正常死亡"。

1960 年 6 月，毛泽东似乎开始觉察到，或者是真正愿意面对农村的严重问题，起因是陶铸的一份报告。陶铸认为，解决农村问题的方法是开展一场"三反运动"，即反官僚主义、铺张浪费和形式主义。具体内容为纠正基层干部的违法乱纪、强迫命令一类错误。应该指出，干部违法乱纪确实是造成农村严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这些都是干部在执行上级各种命令的情况下干的，犯下这类错误的干部基本上都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积极分子，仅几个月前，这些基层干部还因有力地执行了上级指示而被表扬和重用。现在领导却将自己责任遮去，而让基层干部"背黑锅"。尽管陶铸未尝不明白造成农村危机的真正原因是政策错误，但他的报告丝毫不敢涉及这个问题。

陶铸提供的广东三反经验将打击矛头针对社队基层干部，其主题与方法和几年后的四清极为相似：运动的对象是农村基层干部；运动的重点是清理帐目、干部退赔；斗争的指导思想是以党的阶级路线来开展三反，即清除出身地富的"成份不好"的干部；打击范围掌握在 3%之内；通过运动，最后促使干部参加劳动。[17]

陶铸的报告既不涉及修正政策，又开出了解决问题的药方，果然获毛泽东赏识，他称赞广东"提出来的问题和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办法是正确的"。[18]

1960 年 6 月后，毛泽东对大灾荒的解释逐步清晰，他认为问题主要是由"五风"造成（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毛的上述判断应该不错，却只涉及问题的现象层面，他所提出的解决问题之道仍是其一贯坚持的大搞阶级斗争的一套。

毛泽东提出在农村立即开展整风、整社，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搞三反运动，同时继续坚持农村食堂。其结果是"三反"与事无补，1960 年 9 月的"八字方针"也不能立即缓解大灾荒，形势进一步恶化，致使部分地区饿死人的现象在 1960 年下半年后已发展到"惨绝人寰"的地步。1960 年 6 月后，河南信阳地区已饿死人达 100 万。[19]10 月 21 日，中组部、中监委 4名干部写出有关"信阳事件"的报告，10 月 24 日，李富春将报告上报毛。10 月 26 日，毛批示刘少奇和周恩来"即看"此件，"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20]"信阳事件"给毛以大震动，次日毛批转胡乔木有关推广小球藻的报告，胡称，"此举可以保证，不饿死人，减少甚至消灭浮肿病。"[21]

面临极端恶化的形势，毛泽东终于同意加大调整政策的力度，1960 年 11 月 3 日，中央下发紧急指示信（12 条），提出全面反五风，允许农民保留小额自留地，允许农民经营小规模家庭副业。在当年夏天的北戴河会议上，毛虽提到"只有大集体，没有小自由不行"，却没有将其变为中央的政策，现在终于明确为具体政策。但是"紧急指示信"仍然坚持农村食堂，此项规定在相当程度上冲淡了有关自留地的精神？

1960 年 11 月，毛泽东开始修正"形势一片大好"的论断，改口说"三分之一的地区的形势不好"，同时毛又明确提出，调整政策后，几个月形势就会好转。[22]毛要将基调先定下来，即解释为何全国部分地区形势不好。

现在毛泽东的解释比 6 月份前进了一步。他说，这是因为这些地区

的"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23]可是有无领导方面的责任和缺失呢？毛争取主动，首先承认自己有错误。尽管 1959 年庐山会议后，中央层已没有任何人敢于提出毛的错误的问题，毛却知道党内外都有一股指责、埋怨他本人的空气，毛预感到自己要承受这股巨大的批评压力。与其让这股"阴风"不断蔓延，不如公开将其挑明。1960 年 6 月，毛在《十年总结》一文中第一次谈自己的"错误"，毛说，他的"错误"在于将过渡时期估计太快，但马上强调："错误不可能不犯"，"有一部分错误大概也是难免的"。毛并没有忘记将其他人捎上，他说，"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的"。 [24]1960 年 11 月，毛在一份为中央代拟的文件里，用第三人称的方式，再次谈自己的错误，言辞和态度都非常恳切。[25]

毛泽东已作"自我批评"，各省大员纷纷表态愿承担责任、为毛分忧。仅仅半年之前，在北戴河会议期间，各省的书记们还不肯检讨，他们非要等中央检讨后，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极为焦急，他耐心启发华东各省的书记率先作出检讨，但是书记们就是不上钩。[26]柯庆施无奈，只能借上海工人之口说，"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对的，一个指头的毛病是出在我们手上。"[27]

毛泽东既已下"罪己诏"，各省检讨报告如雪片般报向中南海，所有的检讨都是一个调门：中央的政策是正确的，地方在执行正确的政策过程中出了偏差。毛泽东心领神会，对这类报告一概嘉许。[28]

1960 年 11 月后，毛泽东焦急地等待各地报来"好消息"，地方领导非常理解毛的这种焦灼心情，迅速报来的各种材料，皆是"12 条"下达后农村一片新气象的内容。安徽省委的报告称，传达 12 条紧急指示信后，全省"人人兴高采烈，生产出现了一片崭新气象"。[29]黑龙江省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开展"红思想运动"，借工人之口说，"现在每月能吃大米白面，有这么多的粮食，真是上天堂了。今后我再也不吵粮食不够吃了"。[30]

此时此刻，毛泽东太需要这类反映"大好形势"的报告，毛更对"乱讲"十分警惕，他同意林彪的意见，禁止军队同志向地方领导反映对形势问题的看法。[31]

1960 年 11 月，毛泽东的心情较为沉重，反映在政策制定方面，也显示出某种理性化色彩。11 月 29 日，毛网开一面，批示免去资本家下放农村，改为下放城市企业。[32]如果沿着这条路继续下去，加大"罪己诏"的份量，可能会加速扭转危急局面，毛也不失为知错即改的"贤君"。

但毛泽东斗争了一辈子，经历了无数风浪，运思是独特的。毛对自己领袖威望变得异常敏感起来，1960 年 12 月 14 日、21 日，他在下发军队的一份文件中亲笔写道："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好好读书，好好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33]毛也将外国左派歌颂他的资料批转给中央和省级负责干部阅读。[34]毛心细如发，完全清楚党内外早已怨气冲天，如果听之任之，极有可能会危及自己的领袖地位。1960 年毛退居二线在中央核心层早已明确，毛已处在相对超脱的二线。尽管一线、二线的界限极为模糊，毛仍象过去一样直接给中央常委和省一级党委下指示，所有的中央决策仍需毛点头，但毛仍不得不多存一份警戒。他只能采取进攻的姿态，大讲阶级斗争。

1960 年 12 月底和 1961 年 1 月 10 日，毛泽东两次批示全国推广辽宁、锦州以阶级斗争解决群众"闹粮"的经验，[35]毛在批转河南信阳地委处理信阳事件的报告时，表扬该报告是"好文件"，[36]信阳地委的报告称，造成信阳事件的根本原因是民主革命不彻底，解决的方法是将整风（阶级斗争）与救灾结合起来，夺回被敌人篡夺的各级领导权，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补课。[37]

1960 年 10 月，陈云在河南省视察，该省已饿殍遍野，而省委领导人竟敢向陈云吹牛说，该省粮食产量比去年增产一倍，不但不需调入粮食，还可调出粮食。[38]两个月后，河南省委竟将责任推到子虚乌有的"阶级敌人"身上，在这之后，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亲赴信阳调查，结论是"干这种事情的，通通是贫雇家（庭）出身的干部"。[39]

1961 年 1 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对死人事作出正式判断，毛指出：地主阶级复辟，各地出了乱子，才意识到这是地主阶级复辟，我们对城市反革命比较有底，对农村多年未搞阶级斗争，没底。[40]在这里，毛不愿直接说"饿死人"，而是说"出了乱子"，且"乱子"是敌人破坏所造成。毛的这个思路，并非产生于 1961 年 1 月，早在一年前甘肃省委关于解决通渭事件给中央的报告中就如是说。在经过一个短时期的思想波动和震荡后，毛又恢复了从容，现在他要从理论的高度来分析这类问题，毕竟和平时期大面积饿死的人现象极其罕见，想绕过去也困难，唯一的办法就是"硬着头皮顶住"。

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将他对形势的判断加以进一步的系统化和理论化，毛指出，全国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中，出乱子的原因在于：民主革命不彻底，地富复辟，勾结坏干部，实行和平演变。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用扎根串联的办法，组织阶级队伍（贫协），开展对敌斗争。[41]阶级斗争的对象有两类：钻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

毛泽东为什么将阶级敌人的破坏视为造成特大困难的主要原因？其一，毛不能接受工作错误是主要原因的分析，这将使自己无地自容，并证明彭德怀意见的正确。第二，毛的思维逻辑也使他相信，造成大量死亡一定是敌人破坏所致，因为他和党是一心为人民谋利益的，干那种坏事的人一定是国民党，或是混入党内的国民党分子。

然而问题还有另一面，尽管在毛泽东巨大的意志壁垒前，中央层无一人敢于站出来讲话，但毛深知不满的潜流正逐渐汇集，毕竟大量死人事是客观存在，除非紧闭双眼。毛知道现在已到了松镙丝钉的时候了。

1961 年 1 月，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1961 年搞个实事求是年，他要求全党各级负责干部下乡搞调查研究，毛且同意把给农民的自留地由原先占公社土地的 5%上升为 7%，同时开放农村的自由市场。

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期间及之后一段时期的决策包含互相矛盾的两个方面。第一，毛明确将农村的危机归结为阶级敌人破坏，并着手布署反击资本主义复辟。第二、毛也同意对农民作出若干让步，毛在向农民让步时，仍坚守住他的意识形态底线，不明确承认是让步，而是称之为"安排城乡人民经济生活"。

毛泽东在 1961 年初的判断和接连出台的措施-既要搞阶级斗争，又

要搞救灾，恢复生产，在实施中带来极复杂的后果：八届九中全会后，死人现象继续蔓延，大抓阶级斗争也无法予以制止，以至出现建国后最严重的危机。

八届九中全会后，各地开始贯彻毛泽东有关反击资本主义复辟，在农村整风、整社、整党的社教的指示，1961 年 1 月，保定市委书记下乡，搞扎根串联，组织贫下中农协会，调查的结果是：基层政权全为坏人当权，贫雇农出身的干部全被地富收买，其根本原因在于土改不彻底。天津的经验是：应对犯错误的干部进行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河北省的经验则认为，出现特大困难的原因之一乃是过去对地富反坏"摘帽"多了。[42]

在特大困难的形势下大搞阶级斗争，并不局限于京畿重地，而是遍及全国各省区。1961年 1 月，湖南省仅在一个短时期内，就有 11 人在运动中被打死和自杀，[43]广东省则在 1961年 12 月，全面展开"民主革命补课"，以至刘少奇需要出来强调，在整风整社中绝不能动用肉刑。[44]

问题在于，即使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了"民主革命补课"，也无法遏止大量农民饿死的现象，残酷的现实是：贫下中农和地富一起因绝粮而死。

1961 年，全国的危急形势已趋顶点，城乡人民普遍因缺少粮食和副食品而浮肿，大批农民自发流入城市讨饭，农村地区卖儿鬻女和妇女弃家出逃现象极其普遍，"非正常死亡"比率急剧上升，据不完全资料反映：1961 年 6 月之前，福建省龙岩地区病人已达 13 万 5千。流入陕西的甘肃妇女，与陕西男子"非法同居"者达 3 万人以上。1961 年夏情况进一步恶化，在大跃进重灾区山东省的聊城、德州、惠民三专区，6 月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 1万 6 千 7 百多人，9 月份即上升到 3 万 5 千 6 百人，到 10 月，仅聊城一地外流讨饭人数即高达 10 万，卖儿女者 985 人，有夫改嫁者 869 人，个别基层组织已完全瘫痪。[45]

就在形势不断恶化的同时，一股微微的暖流已开始在中国农村大地升腾、吹拂。随着中央加速调整政策，特别是解散公社食堂，恢复农民自留地和开放集市贸易后，农村果真出现了转机的迹象，濒临死亡的农民又有了一口活气。在中央或省地调查组的默许下，不少地区的基层干部更向前迈出一步，在自发解散公共食堂后（许多省区的农村食堂因断粮绝粮，在中央下达指示前即自行解体），甚至搞起了"大包干"。1961 年 10 月，贵州这个一年前大办食堂的红旗省，就有三分之二的县实行了包产到户。短短数月，原先死气沉沉的农村，又有了活力，以至于不少城市的工人要求返乡种地。毛泽东最先捕捉到这股经济复苏的迹象，现在他的精神又开始振奋起来。1961 年 9 月，毛在庐山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困难已到谷底，形势一天天向上升。[46]

二、悬置阶级斗争：刘、周、邓、陈的态度

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搞社教的指示，要求以阶级斗争的精神，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刘少奇等不正面反对毛的意见，也在各地部署贯彻毛的指示，但总的说来，是将毛大搞阶级斗争的指示悬置起来而把救灾、调整经济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

刘少奇原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积极支持者。在庐山会议和八届八

中全会上，刘少奇全力支持毛，虽有资料反映，刘对在全国开展反右倾运动有所保留。[47]但从庐山会议后至 1960 年上半年，刘在公开和私下场合都和毛泽东保持一致，进入 1960 年下半年，刘少奇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刘在继续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原先与毛完全一致的调门，渐渐也夹杂了某种"杂音"。

刘少奇在 60 年代初已全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完全知道国家已陷入严重危机，他也了解问题症结之所在，更知道自己作为中央第二号人物对此应负的责任。因此刘在 1960年极为谨慎，说话、办事都小心翼翼，竭力照顾、迁就毛泽东。

1960 年 6 月，刘主持各大区、各省市负责人会议，指出半年以来问题严重，却将"粮食问题，浮肿病问题，非正常死亡问题，事故问题，计划完成情况的问题"放在一起讲，[48]以减缓讲话的冲击力。1960 年 9 月，中央虽然通过"八字方针"，但在落实、贯彻方面却显得迟缓、无力，"始终没有摆脱'跃进'的架势"，[49]以至数月后，仍看不出成效。刘少奇在谈到"非正常死亡"时更是极为小心，他说"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饿饭"，[50]尽量使语言不那么尖锐。

虽然刘少奇已为毛做了不少开脱的工作，但他作为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人却不得不每天面对各地如雪片般报来的灾情报告，在这种严峻的形势前，刘的心情愈益沉重。1960 年6 月 10 日，刘少奇首次针对毛的著名的"指头论"（成绩是 9 个指头，缺点、错误仅为 1 个指头）发表了看法，他说"现在是一个指头，将来可以慢慢扩大到两个指头，三个指头"。[51]1961 年 3 月，刘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一方面讲"有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另一方面，又情不自禁地检讨起中央决策的失误。刘说："中央有些政策，决定前缺乏很好的调查研究，根据不够，决定以后，又没有检查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52]刘少奇这番话，带有自我批评的含义，却容易引起毛的疑心，因为多年来，"中央"即是毛，除了毛可自称中央，毛以外任何人，包括刘，皆不可以中央自居。他们以中央的名义起草的各种文电，也须报毛批准后才可下发。因此，刘的这番言论，已构成对毛的"压迫"。

形势日趋困难，对刘的态度变化有决定性的影响。1961 年 4 月，刘亲赴家乡蹲点，对形势的严重性有了完全彻底的了解。八届九中全会后，毛又去了南方，由刘少奇在京主持日常工作。刘少奇加大了政策调整的力度。

1、同意陈云建议，从国外紧急进口粮食，以舒缓空前严重的粮食危机。2、支持陈云有关减少 2000 万城镇人口的建议，以减轻国家对城市的沉重负担。3、主持罢免了一些"非正常死亡"现象严重省份的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1961 年，河南的吴芝圃、山东的舒同、甘肃的张仲良、青海的高峰等皆被免职，调作较次要的工作。刘甚至提出对一些罪行严重的地、县负责干部应加以逮捕法办。

刘少奇的上述举措十分有力，进口粮食和罢免浮夸官员在相当程度上挽回了已被严重损害的共产党的威信。刘在与毛共事的几十年中，既有顺从、畏惧毛的一面，也有提出并坚持自己看法的一面，这是刘少奇政治性格的特点。1959 年 4 月，刘接任毛做了国家主席，1960 年后，

毛有所消沉，暂时做了"甩手掌柜"，默许刘少奇等对过往政策进行适当调整，又使刘的活动空间得到进一步的扩大。

刘少奇态度的变化对核心层其他领导人具有极重要的示范作用，周恩来受到很大的鼓舞。在历史上，周与刘并非一路。1956 年，周、刘联手反冒进，引致毛震怒，两年后，毛在领导层中批周恩来，却放过了刘少奇，使周从此格外小心。周为国家经济的总管，完全了解实情，1960 年后更是为调粮、救灾日夜辛劳，11 月，周又担任了中央瓜菜代领导小组负责人，但周知道此事的全部复杂性和微妙性。在那几年，周十分注意与毛保持一致。1959年 11 月，周说：人民公社有缺点是难免的，是不到一个指头的问题，而且毛主席已经纠正了。[53]1960 年，安徽饿死人已经成了半公开的秘密，3 月 29 日，周将反映安徽死人的群众来信批转给曾希圣："也许确有其事，也许夸大其辞"-面对毛的这位爱将，周尽量把话说的四平八稳，但周批语的主调仍是要曾希圣加强注意，派人前往调查，并要求曾将调查结果报周。[54]

在这之后，毛泽东有关对农村情况的判断已经形成，周迅速跟上毛的口径。1960 年12 月 6 日，周带中央草拟文电，针对山东、河南、甘肃、贵州等几个饿死人最多的省份出现的严重情况，指出："其中某些反革命的破坏行为显然是封建势力在地方篡夺领导，实行绝望性的、破坏性的报复"，周强调，"这是农村中阶级斗争的最激烈表现"。[55]周对毛的认识太深，从内心深惧毛，因而周一般不会主动向毛提出任何有关涉及全局纠偏的建议。1960 年 8 月，周对李富春提出的纠偏方针，"整顿、巩固、提高"加以修润，将"整顿"改为"调整"，增加"充实"一句，使其成为著名的"八字方针"。这一改动使"八字方针"显得温润、委婉，照顾到了毛的情绪。

然而周恩来的现实主义毕竟占主导，只要刘、邓愿意领头，周马上响应。1960 年 3 月24 日，在毛主持的常委会上，邓发言批评报刊上对毛思想的宣传庸俗化，周当即表示赞成邓的意见。[56]但周仍十分注意分寸，在涉及重大政策调整时极为谨慎，一定要等毛愿意转弯或核心层已取得一致意见后，才表明自己的态度。据《江渭清回忆录》披露，1961 年2 月，毛在杭州开往绍兴的专列上，与几个大局书记和华东几省的第一书记叙谈，柯庆施顺从毛意，大谈公社食堂的几大好处，毛听的"眉飞色舞"。毛转而征询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的看法，江渭清如实反映农民急盼解散食堂。毛当即要在座的周恩来表态，周答曰：渭清同志讲的有道理。于是毛发话，要江渭清先把江苏的食堂解散。[57]但周毕竟十分了解毛的个性，毛完全可能转眼间不认帐，因此周在解散食堂问题上并没有自行采取措施。1961 年 3 月后，中央核心层领导纷纷下乡调查，基本都倾向解散食堂。周在邯郸调研一周，5 月 7 日，亲自就食堂问题向毛电话汇报，建议解散食堂。但毛却不在周的电话汇报记录上明确表态，只是批示转发下去，供各地同志参考，以后由于刘少奇等强烈要求解散食堂，毛才在 1961 年 5 月 - 6 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同意，是否参加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

与周恩来的小心翼翼相比，邓小平因受毛信任而显得敢说敢为。邓在核心层中处于重要地位，周恩来一向对邓小平十分尊重，不仅表现在对邓工作上的支持，更反映在对邓的党内地位的肯定和强调方面。1960

年 3 月，周在一次谈话中提到"整理毛泽东思想……更重要的是靠少奇、小平同志这样党的领导人来总结"。[58]1960 年后，邓的主要工作是主持中苏两党谈判，但他仍将很大的精力放在国内工作方面，邓深知国内问题的严重性质，全力支持刘少奇，1961 年邓批评八字方针贯彻不力，主张"退够"。邓虽表态支持毛搞"三反"，同时又提出开展三反应放农闲进行，被毛接受。[59]

在毛的眼中，陈云一直是一位"老右倾"，60 年代初，柯庆施因知毛泽东对陈云的冷淡态度，竟也敢在华东散布陈云是"老右倾"的议论，[60]1958 年北戴河会议后，陈云因遭毛批评而告病休息。一年后，陈云又向毛表示自己的意见，再次受到冷遇。1959 年庐山开会前，陈云在大连休养，他已有所预感，因而没有参加会议，他劝正在大连休养的邓子恢也不要去，事后，邓子恢十分感激陈云的提醒。[61]1960 年后的特大困难全在陈云的估计之中，但他并没有显出任何事前诸葛亮的态度，而是埋头做具体工作。1960 年的调整方针得到陈云的全力拥护，同年底，陈云提议，动用外汇进口粮食，周恩来原准备进口 150 万吨，陈云要求增加进口量，经中央同意改为进口 250 万吨。在刘、周、陈、李先念的努力下，1961 年 1 月，从澳洲进口的第一批粮食抵达天津港。3 月，周又给毛写信，请求批准进口500 万吨粮食。1961 年 8 - 9 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云复向毛建议，可否通过法国转口购买美国粮食，得到毛的批准。在饥馑遍地的非常时期，这些从国外进口的粮食拯救了许多普通人的生命。

在中央核心层中，朱德的政治影响力最为虚弱，朱德在 1959 年庐山会议上受到毛的批评。10 月，毛将朱德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检讨批转给全国县团级党委。1960 年 3 月，朱德在其老家四川仪陇与父老同喝食堂"清薄的稀饭"，"难过得许久说不出话来"。[62]在大灾荒期间，朱德在中南海挖野菜，对国内的灾情忧心如焚。尽管他每年多次下基层，"对中央内部的事情却知道甚少，他也不打听"。[63]

朱德身为政治局常委，许多事情不知道，彭真不是常委，却了解全部情况。1960 年后，北京作为首善之区，也出现了极严重的困难局面。彭真作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对大跃进的不满逐渐明显，1962 年 1 月，甚至在小范围内讲话，径直要求毛做检讨，他说，"如果毛主席的错误的 1%、1‰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64]

常委之外的政治局一班人都知道国家已进入非常时期，但他们只能听常委的，而不能自行做任何事。陈毅对华东熟悉，华东几省的领导人，不少是其老部下。困难时期，江浙情况尚非特别严重，还可接待外宾参观南京、苏州、杭州等少数城市，陈毅陪外宾来华东，曾私下向他的老部下询问灾情，却无人敢于向陈毅反映真实情况。[65]

几个中央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东北局）、刘澜涛（西北局）、陶铸（中南局）、李雪峰（华北局）直接面对基层，承受压力很大，在那几年，都全力救灾。只有华东的柯庆施和西南的李井泉依然故我。李井泉在大跃进期间极为活跃，与长江下游的柯庆施互相唱和，及至 1960 年后川北大量饿死人，四川还多运粮食支援外地。[66]柯庆施则比李井泉幸运的多，他的直接领地上海，郊县虽有农业人口，但因依托上海，不致出现"非正常死亡"，所以柯庆施可以继续欢唱跃进曲。

刘、周、邓、陈为中央决策的错误而导致百姓无谓牺牲而感到很深的愧疚，1962 年夏，刘犯忤向毛进言，要求放宽政策，刘甚至对毛直言：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67]据邓力群回忆，1962 年春，刘在与他谈话时也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其时，刘"情不自禁，愤愤地说：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68]刘少奇等都是务实的领导人，一旦毛泽东稍稍松手，他们的务实精神马上就解放出来。刘、周、邓、陈的态度完全表达了全党绝大多数干部的意愿。1960 年后，许多高干目睹人民受难，心中痛苦，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前往信阳调查，返京后与妻抱头痛哭。[69]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1960年后眼见安徽大量非正常死亡，感到无限愧疚，遂支持包产到户。在这几年，省、地、县一级的干部普遍患上了浮肿病、肝肿大，一些干部的家属甚至也在大灾荒中饿毙。一些地委书记、专员"每每为灾民号啕大哭"，"机关里是一座座空房，全部下乡救灾了"。江苏省长惠浴宇为救灾"心力交瘁"，自陈已成了"灾官"、"赈官"。[70]

中共历史上长期战斗在农村，许多高级干部都有"民本"情结，1960 - 61 年对他们的刺激极深，"一想起来就胆战心惊，夜不能寐"，因为"灾区人民的凄惨，付出的牺牲，竟比战争年代还要多"，而他们都清楚，"这完全是无谓的牺牲啊"，[71]以至陈云慨叹，中国人民实在好，"饿死人（也）不想起来造反"。[72]

六十年代初，刘、周、邓、陈的一系列举措证明，他们与那些高蹈的"理想主义者"和"革命巨子"（鲁迅语）并非一类，他们对大量百姓的"非正常死亡"常怀不忍之心，由此，刘少奇等才能从过去对毛的无条件服从中解脱出来，回归到常识理性。刘少奇在这一阶段总揽全局，地位举足轻重，是他在建国后对国家、民族、百姓贡献最大、出力最多的时期。然而正因为如此，毛对刘的不满也在急剧增长。

三、重新回到阶级斗争

毛泽东认定"12 条"、"60 条"、"4 条"下发后，农村情况肯定好转，从这点讲，毛的判断不错，但是灾荒太大，恢复极缓慢，从 1961 年庐山会议后至 1962 年春，各地饿死人现象仍未完全中止。与此同时，许多基层干部的极左已积重难返，对中央纠偏政策大打折扣，使中央精神难以全面落实。毛对这些明显估计不足，陈云在其家乡上海青浦调查即发现，当地干部迟迟不愿执行中央给农民放宽自留地的政策。[73]

从毛泽东的角度讲，他已作出相当的让步，凡所能退让的，他都让了。这对自尊意识极强的毛，已诚属不易。1960 年后，毛在若干文件上删去"毛泽东思想"，他也解散了过去一向坚持的公社食堂，毛甚至批准从国外进口粮食，对包产到户，在一段时间里，毛也没明确表示反对。

毛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在 1961 年没太具体过问刘等的纠偏，毛不吃肉也在这个时期。但是从内心深处，毛不认为自己有何大错。死人事固然不好，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事是经常发生的"。在这一点上，毛的知音惟林彪数人而已。1960 年春，林彪来南京，江苏省委领导向其汇报已出现群众饿死的严重情况，林彪开导他们，"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死几个人算什么"。[74]

可是饿死人毕竟不是好事，正是因为饿死人现象太普遍，毛避"黑

暗"犹如避鬼神。在他看来，所有有关"黑暗"面的报道都像一把利剑指向自己，毛用坚强的意志为全党定下调子，不许乱讲，凡乱言饿死人事，一律以攻击三面红旗论处。1961 年 3 月 23 日，毛亲笔修改文件："中央认为最近几年建设成就是伟大的，证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只是在"具体工作"方面发生一些缺点和错误，造成了一些损失。[75]所以当陈毅南下时，其老部下也不敢向他直言。徐子荣虽亲眼目睹信阳惨状，只能在家痛哭，而不敢在正式场合吐露一句真言。

毛泽东认为，在严重的困难面前，党内普遍已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发生了"动摇"。1962年夏，毛在中南海游泳池当面叱责刘少奇，"顶不住了，看我死后你怎么办！"[76]毛认为"修正主义，被打倒的阶级复辟或企图复辟，特大的天灾，以及一段工作和斗争中的困难，挫折等等，一切都不可怕"，[77]而毛相信，唯有他才能力挽狂澜。毛的方法，概言之，就是"硬着头皮顶住"。其具体内容有三：

1、坚持对形势的乐观估计。毛告诉全党："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形势正在好转，问题正在解决。[78]1961 年 12 月 29 日，毛批转钱昌照等歌颂农村五谷丰登的诗，以说明农村出现的一片繁荣景象。[79]1961 年，毛将"纸老虎"的论断再次搬出来，以鼓舞全党、全民战胜困难的意志。

2、毛知道刘等在内心中已对自己有怨言，他抓住调查研究一事，向刘等反击。1961年 3 月 13 日，毛给刘、周、邓、陈云、彭真写信，他先争取主动，表示"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随即批评刘等对公社内部的关系"至今还是不甚了了"。毛咄咄逼人道，"不是吗？我说错了吗？"[80]

3、毛看到刘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不仅毛刘领袖像已并列，有关方面还在编辑"马恩列斯毛刘论述"，"一国二公"几成定局。毛加紧批转各类文件，以维持自己在党机关的领导权威和影响力，1961 年，毛给李井泉写信，要求各省市第一书记"发善心"给他写信，他许诺自己一定给他们回信。[81]

4、关心林彪健康，[82]扶持林彪抗衡刘少奇等。

5、强调阶级斗争。毛从另一个角度来谈自己的缺失，即自己对阶级斗争抓的不紧-"见事迟，抓的慢。"[83]

然而全党上下埋怨，批评的压力太大，毛泽东在 1962 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讲了几句带自我批评的话，他甚至在讲话中称赞陈云搞经济内行（正式稿中删去）。七千人大会后，毛离京南下，对刘少奇等的不满已越积越深。

毛泽东敏锐地发现，由刘少奇主持的纠偏已愈走愈远，不仅涉及经济、文教、外交、统战，甚至延伸到了公安领域，在这种大气候下，对毛不满的潜流已在全党上下广泛蔓延。

毛泽东同意调整，但不容对三面红旗有任何涉及。毛长期以来就一直对刘少奇有怨气，1956 年中共八大通过的新党章删去"毛泽东思想"一词给毛造成"极大不愉快"，刘等从而"得罪了老人家"。[84]站在毛的立场，刘旧错未改，又添新错，且都是错在重大原则问题上。1961 年 7 月 17 日，刘在沈阳说，"三面红旗可以让人家怀疑几年"。[85]7 月 19 日，刘在哈尔滨又说"有人怀疑三面红旗是可以理解的"。[86]在当时的

形势下，毛不得不同意退让，但对刘的不满已形之于色。1961 年 5 月，毛就降低指标事讲话，他说，降就降，"无非是外国人骂我们不行"。[87]

刘少奇等主持罢免浮夸干部一事，也给毛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1960 年月 11 月 28 日，毛以中央名义表示，"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88]刘少奇当然知道投鼠忌器的道理，但为了整肃纲纪，还是罢免了几个毛的爱将的职务：吴芝圃先降为河南省长，继而转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的闲职；舒同也调任西北局书记处书记，实际上在家赋闲。刘极注意分寸，1962 年前对曾希圣毫无动作，李井泉、王任重也照做他们的原职，但还是引起了毛的不快。毛尽管同意惩处某些地、县级干部（柯庆施下令逮捕死人较多的江苏宝应县委书记），[89]但不愿对他们太动真格。1961 年 1 月中央拟定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条文，原有"保护人民安全，打人要法办，打死人要偿命"、"保护人民自由，随便罚人、抓人、关人、搜查要法办"等内容，被毛批评为"太复杂……有几条执行起来可能起反作用"，结果被改成"同劳动同食堂"，"办事公道"等一团和气的文字。[90]

使毛最不能容忍的是刘少奇讲话中流露出的那股"算帐"的意味。刘的许多话在毛听来，句句犹如赫鲁晓夫的"黑报告"。1962 年 3 月，刘召见公安部长谢富治等谈话，要求公安部总结几年来打死人命，伤害无辜群众的教训。刘说，"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91]刘的这番话已涉及毛统治最敏感的部分，事后，刘觉得不妥，坚决不同意公安部党组印发他的这番讲话。他说"将来会出毛病的"。[92]1962 年冬春刘少奇加大了对大跃进以来错误的批评，刘的态度有广泛的党内基础，七千人大会精神传达后，许多基层党组织成员对七千人大会不承认犯了路线错误极为不满，江苏省参加省委扩大会议的一些代表甚至呼吁中央为彭德怀平反。[93]江苏省常务书记刘顺元也不同意所谓错误在于"天灾"和"民主革命不彻底"，他说："复辟那有这么大的面，硬是五风严重，那里是什么天灾，是什么民主革命不彻底呀！"[94]刘顺元放言：根本问题是出在"君臣相见"。[95]所有这些在毛眼里都被认为是"尖锐的指向"他个人的。

刘少奇在 1962 年上半年不断谈形势的严重性，也使毛愈来愈相信，刘是心怀叵测。对于形势问题，早在 1961 年 9 月庐山会议上，毛就下过明确的判断，然而刘少奇却自说自话。庐山会议前，刘在 5 月 31 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第一次讲"三分天灾，七分人祸"。5月 24 日，刘试探性地提出"现在，是不是要提出反'左'的口号"，[96]刘虽然迫于毛的压力，未能公开提出反"左"，但刘的语言愈来愈尖锐。1961 年 8 月 28 日，刘在庐山会议上插话，提到"整个国家要破产、垮台，国民经济要崩溃"。[97]刘更谈到，"如果搞不好，我们要跌下台"一类的话。[98]从七千人大会到 1962 年上半年，刘几乎逢会必讲困难形势，在 2 月的西楼会议上，竟出言不慎，自称是"非常时期大总统"。[99]直到 5 月，还认为"国民经济要崩溃"。[100]尽管刘所述的困难皆是事实：1962 年初，国内情况仍极其严峻，仅河南省6 个专区统计，外流人口就达 32 万人。贵州省的断炊户达 1 万多户。[101]四川省直到 1962年 3 月底，还有 1 千多高炉，占用 9 万多职工。[102]但以毛的敏感观之，则会得出

另一种判断："非常大总统"已不安于份，无非是以讲困难为由，逼毛彻底交权！

毛泽东可以接受刘少奇"形而下"的纠偏，他本人在 1960 年下半年后也亲自做了一些调整政策的工作，但绝不容许纠偏涉及"形而上"，因为"形而上"已与毛水乳交融，稍一触及，就有可能导向对毛权威的怀疑。1962 年上半年，刘主持的纠偏，已逼近"形而上"。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口头报告提到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陈云在七千人大会陕西代表团会上有关党内缺乏民主的讲话-陈云说，这几年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逢人口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103]周恩来、陈毅 3 月在广州会议上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种种迹象表明，刘等已开始全面修正毛自 1958 年以来的路线。

毛泽东已看到经济形势全面趋向好转，他心中有数，虽然还有"非正常死亡"，但最危急的时期已经过去。蒋介石在 1962 年夏叫嚷反攻大陆，但蒋的底线毛完全掌握，毛、周急电参加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中方代表王炳南飞京，再返华沙向美国大使摸底，知肯尼迪政府反对蒋介石反攻大陆，所以当陈云以对付蒋反攻为由，要求毛批准分田到户（刘、周、邓均同意陈云的意见），毛根本不能接受。[104]

因此，1962 年上半年，毛开始将其态度逐渐明朗化。1、毛不同意周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即使周多次请毛表态，他就是不答复。毛得到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支持，陆虽然私下对大跃进有异议，但在人民公社和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上与毛基本一致。[105]2、毛不同意实行包产到户，虽然刘、周、邓、陈都倾向于支持邓子恢的意见，但陶铸、胡耀邦等党内许多高干都对包产到户持反对意见，甚至连彭德怀也反对。3、在毛的影响下，党内刊物大量刊载歌颂斯大林的文字。1962 年上半年，毛基本住在南方，密切注视着刘等的一举一动，他守住底线，准备反击。

1961 - 62 年，刘少奇因力主实事求是，正视困难，其个人威望得到大幅提高，尽管刘具事实正确，却因毛独享"解释权"，而不具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刘在 1962 年春之后，同意"三自一包"，但只是私下流露而未有自己的解释，刘只能默认地方悄悄干，不是"光明正大"。毛却师出有名，名正言顺，因为从 1961 年以来，党内的主流意见一直是批判三自一包，刘自己长期也是持这种观点。1962 年的"七千人大会"，其议题之一即是批评"三自一包"，会后中央明令安徽省委取消"单干"。2 月，新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在省常委会议讲话，转达刘少奇对安徽责任田的意见，刘认为责任田"要走回头路，这是很明确的"。[106]3月，北京已在内部批评湖南 5 县"刮分田黑风"。[107]刘少奇已将自己置放于一个尴尬的境地。

刘主持对过往政策的全面调整，但八届九中全会要求，"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对刘有着很大的约束力。1961 - 62 年，虽然刘主要抓经济调整，但党内也一直在讲"民主革命不彻底"，刘少奇已被毛和自己双重封住嘴。

1962 年 8 月 1 日，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再版，他试图在毛思想的大框架下，搞出自己的新解释，但是马上遭到毛的还击。8 月 6 日，毛开始谈"阶级、矛盾、形势"，一旦毛反击，刘除了接受毛，

别无其他选择。在北戴河会议期间，刘少奇言语不多（姚依林称"刘一言不发"，周恩来则被攻击严重），[108]毛既已开口，刘、周、邓、陈还能说什么呢？除非顺着毛的话说，刘平静地接受毛大搞阶级斗争的决策，仅向毛进言，搞阶级斗争勿影响经济调整，得到毛的同意。

八届十中全会后，形势逆转，只有最具敏感的人才知道应激流勇退。1962 年 8 月，陈云告病休息，1963 年胡乔木称病，开始长期休养。同年，曾被毛钦定的"老右倾"，江苏省委常务书记刘顺元经其老友，中央委员郑位三的点拨也主动隐退，[109]以后他们皆渡过文革劫难。

1962 年 10 月后，各省都已调整好姿态，纷纷按照毛泽东的新调门，向北京提供各地阶级斗争尖锐，资本主义严重复辟的材料，四川、山东甚至已将困难时期出现的"反动儿歌"的资料搜集完毕，[110]下一步就是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 年初，湖南零陵地委"大揭阶级斗争盖子"的经验问世，4 月，河北邢台经验上报-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平地掀起，是为"四清运动"，其主调就是"资本主义复辟，民主革命不彻底"，其方法就是"扎根串联"，只是距毛首先提出这些口号已推迟了两年。

（原载《二十一世纪》第 60 期）

注释：

[1]1959 年部分省区就有饿死人的报告。1959 年初，南京远郊的句容县宝华公社两个大队就有饿死人现象，高淳县在 1959 年饿死 1529 人。见丁群：《刘顺元传》，（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页 312。江苏宝应县从 1959 年冬到 1960 年 4 月，共死亡 35391 人，绝大部分为缺粮而死。1960 年春，中央粮食部门和江苏省委曾分别派工作组前往该县调查。见《70 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页 448。

[2][3][7][9][10][11][12][13][14][16][17][18][20][21][22][23][24][25][28][29][31][32][33][34][35][36][37][46][59][75][77][78][79][80][81][82][83][88][90][10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9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 71；98；40；64 - 65 注释 1；100 - 101 注释 2、3；59 注释 1；58；72、74 - 75 注释 3；44、45 注释 2；68；69、71；161；207 - 208 注释 1；207；326；327；349 - 50、352 - 53；349；215；364 - 65；364、366 注释 2、368 - 69 注释 1；页 334 - 35 注释 1；356 及注释 4；374；384；14、262、264；402、419 - 20 及注释 1；406 - 407；408 - 409 注释 3；页 555 注释 1；页129 注释 1；页 458；425；517；619 注释 1；440 - 41；484；487；465；364；418 - 19；436 注释 4。

[4][15][27][30][40][41][42][43][45][101][107][110]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所藏当代中国史史料。

[5]李树杰：《谈"中宁事件"》，载《宁夏文史资料》，第 21 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页 110。

[19]徐明：《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载《二十一世纪》，总

48 期，页 45 - 46。

[26][74][89][93][94][95][109]《刘顺元传》，页 329；315；321；343；335；344；352。

[38][49][72][73][87][103]孙业礼、熊亮华：《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 192；232；224；224；219；233。[39][68]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页 107 - 108；121。

[44][48][50][51][52][85][86][91][92][96][97][98][10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 - 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 510；488；525；489；509；530；531；551；552；524；538；530；555。以下简称《刘年谱》。

[47]《刘年谱》，下卷，页 458。另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页 15；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页 103、105。

[53][54][55][56][10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 - 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页 269；299；377；296；468。

[57]《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页 454 - 56。

[58]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 4 册，页1537。[60]顾复生：《红旗十月满天飞》，孙颔序，载《江苏文史资料》，第 100 辑，（南京，《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7），页 5。

[61]《邓子恢传》编辑委员会：《邓子恢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页 535。

[62][63]朱敏：《我的父亲朱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页 304、401 - 402。

[6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页 1026。

[65][70][71]惠浴宇口述，俞黑子记录整理：《朋友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页 215 - 16；213；212 - 13。

[66]姚锦：《姚依林百夕谈》，（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页 160。另见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二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 313。

[67]《刘源、何家栋谈刘少奇与四清运动》，见《南方周末》，1998 年 11 月 20 日。

[69]陶驷驹主编：《徐子荣传》，（北京：群众出版社，1997），页 253。

[76]《刘源、何家栋谈刘少奇与四清运动》，见《南方周末》，1998 年 11 月 20 日；邓立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页 133。

[84][104][108]姚锦：《姚依林百夕谈》，页 153；165 - 67；167。

[99]姚锦：《姚依林百夕谈》，页 165；另见《刘年谱》，下卷，页 549。

[106]刘以顺：《毛泽东在安徽推广责任田的前前后后》，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 54 辑，（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5），页 117。

第十二篇　北京政争与地方——释读《江渭清回忆录》

最近，曾在 50-60 年代长期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江渭清出版了《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一书，该书约一半篇幅叙述作者在 1949 年后的经历。其中有关反右运动、1959 年反右倾运动和文革前夕他卷入毛泽东与刘少奇争执的相关叙述，是最有价值的部分，为研究者探讨这些重大事件、研究 50-60 年代北京与地方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一

50-60 年代，华东地区的几个省委第一书记在全国一直比较活跃，江渭清是知名度较高的一个。对于省一级「第一把手」的任用，在毛泽东的「领导学」中始终占据中心地位。毛依据对干部个人历史和政治忠诚的观察和了解，特别是他本人与干部接触的经历，来决定他对干部的取舍和任用。由于华东地区在全国处于最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对于华东地区大员的任用，相比于其它地区显得更为重视。

毛泽东与华东地区的几位省委第一书记早在红军时期均已相识，与主政浙江的江华等相比，江渭清虽与毛泽东渊源较浅，但是江与毛的老部下谭震林关系密切。谭震林与毛泽东有极深的历史渊源，数十年深受毛的信任。1952-1954 年，谭震林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日常工作，是华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江渭清作为谭震林的部属，也相应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重用。1953 年江苏建省，次年江渭清就成了江苏第一号人物，一直到1966 年。

50 年代初、中期，中共党内除了发生「高饶事件」外，总的情况相对平静，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模式已基本形成，毛泽东等以各种文件、电报、批示具体指导地方工作，地方则以相应的文件、电报向北京请示、汇报。中央领导人还通过对各地方的视察，对地方工作加以监督和检查。

毛泽东一向偏爱华东，50-60 年代几乎每年都来江浙。在毛泽东视察江苏期间，江渭清与毛接触频繁，得到毛的赏识。江渭清主政江苏，一向以稳健为原则，然而做事谨慎的他，在 1957 年的反右运动中却差一点栽了下来。

1957 年 7 月上旬，毛泽东不辞酷暑，来到以「火炉」闻名的南京，亲自为抓右派找部分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雷霆震怒，对江渭清不在省委常委内部抓右派大发怒火，据江渭清回

忆[1]：

毛主席问：「你们江苏省委书记、常委里头，有没有右派？为什么不反？」我回答说：「主席啊！哪个人没有几句错话呢？您老人家说的嘛，十句话有九句讲对，就打 90 分；八句话讲对，就打 80 分……」毛主席大概没料到我会这样回答，顿时生气起来。他拍着沙发边的茶几，说：「你到底反不反右派！」

江渭清以当事人身分的这段描述，将毛泽东当年的神态生动地呈现在今天的世人面前，这是迄今为止，极少的近距离反映毛泽东在反右期间行为的珍贵文字。

毛泽东为何以「一党之尊」和「一国之尊」的身分，直接干预一个省委内部的反右派运动？毛判断江苏省委常委内部有右派的依据是什么？江渭清在他的回忆中均无交代，也没有提供任何有关地方干部给毛「打小报告」的线索。毛泽东的判断究竟是源于某种理论推论，还是起于一时的兴之所至，从江苏的事例看，似乎两者兼而有之。

1957 年夏，就在毛泽东赴南方推动反右运动之际，北京已开始大抓党内右派，但是在中央与国家机关的党内正副、部级的实职高干中，尚没有大抓右派。这或许使毛泽东有所不满，希望从地方领导干部中抓一批右派，以证实自己「党内外右派配合向党进攻」的论断。然而，江渭清的圆熟帮助他避开了毛泽东的进攻。据《江渭清回忆录》记载，当时他是这样应对毛泽东的：

「要反右可以，请您老人家下令把我调开，另外派人来。因为是我先『右』嘛！您先撤了我，让别人来反」。

听我这么表态，毛主席倒消了气，说：「那好嘛，你就不要反嘛！」他还带着幽默的口吻说：「渭清啊！你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回答说：「主席啊！我是舍得一身剐，要为您老人家护驾。」

上述的一问一答，颇真实地反映了 50 年代毛泽东的精神面貌。经常有意无意以「皇帝」自居的毛泽东，在特殊情况下，也有纳谏的「雅量」，但是，关键要看是谁进谏、进谏的态度和涉及的问题。江渭清态度恭敬，虽有口角顶撞，然而其私心只是为了保护部属，毛对江渭清向有好感，知他绝非蓄意抗上，也就顺水推舟，不再当场抓住他不放了。然而，毛的「大度」并不表明他可容忍对自己权威的任何冒犯。在主持召开了全面部署反右派的青岛会议后，毛泽东派出了反右钦差大臣彭真和康生[2]， 分别坐镇南京和苏州，具体指导江苏的反右运动（康生指导江苏反右运动一事，在《江渭清回忆录》中被略去）。

彭真与康生各自负有不同的任务，彭真的使命是督导在江苏省委内部抓右派，康生则是负责在江苏文艺界抓右派，对于这两位直接由毛泽东派出的中央大员，江渭清的反应也相应不同。

彭真在中共八大以后地位上升，其实际权责近似党的副总书记。彭真在来宁前，毛泽东曾当面交代说：江渭清「右」，但是毛又要彭真个别向江渭清打招呼，表明他并非有拿下江渭清之意。

江渭清极为聪明，他请求彭真在江苏省委常委会上讲话，传达毛泽东对自己的批评。彭真当着在坐的常委不好明说，只是含混问道：「江苏为什么不打右派？江苏有没有右派？」面对彭真的指问，江渭清回

答：「有右派啊！不过我还没有发现。」

江苏省委内部的反右运动，最后以批评几个厅级领导干部的「右倾」而最终「过关」。在反右运动中，江苏省委常委和各地市县主要领导中没有抓一个右派，这全依仗江渭清的保护，这也说明，即使在党内高压气氛浓厚的年月里，省一级地方领导人在执行北京政策的过程中，仍有一定的弹性活动空间。对这个活动空间宽严尺度的掌握，往往取决于「第一把手」的个人意愿和态度。与江苏情况形成对照的是，由江华任第一书记的浙江省，把省长沙文汉和其妻陈修良（时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双双打成右派；由曾希圣任第一书记的安徽省，把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世农也打成了右派。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江渭清当年所要保护的仅是党内各级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一般干部则不属这个范围。康生坐镇苏州查办右派所获的「战果」是「揪出」了一个名曰「探求者」的「右派集团」。「探求者」是由一些江苏青年作家在 1957 年春自发组成的文学社团，仅存在 18 天。据长期担任江苏省省长的惠浴宇回忆，当时江苏省委曾召开常委会专门研究对这批人的处理问题，尽管所有的常委「没有一个不想保他们的」，省委宣传部长俞名璜甚至「说着说着，眼泪汪汪」，但是最终「还是没有保得住」[3]，这批青年作家全部被打成右派。《江渭清回忆录》称，江苏省一共打了 13，349 名右派，占全国右派总数的 2.4%，属于全国打右派比较低的，若从江苏人口看，比例更低。事隔四十年后，江渭清对此承担了自己的责任，他为此「一直内疚在心」。

毛泽东在反右运动中开启了对地方工作直接干预的闸门，毛的干预的无序性和强制性，逐渐成为北京与地方关系中的显着特征，使得地方领导人对北京的依赖进一步加强，地方领导人与北京的关系更趋复杂。

毛泽东对江苏的又一次直接干预发生在 1959 年庐山会议之后，这一次毛看准了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刘顺元，认定他是一个「老右倾」。

刘顺元何许人也？他是 80 年代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然而，刘顺元在党内的命运却坎坷多舛。1945 年秋，八路军出兵东北，刘顺元担任中共旅大党委领导期间，因不满苏军扰民曾提出异议，被苏占领军指名要求调离。彼时中共倚重苏联，刘曾因此受党纪处分。1953 年，刘顺元调入江苏，任分管农业的书记，并曾担任过江苏省委常务书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后，刘顺元对浮夸风多有尖锐抨击，他曾公开批评时下尽多「三六九干部」和「风马牛」干部。「三六九」者，指嘴上高唱「三面红旗」、「六亿人民」、「九个指头」（即成绩为九个指头，缺点为一个指头，此为毛泽东所创的名言）；「风马牛」者，指顺风转舵、溜须拍马也。刘顺元这番切中时弊的「名言」不胫而走，竟传到毛泽东那里。毛在打倒彭、黄、张、周后，一不做，二不休，正待将所有敢于表示异议的干部一网收尽，于是，刘顺元成了撞上枪口的靶子。

1959 年 10 月后，江渭清与省长惠浴宇接到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传来毛泽东的指示，其意是江苏还有一个「老右倾」刘顺元。究竟如何处理钦定的「老右倾」刘顺元[4]，现在真正成为江渭清最棘手的难题。

中共党内在 1949 年后，毛的指示对于全党是绝对律令，凡被毛钦

定为「坏人」的干部，在经过一定的组织程序后，重则削籍入狱，轻则贬谪基层，除此之外，似乎再难有什么其它的结局。反右倾运动期间，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就因解散了一批农村公社食堂，引致毛震怒，而被当地领导人打成「反革命」投入监狱[5]。

考验江渭清与惠浴宇道德良知的关键时刻已经到来。据惠浴宇回忆（在《江渭清回忆录》中对下述细节略去），为了商讨如何应对来自毛泽东的直接压力，江渭清与惠浴宇相约，在南京市郊的高级招待所中山陵五号的草坪上，「搬两把藤椅，避开闲人，从早晨直谈到暮色苍茫」。在「全党上下噤若寒蝉」（惠浴宇语）的大气候下，江苏省两位主要领导的意见完全一致：向柯庆施求援，全力保护刘顺元 。经过江渭清的力保，柯庆施默认了江渭清的要求。此时已是 1960 年后，大灾荒已成为明摆的现实，毛泽东似乎已无兴致再抓「右倾份子」，刘顺元一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江渭清在 50 年代后期两次为了保护部属顶住来自于毛泽东的巨大压力，事后仍然做他的省委第一书记，除了毛泽东对他一直保有基本信任外，还在于江渭清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始终严格遵循北京的路线。1959年庐山会议后，江苏省有个别地区自发实行包产到户，江渭清一发现，便立即予以禁止。1959 年 10 月 13 日，中共中央曾向全党批转江苏省委《关于立即纠正把全部农活包到户和包产到户的通知》（《江渭清回忆录》对此略去不提）。故而，即使江渭清少抓一些右派、右倾份子，也不成其为问题。

江渭清作为一个深谙中共政治生态学的地方大员，在毛时代的政治惊涛骇浪中，逐渐练就一套生存之道。1961 -1962 年上半年，当「包产到户」之风从江苏邻省安徽刮起后，江渭清按兵不动。1962 年夏，安徽省在李葆华主持下，甄别了一批 195 7 年的右派，江渭清还是观望。当毛泽东于 1962 年 8 月在北戴河发起反击时，很有资格充当「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左派角色的江渭清，却无意去抢那顶「左派」桂冠。江渭清这种稳健、谨慎的从政性格，使他在 1964-1965 年新一波的政治风浪中再次站稳了脚跟。

三

随着「三年自然灾害」将近尾声，中共的政治生态环境也静悄悄地发生变化，这就是在「毛主席」之外，「刘主席」愈来愈多地出现在党和国家的政治场合，刘少奇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地位已完全明确。

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对地方的指导方式上，与毛泽东有某种差别，刘少奇对地方工作一般不采取直接干预的方式。但是，随着刘少奇在党内影响的扩大，情况也逐渐发生变化。1964 年，刘少奇为指导「四清」运动，给江渭清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具有某种直接干预的性质，导致了极其复杂的结果，使得江渭清被卷入 1964-1965 年毛泽东与刘少奇争执的旋涡中。

在 50-60 年代初，江渭清与刘少奇仅维持着一般的上下级工作关系，依照中共历史上的「山头」谱系，江渭清不属于刘少奇的系统。40年代初期，刘少奇被毛泽东派往华中任中共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江渭清虽是刘少奇的属下，但是，江渭清在历史上与刘少奇没有渊源，江渭清的直接上级是他可以亲切呼之为「谭老板」的谭震林。

考之中共历史，凡是位居中共核心层的领导人，其权威来源不外两端：一是有赖于在党的历史上形成的地位，二是在工作中所取得的实绩。刘少奇作为中共第二号人物，其在党内的地位，早在中共七大就已得到正式确认；刘少奇领导白区党的贡献，也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得到全面肯定。然而，中共七大由刘少奇参与建立的体制是领袖主宰制，在这种体制下，毛泽东与党内同僚的关系具有双重性质。毛与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既是同事关系，毛也是其同僚们的领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与他的党内高级同僚的关系，逐步从双重性质过渡到单一性质。毛渐渐不再是领导集体中的成员之一，而是自然而然地成为刘少奇等人的领袖。历史上因共同对付党内留苏派和所谓「经验主义者」，毛、刘曾有过的亲密合作关系，使得刘少奇比其它领导人多一份「特权」，即只有刘少奇可以个别向毛泽东表达和转述对某些敏感问题的不同看法。但是，这仅是「习惯法」，而非「成文法」。它完全取决于刘少奇有无表达和转述的意愿，以及毛泽东有无倾听的兴致。因此，刘少奇虽位居中共领导人排行榜的第二位，但与排行第三的周恩来仍同处一个地位，刘少奇虽距毛泽东仅一步之遥，但两人的地位、权力、权威则有天壤之别。

刘少奇得以身居中共第二号人物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清除党内留苏派的斗争中，以及在确立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领袖地位的过程中，曾给予毛巨大支持。作为对刘少奇支持和合作的「回报」，毛泽东一度授予刘少奇领导党的组织系统的权力。1944 年，刘少奇的老部下彭真接替陈云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次年，原北方局干部安子文被调入中组部主持日常工作[7]。然而，中共干部来自四面八方，党内历史上「山头」林立，人际因素复杂交错，毛泽东在放手刘少奇涉足中共组织工作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制衡措施。1950年以前，由任弼时代表中央书记处指导中组部，1954 年后，邓小平又接替了任弼时原先的职责。在 1956 年安子文任中组部部长以前，饶漱石、邓小平都先后执掌过中组部。张鼎丞、马明方也曾以中组部副部长的身分相继主持中组部的日常工作，因此刘少奇对党的组织系统的影响力又是相对的。对于地方大员，尤其对华东地区大员的任免，起决定作用的是毛泽东而非刘少奇。

在 50 年代的一段时期内，刘少奇曾因在「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等问题上与毛泽东意见相左，在政治上一度陷于低谷。直至 1959 年，刘少奇接替毛泽东任国家主席，他在中共核心层中的地位才真正得以巩固。刘少奇任国家主席，标志着他在 50 年代初中期受挫后，开始了权力复苏和扩张的过程。到了 1962 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在中共党内的威望已有逼近毛泽东之势。也正是在「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派出了原北方局系统的李葆华主政安徽，取代了毛泽东的老部下曾希圣（曾希圣因积极推动大跃进受毛特别信用，后来因率先推行责任田而被毛抛弃）。但是李葆华入皖，并不表明刘少奇在华东地区已建立了完全的影响力，因为主政华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自恃有毛泽东作后台，并不买刘少奇的帐。对于这一点，刘少奇、毛泽东均心中有数。

柯庆施自 1949 年后长期在华东工作，与江渭清有同僚之谊。柯庆施虽对江渭清时有压力（催促「反右倾」），但并不具体干涉江渭清职

权范围内的工作。华东地区既已有了谭震林、柯庆施这两道屏障，刘少奇自然对之奈何不得。但是到了「七千人大会」后，情况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刘少奇的影响继续上升；另一方面，毛泽东再度对刘少奇表示不满。在 1962 年 8 月的北戴河会议和继之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向党内健康力量发起反击，威逼全党就范。刘少奇对毛泽东的反击毫无抵抗，他随即作了「自我批评」，紧跟着毛泽东大唱「阶级斗争」高调，进而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1963 年 2 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农村开展以「四清」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刘少奇在会上说：「总是讲阶级，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 11 月，刘少奇派出其妻王光美，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名义，参加河北省委工作队，前往抚宁县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王光美下乡蹲点的成果，就是产生了轰动一时的「桃园经验」，也就是围绕着这个「桃园经验」，刘少奇与江渭清发生了争执，毛、刘之间的矛盾也随之激化。

1964 年 6 月底，刘少奇带着王光美离开北京，前往十一个省市巡视指导运动，并由王光美在各地党政干部大会上做介绍「桃园经验」的报告。7 月 14 日，刘少奇等来到南京，不住设备完善的中山陵高级招待所，而是在省委办公大楼一间办公室住下。

刘少奇此行来势猛烈。据江渭清记述，当刘少奇抵达济南时，华东局即派书记魏文伯专程前往迎接，然后陪刘少奇一行至合肥。魏文伯与江渭清是老同事，特从合肥打电话给江渭清通气，提醒他「要小心」、「注意」，因为刘少奇一路「脾气大得很」，「他在山东已经发了脾气，到合肥发了大脾气」。

刘少奇在南京「开讲」了两个下午，他在报告中强调「也许不止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有严重问题的干部占基层干部的多数，并提出近一年的城乡社教都没有搞好。刘少奇还反复强调，领导干部若不蹲点，就没有资格当省委书记、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

江渭清虽然事先有魏文伯的电话通气，但是既有前几年面折毛泽东的勇气，对刘少奇也就不惧当面陈述自己的不同看法。刘少奇认为江苏的运动打了败仗，江渭清坚持说，不能这么讲，江苏省开展社教的社队，60% 打了胜仗。江渭清又说，江苏没有发现烂掉的社、队领导班子。刘少奇反驳道：「你这是没有下去，不知道实际，讲的还是三年前老情况。」江渭清寸步不让，回答：「我经常下去，对本省情况是知道的。」

就在江渭清与刘少奇这番辩驳中，江渭清忽然抬出了毛泽东，他说：「毛主席也说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刘少奇当即打断江渭清，转问他对王光美的报告有什么看法，因为江渭清没有出席并主持江苏省的王光美的报告大会。刘少奇逼问江渭清：「究竟赞成不赞成王光美同志的报告？」江渭清给刘少奇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从江苏的实际出发，学习精神实质。符合江苏情况的，就学习运用；如果不符合江苏情况，就不照搬。」刘少奇更进一步追问：「那你们江苏就不执行了？」江渭清回答：「不盲目执行。」

江渭清的这番回答，引致刘少奇的强烈不满。第二天在刘少奇离开前夕，「脾气」终于爆发。刘少奇明确告诉江渭清，他的意见「是不对

的」，江渭清则坚持原来的看法，两人发生顶撞。返京后，刘少奇主持召开修改《后十条》小型座谈会，在会上抓住江苏省涟水县高沟公社社队干部打击报复社教积极份子的事件，强调要对「高沟事件」作「现行反革命处理」。而在会议之前的 7 月 29 日，平日较为谨慎、因「桃园经验」一时跃入政治舞台中心的王光美，竟直接打电话给江渭清，传达刘少奇对「高沟事件」的定性：这是一起「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现行反革命事件」。揭发「高沟事件」本是江苏省委在北京压力下为顺应「大抓阶级斗争」的形势而加工提高的产物，现在刘少奇抓住这个事件，就是为了证明他对基层政权已烂掉的看法的正确性，并且要以此「事件」为起点，继续挖出上面的「根子」。

刘少奇射向江渭清的另一支箭，是抓住江苏省委办公厅 7 月 28 日发出的一个通知，这个通知提到「要学习江渭清同志的讲话」，善始善终抓好社教运动。刘少奇当面质问江渭清：「为甚幺不学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要学江渭清的？」刘少奇这一招确实击中了「要害」，既然江渭清可以抬出毛泽东为自己辩护，刘少奇就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于刘少奇的这番追问，江渭清极为紧张，他立即向刘少奇作了解释。这一次，即连一向对刘少奇阳奉阴违的柯庆施也发了慌。一旦刘少奇又以「护法大师」的面目出现，柯庆施则不得不退避三舍，他一连打三个电话逼江渭清非作检讨不可。

此时的刘少奇已走出 1962 年下半年的低谷，正走向新的权力高峰。江渭清返宁后迅速布置传达刘少奇的指示，并且亲自下乡蹲点。到 9 月 8 日，江渭清以个人名义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汇报全省运动进展情况，并且特别报告了根据刘的指示，正在研究处理「高沟事件」，又一次就江苏省委办公厅 7 月 28 日发出的通知，作出检讨。

刘少奇接到江渭清信后，于 9 月 23 日覆信给江[9]。刘少奇在这封信中首先针对江渭清信中所写的「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我们都必须学习中央、毛主席及中央其它领导同志的指示，否则，将犯更大的错误」的一段话，表示这些话「不完全正确」。刘少奇提出「应向一切有真理的人学习」，他并举例应学习由中央批转的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大庆油田经验和「桃园经验」。刘少奇解释他之所以反对学习江渭清那篇讲话，是因为江渭清的讲话「空话连篇，基本上是一篇教条主义的讲话」。[10]

在江渭清的回忆中省略了当年刘少奇信中有关对他的「教条主义」的批评，其实，这正是刘少奇信的要旨所在，也是导致毛泽东疑忌刘少奇的重要因素之一。刘少奇在信中说，同不能把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当成教条一样，也不能把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当成教条。因此，刘少奇认为江渭清的那篇讲话「不值得学习」。

1964 年刘少奇将全副精力放在社教运动上，他试图在毛泽东的框架内放入某种含有他个人色彩的内容，「桃园经验」的产生即是他这种「新思维」的果实。但是，地方领导人各有其复杂背景，即使在 1962 年后党内日趋恶化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各地方领导人仍存有管道联系，以应对北京层出不穷的政策变化。在毛泽东的巨大光环中，任何与毛的话语稍有差异的言辞都能被地方领导人立即识辨出来，作为为自己辩解的理由。这就是为甚幺刘少奇在山东、安徽和江苏都「发了脾气」。为

了与影响正日益上升的林彪相抗衡，刘少奇作出最后一搏。他试图以江渭清做鞭子，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降温。1964 年 10 月 20日，刘少奇在文革前最后一个强势动作出台，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讨论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的指示》[11]，刘少奇还派出他的老部下，时任国家物价委员会主任的薛暮桥等来江苏检查和指导四清运动。薛暮桥等曾写信批评江渭清和江苏省委的检查没有「把认真讨论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信同反右倾结合起来」，没有「抓住省委在指导运动中的一些突出的错误事件进行分析和解剖」（薛暮桥近年出版的回忆录对此段史实只字不提）。据惠浴宇回忆，这个由北京派出的「来头很大的工作组」在淮阴搞「四清」，执意要把「一个县委和该县所属几十个公社领导」打成「反革命小集团」，惠浴宇在这里指的就是涟水县委。该县委的直接上级淮阴地委书记孙振华向省委陈情，要求保护这批干部，得到省委的支持，但孙振华却因此「搞坏了」与北京「某些领导人的关系」[12]，不久便被调往安徽巢湖地委工作。此时若非形势忽然发生转折，针对江渭清的动作可能还会继续下去。

四

1964 年 12 月，北京形势丕变，毛泽东出尔反尔，一改原先支持刘少奇的态度，转而和刘少奇发生对立。自 196 3 年秋王光美蹲点桃园，刘少奇全力主持四清运动近一年时间里，毛对刘少奇指导四清运动的一系列做法均表示支持。毛泽东之所以支持刘少奇，乃是刘少奇的左调均来源于毛本人，刘少奇的若干「新语言」，也是在毛的左调基础上的发挥。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工作显得心满意足。

事实正是如此，刘少奇的言论皆有源可稽：1964 年初，王光美向毛汇报桃园大队的一些干部多吃多占，毛泽东说，根子在上面[13]。「扎根串联」一说，最早版本也属于毛泽东。早在 1961 年 1 月，毛就提到要派大批干部下乡，深入「扎根串联」[14]。1963 年 5 月，毛泽东又再次强调「要采取扎根串联，依靠贫下中农这一套办法」[15]。1964 年 6 月，毛泽东提出全国 1/3 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1964 年 8 月底，毛同意向全党转发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毛泽东还称赞过刘少奇给江渭清的信。1964 年 9 月 25 日、10 月 18 日，毛泽东两次对刘少奇给江渭清的信写下批语。毛在批语中给刘少奇写道：「看了你这封信，觉得实在好」，「存在着的问题，正是要照你写的那样去解决」。毛泽东并对刘少奇的信作了亲笔修改，添了一些如何正确认识客观真理等具有毛氏特色的领袖型哲学训示，并指出如不这么做，「则官越大，真理越少。大官如此，小官也是如此」[16]。（《江渭清回忆录》完全回避毛曾参与刘少奇信一事。）

毛泽东为什么忽然转变对刘少奇的态度？结合 1964 年下半年刘少奇的一系列举措，即可发现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乃是事出有因、有迹可循的。刘少奇不经意中已在好几个问题上招引毛的忌恨：

（1）蹲点问题。刘少奇在 1964 年夏四处游说，其间还曾返回北京，于 8 月 1 日向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讲过一次。刘少奇宣称，若不蹲点，则无资格做中央委员、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在这段期间，刘还反复强调，不参加四清，就没有领导四清的发言权。刘少奇的这些话本无影射毛泽东之意，但是在极度敏感的毛那里，刘少奇的这番话用意

险恶，有逼宫之意。在中共上层人人皆知，1961 年刘少奇曾在湖南宁乡老家蹲点 44 天，而毛从未蹲过点。（2）「调查会过时论」。刘少奇宣扬，深入了解基层的不二法门是「扎根串联」，开调查会已不能接触农村真实情况，因为基层干部大多有问题。开调查会为毛泽东发明所创，如今刘少奇予以否定，被认为有贬毛之意。

（3）批江渭清的教条主义问题。刘少奇批评江渭清将毛泽东著作当作教条，矛头直指对毛的个人崇拜潮流，明打江渭清，实攻毛和林彪。

（4）「大捧王光美」。刘少奇亲自出马，让王光美在全党登台亮相，使毛泽东感到刘少奇夫妇的行动对他的权威已构成威胁。毛对「桃园经验」的态度全凭他对刘少奇好恶的增减而转移。1964 年春夏，当几个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讨论四清问题时，有领导人提到王光美搞四清的经验很好，毛泽东说，那就请王光美同志来讲讲嘛。刘少奇的司机当即从人民大会堂回来把王光美接去。王光美在会议上讲了以后，与会者认为这个经验可以推广。毛泽东说，就请光美同志做四清的顾问吧[17]。然而一旦刘少奇果真这样干了，毛泽东态度很快就改变，迅速地将「桃园经验」看成是刘少奇意欲分庭抗礼的罪证。

（5）刘少奇呼风唤雨的能量之大，使毛泽东由惊生恨。1964 年夏，在刘少奇的力促下，一声号令，全国一百五六十万干部参加城乡四清[18]，此举最终导致毛对刘的深刻忌恨。正是上述因素在毛泽东胸中日益发酵，1964 年 12 月，毛泽东开始向刘少奇发难，对刘少奇的态度来了一个 180 度的大转变。

1964 年 12 月 15 日，由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与会者包括各大区书记和各省委第一书记。正在蹲点的江渭清没有接到参加会议通知，原计划由陈毅来华东时向江渭清传达会议精神，而其它地方领导人则中断蹲点，前往北京赴会。显然，不让江渭清与会可能具有某种含意，毛泽东当即注意到这一点。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命江渭清赶到北京参加会议，当时谁也没料到毛泽东几天以后会向刘少奇发起突然袭击。

1964 年 12 月 20 日，举行了一次小范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刘少奇在讲话中谈到当前运动中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主要的，运动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听到这里，忽然打断刘少奇，当即反问：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19]？毛泽东随即严厉指责四清运动中的「大兵团作战」、「扎根串联」等方法。

过了几天，12 月 26 日，毛泽东又在他的 71 岁生日宴会上不指名地指责刘少奇：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所以没有什么发言权，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的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党内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云云。[20]

江渭清在回忆中提到，就在会议期间，毛泽东找江渭清面谈，问到他对刘少奇的批评检讨了没有？毛泽东话中有话地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是这么一回事。你感到批评对的，就检讨；不对的，就申诉；申诉还解决不了，就等历史作结论。」也许毛泽东已觉得再没有必要搞障眼法，干脆把与刘少奇的矛盾在江渭清面前挑明。会议期间，毛泽东当

着江渭清和刘少奇的面，直截了当地说：「少奇同志给你的一封信，是错误的。你的意见是对的，少奇意见是错误的。」

接下来的，就是毛泽东向刘少奇的连番进攻。1964 年 12 月 28，1965 年 1 月 3 日、5日，毛泽东连续攻击刘少奇，最后以《二十三条》文件的形式将毛指责刘少奇的观点纳入进去。刘少奇在毛的进攻下，节节败退，其威信遭到沉重打击。

从 1965 年 1 月起，在形式上，刘少奇虽还是中共第二号人物，但是在党内地位已日益衰弱。据其它资料透露，1965 年初，刘少奇在周恩来、贺龙找他谈话希望他主动向毛泽东致歉后，曾找机会向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毛似乎宽谅了刘。在这此后的一个小型会议上，毛泽东当着一些领导人的面说：「我批评了少奇同志了，但你们今后还是要听他的话哟！」[21]

然而，这是毛泽东故意施放出的烟幕弹，毛泽东已决定要搞掉刘少奇。1965 年夏，刘少奇接班人地位将由别人取代的消息，已在极小的范围内传出。据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回忆，1965 年秋，周恩来奉毛泽东命去看望已赋闲几年的王稼祥，周恩来对王稼祥说，接班人可能是林元帅和邓总书记。[22]

1965 年 11 月，毛泽东离京，开始他「伪游云梦」，密谋倒刘的部署。不久，中南海的刘少奇办公室收到一份无抬头、无署名，打印在一张白纸上的毛泽东在外地与几位负责人的谈话记录。这份文件是哪一个地方领导人通报给刘少奇的？近年披露此则消息的是刘少奇当年的机要秘书，但他未加以说明。据这份神秘的文件记载，毛泽东在谈到四清运动时说：「王光美在河北省搞四清，河北省领导不了，华北局也领导不了，是他（指刘少奇）亲自领导的。他有他的长处，我有我的弱点。他有一股硬劲，我爱妥协。我说不行，他说行。……他是第一副主席，瞒不住他……。」[23]

毛泽东的这番话扑朔迷离、暗藏玄机，对王光美的不满是明白无误的了。「我说不行，他说行」，是指刘少奇支持「桃园经验」，毛反对「桃园经验」，还是别有所指，毛故意闪烁其辞；「他是第一副主席，瞒不住他」，是否暗示不要把他的话传给刘少奇？总之，毛为搞掉刘，实际上已向地方官员「打招呼」了。

据《江渭清回忆录》记载，毛泽东 1965 年 11 月 16 日来到南京，江渭清向毛汇报时仍说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和少奇同志信的精神进一步检查省委的工作作风，毛泽东大为惊讶，问道：「你们还要做检讨？」江渭清按照官式语言回答：「主席的指示，少奇同志对我的批评，给我教育很大，每检讨一次就有一次的收获。」

江渭清在毛、刘之间四平八稳的态度，无疑使毛泽东更坚定了把刘少奇搞下台的意愿。自 1964 年 12 月，毛泽东当面向江渭清表明他对刘少奇的不满，已经过去一年，地方大员仍将刘少奇奉为神明，依旧按照党内的某种统一风格，在说着「老话」，这一切都令毛泽东对由他一手创造的庞大的党机器产生出强烈的排斥。在毛想象中的世界里，刘少奇已严密控制了全党，而毛泽东的话已到了差不多没人听的地步。刘少奇下台后，毛泽东在历数刘少奇「罪状」时，曾经提到刘少奇责难江渭清一事。1966 年 10 月 24 日，毛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召开的汇报会议

上，指责「少奇说江渭清蠢，他自己就聪明了吗？」[24]（有关文革期间毛泽东为刘少奇给江渭清信指责刘少奇一事，在江渭清的回忆中只字不提）。看来，围绕刘少奇给江渭清信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对毛刺激颇深，这也是毛泽东在扳倒刘少奇后，仍将各级领导干部「一锅煮」的原因之一。江渭清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文革中，毛同意「点名」批判江渭清，但又不要将老干部完全打倒，这使他感到费解。其实，毛只是要「教育」他们一番，要他们为昔日「听少奇的话」付出代价。

在 1964 年末至 1965 年初，围绕四清问题的争论中，毛泽东与刘少奇孰是孰非？一般认为，刘少奇反对毛泽东提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乃是为了保护干部。然而事实上，刘少奇在 1964 年提出的一系列概念，其言辞之左，与 1947 年刘少奇主持老区土改的过左政策如出一辙。1964 年在大陆各城市普遍上映的电影《夺印》，和被四清工作队员视为「干部必读」的陈登科的小说《风雷》，均反映了刘少奇当时左的观点。刘少奇虽没有提出「走资派」的概念，但其左的精神与毛泽东并无二致。正是因为刘少奇的左调与毛的左调基本合拍，当时参加制订《二十三条》的各地负责人，对该文件中提出的「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无特别的感觉。

1964 年，刘少奇意欲在毛的框架下搞出新花样，并试图抗衡林彪。然而，在毛划的小圈圈内做文章又谈何容易？刘少奇的迂回天地狭窄，注定跳不出毛的如来佛掌心。刘少奇本欲求神，却把灾难请下来，这也是刘少奇始料不及的。

在中共核心层领导中，刘少奇素有个性谨严、善于自制的名声，其实刘少奇的谦和多表现在他受毛泽东的指责以后。1953 年高岗四处游说反刘，当毛抛弃高岗后，刘少奇仍坚持要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做自我批评。1965-1966 年文革前夕，刘少奇更是表现得特别平和、低调，他知道毛泽东对其不满，但没有任何「抵抗」的举动，而是一有机会就进行检讨。

1966 年 5 月，毛泽东依例让刘少奇主持清洗「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刘少奇在 5 月 26 日举行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将自己从 1927-1965 年所犯的「缺点错误」事无巨细通盘鞭挞一遍[25]。刘少奇几乎是默默忍受毛泽东对他的封锁和打压，而在 1964 年他的权力趋于高峰时，他可以从济南、合肥到南京，一路「发脾气」。

1966 年 10 月，毛泽东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踌躇满志地在抖落他对刘少奇的怨恨。毛泽东口口声声说，他退居二线有意大权旁落，是为了树立刘少奇的威信[26]，其意在表明，刘不堪造就，辜负了他的栽培。然而，毛泽东何时真正退至二线？大政方针、用人大权，毛泽东何尝一天松过手！当毛泽东看到刘少奇积累的威望和影响力在 1964 年有相当发展时，毛就决定要废黜刘少奇，什么「形左实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等等均是饰词。

毛泽东惦记着江渭清。1967 年 2 月，毛命周恩来用专机将江渭清等几个华东地区省委第一书记接到北京的京西宾馆，使江渭清摆脱了被造反派批斗之苦。1975 年，毛泽东又重新起用江渭清，任命江为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直至 1982 年，江渭清返回南京定居，转任中央顾问委

员会委员。

江渭清早年投身革命洪流，中年后长期身任封疆大吏，在风云莫测的毛时代，练就了一套极为丰富、熟稔地应对北京的为官之道。在反右、反右倾的风暴中，巧妙地维护了地方的利益，又以不投机、不取巧而得以在 60 年代中期的毛、刘争执中避祸与身，终于渡过了文革的劫难。江渭清现已 87 岁，如今细细检索当年旧事，虽在不少涉及敏感的地方多有避讳，但总体上仍不失客观和真实，其回忆录称得上是一部颇为珍贵的中共地方政治生态学的实录。它展现了地方与中央各种复杂的、起承转合的关系，不仅是可供研究的样本，亦是一部毛时代地方官员的「心灵史」。笔者读之，眼前浮现出 50 年代后在江苏大地上所发生的革命、改造、斗争的一幕幕景象，更生出无穷的慨叹！

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1998 年 4 月号 总第

注释：

[1] 参见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页 415。为避免注释过多的累赘，下文中凡因自该书处，借略去引文注释。

[2] [3] [4] [5] [12] 参见惠浴宇口述，余黑子记录：《朋友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页 220；220-21；214；214；215；223。

[7] 陈野苹、韩劲草主编：《安子文传略》（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页 108。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63 年 2 月 12 日。转引自黄峥：《刘少奇的一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页 395。

[9] 《江渭清回忆录》中称：刘少奇给的复信写于 1964 年 9 月 30 日。另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对刘少奇给江渭清复信的批语和修改＞篇注释 1 所载，刘少奇给江渭清的复信写于 1964 年 9 月 23 日。本文取后一种日期。

[10] 毛泽东：＜对刘少奇给江渭清复信的批语和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页 170，注释 2。

[11] 该指示以中发（64）672 号文件发至县团级党委，同时附有经毛泽东修改过的刘少奇给江渭清的信，及江渭清 1964 年 9 月 8 日给刘少奇的信。

[13] [21] [25] 同注 书，页 395；402；423。

[14] 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1961 年 1 月。

[15]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问题的指示＞，1963 年 5 月。

[16] 毛泽东：＜对刘少奇给江渭清复信的批语和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页 169、168。另参见王首道：＜坚定地站在正确路线一边＞，《缅怀刘少奇》（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页 28-29。

[17] [23] 刘振德：《我为少奇当秘书》（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页 262；249。

[18] [19] [20]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页 1120；1129；1131。

[22] 朱仲丽：＜内乱之中——王稼祥在“文化革命”中的遭遇＞，载《革命史资料》，第 5 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页 119。

[24] [26] 毛泽东在 10 月 24 日汇报会议上的讲话，1966 年 10 月 24 日。

第十三篇 初读《杨尚昆日记》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杨尚昆日记》都可被视为去年最重要的出版物之一，甚至可被视为是 20 世纪中国政治人物最重要的日记之一。

中国人写日记的传统源远流长，宋明以降，已渐成风气，至晚清更蔚为大观，文人学者，政宦显要，多以日记记事述怀，其珍贵之处一为皆亲闻亲历，二为私人书写，较少虚饰，是故，这类日记往往可弥补官修正史的偏缺，而为后人了解历史的多重面像提供珍贵的史料。及至今日，治近代史的学者，不仅需读官编的《清史》，也要读《翁文恭公日记》和《越漫堂日记》;而治中外关系史的学者，不能只看《筹办夷务始末》，而放过《英轺日记》和《出使英法意比日记》，这对史学工作者来说，已是常识。

进入民国以来，许多政界人物沿袭了写日记的传统，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年出版了曾任北洋总统的徐世昌日记 12 本，起讫时间为 1917-1948 年。“中研院”近史所还出版了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的王世杰日记 10 本。蒋介石生前也有每日记事的习惯，其所写日记现收藏于台北“国史馆”蒋氏之“大溪档案”中。

相比于国民党政治人物，中共高级领导人生前和生后都较少出版个人日记，80 年代后，曾出版过一些曾担任过负责工作的前领导同志的日记，如《谢觉哉日记》、《林伯渠日记》(片断)、《周保中日记》，《赖传珠日记》、《王恩茂日记》等。但这类日记所载内容均起讫于民主革命时期或革命战争年代，基本上不涉及建国后的内容。极个别者如《汪东兴日记》也只是撷取作者在 1965 年的一段经历，而非汪氏全面、系统、有连续性的完整日记。

在担任过党和国家最高职务的领导同志中，杨尚昆是唯一在生后出版日记的。其日记是迄今出版的前领导人中地位最高、也是内容最为丰富、部头最大的日记。这部日记共有上、下两册，全书 110 万字，引人注目的是，该日记全是建国以后的内容。起讫时间为 1949年 1 月 1 日-1965 年 12 月 10 日，时间跨度为文革前的整整 17 年。在建国后的这 17 年间，杨尚昆位居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他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等职。因此，这部日记就格外引人注目。在这部日记中，作者不仅简要记述了他的所见所闻，还叙述了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堪称是一部观察当代中国史的珍贵记录。

中共是一个长期在农村进行艰苦革命战争的党，1949 年初，中国

革命即将获得全面胜利，党中央也将从战斗了几十年的农村转移到城市，对于党的这个重大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毛甚至以“糖衣炮弹”来比喻中共将面临的新的严峻考验。杨尚昆当时任中央秘书长兼军委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其工作之一，就是负责中央机关向北京转移的具体事宜。1949 年 3 月 23 日，杨尚昆为中央打前站，先行从西柏坡出发，前往北京。在《日记》中，杨记述了个别机关在北京纪律松弛的事，他感叹道，才进城几天，“似乎大家都变了”，“一进城市，大家对居住生活条件的要求就提高了，都爱从好的方面去布置，”杨写道：“要能维持简朴的作风，恐不容易，城市的引诱实在太大。”

杨尚昆长期担负党和国家的中枢——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一岗位所承担的基本工作就是上承下达，其具体事务包括上至中央常委开会会场的布置与记录、文书草拟和下发，下至中南海车队的调度、托儿所、食堂工作的安排，以及房屋修缮和花草栽培。杨是办公厅主任，不一定具体处理过于琐碎的事情,但其日常工作仍是找人谈话、听取汇报、布置检查等等，负责处理的事情极其繁杂。1955 年 3 月，中央决定开党的代表会议，事先杨接见中央新闻制片厂厂长，具体讨论拍摄事宜，详细指导拍摄哪些镜头，哪些镜头不拍。50-60年代，政治风云时有变幻，忽而雷电闪鸣，转眼又是风和日丽的艳阳天，不管发生如何变化，中枢机器都要运转，杨仍每天都要面对亟待处理的一大堆具体事务。杨尚昆自1956年党的八大后，在书记处分工分管工、青、妇和指导中央调查部的工作，他几乎每隔两、三天都要听取中调部常务副部长孔原同志等的汇报，近十年从未间断。从《日记》上看，杨几乎每天工作至深夜一、二点，尽管在这 17 年中，杨在党和国家的职务序列中并非处于最前沿。

杨尚昆所处的地位极其重要，距毛泽东主席很近，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杨也是信任有加，甚至诸如代表中央与罢黜后的彭德怀进行联系的工作，也由杨来承担。所以，杨尚昆对毛的记载就特别有意义了。杨尚昆对毛的胆略、气魄和能力极为折服，他在《日记》中时常称毛为“主”、“主座”，这应该是为了记述的方便而作的简称。不无巧合的是，曾经担任过毛泽东政治秘书、也是杨的老部下的田家英，以及毛的兼职秘书李锐等私下也称毛为“主公”。

杨尚昆青年时代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和王明是前后同学。由于王明的机会主义错误曾经给中国革命带来重大损失，王明本人受到了许多领导同志包括杨尚昆的尖锐批评。1949 年 3 月，王明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发言，对自己的错误多有掩饰。杨在《日记》中批评王明的发言“口若悬河，离题万里”，“简直是胡闹”，“总观此人是毫无进步，野心未死，还有伺机反攻之企图”。而对于毛泽东，杨尚昆则是发自内心的尊崇，他在 1949 年1 月 23 日的日记里，抒发了自己的心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亲眼看见中国革命一步一步地照毛主席所规定的进程，走向全国大胜利，实在是值得兴奋，值得为自己庆祝。”“没有毛主席的领导，这种合乎国情而又使革命加速胜利的办法是难于想像的。”建国初，我志愿军在朝鲜取得对美国的胜利，大大地振奋了杨尚昆，他在 1951 年 1 月 1 日的日记中写道，主席出兵朝鲜参战之举“实是万分英明的，有远见的决定……如果当时要由我来决定，我则会偏于‘苟安’!”

从杨尚昆的这些叙述可以看出，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和成功，成为老一辈革命者对毛尊崇的思想和行动的基础。对毛的信任和尊敬，早已内化为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基本性格。

在毛泽东时代，完全实现了以毛为中心的政治上的高度集中统一。在毛的强有力领导下，听毛主席话，照党中央指示办事， 几乎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包括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日常行为准则。只要毛泽东和中央一声命下，全国上下马上动员起来，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普通百姓。这种体制的特点是，上面只要指导正确，下面贯彻执行也大体正确；而上面的指导一旦出现偏差，下面的工作也必然出现问题。1964 年 10 月至 1965 年 5 月，身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和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响应刘少奇主席的号召，率领中央办公厅长安社教工作组，前往陕西省长安县开展社教运动。杨尚昆亲自下乡蹲点，在长安县搞社教大半年时间。杨深入干部和群众，对他所蹲点的村——长安县斗门村的经济、社会、人民生活情况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调查，这些都反映在他的日记中。长安县的社教运动是当年中共中央西北局直接领导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大抓阶级斗争，“进行民主革命补课”。西北局共派出 17393 名干部，在这个县进行“大兵团作战”。几十年后，历史虽然已对当年的这场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作出了定论，长安社教基本是失败的。其根本原因是，运动的指导思想不符合实际。尽管如此，当年中央领导同志深入群众，与群众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精神，今天看来仍有其积极意义。

今天的研究者都知道，1966 年末围绕“四清”运动(社教运动)，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产生了重大分歧，由此对中国政局的发展带来极严重的影响。有关毛、刘争论的详情，在杨尚昆的日记中少有反映。杨当时在长安搞“四清”，特地赶回北京，参加了 1964 年 12月 15 日召开的持续多日的研究“四清”的中央工作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以及紧接的 12 月下旬和 1965 年 1 月初，毛泽东在核心层多次指责刘少奇，并且主持通过了包含批评刘少奇内容的重要文件《二十三条》。杨尚昆在日记中，没有记录毛批评刘少奇的原话。在 1965年 1 月 14 日的日记中，杨表示支持《二十三条》，但同时提出文件“到底好否，要经过实践证明”。毛、刘争论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杨写道：“刘话不灵了”，他担心从此以后，干部“不蹲点了!”

在杨尚昆所担负的工作中，有一块是负责协调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的联络。杨多次参预两党谈判，也经常安排苏联驻华大使与毛泽东、刘少奇等的会见。杨通俄文，有时甚至亲自担任毛与苏大使会谈的翻译。1961 年苏共二十二大通过新党纲，杨一面安排工作人员进行翻译，送交领导同志参阅，同时他还找来俄文原件，直接阅读。1960 年夏，苏联政府突然中断对华援助，撤走专家，恰逢我国遭受特大经济困难之际，雪上加霜，给我国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1961 年 3 月，赫鲁晓夫对我国作出姿态，提出愿意以贷款方式供给我国小麦 100 万吨和转口古巴糖 50 万吨，事关重大，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后，要向毛泽东汇报，请毛定夺。此时，毛已退居二线，住在广州，但所有重大问题仍需老人家亲自拍板。为此，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专程飞穗。毛一锤定音，不要粮食，可以接受糖。从杨尚昆的这段叙述

中，后人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主席不食嗟来之食、坚持自力更生的意志是何等坚强。

《杨尚昆日记》也有不少空缺部分。在一般情况下，某些时日，日记主人因工作繁忙，而无暇坚持每天记日记。杨尚昆也有此种情况。《杨尚昆日记》中，有一些年份都为空缺，例如，从 1949 年 4 月 1 日至 12 月 3 日、1950 全年、1952 全年，都未记日记。1951 年只记了头四个月的日记。1953 年杨也只是从 12 月 24 日记到 31 日，其它全为空缺。编者对《杨尚昆日记》中的空缺部分曾予以说明。例如，编者明确提到，杨的"一部分日记已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虽然并未注明散失的是哪些部分。但在另一种情况下，日记的空缺则可能情况不同。例如，从 1956 年 5 月 16 日至 1957 年 1 月 17 日，杨尚昆的日记空缺，编者未加注明是否杨本人在这一段时间确未记日记，而其它的空缺，编者都予以了说明。这一段时间为中共八大召开，杨升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提出双百方针和波匈事件的发生。1957 年 1 月 27 日至 11 月 1 日，杨的日记也出现了空缺，编者也未说明原因。此一时期，为整风反右前后。然而对于 1959 年的庐山会议，杨的日记中却有极其简略的记述。1959 年 7 月 23 日，毛泽东就彭德怀的信发表重要讲话，杨在日记中作了记述。自此以后，杨也每日有日记，虽少涉及彭德怀事件，然仍透露出若干重要信息。例如，1959 年 8 月 12 日，彭的夫人浦安修来杨处谈话，"由十点半谈到四点"，次日下午，彭德怀向八届十中全会作了检讨。日记首次披露了庐山会议后，由杨代表中央与彭联络事。9月 12 日晚，杨向毛汇报"昨夜彭来谈的情况"。庐山会议后，毛很关心彭德怀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从庐山返京后，1959 年 10 月 21 日，毛要杨"常去彭处，每月两次"。10 月 26日下午 4 点 30 分，杨去彭处探望，当夜 12 点便将与彭德怀谈话的情况向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汇报。自此后，杨尚昆经常向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汇报彭德怀的情况。

日记通常都较简略，鲁迅日记即为一典型，但政治人物日记简略，就不仅仅是书写习惯的问题了。如涉及重大政治问题，涉及人事敏感，涉及对重要人物的看法,在日记中通常会回避或较少着墨。杨尚昆位居中枢机要，所见所闻大多不宜对外透露，在其日记中，对许多重大事情加以回避或省略，就完全在情理之中了。例如，1959 年 9 月底，赫鲁晓夫访华，与中方同志发生严重争执，杨尚昆亦参加部分会谈，但在日记中均无反映。像这一类情况，在《杨尚昆日记》中并不是个别的。因此，对于学者而言，仅凭日记一类的记载来进行研究，显然是不够的，还须其它相关资料加以佐证。

例如，有关彭德怀 1965 年 10 月被重新分配工作一事，在杨的日记中记载得就极为简略。1965 年 10 月 19 日，杨代表中央约见彭德怀，日记中只有寥寥数行字："下午三点至六点，彭德怀同志来谈话，要求帮助他去西南。"此次谈话时间长达三小时，所谈内容一定比较广泛，但在杨的日记中并无涉及，也无一字提及杨在这次谈话中的感受。事隔几十年后，杨著文纪念彭德怀，他写道，当年这场谈话，他与彭都动了感情，共同回忆了过去在红三军团并肩战斗的往事，临分别时，两人都流下了眼泪。

杨尚昆是文革浩劫的最早受害者之一。早在 1965 年末就被不公正地调离工作岗位，下放地方工作。对这件关系到杨的政治前途和政治命运的大事，在他的日记中记述得也非常简略。

1965 年 10 月 29 日，杨尚昆在当天日记的抬头上，写下："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天。"日记写道："上午十时半，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三人约我谈话，这是一次不寻常的谈话，十分值得记着，永远不要忘记！"这是一次什么样的重要谈话呢？谈的又是什么内容呢？在杨的日记中无一字反映。谈话的当天下午、次日和第三天的日记中，杨都写了对这次谈话的感受。谈话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中午未睡好，下午也忐忑不安"。在 10 月 30 日和 10 月 31 日的日记中的第一段，分别写有这样的话："心情不安，什么东西都看不下去。勉强看了一些文件。""整天没有精神，无心看什么。"原来这次谈话是由于中央个别领导同志对杨尚昆同志产生了不信任，宣布调离杨的工作，另行安排杨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周、邓、彭只是奉命传达而已。杨尚昆是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下放广东担任一名普通书记（当时省委一级的书记处的书记多达 5-6 名），这只能被认为是贬黜，否则何来"不安"，何来"整天没有精神"？

10 月 29 日谈话后，杨尚昆就着手移交工作，这在日记中均有记载。杨仍出席一些例常活动，例如参加孙中山百年诞辰筹备会议，出席苏联大使馆国庆招待会（11 月 6 日），出席阿尔巴尼亚国庆纪念会（11 月 29 日）。

1965 年 11 月 10 日对杨尚昆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杨的工作调令在此日正式发出。同一天，毛泽东主席应杨的要求约见杨。当天日记抬头写道："中午主席找去谈话。"这次谈话历时一个半小时，但在杨的日记中对谈话内容无一字记载。几十年后，杨回忆道，在这次谈话时，主席要他多深入，多调查，先在珠江流域干个两三年，再到黄河流域干个两三年。主席甚至很幽默地问道："广东那么热，你跑到那里去干什么？"然而，熟悉党内政治生活的老同志都知道，像杨尚昆如此重要干部的工作安排，是非经最高领导点头批准而绝无可能的。

毛泽东了解杨尚昆办事牢靠，即使要调离他的工作，仍分派他一些重要任务。在杨遭贬黜一个月前的 9 月 16 日，杨还受命与庐山会议后一直赋闲接受批判的黄克诚同志谈话，那次是向黄宣布调黄任山西省副省长。10 月 19 日，杨受命与调任三线副总指挥的彭德怀谈话。现在，杨自己也被调离岗位，另行分配工作。11 月 17 日，杨奉毛泽东主席命，去看望王稼祥同志，次日，杨又去看望了陈云同志。虽然在日记中未写是否受毛的委托，但以杨当时的身份，不可能单独去拜访陈云同志。(1998 年，杨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这次去拜访陈云同志也是奉毛主席之命去的。)杨在看望过王稼祥、陈云同志后的第三天，专门就此探望给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而在 11 月 19 日，杨还就这两次探望向周恩来作了口头汇报。

11 月 19 日，杨尚昆向周恩来的汇报，是这两位革命老战友的最后一次见面。杨的日记写道，这次谈话"从上午十一点到一点半"，至于所谈内容，即在汇报了与王稼祥、陈云同志谈话情况后，杨与周谈了什么，日记中付之阙如。直到 1976 年初，杨尚昆在山西临汾流放期间的

日记，以及 1998 年为纪念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而发表的文章中，才对这次谈话的内容作了披露：杨尚昆对周恩来说："由于我工作岗位特殊，涉及面很广，做了些工作，也犯过些错误。许多事情你都了解，有些问题只有你知道，我没有向中央其他同志说过；但也有你不了解的，我不愿意多说。如果发生意外的情况，要处分我，甚至要开除我出党，只要你知道我是坦白的、无辜的，我就心安了。我决不计较个人利害，也不愿意说不应当说出的事。周总理两眼一直盯着我，听完我说的话，……然后对我说：'不至于如此，你放心!'"杨尚昆还回忆了周当时的表情："眼睛特别明亮，似乎含着眼泪。" 杨尚昆是一个有着高度组织纪律性的老共产党员，在如此紧张的气氛下，他承受住巨大的精神压力，照常工作，有条不紊地向中办同志办理移交手续，即使对他的老伴，有着几十年党龄的长征老干部李伯钊同志，也口风很紧，不深谈什么。在 11 月 2 日的日记中，杨写道："晚间散步时，同伯钊谈了一下，她有些疑虑，不好向她说明"。这一天，杨"勉强工作到(夜)十二时后"。

杨尚昆对于他的夫人李伯钊是这样，对于中央常委、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也是这样。1965 年 11 月 27 日，是朱德八十大寿的日子，杨去朱德家，"坐了一下，未谈什么，彼此心照而已"。何以如此呢？杨尚昆与朱德都是四川人，也是革命几十年的老战友，杨主持中办二十年，与几位中央常委朝夕相处，彼此间知根知底，有些甚至还知心，即如杨所说的，他与朱德"彼此心照"。朱委员长年事已高，事实上已属赋闲，杨对朱德的境遇一清二楚，而朱委员长对杨的工作调动事却很难说事先予闻。在朱委员长八十大寿的日子里，两位老战友无言默对，情何以堪!

1965 年 12 月，由姚文元评吴晗《海瑞罢官》一文引发的政治风暴已经来临，北京市风紧云急。由于杨已被调离领导岗位，不再参预中央领导事务，故在日记中对这一事件无一字反映，但事实上，当时，杨尚昆透过此事，已预感政局即将面临大变动："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1998 年杨尚昆在文章中回忆到当时的情景)。现在又一位领导同志处于前沿，他就是曾参加约谈杨尚昆的彭真同志。至于彭真被其它领导同志约见谈话，免去职务，则要到半年以后。

1965 年 12 月 8 日，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得知常委各同志都去上海开会去了!"这次会议就是中央"处理"罗瑞卿同志问题的上海政治常委扩大会议。此时，杨根本无法想到这次会议会和自己有何关系，杨事先也无从获悉会议的内容，因为这次连刘少奇也不知道去上海开什么会。上海会议虽与杨无直接关系，但有间接关系，半年以后，杨尚昆被与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同志绑在一起，成为子虚乌有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

1965 年 12 月 10 日，杨尚昆整装登上南下广东的火车，这时，上海会议正紧锣密鼓地进行，杨心情黯然，告别送行的妻儿和中办的同事，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感慨甚多，非言语所能表达，"最后的一句话是："十六年的北京生活，今天开始变了，一切只能等时间!"

杨尚昆历经党内斗争，见识广，心胸开阔，他的气度和忠诚在艰难的岁月里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杨的"等时间"，不是一年两年，这一"等"竟长达十二年。1965 年底杨赴广东后，1966 年 5 月又被下放到肇庆任地委副书记，可谓一贬再贬，任命下达的当天，他以气候潮湿，

身体不适，向中央申请转去山西，得到批准。 5 月下旬，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宣布“揪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后的几天，杨尚昆转任山西临汾任地委副书记。旋即文革爆发，杨被隔离审查，不久即被“监护”了起来，一直被关到 1975 年，邓小平复出，杨才被放出来，安置在山西临汾。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央重新启用杨尚昆，任命杨为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两年后，杨回到北京，开始担负一系列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杨尚昆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革命家，他一生的历史已与党的历史融为一体。他是四川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杨闇公之弟，早年留苏，返国后曾任中宣部部长，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后不久，担任三军团政委，抗战爆发，旋又任北方局书记，1941 年，杨调回延安，工作性质发生了变化，以后长期主持中央办公厅，长达二十年。杨尚昆对党的历史如数家珍，八十年代后，曾负责中央党史领导小组。

杨尚昆也是一位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共产党员，他通俄文，爱看电影(在日记中有其所看电影的大量记载)和戏剧。杨更坚持写日记几十年，临去世前几个月，他还写了回忆周恩来、彭德怀的文章，感情十分真挚，很少有这类文章常见的程式化的味儿。杨在 1995 年完全退下来后，写了他的回忆录的建国前部分，他原还准备写中办二十年，文革前后和复出工作后三个部分，可惜天不假其年，这三部分已永远无法完成了。

即使在文革后期，杨尚昆在临汾流放期间，他也写了日记，杨近年发表的纪念周恩来的文章《相知相识五十年》，就是依据临汾日记集纳而成的。很遗憾，目前读者还不能看到他在文革后期以及恢复工作后的日记——根据杨一生的习惯，相信他在七十年代后期恢复工作后仍会记日记。人们只能指望这些珍贵的日记将来会有向社会公开的一天。

笔者长期治史，虽然只能从资料、影视中接触到杨尚昆，但亦可窥见杨尚昆个性之一斑。依笔者观察，杨是一个豁达、宽和，颇有人情味的老同志。他和夫人李伯钊结缡于 1929年的莫斯科，两人共同走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杨对其老夫人也呵护了一辈子，在其日记中有大量的反映。1979 年，杨在北京偶遇木刻家彦涵，此人抗战时期在太行八路军总部工作，是杨的老部下，1957 年被打成右派，蒙冤几十年。杨对彦涵说：“当时你为什么不找我呀，我给他们打一个电话说一下就完了嘛。”(孙志远《感谢苦难——彦涵传》，页 465，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彦涵是一介书生，不懂也不会请托，但杨的这番话却透出他关怀下属的性情。

1996 年，杨尚昆已 89 岁高龄，带领王若飞、秦邦宪等“四八烈士”遗属 100 余人，专程去延安扫墓。杨尚昆去世后，2001 年 5 月，那些“四八烈士”遗属和其他子弟们也专程护送杨的骨灰回四川潼南老家，只因他们的父母辈在战争年代和建国后的岁月里，都曾得到过杨的关照。

作为一个革命者，一个老共产党员，杨尚昆已走完他一生的路。他肯定是一位令世人难忘的人，他留下的这部《日记》，以及现在暂未发表，将来可能问世的文字，将长久被后人所研究和咀嚼。

第十四篇　我为什么研究延安整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1]一书的《后记》

这本书从酝酿到写作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80 年代初，我产生了写这本书的念头，但促使我对延安整风这一事件萌发兴趣则是在更久远的年代。

我第一次接触到“延安整风”这个词是在文革爆发前夕的 1966 年春。记得有一位前辈学者曾说过，旧中国黑暗的现实，使中国的青少年比欧美国家的青少年，在政治上更趋于早熟。我想说的是不仅在旧中国情况如此，在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情况亦是这样。新中国层 出不穷的政治斗争及其对社会的广泛影响，使我不幸地过早地关注起自己不应该去关心的事情。

我读书启蒙的年代是六十年代初的南京，那是一个政治意识畸形发展的年代。从 1963年初开始，我对母亲订阅的《参考消息》发生了兴趣，经常躲着她偷偷阅读。我也从那时起，养成了每天读江苏省党报《新华日报》的习惯。可是我对那时的社会状况并不清楚—应该说，除了雷锋、革命先烈、越南、红军长征的故事，那时我的头脑中并没有任何其他东西，但是到了 1963 年下半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我愈来愈注意《参考消息》和报纸上刊载的有关中苏两党论战的报道。1964 年春夏之间，我从《人民日报》上看到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在苏共二月全会上作的“反华报告”，第一次看到对毛泽东、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批评—这对于我是一个极大的震动（这份报告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以后我长期保留这份《人民日报》）。我开始思考苏斯洛夫报告中所论及的一些词汇：毛泽东是“左倾冒险主义”、“半托洛茨基主义”、“唯意志论”等等（七十年代，我从内部读物才知道，苏斯洛夫是一个顽固的教条主义者。近年出版的俄罗斯资料透露，1964 年苏共党内的革新势力利用与中共的论战，削弱了斯大林主义者在苏联的阵地，一度遏止了保守势力复辟的势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保守的苏斯洛夫才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作了这个报告）。对于这些话，当时我似懂非懂。我联想自己的日常生活，几年前那些饥饿的日子，我随母亲去南京郊外的劳改农场去探望因“右派”问题而被下放劳动的父亲，1963 年夏，我已被南京市外语学校录取，却因政审不通过而被拒之门外—我对当时的政策居然产生了一些疑惑。不久甚至连小学也讲起“阶级路线”，我因出身问题越来越感到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迎来了文化大革命，也就是在这个

时候，在学校的号召下，我通读了《毛选》1 至 4 卷，我多次阅读了收入《毛选》中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毛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于是我知道了“整风运动”这个词。

紧接着文革爆发，我从每天读的《新华日报》上发现，1966 年 5 月初北京召开的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群众大会上不见了彭真的名字，接下来我就读小学的一些干部子弟（我的小学邻近南京军区后勤部家属大院和《新华日报》社家属区），手拎红白相间的的体操棒在操场上殴打一位“成份不好”的 30 多岁的余姓美术教师，校长兼支部书记则装着什么也没看见。

南京 1966 年 8 月下旬的红色恐怖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我的家庭受到冲击，有一天，我无意中父母的谈话，父亲说，这一次可能躲不过去了，再不跑，可能会被活活打死。父亲终于离家出逃， 躲在山东农村老家那些纯朴的乡亲中避难，不久，我家附近到处贴满了父亲单位捉拿他的“通缉令”。

在文革的血雨腥风中，我看到了多少景象！曾几何时，那些在文革初期指挥揪斗“死老虎”的当权派自己很快也被拉下了马，“周扬 四条汉子”、“彭罗陆杨”、“刘邓陶”像走马灯似地被“扫入历史 的垃圾堆”，真是“一顶顶皇冠落地”！从那时起，我就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报纸上的“排名学”。1967 年初，在南京大学的操场上，我亲眼看见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被批斗，就在半年前，我的小学的校长还是满口“江政委”唤个不停。不久我又去了省委办公大楼，那里正举办所谓“修正主义老爷腐朽生活”的展览，那宽大的带卫生间和休息室的书记办公室，那嵌在舞厅天花板壁槽内的柔和灯光，以及用从缅甸进口的柚木制成的地板，无一不使我头脑翻江倒海。

我的家庭背景使我不能参加这场革命，我在家庭中受的教育以及我从各种书籍中所获得的精神营养也使我不会去欣赏那些在革命名义下所干的种种凌虐人的暴行。在文革前，我家有一个区文化馆图书室的借书证，因此我读过不少中外文学，历史读物。至今我还记得，在恐怖的 1966 年 8 月，我如何从母亲的手中夺下她正准备烧掉的那套杨绛翻译的勒萨日著的《吉尔?布拉斯》等十几本书籍。在焚书烈火中被抢救下来的《吉尔?布拉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普希金诗选、《唐诗三百首》等给了我多少温暖，让我在黑暗的隧道中看到远外一簇光！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希望之光是黯淡和飘忽的。1967 年初，我在家附近的长江路南北货商店墙上看到一张“特大喜讯”的大字报，上面赫然写着叶剑英元帅最近的一次讲话，他说，我们伟大领袖身体非常健康，医生说，毛主席可以活到 150 岁。看到这张大字 报，我头脑轰地一响，虽然有所怀疑，但当时的直觉是，这一下，我这一辈子都注定要生活在毛泽东的时代了。我马上去找我的好友贺军—他目前住在美国的波士顿，告诉他这个消息，我们一致认为，毛主席不可能活到 150 岁，因为这违反科学常识。

从这时起，我在心里悄悄地对毛泽东有了疑问。我知道在中国，一切都凭他一个人说了算，其他人，即使刘少奇，虽然《历史决议》对他评价极高，虽然在文革前到处都能看到毛、刘并列的领袖标准像，虽然

刘少奇夫妇访问东南亚是何等的热烈和风光，但是如果毛泽东不 喜欢，刘少奇马上就被打倒。我又看到自己身边发生的一些事，离我家不远的一个小巷的破矮平房里，住着与我同校但不同班的一对姐弟和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妈妈是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在街道煤球厂砸煤基（蜂窝煤）。因为不能忍受歧 视和侮辱，这位母亲竟失去控制，将毛主席的画像撕碎并呼喊“反动口号”，结果在 1970 年南京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枪毙。召开公判大会那一天，我的中学将所有学生拉到路边，观看行刑车队通过，美其名曰“接受教育”，这姐弟两人也被安排在人群中，亲眼目睹他们的母亲被五花大绑押赴刑场。车队通过后，学校革委会副主任要求全校各班立即分组讨论，于是所有同学都表态拥护“镇压反革命”—所有这一切都让我对毛产生了看法。我知道这些看法绝不能和任何人讲，甚至不能和自己的父母讲，只能深埋在心中。

在那令人窒息的岁月里，没有希望，没有绿色，除了从小在一起长大的贺军，差不多也没有任何可以与之交心的朋友（即使我们之间的 谈话也小心翼翼，绝不敢议论毛泽东），但是，我的心中仍存有一线微弱的光。我的家附近有南京某中学留守处，这个中学已被勒令搬至农村，所有被封存的图书都堆放在留守处的大仓库里，由一姜姓老先生看管（老人是山东人，年青时被国民党拉去当兵，被解放军俘虏后成为“解放”战士）。至今我仍感激这位老先生，是他允许我每周进一次仓库借一旅行袋的书，下周依时交换。正是在那里，我翻检到 1958 年的《文艺报》的《再批判》专辑，因而我第一次读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在那几年，我从这个仓库借去大量的中外文学和历史书籍，至今还记得，孟德斯鸠的《一个波斯人的信 札》、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惠特曼的《草叶集》、叶圣陶的《倪焕之》、老舍的《骆驼祥子》，就是在那个时候读的。1971年后南京图书馆局部恢复开放，我又在每个休息日去那里读《鲁 迅全集》，将包括鲁迅译著在内的旧版《鲁迅全集全部通读了一遍。正是这些作品支撑起我的人文主义的信念。

70 年代中期，国内的政治局势更加险恶，我的一位熟人的弟弟，因愤恨江青的专横，在 1975 年从其位于南京市卫巷家中的阁楼上跳下自杀身亡。我的家也每天受到居民小组老太太的监视，只要家里来一外人，她就站在门口探头探脑，东张西望。1976 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与好友贺军坐在长江路人行道的路边，我背诵了鲁迅的话：“地下火在运行，岩浆在奔突……”（1995 年 8 月底，我与贺军在纽约第五大道的街心花园坐了半天，我们共同回忆起往昔岁月，我们都谈到 1976 年夏在长江路边的那次谈话）。

在文革期间，我读了许多毛的内部讲话和有关“两条路线斗争”的资料，这些资料真真假假，其中不少充斥着大量的歪曲和谎言，然而它们还是激起了我强烈的兴趣。结合文革中所发生、暴露出的一切，以及自己的生活感受，我愈来愈有一种想探究中共革命历史的愿望， 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了延安整风运动—这虽然是距那时以前几十年的往事，但我还是隐约感到，眼下一切似乎都与它有联系。在大字报和各种文革材料中，我难道不是经常读到毛和其他“中央首长”的讲话吗：什

么“×××最坏，在宁都会议上，他想枪毙我”，“刘少奇在抗战期间勾结王明反对毛主席的独立自主方针”，什么“×××在延安审干中查是自首分子，因此对他控制使用”，还有“王明化名马马维奇在苏联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等等。

在那些年里，我虽然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却不知填了多少表格，从小学、中学到工作单位，每一次都要在“政治面貌”、“社会关系”栏内填写老一套的内容。看看周围的人，大家也一样要填表。我工作单位的人事干事是从老解放区来的，她说，这是党的审 干的传统，是从延安整风开始执行和推广的，那么延安整风运动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带着这些疑问，1978 年秋，我以历史系作为自己的第一选择，考入了南京大学历史系。

1979 年后的中国大学教育开始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我经历了那几年由思想解放运动而带来的震撼并引发了更多的思考。在课堂上，我再次听老师讲延安整风运动，我也陆续看到一些谈论“抢救”运动的材料，然而所有这些都在维持一个基本解释：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1979 年我还读到周扬那篇有名的文章《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周扬将延安整风与五四运动、70 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相提并论，谓之为“思想解放运动”。在大学读书的那几年，我知道，虽然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已被批评，但毛的极左的一套仍根深蒂固，它已渗透到当代人思想意识的深处，成为某种习惯性思维，表现在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就是官学甚行，为圣人避讳，或研究为某种权威著述作注脚，几乎成为一种流行的风尚。当然我十分理解前辈学者的矛盾和苦衷，他们或被过去的极左搞怕了，或是因为年轻时受到的《联共党史》、《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思想训练太深，以至根本无法跳出官学的窠臼。

然而，我难以忘怀过去岁月留下的精神记忆，刘知几云，治史要具史才、史学、史识，其最重要之处就是秉笔直书，“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我难以忘记 1979 年在课堂上听老师讲授司马迁《报任安书》时内心所引起的激动，我也时时忆及范文澜先生对史学后进的教诲：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所有这些都促使我跳出僵硬教条的束缚，努力发挥出自己的主体意识，让思想真正自由起来。从那时起，我萌生一个愿望，将来要写一本真实反映延安整风的史书，为此我开始搜集资料。

由于延安整风在主流话语中是一个特殊的符号，有关史料的开放一直非常有限，这给研究者带来极大的困难，但在 80 年代以后，中国也陆续披露了某些与延安整风运动相关的历史资料，除了少量档 案、文件集外，也出版了不少回忆资料，这给研究者既带来了便利， 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这就是如何分析、辨别、解释这些材料。应该说，我在中国大陆长期的生活体验以及我对有关史料的广泛涉猎，加强了我读资料的敏感性，我逐渐能够判断在那些话语后面所隐蔽的东西。

经过对多年搜集、积累资料的反复研究和体会，我头脑中的延安整风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我开始发现散乱在各种零碎资料之间的有机联系。1991 年 8 月中旬我开始动笔,到1992 年下半年，我已完成初稿的三分之二。

从 1992 年下半年始，我的写作速度慢了下来，一则日常教学工作十分繁重，牵扯了我不少精力；二则我需要更广泛地搜集、阅读各种资料。

1995 年夏—1996 年秋，我有机会去设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作访问学者，我在美国的研究题目与延安整风无关，但我仍利用在华盛顿的机会，在国会图书馆工作了一个月。但是很遗憾，国会图书馆中文部虽然收藏十分丰富，但 是几乎找不到有关延安整风的材料。1996 年 10 月我返国后，又重新 开始写作，到了1998 年夏，全书已经完成。我又用半年时间对书稿作了 3 次修改补充，于 1998 年底，全书杀青。1999 年初交稿后，在编辑校对阶段，我接触到若干新材料，对书中的个别内容再次做了充 实，于 1999 年春夏之交，全书最后定稿。

我写这本书在思想上一直以求真求实为依归，在写作过程中，始终遵循据事言理的治学方法。我以为，重要的是，首先应将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叙述清楚，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数十年意识形态的解释学早将当年那场事件搞得云环雾绕，面目不清。为此我作了大量的工作，对各种重要和非重要的资料进行点滴归拢，爬梳鉴别，再对之反复研究体会，使之融汇贯通。这方面的工作用去我最多的时间和精力。我不反对对延安整风这一重大现象进行严谨的理论分析，且认为，这个工作极为重要，但是我又担心过度解释而妨碍读者自己的判断。陈寅恪先生言，“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滴水观沧海”，因此在本书中，我从实证研究的角度，以分析性论述的方式展开，这也与我个人比较重视历史的个案研究有关。

在写作此书的 7 年里，我一直怀有深深的遗憾，这就是，我无法得到更重要的原始资料。众所周知，有关延安整风期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中社部、中组部的档案文献，除少量披露外，绝大部分迄今仍未公开。1992 年，我看到一位负责人在中央档案馆的讲话， 他说，鉴于苏东巨变的深刻的历史教训，应该加强对档案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他指出，中共档案资料的保管，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我可以理解这位负责人的观点，但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却为不能阅读利用这些珍贵史料而感到无穷的遗憾。

由于这是一本站在民间立场的个人写作，十多年来我从自己不多的工资里挤出钱购买了大量的书籍资料，我从没有以此选题申请国家、省级或大学的任何社科研究项目的资助，我知道，即使申请也不会成功。所以我的另一个遗憾是，我无法对一些当年参加过延安整风运动的人士进行口述采访，如果我做了这样的工作，一定会对本书的内容有所充实。最后，我的遗憾是我应该去莫斯科搜寻有关资料。90 年代后，莫斯科开禁历史档案，涉及40 年代苏共与中共交往的文献记录也已开放。中国历史学会的沈志华博士近年来为搜集这些史料作了大量工作，他并已将其中某些材料转送北京研究者（沈博士告诉我，苏共与中共在延安整风期间交往的史料很少），因沈博士去美国，一时联系不上，这也使我深感遗憾。

伏案几载，每天神游于当年的历史景像之中，自然会对延安整风运动及其相关的史事与人物产生种种体会，这方面的体会与感受的绝大部

分已化为书中的叙述，但是还有几点需在此予以说明：

1、予生也晚也，未能躬逢中共草创革命的年代。吾细读历史，站在 20 世纪全局观二十年代后中共革命之风起云涌，心中自对中共革命抱持一种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吾将其看成是 20 世纪中国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运动的产物，认为在历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价值和意义。

2、从中共革命夺权、推翻国民党统治的角度观之，延安整风运动对于中共革命成功助力巨大，但是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某些概念、范式以后又对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产生若干消极作用，极左思想、权谋政治汇溪成流，终至酿成建国后思想领域一系列过左的政治运动直至文革惨祸，真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所幸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已逐步走出过去那种怀疑一切，无情斗争的极左道路，但旧习惯思维的清理仍需长期努力。吾期盼旧时极左的“以我划线”、权谋政治永不再来，国家从此能步入民主、法治的轨道，如此，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3、本书涵盖面颇宽，涉及中国现代史上许多著名人物，对于本书所论及的所有人物，我只将其看成历史人物，不存任何既定的好恶偏见，主观上力求客观公允，“不虚美，不隐恶”。当然任何研究都不可能完全排除作者的价值关怀，陈衡哲先生曾说过，“若仅缕述某人某国于某年征服某地……那有什么意思”，说的也是研究者的价值关怀问题，只是这种价值关怀不应妨害到叙述的中立和客观。如果说本书叙述中有什么价值倾向的话，那就是我至今还深以为然的五四以后的新价值：民主、自由、独立、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

在写作此书的几年里，我得到了一些朋友的宝贵的支持和鼓励，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谨向他们表示真挚的感谢。

上海师范大学的许纪霖教授多年来一直关心我研究的进展，他还热情的为本书的出版提出许多好的建议。在与许教授的交往中，他的深厚的学养和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卓越见解总是使我深获教益。

我衷心感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金观涛教授和刘青峰教授。他们对本书的出版提供了热情的帮助，在本书定稿过程中，他们提出一些富有启迪性的建议和意见，对于本书臻于学术规范化的要求，有重要的作用。

我也向我的同事，南京大学历史系颜世安教授和我的好友，现旅居美国的贺军先生表达我的感激，他们的友谊和支持，对于我一直是一个激励。

我曾与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孔斐力教授（Philip Kuhn）和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问题研究院“华盛顿— 南京办公室”主任甘安哲博士（Anthony Kane）有过多次关于三十至四十年代中共党史问题的愉快的讨论，他们的支持和鼓励对于我的写作是一种推动。

在写作此书的几年里，我始终得到我过去的学生甘思德（Scott Kennedy）和唐山（Jeff Zuckerberg）的关心和帮助，我的研究生郭洵澈对 我帮助尤大，他不仅帮我用电脑输入文字，还与我分享了讨论的乐趣，在此我向他们表示深切的感谢。

我也向本书所引用文字的作者、编者表示我的谢意，我虽然在引述文字时都做有详细的注释，但没有他们提供的资料基础，我要完成这本书也是不可能的。

我要向本书的编辑郑会欣博士表达我深深的谢意，郑博士自己有大量的研究任务，但是他还是拨冗为本书做了许多琐细的工作，他的慷慨相助对本书的出版有重要的帮助。

1998 年夏秋之际，我有机会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作访问研究，在“大学服务中心”得到熊景明女士的热情接待和帮助， 在这个收藏丰富的史料中心，我为本书补充了若干新的资料，在此向 熊景明女士和“大学服务中心”表示谢意。

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的老师们多年来在图书资料方面给了我许多帮助，对他们的友好、善意和敬业精神，我深表感激。

最后，我要深深地感谢我的妻子刘韶洪和儿子高欣，我的妻子在每天工作之余，承担了大量的家务，使我可以专心致志进行研究，她还为书稿作了一部分的电脑输入工作。为了写作这本书，许多年我不能和妻子、孩子一同出外游玩，也不能与孩子经常讨论他的功课，没有他们的支持、帮助和理解，我要完成此书是完全不可能的。

第十五篇《七律·有所思》看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运思

古曰："诗言志"，作为二十世纪巨人的毛泽东，他所创作的绝大多数诗篇都与他的政治理想和报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966 年 6 月毛泽东写就的七律《有所思》就是这样一首政治诗篇，它真切地透露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复杂运思。今天我将从历史的角度来谈毛的这首诗所透露出的丰富的意涵，我给自己的要求是：1，所谈的都要有历史资料的依据，并兼顾到资料的平衡性，2，尽量做到客观，中立，当然研究者不可能没有自己的价值倾向，但要有所克制。

我先简单说一下这首诗的背景。1966 年 6 月，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降临北京，月初的第一天，刚刚改组的《人民日报》以通栏标题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将 5 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迅速传向全国。6 月 2 日，《人民日报》发表支持聂元梓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次日又公布北京新市委成立的消息，影响所及，北京及几个主要城市的大学首先陷于动荡，继北大的陆平、彭佩云被宣布为"反革命黑帮"之后，北京和各地众多大学的书记、校长纷纷倒台。为了取代已"烂掉"的各大学党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主席依照历次政治运动的传统办法，向各大学和文教单位派出暂行党委职能的工作队。在他看来，这是新一轮的反右运动，只是运动的规模要大大超过 1957年[1].刘少奇和其他领导同志都对这场来势凶猛的运动有些摸不着头脑，他们都惦记着四清运动还没有结束[2]，同时，他们也不清楚毛泽东对这场新运动的具体想法。但作为中央第一线的领导人，刘少奇等必须承担起指导运动的责任。

刘少奇作为党的第二号人物，对党中央的某些最新重大决策知之有限，这是很不寻常的。半年前的 1965 年 12 月上旬，刘少奇忽接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直飞上海，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匆匆赶到上海的刘少奇下榻于锦江宾馆，但毛泽东、林彪均不住此。刘对即将召开的会议内容一无所知，竟向贺龙打听，对方回答：你都不知，我怎么会知道[3].很快，谜底终于揭开，这是毛泽东临时决定为解决罗瑞卿的"问题"而召开的会议。同样的情况几个月后再次重演。1966 年 3-4 月，正当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出访阿富汗、巴基斯坦、缅甸等国，在返回昆明接到通知于 4 月 20 日赶往杭州出席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时，等待他的已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被打倒的既成事实[4].进入 5 月，远在杭州的毛泽东又命刘少奇在京主持解决"彭罗陆杨"问题的政治局扩大

会议，却由康生在会上传达毛的最新指示。在这次历时 23 天的会议上，刘少奇扮演的只是一个会议召集人的角色，对会议的议程、全会通过的文件，无任何置喙的余地[5].6 月 1 日，又是在刘事先完全不知晓的情况下，毛泽东命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由于对许多重大决策并不知情，刘少奇等急于想了解毛泽东对运动的意见。6 月 9 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前往杭州向毛请示是否向大专院校派出工作队？然而，毛说话却模棱两可，让刘等相机行事。刘少奇对这种情况并不陌生，多年来，经常也是这样，有时，毛会具体指示什么；有时，又深藏不露，说的话上下几千里，全靠刘自己去领会、揣测.为了确保准确执行毛的指示，刘少奇还是每周向在外地的毛书面汇报工作一次。

1965 年国庆节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南方，至 1966 年 7 月 18 日返回北京，在外地长达 9 个月，为毛历次巡视时间最长的一次，所思所行都围绕着一个中心：酝酿文化大革命。1966 年 6 月 18 日，毛泽东在极秘密状态下，住进了韶山的滴水洞，前后待了 11 天。据跟随毛住进滴水洞的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耀祠回忆，在这十余天中，毛“任何人都不见，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外，就是思考问题”。毛“有时拿着书躺在床上看，有时又象烦躁不安”。喜欢户外活动的毛这次一反常态，仅让张耀祠等人用轮椅推着离开洞口不过三百米，而毛的习惯是，“一有重大事情，一般不出来散步，或者散步时间很短”[7].形迹隐密的毛泽东在滴水洞陷入深深的思考。1966 年 7 月 8 日，他在武汉给江青写下那封著名的信，可以判断，这封信的基本内容是在滴水洞形成的。除了这封信外，毛在这段期间有无其无其他抒发胸臆的文字？对此，外界长期不得而知，直至 1996 年 9 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诗词集》，人们才知道，毛在 1966 年 6 月还写有一首《七律?有所思》，也是谈他对文革感受的，只是毛未注明写作此诗的地点。

毛泽东《七律?有所思》全文如下：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毛写这首诗正是在他发动文革的关键时刻，今天我要谈的“文革的发动”包含两个方面的问题：毛为什么要发动文革？文革是如何发动起来的？我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有两方面的动因，第一个因素：文革集中体现了毛对他所理想的社会主义的追求；第二个因素：他认为自己已大权旁落，而急于追回，这两方面的因素互相缠绕，紧密的交融在一起。

先说第一个因素，毛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他所理想的新世界究竟是什么？在毛的五十年代后期以来的言论中，特别在 1966 年的“五七指示”中都有所反映，这就是一个高扬革命精神，保持革命战争年代高昂理想主义和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摆脱物质追求，思想不断“纯化”的新天地。可是用什么方法来实现这一伟大的理想目标呢？用毛的两个概念就可以概括：那就是大抓阶级斗争和“斗私批修”——为了实现理想社会主义的目标，必须进行持续的阶级斗争，在经济和社会层面，就是不断

提高“公有制”的含量；而在思想和政治层面，就是不断清除各种“剥削阶级和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在大风大浪中培养无产阶级新人，而斗争的主要对象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毛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在五十年代后期越来越激进，到六十年代进而发展到，把 1949 年后接受新中国教育，已加入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也看成资产阶级，甚至更加极端，把那些很早就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高级干部，也看成是“老反共分子”。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都重点强调文革的打击目标是“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充分表达了毛的这个基本思路。

毛对市场的排斥，是和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一致的；毛对“走资派”的看法则是一个创造，但以后在这个问题上，毛的思路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最先认为“走资派”属于“敌我矛盾”，到 1968 年后改称为“犯了走资派错误”；毛对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的判断，则不符合原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划分阶级的依据是根据财产占有的多少，而不是根据思想意识。1966 年文革爆发，毛将红卫兵给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对联：“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改动一字：“池深王八多”.毛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尤其是对人文知识分子的反感和排斥，流露出的是“反智主义”的情绪。

那么 1960 年代，中国又有哪些事使毛不满意呢？首先是他对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在六十年代初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感到很不满意，认为刘少奇“右”了，然而事实上刘少奇是正确的。在六十年代初那些严峻的日子里，大跃进运动的乌托邦的狂热造成的巨大的破坏使刘少奇中央领导同志等痛定思痛，痛定思安，他们心里清楚，在党犯下的错误中，毛占的比重最大，当然他们对大跃进的损失和灾难也都负有责任，他们愿意弥补这种损失和灾难，因为他们的心里都知道，在和平时期饿死几千万人不是小事情。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田纪云当时在基层，他对当年所经历的一切有刻骨铭心的亲身感受，他说：“回顾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闹浮肿，饿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比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死的人还要多。是什么原因？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现在看基本上是人祸，这个”人祸“就是瞎指挥，就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左倾机会主义“[9].从当时的历史资料看，毛泽东也参与领导布署了全国的救灾救荒的工作，而处在中央一线的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更对老百姓怀有愧疚感，他们在非常困难的形势下，承担大量繁重的具体工作，努力恢复常规，秩序，挽救国民经济，把毛搞大跃进的一套（用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方式搞建设）束之高阁，或悄悄做了转换。刘少奇等还对内调整阶级关系，安抚知识分子和原工商界人士，给被打成”彭德怀分子“和”右倾分子“的几百万干部平反，并着手准备给 1957 年被打成右派的人搞”甄别“；对外希望缓和和苏联的紧张关系，调整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减少过量的对外援助；刘少奇等为了维护毛的领袖威信，对特大困难的解释是”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我记得当时小学老师说，猪肉是给苏联还债了）；刘宣布，大跃进不搞，但保留”三面红牌“的牌子；其它人都可平反，彭德怀等四个人不平反，刘在”七千人大会“上说，彭德怀给毛写的信没问题，彭的问题是”里通外国“。

刘少奇本是想为毛开脱，当然也是为他自己开脱，却把问题搞的曲

曲弯弯，反而使自己不能理直气壮。刘少奇可能以为毛是会领他这份情的，谁知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毛对刘很是不满，毛判定，神州开始“有事”了[10].因为在毛看来，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就是“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最多再加上一个“没有经验”。毛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右倾分子”不能一风吹，“右派”更是不能平反。毛坚信他和大跃进并没有错，反右运动更不错，大跃进就是多付出一点学费，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有些损失不算什么，关键是六亿人口的国家不能泄气。和刘相比，毛是一惯性到底，绝不松口，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期间说“责任田是走资本主义路”，又默任下面搞“三自一包”。当然刘少奇这么说，这样做都是有难处的，因为在刘的上面有毛这样的强势领袖压着，而且多年来的极左已使一部分同志的思维完全僵化了，极左的一套积重难返，刘少奇必须考虑到转弯子不能太快，可是这样一来刘也就使自己进退失据了，缺少了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应有的一惯性了。

就在这前后，一些特别敏感的现象也发生了，使毛泽东受到更大的刺激：1961 年 4 月，发生了“录音事件”（即文革中广为传播的“*********事件”），使毛极为震惊，但在当时，只是由中央书记处对有关部门的几个工作人员进行了处分，毛在震怒之余对此事并没有加以深究，中央办公厅的负责干部在事后继续留任原职。[11]但此事的后果十分严重，联系到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前后的一些说辞，诸如：“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一代不揭，下一代揭”，“我当国家主席出了这种事”，“现在是非常时期”，“恐怕不能再说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等等，毛对中国党内是否有人也想仿效“赫鲁晓夫作反斯大林黑报告”的警惕大大加强，而毛的被伤害的感觉也更加强烈。与此同时，思想文化界出现了一些针贬时弊的作品，例如邓拓等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等；一些高中级干部通过不同的方式，呼吁要为彭德怀平反；1962 年 8 月初，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再版，全党开始学《论修养》，毛面临着建国以来最大的压力，刘少奇的威望急速上升。

毛的反映是“硬着头皮顶住”，但在当时形势的巨大的压力下，他还是在“七千人大会”上作了简短的自我批评，但内心是不悦的。毛忍耐了大半年，看到经济好转已成定局，于 1962 年 8 月开始反击，毛的法宝是重提阶级斗争，反击资本主义复辟，一下子就站到了革命的制高点上，使刘少奇等无法不接受。因为强调“阶级斗争”在 1957 年后一直是“主旋律”，谈阶级斗争是正统，不谈，少谈就是修正主义，而刘少奇也是这套叙述的主要创造者，他就是在六十年代初很短的一段时间里，才淡化了阶级斗争的宣传。现在经济好转，在毛的压力下，刘也认可应当重拾阶级斗争的口号了。所以，刘对毛重提阶级斗争并没有反对，只是希望别影响到经济的继续调整。他对毛批评的几个重要干部，例如：邓子恢，王稼祥，李维汉，以及习仲勋，贾拓夫等，也没有伸出援手。毛看到了刘的这些表现，在“敲打”了他几下后，就暂时放过了他，一来刘愿意改，迅速跟上了毛的调子；二来刘在北戴河会议上已认错，虽属轻描淡写，但已是自我否定，从而证明了毛的主张的正确性；更重要的是，当时经济刚刚恢复，刘的威望又很高，党内不宜有大波动。毛在当时和随后的几年对国家形势做了非常恐怖的描述：“城乡出现了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1964 年 2 月，毛对来

访的金日成说，在中国各种“搞地下工作”的坏人有 1000 万人，毛计算了一下：在 6 亿 5000 万人口中，这种人就占了 1/65，就是 65 人中有 1 个[12].继而毛表现出对“官僚体制”的极大的厌恶，他提出“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的概念，严厉指责“城市老爷卫生部”，“帝王将相部”，“洋人死人古人部”，1965 年初，毛更提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

毛的这些激愤之词不仅是对当时党内外形势的一种过份反映，也流露出对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等的强烈不满，严格说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困难时期部分地区在上级默许下推行的“三自一包”和农村中一度出现的商品流通现象（所谓“长途贩运”，“投机倒把”）是使农民活命的非常之举，刘少奇等并非有意和毛对抗，刘等对农民让步，实属不得已而为之；至于城市里的资本主义复辟，更是子虚乌有，也就是在 1961-1962 年，刘等才对知识分子、原工商界人士采取相对温和的政策，并让一些古装戏重上舞台，批准放映一些香港左派电影和少量外国“进步电影”，从而使多年紧张的社会空气有所舒缓。

然而，毛在六十年代对“官僚体制”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触及到新中国建立后体制上的某些弊端，这主要是官僚主义和干群矛盾的问题。1949 年后，中国建成了历史上最完密的自上而下的国家管理体制，由此形成中国历史上最庞大的干部官员队伍。部分干部欺压群众，利用特权，多吃多沾，进而贪污腐化，引致群众强烈的不满，这种情况历来如此，中央虽三令五申，也用“学习”，“整党”的方式予以解决，但一阵风过去，依然如故。刘少奇 1964 年指导四清，把打击重点放在基层干部，本意也是想解决这个老大难的问题。

毛看到了官僚特权的弊端问题，1964 年他提到“高薪阶层”和“工人贵族”的概念，但从历史事实看，当时的中国并不存在“工人贵族”。据上海总工会的统计：上海全民所有制职工的月平均工资：1952：65.18 元，1957 年：71.56 元，1965 年：69，58 元，1966年，66，53 元，1967 年：57，16 元。在 1961—1965 年：月工资在 40——60 元的，占职工总数的：89.69，月工资在 71——80 元的，占 0.48；在 81——90 元仅占 0.07[13].这个数字除去上海地区工资差别的因素外，比当时的一般基层干部的收入，包括一般知识分子的收入都高一些，（南京地区的大学本科毕业生转正后的月工资是 53，40 元）和农民相比当然很高，但是在那个年代，工人和农民的收入不是一个概念。

被毛批评的“高薪阶层”确实存在，高薪者主要是党和军队中的高级干部，民族资产阶级，少数名演员和少数高级知识分子。资料显示：1957 年的少将月薪是 350 元；军队正营干部月薪是 145 元；1956 年 16 级干部月薪 110 元，17 级干部月薪 94 元。除了军队中高级干部和地方 13 级以上高干的工资较高外，地方一般中级干部的工资和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的差距相差两倍左右。1956 年一级教授月薪为 345 元（南京：333 元），但全国只有 56 个一级教授[14]。

在大力推动国家工业化的五十年代，毛是绝不允许谈论这些问题的，尤其不允许进行工农收入的比较。广大农民看病难，建国以来一直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和此相对照的是等级严格的干部保健制度，这种医疗保建制度由来以久，当然是有问题的，可是过去毛未曾严厉批

评。六十年代初他注意到“高薪阶层”的问题，在这前后他更注意到“干部生活特殊化”的问题，这对他是一个飞跃，可是用阶级斗争的概念来解释这些现象是不准确的，因为那些高薪者并不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是“官僚主义者”或“官老爷”，最多就是贪图舒服，在群众面前摆威风，欺压群众，欺上瞒下，这是一种特权行为。毛批评官僚主义和官僚主义者无疑是正确的，因为说到底，特权行为是和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及共产主义原则相违背的。然而，二十多年前，王实味在延安就批评过这种现象，却被认为是“反党”；1957 年，一些知识分子和群众又提出这个问题，被指责为“攻击党的领导”，“挑拨党群关系”，都被打成“右派”，送去“劳改”。在中国，在苏联，批评干部特权一直是一个禁忌话题，过去托洛茨基解释这是“工人国家蜕化”；以后南斯拉夫的杰拉斯（即旧译德热拉斯）说，这是“新阶级”，苏联人骂杰拉斯是“修正主义者”，中国也骂他反动。故而苏联看到六十年代初毛的批判官僚特权的言论，攻击毛是“半托洛茨基分子”。应该指出，毛批评苏联东欧国家出现了“特权阶层”是完全符合实际的，而指责毛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特别是勃列日涅夫及其亲信，还有跟着苏联跑的东欧国家的多数领导人，以及不跟苏联跑的罗马利亚的齐奥塞斯库夫妇，他们都是一群热爱美食、好车和别墅，以及黄金饰物、高级礼品的特权分子。在苏联东欧国家，干部的权力来自上级机关的任免，工人和群众没有监督权和罢免权，也不存在真正的舆论监督，确实早已形成一个特殊利益群体或特权阶层。

毛主席希望中国避免苏联出现的情况，主观愿望是好的。他认为干部的变坏是下面几个原因：1，本来就是地主资产阶级分子，混入党内，即所谓“阶级异己分子”；2，好人成了“蜕化变质分子”，“忘了本”，被地主，资产阶级用“美人计”和几斤肉，几瓶好酒，几条好烟等拉下了水；3，脱离群众，脱离劳动所造成。而解决的办法是：1，干部参加劳动，2，加强思想学习，3，间隔用搞运动的方式来清洗干部队伍。但毛在六十年代以前却是长期默认“反领导就是反党，就是反毛主席”这个规则的，这是 1957 年反右派运动的铁的逻辑，给全国人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但是到了六十年代初，毛好像改变了，是什么原因使他改变的呢？可能毛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干群关系表面好像没有问题，但矛盾在增长，苏联存在的问题，在中国同样也存在。1962 年初，大饥荒带来的破坏还没有恢复，全国人民都在节衣缩食，中央布署给 17 级以上干部提供副食品补助，广大干部都感谢刘主席，刘被认为是爱护干部的，而许多群众对此强烈不满。

毛做了一些努力来“缩小三大差别”，例如：要求干部参加劳动，1965 年取消军衔制，高级干部降低工资等，文革初期毛又大力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但从以后的大量事实看，毛的反官僚主义，支持群众“大民主”的思想和行为又是充满矛盾的。

1，文革初期，毛支持群众造反，但没过两年，就在群众中“清理阶级队伍”，大抓“五一六”；对文革中的“异端思潮”绝不容忍，“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红卫兵的“捉鬼战歌”：“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文革中的社论语言：“谁敢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

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就集中反映了那个年代社会意识的强制性质。

2，毛要建立新文化，培养无产阶级新人，鼓励“五不怕”，但文革的“破四旧”，“建立新文化”却是以禁绝中外一切文化的“反智”和暴力破坏的形式出现的。用国家的力量推行“革命样板戏”，实际上是“假大空”泛滥，文坛一片肃杀，“文艺革命”的后面其实是文化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毛喜爱传统戏曲，有关部门在文革时期秘密组织著名演员为毛排演“折子戏”，再予以录像，送北京给毛欣赏。江青也利用特权欣赏“封资修”。文革期间，全国城市职工，包括干部，都没有调整工资，只有江青例外，从 9 级调到 6 级，月工资 342.70 元。

3，为了标明和“刘少奇路线”的区别，毛大力支持“新生事物”，例如：批判工厂管理中的“管、卡、压”，“下放科室人员”，大办“七二一工人大学”，主张“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这些都反映了毛对理想的社会主义的追求。工农兵上大学是好事，但在这个好事的背后是对其它群体关起了大学之门，又造成新的不平等。文革后期，毛甚至对一些人利用干部资源“走后门”读大学表示理解和支持，毛的那句名言：从前门进来的不一定是好人，从后门进来不一定是坏人，从字面上解释，这句话并不错，却使早已习惯于毛氏“二分法”的许多群众大惑不解。在文革中农村教育和合作医疗都有一定发展，对农民有所帮助，这些应予肯定，但是农村中小学的发展和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的出现没有对城乡二元结构有任何触及，更没有解决农村的核心问题：农民的温饱和生活长期贫困的问题。

曾经担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说：“1977 年 6 月，党中央派我到安徽当第一书记。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又是‘左’倾错误的重灾区。‘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学大寨的那一套‘左’的东西特别积极，农村问题特别严重，农民生活特别困难……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样子，门窗都是泥土坯的，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没有了？”“我刚到安徽那一年，全省 28 万多个生产队，只有 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 60 元，40 元以下的约占 25%，我这个第一书记怎么能不犯愁啊？”“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15]

田纪云回忆到：我本人 1965 年在贵州也曾率团到农村搞“四清”，亲历“人民公社化” 的所谓“优越性”。人民公社一般是一乡一社或一区一社，以生产队（自然村）为单位，集体吃饭，打钟上工，敲锣下工。一年四季，何时下种，种什么，何时收割，怎样收割，一切听从公社指挥。那个时候，农民要想务工经商，会被当成不务正业，搞点家庭副业还会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一家养几只鸡都有规定，超过是不行的。哪块地种什么都要按上边的命令做。行距、株距都规定的很细。种的不对，就要拔掉。在这种制度下，农民简直成了公社的“奴隶”，失去了生产的自主权，更没有产品的支配权，也就没有了生产的积极性。劳

动时社员们像一把扇面，一字排开，一小时休息一次，一次半小时，实际上出工不出力，磨洋工，聊天、吹牛、说空话。结果是，公共食堂办了不到一个月就垮了，连稀饭也喝不上了。中国农民被折腾得够惨啊！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16]

消灭农村市场因素，确立城乡二元体制是毛及中央强力推动的，这和五十年代国家强力推行工业化有关，农民长期贫困则是和公社体制相联系的，这种体制又被毛理解为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而坚决维护。文革中的“制度创新”反映了他对创建一种新制度的理想，但这些又都是围绕毛的政治目标来布局的。毛在文革前夕和文革期间的思想和实践表明，他是激进的左翼，是运用一切方法，包括传统的思想资源和方式来实现其理想和意志的左翼，同时他又有着“左翼的限度”，毛不时会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从他的左翼的高度后退，说到底这是因为毛有着互相矛盾的两面：他既是他所创造的体制的最大的造反者，又是这个体制的最大的维护者，他的内在的紧张性就在这里。

无可置疑，毛发动文革，是要用他的思想改变中国，他也要拿回他感到已旁落的大权。“大权旁落”是毛自己这样说的，现在流行一种分析模式，好像一论及毛的这个层面，就是不“深刻”，不“学术”，其实这是非常荒谬的。因为毛是何等人物，他哪是一个单纯思想人物？他是世界最多人口的国家的最高领导者，所以我说毛不仅是大思想家，他还是大政治家，他有两个基本的层面：思想的层面和政治操作的层面。

毛觉得因他退据二线，中国和党内出了大问题了，他说，他是有意“大权旁落的”，却没料到，刘等是不堪信任的。1964 年 12 月，刘和毛就“四清”问题发生争论，刘又在毛讲话时打断他的话头，虽然事后刘向毛作了自我批评，但此事在毛眼里，非同小可，联系到几年来刘的一些思想主张，特别是 1964 年下半年刘搞“四清”的一些作法，毛判定刘有“取而代之”之意图。刘向毛检讨，说对毛尊重不够，但在毛看来，这不是什么“尊重”和“不尊重”的问题。用毛的话说，在原则问题上，他是不会作出任何让步的。毛将几年来这些分散的现象加以综合化，得出的结论是，自己的话在中国已不管用了，刘少奇等要把自己变成“牌坊”[17].

1964 年 12 月 26 日，毛 71 岁生日这一天，他难得的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设下宴席，请中央领导和一些劳模出席，事先他就准备在这个宴会上给刘少奇等一个突然袭击。据当年在毛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的回忆，那天毛的女儿希望参加生日宴会，但是遭到主席的拒绝。毛对其女儿说，“你今天不能去，爸爸我要骂娘”[18].果然在宴会上，毛严厉斥责中央领导同志，使他们如坐针毡[19].1964 年末，毛又当着其他领导人的面，训斥刘少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20].现在毛要“反潮流”，要象孙悟空那样，搅它个“周天寒彻”。

毛以后说，从 1962 年“七千人大会”，他就看出问题了，但是看出问题和要解决问题还不是一回事，这就是看他有没有解决问题的现实的能力。此时毛要解决刘少奇问题的条件并不成熟，简言之，毛在形式上已退据二线，刘处在一线，而且刘的这个地位，也是毛一手促成的，从 1945 年中共七大，刘就是第二把手，二十年来全党也接受和习惯了刘的这个角色，刘好像干得还不错，威望越来越高，刘对全党的领导也基

本形成了，中央的同志看起来也很团结，面对这个局面，毛只能采取迂回的办法。

毛虽面临困难，但他毕竟是全党的伟大领袖，他掌握的各种有形和无形的资源是巨大的，首先毛拥有领袖的巨大的威望。虽然因大跃进的失败，毛在党的高级干部心目中的威望已受到严重损害，但是党有严格的纪律，对毛的不满言论绝不会在党的会议上提出和交流；刘少奇等为了维护毛和党的团结，绝不允许在党内非议毛；在困难时期的老百姓中，虽然也出现了对毛的议论，但除个别以外，都被视为是“反革命”言论和“反革命”行为被迅速严厉地镇压下去了，在中国，除了幼儿，个个都知道，“反对毛主席，就是现行反革命”。尽管如此，毛还是心知肚明，党内外都有一股非议他的潜流，怎么办？是放任自流，还是迎头痛击？毛选择了后者，当务之急就是突出宣传毛和毛泽东思想，以修补受到损伤的伟大领袖的威望。毛亲自出马，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要求全党学习毛泽东思想，林彪也在这关键的时刻站出来，号召全军学毛选，毛随即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在林彪的鼓动下，对毛的大规模的个人崇拜越演越烈，刘少奇虽想降温，但无可奈何，因为刘少奇是最早宣传毛和毛思想的，他过去在这方面的工作，做的最多，如果限制林，一来会使毛和林产生严重误会，二来也是对他自己历史的否定。

其次，中苏论战给毛提供了把国际和国内反修战场连成一片的正当性。刘在六十年代初做的是：在外面反修（但不要和苏联的关系搞得那么紧张），而在国内实行一条务实的路线，但是这一来就有了矛盾和断裂，毛则理直气壮，占领了反修的制高点。毛说苏联变修是在苏共二十大后，其关键点就是大反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对内不搞阶级斗争，只搞经济建设，奖金挂帅，对外和美国缓和关系，投降帝国主义。毛在 1964 年说：中国的修正主义者，对内搞“三自一包”，对外搞“三和一少”。毛还抓住中苏关系紧张的事，调动全党全民的爱国主义的热情，例如那个年代老百姓都知道：苏修卖给我们的机器傻大黑粗，价钱还贵。刘少奇只能跟着毛的调子反修，但刘作为“反修战士”，总显得底气不足，因为“1962 年的右倾”成了他挥之不去的梦靥，没有几年，毛果真就给刘戴上一顶铁帽子：“中国的赫鲁晓夫”。

再次，所谓“一线”和“二线”的模糊性，给毛的反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一线”和“二线”最早是在 1953-1954 年提出的，不久就引发了“高饶事件”。1959 年，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刘的“接班人”地位似乎尘埃落定，但在 1960 年上半年，毛仍在前台，在那之后到 1962 年上半年，毛有两年的时间似乎在“二线”了，那是因为出现了全国性的大饥荒和特大经济困难。从 1962 年下半年后，毛又走到前台了。刘主持一线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毛不在北京的时候，由刘主持政治局会议，但所有的决策，所有的重大的人事任命和所有的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都得由毛决定，拍板。严格说，毛一天也没有退出一线。但毛所处的“二线”地位给了他很大的便利，他可以不具体承担主持中央工作的责任，却是最高的监国者。按照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规定，1961 年应召开中共九大，此时开会，毛有可能会转任八大党章设置的“名誉主席”一职，但毛无意在此时开会，于是谁都不敢提开会的事，谁提开会的事，谁就有

逼宫之嫌，结果是在打倒刘少奇之后 1969 年，也就是时隔中共八大 13 年后，才召开了中共九大。然而这也不能完全责怪毛，因为 1943年 3 月的中央决定说的很明白：毛主席享有最后决定权，刘少奇则是这个决定的主要参与制定者。

下面就要讲到“准备”的问题。我现在说的“准备”，有两个依据：1，毛和其它“中央首长”（林彪，周恩来，江青，康生，张春桥等）在文革期间对这个过程的叙述，2，是我个人，也就是后人，对这个过程的看法。我认为，在 1962-1964 年底，不能说毛当时就要准备发动文革了，我们看到的只是毛要“改变”。文革真正的准备是在 1965 年开始的，它的直接表达，用毛的话说，就是要刘少奇下台。当然，这样一个巨大的事变不可以那么庸俗的叫做“赶刘少奇下台的运动”，那无法包含毛要改变中国，改变中国人，改变中国文化的宏大的理想，所以它应该有一个充满“正当性”的名称，开始它叫“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很快正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5 年后，毛为发动文革做了哪些准备呢？

1，意识形态的准备。毛一辈子都有一个特点，做什么事，都要名正言顺，师出有名，在理论上先说明自己的正当性。六十年代后，毛有许多重要的思考，但他已很少像中年时期那样自己动手写鸿篇巨制了，他的一些片断的谈话，需要理论家帮他完善，使之系统化。六十年代初中期，他和刘少奇共享一批智力资源，同用一批“秀才”、“笔杆子”，这些人中有陈伯达，胡绳，吴冷西，许立群，王力等，胡乔木则在 1963 年初就因病离职疗养了。毛逐渐觉得北京的这套“秀才”班子还不够用，就又通过江青，在上海另组一个小班子，为首的就是张春桥，姚文元。这些理论家，前期以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张春桥，姚文元为主，后期就是张，姚，帮助毛建构起文革的基本理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是毛晚年思想的精髓。和这些相配合，由林彪的军队系统率先大搞毛的个人崇拜的宣传，党的宣传机构也迅速跟进，几个核心概念在全国大普及，实现了充分的社会化，这就是：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到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阶段，阶级斗争无时不在，无处不在，阶级敌人到处有，党外有，党内有，知识分子中更多；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一定会反映到党内，老的资产阶级消灭了，还会不断产生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时刻梦想复辟；反修防修是社会主义阶段的长期任务；毛主席是红太阳，大救星，全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毛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谁反对毛和毛思想，我们就和他拼”等等，经过多年的密集的宣传，为文革提供了充分的精神条件。

2，组织方面的准备。从六十年代初期起，毛对军队干部有着特别的信任，认为军队受修正主义思想的影响较小，1963 年后，大批军队干部被抽调到党政系统，同时在党政机关，高等院校和大中型企业普遍建立起政治部，使军队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更加突出；1965 年末，改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由军队同志担任主要领导，实行半军事化的管理；1966年 5 月下旬，复以中央的名义，成立以江青为核心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以提高他们的威信，为未来取代中央一线预做组织上的准备。在 1966 年春，又组织了首都安全工作小组等等。

1965 年 10 月，毛离开让他沉闷的北京[21]，前往南方“踏芳枝”，所思所虑皆是“反击修正主义”的大事。1965 年 10 月 10 日，毛放出空气：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又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可以造反[22].在毛的想象世界中，违背他意见的“修正主义者”，早已盘根错节，非用大力不能摧毁。1965 年 11 月，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只是一个试探气球，不出所料，彭真果然出面为吴晗讲话。毛不动声色，将其一步步诱入包围圈。1966 年2 月，在武汉东湖，毛与专程前来汇报《二月提纲》的彭真等谈笑风生，彭真等以为大功告成，可以将大批判纳入“学术讨论”的轨道。但是一个月后，毛在杭州彻底否定了《二月提纲》。毛再一次发怒：彭真是一个渺小人物，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打倒他[23].5 月，更挖出“彭罗陆杨定时炸弹”——正所谓“青松怒向苍天发”，毛之发怒挟以雷霆万钧之力，犹如摧枯拉朽，“修正主义者”、“不听话”者，则“败叶纷随碧水驰”。（1967 年 2 月3 日，毛在北京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说，“好几年前，我就提出要洗刷几百万，那是空话，他们不听话嘛”，“《人民日报》夺了两次权，就是不听我的话。”[24

依毛泽东的逻辑，“反动派，你不打，他就不倒”[25]，他也一再告诫人民：“敌人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反动派，敌人者，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除了地富反坏右，如今又增添了一个新品种：“反革命修正主义者”。只是要让这些老百姓眼中的大人物束手就擒，还需要坚强的意志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对于这些，毛从来是高度自信的。不久前，毛在《七律?洪都》中自嘲“鬓雪飞来成废料”，那是揶揄，也是对将其视为“牌坊”的刘等的一种愤怒。毛不仅精神旺健，身体也极为健康。他象战争年代指挥军事作战那样，精心擘划每一个战术计划。正是在南方，他指示加强军队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保卫工作[26].1966 年初，江青组织召开军队文艺座谈会，用迂回的方式向中央一线领导发起进攻。毛让江青去找林彪，随后又三次修改座谈会纪要，并在座谈会纪要上亲笔加上“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的标题，林彪则将这份文件报给刘少奇等，经刘的手以中共中央的文件发向全党。刘少奇知道，除了奉命唯谨，别无任何其它选择。从 1965 秋到 1966 夏，毛采取“剥笋子”政策，先批《海瑞罢官》，继而“揭露罗瑞卿”，再批判《二月题纲》，“打倒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一步步向刘少奇逼近。

1966 年 5 月，“彭罗陆杨”倒台后，高级干部群情惶惶，在惊吓之余同时又缓了一口气，他们为党中央挖出了“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而感到庆幸，却再也不敢往下想了。进入 6 月，各省纷纷揭露出“三家村”一类的代表人物，大多是省委宣传部部长、文化、教育厅长，匡亚明、李达等都是在这期间被所在的江苏、湖北省委“挖”出来的。然而毛却渴望壮烈，为自己的下一步目标而思虑和振奋。

下一步的目标是谁呢？或曰：反修防修，深挖修根？只是毛从不喜欢无的放矢，反修防修须有目标，无此具体目标，一切大嗡大轰皆流于形式，现在毛到了下最后决心的关键时刻：是否赶刘少奇下台？

1970 年，毛对斯诺说，在 1965 年 1 月制定《二十三条》时，他已决定，刘少奇必须下台。但这是事后所言，无从证明 1965 年 1 月至 1966 年 8 月毛在这个问题上思路变化的过程。事实是，1965 年 1 月，在刘少奇向毛检讨后，毛似乎宽谅了刘，尽管可以看到的线索是毛在为

倒刘做精心的准备。可是毛的思路又是何等的复杂多变，在做出决定后，肯定、否定、再肯定，符合毛的一贯风格[27]，这也是为何毛会独自一人长久陷入思考的原因。

从刘少奇 1962 年下半年以后的言行看，他在主观上是努力紧跟毛的布署的。1963 年后，刘具体贯彻毛有关大搞阶级斗争的指示，毛提出要"洗刷几百万"[28]，刘迅即部署在全国开展"四清运动"，甚至比毛还激进。毛说"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刘则加以发展，说"三分之一以上的政权不在共产党的手里"，刘还为这不在共产党手里的"三分之一的政权"做了性质判断，称其是"反革命的两面政权"。刘少奇甚至有破有立，在 1964 年创造出"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在受到毛严厉批评后，从 1965 起，刘就十分低调，他在重要会议上做自我批评，对毛的批评照单全收。1966 年春夏间，刘也跟着毛批"彭罗陆杨"。

在那几年，毛、刘在理念上的分歧似乎并不明显，可是毛为何对刘的不满与日俱增？我想很大的原因是刘少奇"不听话"，"另搞一套"。刘是全党公认的理论家，但在中国，唯有毛才是革命的最高代表和新概念的创造者。例如，我们看不到毛之外的其它领导人有什么"理论著作"，就连号称"理论家"的康生，在建国后也没写过一篇"理论作品"。如果仅仅是工作中犯了"错误"，改了错误，重新跟上毛的步伐，也就可以了。麻烦的是，刘少奇要搞出具有自己特色的新式样，这才是真正"有事"了。1962 年，为了要从认识论的高度解释困难时期全党犯错误的原因，刘特地把自己抗战时期的旧作《人为什么会犯错误？》重新翻印，发给高级干部阅读，毛迅速作出反映，几个月后，1963 年初，毛针锋相对写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如此等等，刘的任何一点和毛相异的观点都有可能被放大，被解读为"离经叛道"。

再有，就是刘少奇有意无意中触犯了党内高层政治生活的"潜规则"。刘在 1964 年的"四清运动"中风头太健，当年夏，刘携夫人王光美去了 14 个省市巡回演讲"桃园经验"，刘则一路开讲"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在中共党内，由领导同志坐镇，陪夫人巡回做报告，这是第一次。毛从没这样做过，他最多是在文革前出席观看过几个由江青指导的"革命现代京剧"，周恩来更不会坐镇现场让邓颖超做报告。

更为严重的是，刘在 1964 年 8 月初又说了一些"犯忌"的话，诸如：不蹲点不能做中央委员，开调查会过时了，因为基层干部不会在会上讲真话等等。"开调查会"是毛在革命年代所发明的一种工作方法，党内大大小小的干部都知道，如今刘却直言毛的这一套"过时了"，尽管刘说这些话不一定有针对毛的涵意，却极容易造成误会，被认为是"贬低毛"。前几年出版的王力的回忆录提到，当刘少奇在 1964 年 8 月初的北京干部大会上说了那些犯忌的话之后，江青跑到毛面前哭诉告状：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才作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29].无疑，江青的这番话对毛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这一年刘"挂帅"领导"四清运动"，一声号令，150 万干部下乡蹲点，刘的威望之高，动员能力之大，都使毛产生警觉。

老人家的隐蔽的世界，他的同志们很难猜度，只有极个别的人才多少有些领悟[30]，但在 1965-1966 年上半年这个微妙敏感的时刻，他们

都不愿也不敢去影响他的决定。毛的那些高级同事们虽然知道一年来毛对刘少奇的不满，然而十余年前高岗反刘的下场给他们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他们谨言慎行，谁也不愿涉足两个主席间的矛盾。林彪在他的读书杂记中告诫自己，勿忘"古策"——"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也就是决不先出头，"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31].康生在这类问题上也是"九段高手"，几十年来一直对刘少奇毕恭毕敬，六十年代初，还主动请缨，要为刘编《选集》，即使在他个人大出风头的 1966年 5 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生也顾忌良深，他在大力歌颂毛的同时，也不忘检讨自己在历史上犯下的反对刘少奇的错误。长期在中枢行走的陈伯达，一直在两个主席间走钢丝，生怕稍有闪失，就会坠入万丈深渊[32].确实，扳倒刘少奇，将是中国政坛上的一场 8 级大地震，毕竟从 1945 年中共七大始，刘就一直是党的第二号人物。可能刘也意识到这一点，尽管他知道毛对自己有不少意见，但他显然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质，刘可能认为自己为党为国，问心无愧，1966 年 6 月，仍派出夫人作为工作队员，进驻清华大学。刘一步步进入了包围圈。

从 6 月 20 日后，7 月 13 日、19 日、22 日，围绕派工作组的问题，中央上层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几十年来一直对刘少奇笑脸相迎的康生、陈伯达，在会议上突然与刘发生了顶撞，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情况。一年后的 1967 年 5 月，林彪在陪同毛会见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时插话说：现在没有犯错误的同志，都是事先经主席交过底的[33].

毛泽东为自己下一步的设计而振奋，打倒"彭罗陆杨"，这不算什么，在这之前，不是也打倒了"彭黄张周"？即使在苏联、东欧国家，这也属平常现象。1957 年，赫鲁晓夫不也搞出个"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反党集团"？中国要使世界震惊的何止是揪出几个人，而是要培养共产主义新人，创建共产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和新文化，这是何等令人血脉贲胀，这才是惊天动地的伟业！毛已清晰看到不久的将来，"一声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毛泽东在南方 6 月的潇潇雨中，想得很深很远，他坚信，他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革命，因为毛是在与人类的痼疾，人性的基本弱点——"私"作斗争，说到底，在他看来，刘所代表的就是"私"：在平庸的世俗生活的包围下，一些共产党人对发展生产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发扬革命精神的兴趣，而在发展生产的后，则是与资产阶级精神相通约的那些因素：追求舒适，追求物质，追求享受。毛就是要和这种"退化"作斗争，他相信，"公字当头"的新社会是可以设计的，人性是可以改造的。当然，这场革命最后能否胜利，现在还难以肯定，自己被打碎也完全有可能，将来的革命是否也将取得胜利，现在更不知道，然而这一切阻挡不住毛的不容拂逆的意志，那些顾虑暂且放在一边，也许几百年后，人们会认为今天的这一切都是可笑的[34]，但那是以后的事，眼下要考虑的是具体问题，这场革命将以何种方式来展开？

不久，毛泽东就找到了领导革命的具体形式，这就是在党的垂直机器之外，通过重组党的宣传媒介，再建立一个领袖与人民直接对话的新渠道。在这个新形式中，将实现领袖与人民的直接交流，而毛将以人民的化身来指导革命。毛将暂时把党机器搁置一边，在他的眼中，党组织

已被以刘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牢牢控制，他们最擅长的就是把毛的一切设计加以过滤和改造，使之适合于他们的需要。毛已不愿意再做“牌坊”，他要重新回到中央领导的第一线，他所掌握的力量将是在他之外的任何人都永远无法掌握的，这就是一个巨大的集合名词“人民”。当然，人民是不会自发产生正确思想的，惟有人民的化身毛，才能给人民以思想，所以“故国人民有所思”，实际上是毛代表人民在思索。

毛在 6 月思索的果实很快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表现了出来。1966 年 7 月 16 日，一声惊雷震惊中国和全世界，73 岁高龄的毛在武汉横渡长江，突然在人民中现身，在响彻云霄的“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毛与人民已水乳交融，毛终于实现了领导这场革命的具体形式。几天后，毛主席返回北京，1966 年 8 月 5 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以《炮打司令部》而使刘少奇下台，由林彪取代刘成为第二把手。

毛为什么能顺利发动文革？一年多来，他小心翼翼，精心准备，把一切最坏的可能性都事先想到了，并做了认真的防范，但预想的各种“修正主义者”做“坏事”，搞“政变”的情况，一件也没有发生！严格说，他老人家发动文革没有遇到任何障碍，彭真抵制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一经毛出面反击，倾刻瓦解，刘少奇则完全是坐等自己的倒台。毛可谓一路乘风破浪，所向披靡，最重要的原因乃是毛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他在体制，意识形态和道义上都享有巨大的合法性：

1，毛就是党，这个概念深入人心。“彭罗陆杨”出问题，对党的形象没任何影响，刘少奇下台，任何人下台，都不会损伤党的威信，最多就是需要修补一下，（这个工作，文革中主要是通过周恩来做的，周解释了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为什么刘错误严重，但只是到了 1966 年才揭露），由于这个原因，文革初期全国各级党委都被砸烂了，在毛看来也没有关系，因为有毛在，有毛领导的军队在，就是党在。

2，从建国起，我们宣传、教育部门的主要工作就是歌颂毛主席的丰功伟绩，这种工作每天，每分钟都在进行，贯穿在一切领域，使得毛和毛思想在人民中拥有巨大威望。他在大跃进中犯的错误，老百姓一点都不知道，群众都相信毛英明伟大，只是底下的干部欺骗毛和中央，文革中甚至出现刘少奇是“三年自然灾害”的罪魁祸首的论调；毛在文革中改组了党的意识形态系统，毛通过不时发布“最新最高指示”，亲自或通过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对毛思想作出直接解释，更增加了毛思想的权威性；毛还找到一个新渠道，在个人崇拜的大环境下，和人民直接交流，1966 年 7 月 16 日在武汉畅游长江，以后又在天安门八次接见红卫兵，直接发动群众，文革期间意识形态不仅没有出现真空，而是实现了毛对意识形态的完全、彻底的占领，这使得毛拥有独一无二，任何人都没有的巨大的社会动员和统合力量。

3，毛要修补体制的弊端，群众觉得毛关心人民，和人民心连心。刘少奇在文革初期“打压”学生，要打他们“右派”，毛则是解救他们：“走资派”搞“三名三高”，毛要搞“平等”，反对特权：“走资派”支持“城市老爷卫生部”，毛号召医生下乡给农民看病；刘保护，爱护 17 级以上的干部群体，毛则把他们赶到农村“五七干校”，要他们劳动改造。在老百姓中，特别在青年学生中，青年工人中，存在着长期积压下的不满，这就是对官僚主义的不满，对干部特权行为的不满，“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

更觉主席亲”，颇生动地发映出文革初期群众的这种情绪和心理，如此等等，都使毛的行动获得巨大的道义性。

4.毛的伟大领袖的崇高威望不仅表现在他在心理和精神领域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拥有的无与伦比的影响力，他更拥有现实中的巨大的权力。他掌握着军队，林彪全力支持他，在提拔林彪做“接班人”的同时，毛又安排叶剑英担任军委秘书长，把军队完全置于自己的直接领导之下；他也掌握全国的公安系统，谢富治绝对服从于毛。刘少奇虽是主持中央工作的第二把手，但他不具有上述的优势条件。

5.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多年，无形中积累下许多矛盾，这些矛盾有的是体制带来的，有的则和具体的人有关系，刘处于第一线排头的地位，不由得他个人同意还是不同意，都身处于这些矛盾的中心。刘之上有毛，刘的旁边还有一批开国勋臣，之下有一群封疆大吏，这些大干部各有神通，虽然都服从中央领导，但一旦察觉毛刘有异，每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而刘又不具毛那样的绝对权威，说话有时并不灵，但刘在一段时间里似乎忘了自己只是第二把手，而强制推行自己的一些主张，有时批评人疾言厉色，故而造成各方关系的紧张。在这些矛盾中，有因“四清”问题而引发的华北局对刘的意见，有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矛盾，有所谓“北方局”干部和其它系统干部之间的矛盾，有群众和“官僚体制”的矛盾等等。上述种种矛盾本来就交叉在一起，在文革前夕的特殊环境下又被有意激化，从而成为毛能顺利发动文革可资利用的因素。再有：刘多年来在政策制定和掌握方面跳跃性较大，喜欢走偏锋，有人称之为“忽左忽右”；刘指导四清，打击面过宽，激起不少地方干部的反弹；一些干部，特别是军队干部认为，刘在干部使用问题上，有偏心的一面；相比于毛和周，刘的个性过于严肃，刘的司机说，“我给少奇同志开车一年，他没有说过一句话。他一上车，我就把车开走；我一停车，他就走下去。”[35]从积极方面看，这可以理解为“是少奇同志长期在白区工作时养成的地下工作的习惯”；[36]但是，建国后毕竟已不是地下斗争的年代，为他服务的工作人员早经过党组织的严格审查，不可能是所谓“嫌疑分子”，所以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说明刘的个性缺乏亲和力。因此文革初期，一些干部，特别是军队干部，对刘下台是无所谓的，就是到今天，也还有一些老干部对刘少奇抱有这样或那样的批评性的看法。当时的老百姓，虽然普遍对刘下台感到吃惊，但也没有很多人为此而特别难过和惋惜的，因为老百姓对刘少奇的了解非常有限，虽然文革前全国各地都上映过歌颂刘少奇的电影《燎原》，广大干部也学过刘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但这些与党的意识形态系统和军队系统对毛和对《毛选》的铺天盖地的宣传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老百姓了解的就是刘少奇多次携夫人访问东南亚，只知道他保护、爱护各级干部，要大家“做党的驯服工具”，根本不知道刘为老百姓做了什么好事，特别是刘在六十年代初困难时期，为拯救人民生命所作出的巨大的贡献。因为在那个年代，所有的功劳，荣誉都归于毛一人，老百姓所知道的，就是报纸上要他们知道的那些。所以说，毛发动文革，是有相当的群众和干部基础的。

毛为发动文革而使用的的一些方法是超常规的，例如：毛背着中央一线领导同志秘密策划批《海瑞罢官》；他一人决定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等等。1964　年年底，他当面对刘少奇说，我动一个小指头

就能打倒你，这不是共产党领导人之间的常用语言，也不符合党伦理。但是，毛的所有重大措施又都是假手刘少奇，通过中央会议，以中央文件的“合法”形式实现的。在那个年代，体制对毛的约束力是不存在的，从 1965 开始，就是毛主席，党中央这样的排序表达，正式的解释是，如果没有毛，没有毛的正确领导，一切都没有。所以毛就是党，革命，军队，人民的化身，他也是真理的化身，他想做任何事都可以。中央领导集体为了党的团结顺从他，人民崇拜他，从而使他获得不受制约的无限权力。

文革发动的年代距离今天已近四十年了，毛的这首诗，也发表一些年了，对文革发动的过程和毛的这首诗，都有一些解释，我这也算是一种解释吧。有关文革发动的细节，还有许多没有披露，所以完全的回到历史，几乎是不可能的。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乃是论述过去，但绝不等于过去”。[37]我只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自己掌握的资料来谈论这个问题，但这也只是一种叙述，所以，在座各位可以任由自己的理解去判断毛的这首诗和我所谈的这个议题，这就叫做“自求其解”吧。

完稿于 2003 年 12 月

注释：

[1]参见刘少奇：《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转中共西北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的指示》，1966 年 6 月 13 日；载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 25-26 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 年 9 月版。

[2]参见刘少奇、邓小平：于 1966 年 6 月 30 日就＜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稿致毛泽东的信；引自于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 27-28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年 12 月版。另参见李雪峰：＜回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路线错误”——从“6?18”事件到“7?29”大会＞；载《回首“文革”》（下）第 661 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年 1 月版。

[3]参见罗点点：《非凡的年代》第 199 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年 7 月版。

[4]参见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载《回首“文革”》（下）第 60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年 1 月版。另参见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 12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年 6 月版。

[5]参见张化：＜刘少奇的悲剧和悲剧中的刘少奇＞；载《回首“文革”》（下）第 847页。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 34 页。

[7]《张耀祠回忆毛泽东》，第 38-40 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 年 9 月版。参见范达人：《“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第 210 页，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 年 5 月版。

[9][16]田纪云：＜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炎黄春秋》2004 年第 6 期，第 4——5页；第 4 页。

[10]1967 年 2 月 3 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客人巴卢库、卡博时说，1962 年七千人大会时，他“已经看出问题了”，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四），第 1832 页注释（1），中共中央文献出版

社，1998 年 2 月版。

[11]文革结束后，官方对此事件的正式解释是：为了准确，完整地保存文献资料，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曾对中央召开的正式会议和中央领导同志在一些重要会议上的讲话或报告，进行了录音。从 1958 年 11 月开始，毛泽东外出时，对他在外地的一些重要讲话和一些地方负责同志的重要谈话，也进行了录音。1959 年 11 月，毛泽东在中央杭州会议上，关照大家不要做记录，并批评了搞录音的做法。1961 年 1 月底至 4 月初毛泽东外出视察期间，发现还有录音情况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指示汪东兴报告中央书记处查处。同年 4 月，中央书记处根据汪东兴所传达的毛泽东关于不准搞录音的指示，批评了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并决定给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副主任康一民以严重警告处分，给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以警告处分。5 月 17 日，《中央书记处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作出了关于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群一律不准搞录音等五项规定。“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康生、江青等人为了篡党夺权，利用“录音问题”，罗织罪名，对杨尚昆等同志进行政治迫害，株连了大批干部。1980 年 10 月 15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原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秘密录音”问题的复查报告》指出：一、“杨尚昆同志在原中办机要室的录音工作上，从来没有搞过阴谋活动。过去在党内外公布的有关杨尚昆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所谓错误，是不存在的，建议中央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二、“借录音问题强加给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等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统统推倒，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三、“1961年 1 至 4 月的录音，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同志是没有责任的，因而 1961 年给他们的处分是不适当的，建议中央予以撤消。”四、“鉴于所谓秘密录音一案株连人员很多，影响很大，建议中央将这个复查报告批转有关单位，以消除影响。”同日，中央办公厅把这个复查报告作为《关于为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附件一起报中央书记处，得到中央书记处的批准，于 1980 年 10 月 23 日印发至县、团级党委。参见：《杨尚昆日记》（上），第 716 页，注释＜1＞，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年 9 月版；另参见《叶子龙回忆录》中的“*********事件”一节，第 223—231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年 10月版。

[12]1964 年 2 月毛泽东与金日成的谈话，引自于曹英等著：《特别别墅——红墙以外的红墙》，第 268-270 页，改革出版社，1998 年 10 月版。

[13]，＜表八，上海全民所有制职工月平均工资＞，＜表九，1961-1966 年上海职工按标准月工资分组＞，载李逊：《大崩溃：上海工人造反派兴亡史》，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 592 页。

[14]黄新原：＜1956 年的定级＞，《人民政协报》，2004 年 10 月 28 日。

[15]《中国经济时报》，1998 年 4 月 30 日，转引自田纪云：＜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炎黄春秋》2004 年第 6 期，第 4 页。

[17]参见洛厄尔?迪特默：《刘少奇》，第 33 页，华夏出版社，1989 年 6 月版。

[18]此为当时在场的毛泽东卫士周福明的回忆，参见亓莉：《毛泽

东晚年生活琐记》，第 120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 11 月版。

[19]参见《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下），第 433 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年 12 月版。

[20]刘源、何家栋：＜“四清”疑团＞，载《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第 118 页注释（2），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年 7 月版。

[21]毛泽东在文革前经常说：“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胡乔木语），参见郑惠：＜对“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认识＞，载《回首“文革”》（上），第 62 页。另据当时任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的李雪峰回忆，毛泽东在 1966 年 4 月下旬杭州会议期间也说，“北京的空气很沉闷”，他“不愿在那儿住，愿到上海来”，参见《回首“文革”》（上），第 608页。

[22]参见罗点点：《红色贵族档案：罗瑞卿女儿的点点回忆》，第 180 页，南海出版公司，1999 年 1 月版。

[23]1966 年 4 月 28 日，毛泽东在杭州与康生的谈话，康生在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予传达。在文革结束后公布的毛 4 月 28 日谈话中，这一段已被删除。

[24]1967 年 2 月 3 日，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军事代表团巴卢库、卡博时的谈话。

[25]1966 年 4 月 28、29 日，毛在杭州对康生、陈伯达说，彭真已“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西风吹渭水，落叶下长安”，“阶级斗争，不斗不倒”，参见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上），第 70 页，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 年 4月版。

[26]1965 年 12 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领导班子改组。另参见林彪 1966 年 5 月 18 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27]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四），第 1849 页。

[28]1967 年 2 月 3 日，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军事代表团巴卢库、卡博时的谈话。

[29]《王力反思录》（下），第 573 页，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 年 10 月版。

[30]参见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会上的讲话记录，1971 年 6 月 18 日，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四），第 1832-33 页。

[31]引自于冯建辉：＜林彪与个人崇拜＞，载《炎黄春秋》1999 年第 10 期，总第 91 期，第 39、36 页。

[32]陈伯达：＜我与刘少奇关系的几点情况＞，载陈晓农编：《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它》，第 79 页，香港天地出版公司，1998 年版。

[33]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 26 页注释（2）。

[34]参见 1965 年 1 月 9 日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引自于斯诺：《漫长的革命》，第 169页，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 年 6 月版。1968 年 10 月 14 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可能文革这一段“是历史上的小插曲”，参见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上），第 3 页。

[35][36]王鹤滨：《紫云轩主人——我所接触的毛泽东》，第

204-205 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 5 月版。

[37]凯斯。詹京斯：《历史的再思考》，台北麦田出版社，第 56 页，2003 年 9 月版。

第十六篇　叙事视角的多样性与当代史研究

——以五十年代历史研究为例

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历史学有很大的变化与发展，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论述，对我们认识过去、吸取历史的经验，推动近现代史的研究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检视近二十年有关近现代史的叙述，不难发现它们大致分属于两种不同的类型：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上述两种叙事方式占据了近二十年近现代史叙事的主流地位。

所谓“革命叙事”产生于 20 至 40 年代，即左翼革命主义的史学，瞿秋白、张闻天、何干之等一批“有机化”或“组织化”的新知识分子，从苏联和日本左翼新理论中引入一系列概念和范畴，建构了左翼革命力量对中国的现实，过去，和未来的认识和解释的体系，其主要命题是论证中国近代革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帝国主义侵略”、“封建主义压迫”、“阶级战争”、“革命”、“人民群众”、“工农专政”、“经济的决定因素”等成为这种叙事的基本主题。[1][2][3]

所谓“现代化叙事”最初产生于西方，八十年代初被介绍到中国。其主题是论证一百多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经验和教训，传统与现代、社会变迁、经济增长因素、制度创新与政治参与、公共空间和市民社会等成为观察，认识现代化问题的框架。[4]这两种叙事方式都从各自的角度对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作出了概括和分析，在相当的程度上反映了历史进程的实质。

“革命叙事”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第一次引入了苏联革命理论的基本概念，既强调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又强调变革生产关系，推翻旧有秩序的极端重要性；同时强调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国家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痛苦记忆，把中国近代看作是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中国，中国人民抵御西方侵略、扩张的反抗过程。在这个叙事框架中，突出彰显了反帝，底层造反，革命组织，革命领袖人物的思想和领导对推动历史前进的重大作用。

“现代化叙事”是叙事方式的全面转换，它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置放于一个与世界紧密联系的视野下来认识，而这反映了一百多年来历史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即中国是在深受外国影响的背景下，展开现代化进程的。“现代化叙事”也把 100 多年来的中国历史置放于社会变迁的大过

程中，通过对现代化动力、范围、速度、现代化的主体与客体等的研究来展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各层面相。这种从八十年代引入的叙事方式对现时中国的改革与开放有直接的启示作用。

然而这两种叙事方式都各有其不足：在“现代化叙事”中，中国内部的因素经常会被不经意地忽略，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具有普适性；但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更有其特殊性，从西方社会发展的经验中产生的某些概念，不一定能涵盖和解释中国社会的复杂性。

与“现代化叙事”相比较，“革命叙事”对我国历史学的影响更大，在长达几十年中，它是占绝对支配地位的主流叙述，至今仍有广泛的影响。“革命叙事”产生于革命斗争的年代，具有强烈的思想政治动员色彩，在革命胜利之后，如何将这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叙述和深厚的学术性加以有机融合，是一个新的紧迫的课题，勿庸置疑，史学界在“融合”方面曾取得重要的成就，但遗憾的是，从 50 年代中后期开始，“革命叙事”就逐渐走向僵化和教条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中共党史研究中，形成了某种根深蒂固的传统，阻滞了学术性研究的展开和深入。

“革命叙事”逐渐教条化是和它过分追求“宏大叙述”而紧密联系的。反映在传统的中国近现代史和党史研究领域，“宏大叙述”的基本特点是：

1.预设立场，无限制地扩张历史学的宣传、教化功能。以权威论述或权威文件为指导，有选择性地剪裁史料，来论证某种权威性论述，对复杂的历史进程做简化的“必然性”的解释，遮蔽了许多丰富鲜活的历史层面。而事实是，历史进程有它的多重面相，历史学家应给历史的偶然性留下空间。

2.在叙述方式上，频繁性地使用某种不言自明或无法证明的集合性语汇。

3.在语言运用上，过分诉诸感情，具有某种居高临下，训导式的语言风格。

如果对“宏大叙述”作出一些结构性的调整，“革命叙事”仍有其重要意义，它表达了左翼革命主义的世界观，为人们认识这个纷繁而多元的世界及其来源，提供了一个不可取代的视角；增强“现代化叙事”的本土性，也会有助于发现中国经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所以这两种叙述方式是可以互相补充的，并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选择的问题。开放的，兼容并蓄的态度可以把不同的认识框架置放在一个平台上，为叙述者提供更广阔的选择空间。在这个开放性的平台上，一种中立、客观的历史观，即“灰色的历史观”，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新实证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或许能够成为人们认识，分析历史现象的新的工具。

黑格尔称，历史是“灰色的记忆”。即如有的史家所论述的：人类生活，人的性格和思想，人们的社会活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那么单纯。。。。。。那样容易地被转换成这种或那种简单抽象的角色符号和概念化身。[5]〉“‘灰色历史观’反对在历史分析时时‘忘记’那些互相冲突的资料和观点”，在对重大现象研究中故意回避事实，只进行概念的推理和演绎；“灰色的历史观”强调吸取其他社会学科的资源，同时注意运用的范围和界限，防止滥用社会科学方法，以至过度解释，深文周纳，而

主张研究者在运用社会科学概念时不露痕迹，“滋物细无声”。所谓“新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就是避免“宏大叙述”对研究的支配，克服在资料选择上的价值判断，重视对各种史料——包括内容上互相冲突的史料——的收集、鉴别和广泛地运用。“新实证主义”也强调对历史细部环节的注意，宏观叙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需要的，但更应通过细部研究来反映事物的特性。注重从事实出发而不是概念先行，运用各种分析框架又不固步自封，强调总体把握也重视历史的细节和差异，显而易见，这些对于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当代史都是极为重要的。

二

所谓“当代中国史”是指 1949 年以后的中国历史。1949 年后中共成为执政党，故而“当代中国史研究”要探讨在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诚然，1949 年后，由中央体现的党与国家是社会的主导方面，但是主导方面并不就是一切，还有被主导的方面，也应是当代中国史的的研究对象——1949 年后中国的地方，基层，社会，人民生活，理所当然也应在研究的视野之内。

“当代中国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有明显的区别：“国史”以政治为主线，在研究对象方面，侧重于上层政治和政策的演变；“当代中国史”的研究范围较为宽广，对社会的主导方面和被主导方面都持一视同仁的态度，不仅关注全局性的决策及其运作，也注重地方对决策的反映，更注重考察上层和下层的互动关系。在研究方法上，当代史强调对基层和社会进行实证性的研究，故而重视吸取社会科学多种学科的资源。

研究当代史有若干困难。以中国传统而言，当代人不修当代史是一个约定束成的习惯。从大的方面讲，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深厚影响；在另一个方面讲，当代人研究当代历史确实存在着资料开放不足、研究者的主观价值判断是否节制、利益关系的牵制等诸多因素的局限。然而 1840 年后，“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传统被打破，魏源等首开先河，研究本朝史。民国以后，社会自由度大大提高，李剑农的名著《辛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即是当代人修当代史的典范。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修当代史提不上议事日程。这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社会已有一个高度统一的新意识形态，已经提供了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全部解释，形成了对全体社会成员，包括对历史研究者的统一的认识和叙述的要求。这种统一性的认识和叙述规范以“大叙述”、“大概念”为基本框架，在其指导下，再辅之以简明化的材料，以凸显“历史的铁的逻辑演进规律”，其特点是高屋见瓴，以点带面；不足之处在于：易忽略差异性和历史面相的多重性。当然，对某些正在发生和不久前发生的事实，人们的认识需要一个沉淀的过程而不宜过早定论，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大叙述”、“大概念”继续占据主导地位的同时，更具多元性的新叙述概念从两个方面被发掘、引入到历史学研究领域，这就是中断数十年的中国史学中的私人著述传统，以及强调作者自主性的西方历史学理论。随着新叙述概念越来越被人们接受，故而当代人写当代史已成为可能。另一个更重要的积极变化是，党和国家为了总结建国后的历史经验，进一步配合和推动改革开放，一些

档案馆陆续向社会开放，官方机构在 80年代以来也相继整理出版了许多当代史的重要文献，从而为研究当代史提供了基本条件。由于建国后的历史全面、深切地影响到亿万百姓的生活和命运，社会各界对探讨当代史的一些问题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坊间也出现了大量有关 1949 年后的各类出版物，外国相关研究也被逐步介绍到中国。

总之，社会有需要，也具备了研究的初步条件，故而当代人可以研究当代历史。这种研究虽然存在着某些客观限制，但也有诸多便利条件，例如距今时代较近，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可保持较鲜活的个人感受；在资料搜集方面，也因距今不远而较为方便。

对 50 年代历史的研究在当代史研究中有着特殊的意义。首先，50 年代是当代史的开端。研究当代史从五十年代起步，不仅是研究时序展开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从五十年代初开始或从更久远处启动的一切，仍在以不同的方式影响我们当下的社会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马克.布洛赫认为：理解活生生现实的能力是历史学家最基本的素质。[7]50 年代为今日之基础，影响既深且远，今日之结构，框架，均奠定于此时期。以往在国内的学科分类谱系中，将这一时段的研究划归于政治学范畴，时光已进入到 21 世纪，50 年代的历史应属于历史学范畴了。其次，把研究范围置放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还是因为自那以后的年代距今天较近，某些事情还在发展中，人们认识它，不仅需要更多的，今天仍没公布的历史资料，还需要一个认识沉淀的阶段，即研究者主观感情因素的冷却，而 50 年代，已慢慢隐身于历史厚重的帷幕之中，成为渐离渐远的过去。

应该如何研究 50 年代这个距今不甚遥远而影像又相对模糊的历史时期？长久以来，对 50 年代至 60 年代初历史的研究，在“革命叙事”的视野下，就是“凯歌行进”、“艰苦探索”、“挫折调整”；而“现代化叙事”则将这十多年丰富、复杂的历史简化为“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在这两种叙事的视野下，我们有时就难以看到历史的全貌，对那个时代无法获得生动、具体的影象。

站在２１世纪的历史门槛，回顾和研究 50 年代的历史进程，在充分肯定新国家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还应看到 50 年代的多重面相：大环境的巨变确实对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产生重大影响，但有没有不同与主流的潜层意识？即年鉴学派代表人物马克.布洛赫所说的历史进程中的潜因素和隐蔽的趋向； 民众的信仰和生活方式是怎样变化的？改变到什么程度？宣传对民众精神生活的塑造，是否全为国家强制行为？塑造或建构之所以有效，与知识分子有无联系？如果说，新知识分子参与了塑造，老知识分子是否就置身于外？事实是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都参与了新叙述的建构，这在近年问世的宋云彬日记《红尘冷眼》中得到了印证。宋云彬是著名的民主人士，１９４９年他给柳亚子写信，以老朋友身份批评柳亚子不顾场合，乱发牢骚，担心柳的言论被美国或蒋介石所利用，作为攻击中共的口实。宋云彬对新秩序，新变化衷心拥护，但也保持个人看法。１９４９年５月，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歌颂“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却在日记中自贬其文为“八股”。他一方面钦佩周恩来，又在日记中委婉批评领导同志把民主人士看作五年纪小学生，动辄做大报告五六个小时。宋又批评所谓“学习讨论会”，实际是党

八股训话会。某次一重要领导同志做报告，听众达三、四千人，宋不堪其冗长，想溜出去，被警卫挡回。尽管宋和他的好友叶圣陶都不喜欢他所称之为的“党八股”和“人民八股”，却又积极参加新叙述的创造，他们都成为１９４９年后第一批大中小学课本的撰述者。[9]如此种种，都显示历史是非平面化的。

马克.布洛赫说，各时代的统一性是如此紧密，古今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10]20 世纪的中国历史是有其延续性的，1949 年新中国的成立开始了一个新纪元，但一些近代以来的重大命题依然存在：追求中国的工业化，维护中国的疆土的统一和独立，提高人民的教育和科学水平，等等。[11]在 20 世纪前半业，国共两党都致力于中国的民族独立和社会改造，两党的理念，方式和道路不同，所取得的结果也不同，两党在争取各自目标的过程中形成的理念，方法，都延续到 1949 年之后，其间虽有流变，但基本方面都继续保存，对海峡两岸的社会发展都起到支配性的影响。因此，了解 1949 年之前的中国是研究当代史的前题。

对 50 年代进行历史学的研究，应跨越 1949 年的间隔。所谓“间隔”，即是将２０世纪的历史截为两段，视彼此毫无关联，而实际上一些历史性的长时段因素仍在继续发挥作用，并没有因１９４９年而中断。应将２０世纪的中国历史置于一个长时段演进的背景下，进行各个侧面的研究。马克.布洛赫说：真正的时间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它又是不断变化的，而历史是持续发展的过程，不同的时代休戚相关，[12]要研究历史就不能人为割断过去和现在。

在这个基本方面，以往党史学界多认识不足，对历史长时段因素的影响及其表现，确少应有的敏感。在某种模式化的叙述中，只看到“变革”的一面，对“延续”的一面往往不予重视。这种模式化的认识方式不仅存在于史学界，也存在于人文和社会科学更广泛的叙述中。胡风于 1949 年 10 月发表的《时间开始了》的长诗就表达了这种观点，胡风是从欢呼新纪元的角度表达他对新中国成立的喜悦心情的，但他不是历史学家，而研究历史肯定需要观照两个方面：变革是从何处出发的，延续在变革中的流变及其走向。需要指出的是，在很长的时期里，“截然分开”已相沿成习，且这类叙述不甚注重具体史实之发现与考辩，而只从政策研究着手，多为宏大叙事和文本解释，从中很少看到基层，也看不到社会的众生相。近 20 年来，一些社会学、人类学研究者越来越多的涉及当代中国的研究领域，例如社会学对“单位制”的研究，对改革前后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状况的研究。

台湾学者刚刚起步。１９49 年后两岸长期对峙，90 年代前，台湾对大陆 50-60 年代的叙述，除少数外，都属于意识形态解释学。近年来，台湾又有“去中国化”思潮之兴起，目前只有陈永发教授等学者，本着中国情怀，坚守学术立场，关注、着手于 50——60 年代历史的研究。２００１年１２月，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召开了“５０年代海峡两岸研讨会”，旨在倡导对五十年代历史之研究。

三

检视 50 年代历史，一个最重要的的特征就是在冷战格局下，新国家、新制度的创立。由此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进程，中国出现了新的面貌：民族独立国家地位的新确立，工业化的展开，全社会的高度组织

化，普通民众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广泛参与，全社会共同意识、共同价值观的建立等等。

新国家、新制度、新社会是中国共产革命胜利的产物，促成革命的成功因素在当代史上继续发挥重大的影响，成为建国、治国的“依赖路径”，有力地型塑着 50 年代社会的面貌：

1，众所周知，中国共产革命的成功是中共长期领导武装斗争胜利的结果，而这又反映了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和社会变革的一个基本特点，这就是为了抵御外来列强的侵略和改变国内的积贫积弱，中国重要的政治力量，都把运用军事手段实现政治目标，摆在头等重要的地位。从建国初开始，社会的组织化加速进行，在全社会的范围内，军事性的风格和精神气质也逐渐浓厚，大大改变了世纪初以来，由受列强侵略而造成的民气低落，精神低迷的状态。五十年代，国家进入到建设时期，从苏联引进的苏式经济管理体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帮助中国建立起初步工业化的基础，中国的计划管理模式事实上已具有“理性计划经济”的特征，但是本土过去革命时代的经验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957 年后，军事化或类军事化的思维和管理方法在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中全面复活，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达到高潮。乌托邦主义配之以高度的组织化和军事化的政治措施，军事性格，用行政命令解决一切问题的惯性，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巨大的破坏。六十年代初，军事化动员模式在工业管理领域一度后退，但很快又卷土重来，并向其它领域全面渗透。受到意识形态全面支持的集中划一的思维和方法成为这一时期政治文化的显著特点，以至“唯军事至上”在文革初期达到巅峰。在战争年代运用高度集中统一的军事化方法达成革命目标是顺理成章的，在从军事时期到和平时期的过渡阶段，继续沿用军事化方法和手段进行快速动员，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历史的经验证明，大凡政权更替，胜利者建立新秩序，必然伴随一场暴风骤雨般的摧枯拉朽的过程。但在进入长期和平建设阶段后，迟迟未能建立起以法律为中心，体现共性和个性相协调的现代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培育现代公民文化就缺少了基石，这必然给国家、社会和人民的精神和物质生活带来消极影响。

2，1949 年，在农村进行了 22 年武装斗争的革命者进入到城市，他们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就是如何和城市融合，与知识分子结合，这是在执政的条件下建设国家，发展教育，科学，文化的关键。但如陆定一同志所说的，解决这个课题对于党和知识分子来说，都是有困难的，因为以农民为主体的党的干部并不熟悉城市，而知识分子对革命也不了解。[13]在中共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农民是当之无愧的革命的主力军，被广泛动员的农民不仅构成了革命军队的主体，而且在建国初党的队伍中占了的绝大的比重。[14]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的狭隘性和保守性被遮盖了，而只是被限定在“小生产自发性”上面，这就造成一种diao 弔弔诡的现象：一方面，是壁垒分明的城乡二元结构；另一方面，在政治和思想领域，农民思维，农民习气又受到高度推崇，被赋予了纯正的无产阶级革命特质，而与城市相联系的知识分子等阶层则因其出身和所受的教育被认定是旧阶级，旧思想的载体，被无休止地要求纯化思想，在这种思路下，新老知识分子都受到不应有的批判和排斥，其作用在长时期内难以正常发挥。

3，毛泽东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革命的胜利使毛获得极高的威望，毛成为了革命象征和革命道德的最高体现，其权威具有不受制约的至高无上性，在这种状况下，领袖的自律和智慧成为政策纠错的唯一条件。遗憾的是，50 代中后期后，一方面是毛的专断性急剧发展；另一方面，他又高度自信，坚信自己已充分掌握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律，于是，在他的不可违逆的意志和昂扬的理想主义精神气质面前，任何形式的政策纠错机制都无从建立。

列宁说，靠广大工农的热情、冲击和英勇精神，可以解决革命的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但这个优点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最危险的缺点了。我们总是向后看，以为这同样可以解决经济任务。但错误也正在这里，因为情况改变了，……不能企图用昨天的办法来解决今天的任务。”[15]1949 年革命的胜利既是革命的到达点，也是建设的出发点，但“马上得天下”并没有很快转化成为“下马治天下”，这是因为对“革命”与“执政”的互动关系认识不清。“革命”一词在近代中国有完全正面的意义，从孙中山开始，致力于改革中国现实的政治力量都自称“革命者”或“革命党”。革命成功后，革命者所面临的环境和任务都变了，经济建设为第一要务，为此需要对过去的传统进行转换，需要建立起以科层化为表征的理性化的经济和社会管理系统，培育具有兼容性的公民文化。和平时期的经济社会管理方式和战时状态下组织形式有着巨大的差异，需要有新思路和新方法，科层制虽然存有种种弊端，但至少可保障经济和社会生活不受空想乌托邦的破坏。空想乌托邦主义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决策过程中的随意性和浪漫主义，在追求理想主义的美好未来时，过去熟悉的记忆和经验不断被唤醒和复制，于是，迷信过去的传统，延续过往的传统，就成为应对现实和未来的不二法门，如此就很难在治国理念和组织形式上向现代公共管理转变。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促成成功的因素在新的时空条件下有可能成为障碍性的因素，对此问题认识不清，必然大大增加了从革命向执政转化的困难。而这种转化的迟滞一定会给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带来消极的影响。

指出和分析这些方面是为了更深入，更全面的观察革命及其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

四

20 世纪中国共产革命在历史上有重大的正面价值，一切基于反抗社会压迫的革命都是合理的。中国共产革命的出现和兴起有着深刻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它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因为此前的其它政治力量无法解决近代以来中国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中国革命就是那些基本矛盾，基本问题的反映。在肯定革命对推动社会改造所起的巨大作用时，同时需要对革命的过程及其结果进行深入的探讨，否则无从解释当代史，尤其是 50 年代历史上的一些重大现象。时至今日，有些学者对“革命”及其内部机制作了更具体的分析：

1，社会革命能够导致建立新的“国家制度”，因为社会革命的基础很广泛，有广大民众和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它的纲领确实符合近代化的主题：追求国家独立、社会公正和解放，推动社会各项事业的进步。[16]

2，社会革命也有后遗症的问题。革命要求政治有能力全面进入社

会和个人的一切领域，其结果是限制了个人自由和社会自主发展，这就是国家力量无所不在，社会自主性和个人自主性受到限制并最终完全消失，[17]最后只剩下一个强大到无所不在的国家权力，即列宁说过的所谓“兵营式的社会主义”。

邹说认为，20 世纪中国革命从一开始就包含两个互相矛盾、冲突的方面：一方面，旧制度的全面崩溃空前地释放了无数个人的活力和创造力，产生了中国新型的知识精英、社会精英和自由个人及团体；但另一方面，旧制度的全面崩溃使得中国这些新型知识精英和社会精英恰恰痛感迫切需要尽快达成“国家制度重建”。在 20 世纪上半叶外来侵略的巨大压力下，“国家制度重建”的目标以“社会革命”为手段而强有力地达成，但同时却极大地牺牲了个人自由的目标。[18]

正因为如此，国内外学术界普遍高度评价 1978 年后邓小平领导的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进程，认为改革的实质就是重新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政治权力从社会经济领域逐渐退出，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大社会、小政府”。从国家主导方面来讲，这种进程实际已愈来愈深入，这就是改善领导方式、改善执政方式，用现代公共管理来取代过去的革命动员的方式，也就是从“革命”向“执政”转变，从“马上得天下”到“下马治天下”。

如何评价 50 年代？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近年来新左派在思想界颇为活跃，他们用以支持其观点的重要论据就是高度评价 50 年代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在新左派的视野内，大跃进、人民公社乃至“文化大革命”皆有其重大的正面价值。[19]而有些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种全控主义的结构和体制。[20]我认为，似不急于在理论上进行无穷的讨论，而应从基本史实研究开始，沉潜于地方和基层，在具体细密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再来讨论理论问题。我认为对这个历史阶段的研究，应充分考虑国际冷战格局对中国的影响，从中国的历史背景和从中国共产革命的历史背景出发，着眼于考察“新制度与新国家的创立及民众对此的反映和互动”，在史观和方法上，是一种开放式的、兼容并蓄的史观和注重多重材料平衡的新实证取向。它兼顾“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的合理成分，扬弃“宏大叙述”的教义化的逻辑演绎主义的空泛化，同时避免概念先行、忽视下层的缺失。具体而言，这是一种兼顾“宏观”与“微观”的“中观”视野，道理不言而喻，因为“宏大叙述”经常会遮蔽社会的真貌，而过细的微观也容易导致两种偏差：看不到同质社会的一般性；容易陷入“一地、一村、一概念，一理论”和过分的琐碎。[21]

历史是否可以重构？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是叙述者建构起来的。[22]还有人认为，有关“反右”、“大跃进”、“文革”的叙述就是占据话语霸权地位的右翼知识分子杜撰出来的。[23]但我相信，过往历史的物质和精神遗存是客观存在的，不管研究者用何种视角和态度叙述它们，基本的历史事实是无法改变的。

强调普通民众的生活经验与感受对我们认识过往历史的重要性也许不是多余的，研究者不仅要重视知识分子的感受和经验，还要注重普罗大众的生活经验和感受。我认为研究当代史应该高度重视普通人的叙述，而这个方面是我们的研究者所忽略的。当然对那个时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记忆和感受，也许永远不会有统一的看法，正是在这种差异

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历史的复杂性，这也是历史学永恒魅力之所在。费尔巴哈说过："经常受到世界史浪潮冲击的，往往是那些最普通的人，而绝不是那些高官显爵，因为他们高高在上，太显赫了。" [24]历史学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生存状态，应永远在我们研究者的关怀的视野之内。也许这样，我们才可能对过往的历史，比过去有一个新的角度，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因为他们组成我们社会的最大多数，他们所处的地位、环境更能我们了解到历史的多重面相。

注释

[1]参见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重印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年.

[2]何干之主编.《中国现代革命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

[3]华岗.《中国大革命史》，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4]参见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上海三联书店，1995 年.

[5] 参见姚大力.〈历史学失去魅力了吗？〉，载《学说中国》，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 191、195、196 页

[7] [10][12] 参见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年，第 36、11、25、36 页

[9]宋云彬.《红尘冷眼》，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

[11]美国柯伟林教授在《认识二十世纪中国》一文中将"疆域统一""统治中国""工业化"等视为 20 世纪中国的大趋势，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纪》2001年 10 月号。

[13]《陆定一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年。

[14]到 1949 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时，中共党员组成中，工人成份所占比重仍极小，以工人党员最多的东三省为例，在 90 万产业工人中，党员只有 16508 人，占工人的1.8 %,到 1949 年 12 月,农民党员 340 万 1 千人,占党员比重 75.8%,文盲共 309 万 6 千人, 占全党党员比重的 69%.赵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第 236、243 页

[15]《列宁全集》第 3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6][17][18]甘阳.《编者前言》，载儀邹说.《中国革命再阐释》，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 Pxi、xii。

[19]参见韩德强：《50 年，30 年和 20 年〉载《士伯咨询网》网站；崔之元：《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载《读书》，1996 年第 3 期；高默波：《书写历史：高家村》，载《读书》，2001 年，第 1 期。

[20]萧功秦.《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21]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熊景明教授语，她对社会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过份强调建构理论的现象多次提出坦率的批评。

[22]沈松桥：《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和晚清的国族建构》，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 28 期，1997 年 12 月；张世瑛：《太原五

百完人：一段国共战争历史的想像与塑造》，载《1949 年：中国的关键年代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国史馆”2000 年，第 627-633页。

[23]参见《中国大饥荒档案馆》网站，“异议论点集锦”。

[24] 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转引自萧功勤.《知识分子与观念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第 1 页。

第十七篇　阶级身份和差异：1949-1965　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

原为单行本，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2004　年出版。现收入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在历史的风陵渡口》（高华文集）2005 年

前言

中国自古以来改朝换代都是血雨腥风，人头滚滚落地，进入　20　世纪，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引入了民主、自由等新因素，清朝退亡，民国肇立，新政权没有对前朝人物大开杀戒。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共政变上台，建立党国体制，奉反共为基本国策，以武力镇压共产党，激起中共的长期武装反抗。毛泽东有名言：蒋介石拿起刀，我们也拿起了刀。从此国共两党，兵戎相见，即使在抗战阶段，双方为共御外侮，结成第二次合作，但彼此仍心存芥蒂，互不信任。1945　年后又有三年内战，最后中共胜利，国民党败退台湾。在长达　22　年的时间里，国共长期武装对抗，无数百姓被卷入，造成生命的巨大牺牲。

自从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东西方阵营对峙的冷战大格局下，中共开始了一个创设制度，重建国家和社会的过程。新制度和新秩序建立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对旧政权及其人员以及“敌对阶级的社会基础”的政治清算来展开的，其思想和实践的背景是：马列主义的“彻底砸碎旧的国家机器说”、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另一来源就是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共革命根据地实践的经验。

胜利者对旧政权及其成员，以及“阶级敌人”的政治清算和改造，是有计划有步骤的一个庞大的社会工程，其具体路径就是“划分阶级成份”。在近 30 年间，党和国家对于社会成员的阶级出身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将阶级出身作为检测普遍民众对新政权政治忠诚度的重要的识别标志，并通过此项检验，巩固和强化自己的政权基础。由此出发，执政者在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根据变化的形势对社会成员持续不断地进行政治身份类别的划分排列，有差别地给予社会成员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待遇。这种对阶级出身问题突出强调的思想意识和依此划分社会成

员政治类别的原原则，在本文中被指称为“阶级出身论”。

执政党的这套思想和组织原则在 50 年代初开始在全国贯彻，但其历史渊源悠远。1928年 1 月 24 日，毛泽东为江西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书写了这样一幅对联：“想当年，你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到今日，我宰杀土劣，怕不伯，刀上加刀”[[1]]。50 年代后的实践只是 1949 年之前中共根据地实践的延伸和发展。在建国后的 17 年里，“阶级出身论”随形势的发展，历经几次变化，在 60 年代初中期成为新政治文化中的强势意识，对国人的生活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1966 年“文革”爆发，毛泽东提出：文化大革命是国共长期斗争的继续，“阶级出身论”迅速转化为“阶级血统论”，从而造成一种广泛的社会歧视现象。1978 年，党和国家终结了这项政策从而大大解放了社会，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也标志着新政权以严刑峻法奠定统治基础的历史阶段的结束，国家进入了和平建设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

对于“阶级出身”问题和文革的关系，除了遇罗克在文革初期的语境下发表的《出身论》一文，在上世纪 80 年代，大陆思想学术界对此问题也曾有所论及，但是对此议题出反思并没有延伸到“阶级出身论”在 50-60 年代的表现形态，更没有将这个问题置放于 20世纪中国共产革命的历程背景下予以系统考察，90 年代后期及近年来，在中国出现了有关这一议题的零星叙述和民间回忆录，对于了解“阶级出身论”在 50-70 年代的表现形式，以及其对民众生活的广泛影响，特别对于观察当年中国社会的另一广大人群及其家属、子女的生存和生活状态，有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叙述极为零散，多数是未刊的文字。

本文试图将“阶级出身论”置放于 20 世纪中国共产革命的脉络中进行考察，从历史的角度来梳理这一重大问题，之所以选择 1949-1965 年为论述的中心，主要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这一阶段的“阶级出身论”现象一向为研究者所忽略，研究者相对较关注于“文革” 期间的“血统论”问题，而了解“阶级出身论”的社会历史根源，特别是剖析建国后十七年的“阶级出身论”现象，则是了解文革“血统论”的入门，因为后一问题是前者的必然发展和内在逻辑的延伸。本文以综合论述的方式探讨“阶级出身论”的历史背景和建国后十七年的表现，所依据的材组为四类：中共历史文献，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所藏当代中国史资料，前苏联有关中苏关系的部分档案资料，以及有关当事人的回忆资料，笔者认为从学术的角度对这个议题进行客观研究是有意义的，并希望能通过这项研究引致后来的研究者继续关注和探讨这个重要的议题。

一、“阶级出身论”的社会和历史根源

中共以“阶级出身论”作为一项重要的思想和组织原则始于 1927 年秋苏维埃运动初兴之际，它是中共对国民党镇压政策的一个激烈反应。1927 年国共分裂，中共被国民党镇压，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与暴力革命思想全面进入中共，与之相随，“阶级出身论”在中共党内迅速兴起。“阶级出身论”的要义为：明确谁是“敌人”、谁是“自己人”，依此逻辑，支持国民党反共的阶级、阶层为“敌人”；支持、拥护中共的则为“自己人”；“自己人”的最重要部分为工农阶级及其子弟。

中共是依照俄共经验，在第三国际指导下成立的列宁主义政党，在 1921-1927 年这一阶段虽然在建立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革命同盟军的组识方面已经初步显示出唯阶级出身的倾向，但是在这个阶段，中共又宣布现阶段中国革命为资产阶级民权性质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其针对目标是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军阀，故而中共对其它阶级的态度还比较温和，更说不上对本党党员采取“阶级出身论”的立场。中共的组织构成中，知识份子党员也占了较大的比重。据陈独秀在 1927 年 4-5 月召开的中共五大所作报告称，至 1927 年4 月，知识份子党员占全党党员人数的 19．1%，其它工人占 50．8%，农民占 18．7%[[2]]。在 1924-1927 年大革命中，中共组织获得迅猛发展并初步在工农运动中争取到了领导优势，但中共的阶级意识还未充分成熟，即便在农运较为展开的湖南、江西、湖北，农民阶级反抗农村旧势力的行动只限于给土豪劣绅“戴高帽”、“游乡”，还未发展到对地主阶级施行肉体消灭。蒋介石对中共的暴力镇压和国民党大规模的“清共”，迫使中共也“拿起了刀”开始了对国民党的长期武装反抗。

“阶级出身论”的兴起与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组织构成的最新变化也有着密切的关系。1927 后，随着中共逐渐开辟农村各革命根据地，农民党员在党的构成中的比重大大上升，与此同时，知识份子党员在中共的危难关头大批退党，带来了全党上下，尤其是党的领导层对知识份子的深刻的负面认识。这就是，在严酷的白色恐怖和战争环境下，地主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共产党员极易动摇叛变，而促使他们动摇叛变的原因即是其所受的敌对阶级思想影响，以及他们与旧阶级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中共唯一可以依靠的只能是从未受到敌对阶级思想影响，且在政治和经济利益上与地主资产阶级存在根本冲突的工农阶级。1927 年国民党清党后，茅盾（沈雁冰）创作《蚀》三部曲，被中共认为：“这是用小说写他的思想”，“当时党认为这就是他的退党宣言”，“从此以后，他不找党，党也不找他”[[3]]。

“阶级出身论”兴起的国际背景是斯大林的“清党”经验对中共的影响。1927 年后，中共中央选派大批工人和知识份子党员赴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和其它军政学校学习，此时正值苏共开展清洗托洛茨基派的党内斗争，中国留学生也全部卷入。在苏共“清党”中，实行以阶级出身鉴别党员的严格的政策，凡工农出身的党员可以重新登记拿到党证，但非工农阶级出身的党员则一般降为候补党员，此种做法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也被照搬，对党员的思想影响极大[[4]]。随着在苏学习的党员陆续返国并被派往各根据地，苏共的这种唯阶级出身的思想和组织方法迅即传播开来，并与根据地内已经出现的“阶级出身论”完全汇合。

从 20 年代末开始，中共党内的“阶级出身论”已渗透到党的思想和组织工作的广泛领域。1927 年中共“八七”会议上首次提出提拨工人干部的主张。在 1928 年中共六大后，提拨、重用工人阶级出身的干部成为一种新的流行现象，一大批工人出身的党员被任命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这批人中有：向忠发（中共六大政治局主席）、罗登贤（中共六大政治局候补委员）、卢福坦（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陈郁（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任命的政治局委员）、张金保（中共六大中央委员）、陈云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任命的中央委员，临时政治局成员，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委员）、项英（中共六大中央委员、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委员）、邓发（中共六大中央委员，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政治侯补委曼）、谭余保（中共六大中央委员）、唐韵超（中共六入中央委员）、余飞〔中共六大中央委员）、顾顺章（中共六大政治局候补委员）。周秀珠（中共六大候补中央委员）、苏兆征（中共六大政治局委员）、徐锡根（中共六大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中央委员）等数十人。与拨提、重用工人干部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中共创建江西等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最初岁月就已表现出对非工农出身党员的排斥态度。在短暂的海陆丰根据地时期，工农出身的干部开会时可坐在前排，知识份子干部则被要求坐在后排[[5]]。1928 年 9 月，中共湘赣边界党组织在井岗山地区首次开展了一场以清洗党内地富出身党员为目标的"洗党"斗争[ ]。

在战时氛围下，出身地富家庭的党员虽然经受过严酷的斗争考验，但这并不能使根据地领导人相信，他们在未来的斗争中还会立场坚定，革命到底。而在红色区域，确实也存在着个别知识份子党员卷款潜逃或脱队叛变的事例，这就更使得推行"阶级出身论"有了理论与事实的证据。

1927 年后，革命的主体已从工人阶级和知识份子转变为农民阶级，中共依靠由贫苦农民组成的红军，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在党的意识形态义理系统中，唤起农民的"阶级觉悟"，激发他们对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仇恨，占了最重要的比重。广大农民出身的党员作战英勇，对敌斗争坚决，尽管他们对马列理论知之甚少，但是农民出身的党员所具有的"朴素的阶级感情"，他们对革命的忠诚，及与国民党势不两立的立场与态度，成为凝聚革命队伍的最重要的思想动力。中共相信，凭籍着这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下，完全可以在苏区建立起自己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

在苏区紧张的战争环境下，"阶级出身论"逐渐成为党和军队的一种约定俗成的思维方式和组织原则，这其中除了领导机关有意识的推动之外，苏区"军事第一"客观环境也使得这一观念渐趋制度化。在根据地的组织工作领域，除非在莫斯科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在军事斗争中表现英勇，取得战功，被认为是经受过严峻的战争考验，知识份子干部一般多被安排在地方苏维埃政权机构从事宣传和文教工作，这样的安排并非千篇一律，有时也会出现例外的情况，但大致成为组织工作中的一种传统方法，久而久之，就在根据地干部中造成一种印象，这就是知识份子干部不适合做最重要的军事工作。在军事第一，枪杆子决定一切的年代，文职干部在党内的地位自然低于军事干部。而知识份子党员也完全认同了"阶级决战"的口号，对加在自己身上的某些歧视性的安排，多能从党的利益的角度予以理解。因此"阶级出身论"就成为了一种公开的思想意识。

在浓厚的唯阶级出身的氛围下，根据地内逐渐出现几种带普遍性的现象：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份子党员干部受到各种有形或无形的歧视，在鄂豫皖地区，知识份子干部被贬称为"白腿杆"，意即是没有实际斗争能力的人，以致一些知识份子不得不故意装成文盲。在 30 年代初，仇

视和乱杀知识份子最严重的是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及鄂豫皖、川北根据地。1937 年进入延安中央党校的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中，许多人明明识字，却硬要伪装成文盲，唯恐因识字而遭清算[[7]]。其二，一旦发生大规模的党内斗争，地富出身的知识份子干部一般部会首当其冲成为被斗争对象，甚至遭到肉体消灭。

1930 年初，经历多次组合的江西地方红军和赣西南党团机构在若干问题上与江西苏区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产生了意见分岐，由毛泽东主持的“二七”会议将赣西南方面的负责人扣上富农份子的帽子，2 月 16 日由毛任书记的红四军总前委发出《前委通告第一号》，正式宣布开展肃清地主富农的斗争。通告指出：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败。联席会议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的布尔塞维克化[ ]。

“打倒机会主义领导”在此前还是一个党内斗争的概念，1927 年“八七会议”前后始出现的概念，也只是宣布改变陈独秀的路线，并中止其在中央的领导职务。在这之后，中共虽已愈益强调思想统一，但党内还保留了若干大革命时期民主传统的痕迹。依那时的党道德和党伦理，不同意见仍可在党内争论，中共中央或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则拥有最终裁判权，未闻有将持不同意见的党内间志予以肉体消灭的事例。但是到了 1930 年，毛却将“打倒机会主义领导”与肉体消灭结合起来。将一个党内斗争的概念转变成一个对敌斗争的概念，这中间需要过渡和转换，毛泽东轻而易举就找到了这个中介环节。他宣布党内机会主义领导本身就是地富反革命份子，从而将对敌斗争的口号——打倒国民党、消灭地富反革命，与党内斗争的概念“打倒机会主义领导”顺利地衔接起来，一举获得了镇压的正当性。所谓镇压有据、消灭有理。随后展开的红一方面军内部的“打 AB 团” 极为惨烈，地富或知识份子出身的党员干部人人自危，朝不保夕。于 11 月下旬至 12 月中旬在一方面军迅速发动“快速整军”——其主要内容就是在师团营连排成立肃反组织，捕杀军中地富出身的党员和牢骚不满份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四万多红军中肃出 4400 余名“AB团”份子，其中有“几十个总团长”（指“AB 团”总团长），这些人都遭处决[[9]]。

需要强调的是，20 年代末，所有的中共革命根据地都是党的知识份子干部率先开创，而坚持“阶级决战”路线，在苏区全面推行工农阶级优先政策的中央核心层的绝大多数领导人也都是知识份子出身。只是他们与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份子不同，博古、张闻天、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等基本为葛兰西所称的那种“有机化知识份子”，即以革命为志业的新知识份子。这批人士中除了张闻天等个别人，或者没进过大学，或者所受的大学教育为时较短，即使留学出洋，也多为勤工俭学性质，基本上未受西方学校正规教育的训练。20年代中共领导人知识背景上的另一个特点是他们都曾在苏联学习过，这种学习基本为政治理论性质的培训教育，不管留苏时间长短，苏俄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阶级斗争、暴力革命、镇压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知识份子，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 1928 年中共六大，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作报告对陈独秀、彭述之等大

知识份子大加嘲讽、批判，更将疑惧知识份子的思维方式从此深埋入这批留苏干部的心中。这批干部返国后大多进入党的领导层，这就使得轻视、防范知识份子的思想意识增加了神圣化的色彩（对知识份子负面批评来自于世界革命的总司令部共产国际），也更具有了说服力（知识份子出身的党的领导人也需要进行不断的思想改造才能实现真正的无产阶级化）。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国际派”掌控中共中央的时期，在贯彻“阶级出身论”时也是有相当弹性的，党在白区的斗争策略是，一方面坚持工农阶级优先的政策积极在工人苦力和社会底层的贫苦群众中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同时，重视团结，争取资产阶级知识份，吸收他们中对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有明确认识，对国民党统治表现强烈不满的一部分人，参加党的组织。即便对于某些资产阶级中上层知识份子，和旧军官、旧政客，中共也本着争取一切可以团结、利用力量的策略，并不在意他们的阶级出身，只要这些人承认中共党纲，愿为革命工作，且有特殊贡献，皆可被吸收为秘密党员，如杨度、胡愈之、王昆仑等都是在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初成为了秘密共产党员。

在 1928-1931 年毛泽东在江西苏区，支持和推行“阶级出身论”与“国际派”难分伯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在 1935 年毛泽东主政中共后“阶级出身论”在形式上有较大的改变。党的领导人已意识到不能再以“出身”问题自缚手脚，中共若继续奉行昔日严格的“阶级出身论”的立场，无疑是自锁门户，主动放弃发展的机会。更重要的是，继续奉行旧时僵硬的“阶级出身论”已有瓦解党和军队的危险。尽管中央苏区在 1932 主已调整肃反政策，但是肃反的核心意识“阶级出身论”并没有得到清理，反之，反之由肃反运动强化的唯阶级出身的倾向在 30 年代中期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某些被诬指为“反革命”“托派嫌疑”的同志，甚至是在被监视的环境下走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杨尚昆的妻子李伯钊因被怀疑为“阶级异己份子”和“托派嫌疑”，直到走完长征的 1936 年，才被吸收入党[[10]]。少数社会经历复杂的同志，例如原福建长汀福音医院医生傅连彰也是在长征到达陕北后因毛泽东宣布非党员经长征皆可入党，才被吸收为党员。

从 30 年代后期开始，中共虽已大规模调整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阶级出身论”也被转换，但其精神实质仍然保存下来，并被改造加工为一种更精致的原则，更趋于系统化。在延安时代“阶级出身论”的表现形式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中共向知识份子敞开大门；另一方面又继续坚持“工农阶级优先”的政策。在大量吸纳知识份子的同时，仍坚持用“阶级出身论”的意识对知识份子进行思想改造。从逻辑上看，这二者间似乎存在矛盾，但若细加分析，则可发现它们并无任何冲突。

中共坚持工农阶级优先的政策是与共产党的性质紧密相联的。抗战阶段中共领导人都一再重申，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党是穷人的政党”[[11]]。党的基本队伍只能是工农阶级，对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党虽然欢迎他们参加革命队伍，但是中共绝不能放弃自己的阶级立场，还是要“根据阶级看问题，根据阶级决定问题”[[12]]。抗战初期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谢觉哉更具体谈到党对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的要求是：“时刻记住自己是抛弃了、背叛了原来阶级，转到无产阶级

先锋队里来了”[[13]]。所以，抗战阶段对“阶级出身论”的调整，具有某种策略性质，并不意味着党放弃了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中共在抗战阶段就是依据这样的思想逻辑：既不以阶级出身问题为由将大批知识份子拒之于门外，又创造了一系列概念，制定许多具体的政策，将“阶级出身论”的基本精神保存下来并发扬光大。针对大批前来延安的非无产阶级出身的青年知识份子，中共采取的是强化政治思想训练的方法，引导他们学习马列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学说。然而，仅仅着眼于学习马列理论并不能完全解决知识份子“阶级立场”的转化问题。只有结合严格的党性锻炼和经历阶级斗争的洗礼，才能真正转变知识份子的立场、观点、态度，这是一条非无产阶级出身的青年知识份子迈入无产阶级“门槛”的必由之路，这一步主要通过 1942年开始的整风审干运动和 1947 年的土改运动来实现的。

从 1942——1945 年，毛泽东和刘少奇推出一系列措施，经由整风、审干、抢救运动，使全党干部，尤其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知识份子在立场、观点、态度三个方面实现了彻底的转变。在思想改造中，阶级立场的转变是一切转变的基础。解决阶级立场的转变问题，并不是革命概念的简单学习和接受的问题，而是要切切实实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例如：对镇压革命的敌人，你是积极参加，还是对敌人心存怜悯？对国民党蒋介石是抱有幻想，还是敢于斗争？

按照毛泽东的看法，一个人的阶级立场必然决定了他的观点和态度。例如：你是不是在心里还欣赏资产阶级个性自由、个性解放的错误思想？你是否心悦诚服地把一切都献给党？你是否真正同意你所出身的剥削阶级家庭是肮脏和反动的？你对没有文化的工农群众是满口鄙夷，还是甘心做他们的小学生？你对党的考验是真心接受，还是抱冤叫屈？即便像谢觉哉这样在 20 年代入党的老党员，也要经过党的考验，谢在日记中写道：“尤其如我这样在旧社会生长壮大起来的人，遍身沾满了恶浊，如果不是长期党的锻炼，便说自己对阶级、对党是如何抱无限忠心的人，还须得党加以考验”[[14]]。

在 1943—1944 年的抢救运动中，延安的知识份子干部普遍都被怀疑为“特务”“内奸”，而被假定为“特务”的主要依据即是出身不好。抢救运动的偏差以后虽被纠正，但是“阶级出身论”却没有受到任何批评和清理，相反，因整风、审干、抢救而进一步滋长。

“阶级出身论” 在中共党内长期存在，更主要的是因为这种意识与原则有利於党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聚集社会支持，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加速建成党的基层结构。抗战阶段，中共为了适应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形势，在根据地内修改了江西时期打击地、富的政策，转而采取联合地富抗日的统一战线政策。但是，这个政策在抗战阶段并不是完全无差别地执行的。1944 年晋绥地区开展减租斗争，“个别地方”对地主采取扫地出门的政策[[15]]。抗战结束后不久，中共面对内战再起的形势，迅速将原先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政策。与这个政策相配合，从 1947 起，在刘少奇的具体指导下各根据地以革命暴力的形式开展了以清除地主、平分土地为中心的土改运动。几年后刘少奇向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提到：

在我党中央做出进行土改的决定和批准土改指导文件之后，从部队

当中抽了一大批党的同志实际贯彻这一重要措施。当开始实际工作时，除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土改政策外，我们党的同志犯了许多重大的错误。一小部分同志，迁就地主和富农。本应没收地主富农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没收他们的财产和土地，可我们这部分同志却怜悯起地主和富农来，给他们留下了私有财产，生产工具，有时还留下了大块土地。其他一部分人，我们党的大部分同志，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开始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和富农。而且，一部分中农也同富农一起被消灭了。（当时）、“左”倾错误非常严重……一些地方，甚至把地主的头砍下来用杆子挑着打着标语沿街游行。还有的把地主的心挖出来，用棍子挑着在村里来回走，号召村民们杀死类似的人。被消灭的地主、富农，还有一部分中农，约有 25 万人。党中央得知这些情况以后，立即采取措施制止这种消灭人的行为，纠正了产生的错误[[16]]。

为了配合疾风暴雨式的土改，当时党内还平行展开了一场十分激烈的“整党”清洗运动，中共在这场斗争中，明确宣示党的阶级路线，将打击矛头对准出身地富家庭的党员和干部，刘少奇在 1947 年 7 月全国土地会议报告中说，土改不彻底的原因在于地主出身的干部出来阻挠土改，“他估计在全国各解放区实行土改和整党将有数十万党员和干部被群众抛弃，或被批判斗争，甚至被审判”[[17]]。中共晋绥分局领导人在解释“阶级路线”时用了以下故比喻：“黑老鸦生的白蛋蛋，孵出来的还是黑老鸦。”在这种精神指导下，划分农村的阶级成份一般均需追查其前两代、三代的经济状况，有的甚至要从乾隆年间和同治年间所立的碑文去查证。对於那些已经破落的人也不能轻易放过，因为“他们前两辈子压迫人，好活了，这辈子不给他们沾上些封建，那太便宜了他们”[[18]]。所谓“沾上些封建”，就是划为地富成份。对干部也采取“查三代”的方法，将那些祖辈曾是地主，现在已成为穷人的干部，也视为地主的子孙加以清洗。在这次“整党”斗争中通过“三查三整”——其核心是“查阶级”（阶级出身），最终将“阶级出身论”深入到党员的意识深层，并转化为一系列的制度措施。1947 年 12 月 15 日下达的《华东军区关於全军坚决拥护土地改革的命令》规定：出身地富和家庭为地富的干部，应当坚决抛弃原来的阶级立场，不准写信回家或暗或明的支持地富家庭；工农干部则应坚决保持其阶级的纯洁性，随时随地不要忘本，不得有任何假公济私与包庇袒护地主的行为。1948 年初华东野战军领导人粟裕在动员学习土改政策的报告中强调 “土改学习是人民解放军内部的一次革命。不仅是一般的思想改造，工作检查，更重要的是，阶级界线的明确划分，阶级成份的彻底检查”[[19]]。1947年土地会议后，华北根据地部分地委的领导机构还根据干部的阶级出身进行了调整，提拔了一些文盲干部，例如，新任四地委书记杨晴、专员崔民生都是文盲，知识份子干部则被安排担任副书记[[20]]。

延安整风运动和土改整党运动，彻底改变了中共党内知识份子的精神气质，使得许多知识份子干部甚至在待人接物和装束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据翻译家杨宪益回忆，1949 年 4 月，接管南京市文化系统的干部，在与南京知识份子谈话时故意“装出一副不文明的样子来”，“用手不停地抓挠他那双肮脏的赤脚”，但其人过去却是“大学生的知识份子”，而 1949 年“许多进步知识份子都像他那样……，好像自己是老革

命”[[21]]。

从中共创建新政权的效果看，“阶级出身论”无疑发挥了极其重要的社会动员的功用，中共成功地以此精神和原则建成中共在根据地的社会结构，但在国统区内，中共则以“争民主、反独裁”为号召，尽量争取社会各阶层的支持。由于中国共产革命长期以农村武装斗争为中心，以农民为主体，最终，“阶级出身论”成为创建共产革命政权的最重要的思想与组织原则。

二、区分敌、我、友：以“政治分层”重建社会（1949-1953)

1949 年中国共产革命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中共的当务之急是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建立党的阶级基础和新政权的社会基础。中共治理新国家的理念与方法离不开自己的背景，“阶级出身论”作为革命的新传统，被加以继承和发展，其具体路径就是在全国广大人群中进行敌、我、友的区分，通过迅速组织“阶级队伍”，来重组中国社会的各阶层。

执政党依据苏联经验和中共领导革命根据地的历史经验，对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重新予以定位：明确工人阶级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工农联盟是国家的政治基础，民族资产阶级既是革命的盟友也是革命的对象，知识份子则是一个中间阶层，既可为新社会和革命服务，也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载体，而国民党残余力量、地主、反革命则是新社会的敌人。

位居新社会政治阶层第一梯级的是工人阶级。在 1927-1949 年中共 22 年的武装斗争中，农民一直是共产革命的主体，城市工人阶级发挥的作用很小。在建国初中共党员的阶级构成中农民出身的党员占了绝对优势，且大多为文盲。到 1949 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时，中共党员组成中，工人成份所占比重仍极小，以工人党员最多的东三省为例，在 90 万产业工人中，党员只有 16 508 人，占工人的 1．8%，而到 1949 年 12 月，农民党员有 340万 1 千人，占全党党员人数比重的 75．8%，文盲共 309 万 6 千人，占全党党员比重的 69%[[22]]。中共党员成份的“农民化”一直为苏共所忧虑，此时更对中共的阶级构成非常不以为然，1949 年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在给国内的报告中，批评中国“很少依靠工人阶级来壮大自己，没有进行多少积极的工作来吸引工人加入党的队伍”[[23]]。

同年 10 月，刘少奇在和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的谈话中也承认：中国共产党的绝大多数党员（他们来自最贫穷的农民阶层）不识字，这是搞好党员学习的严重障碍。刘少奇说，就自己的阶级出身来说，中国共产党党员中 70-80%为最贫穷的农民，10%为工人，10-20%为知识份子和其他阶级出身的人[[24]]。中共既是一个工人阶级党，苏也对中共的阶级构成十分关心，更重要的是中共全面革命胜利在即，革命的中心即将从农村转入城市，中共面对陌生的城市只能找工人阶级作自己的阶级和社会基础。所以毛泽东在 1949 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宣布，进城后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于是建国后，工人阶级成为中国社会的“老大哥”。

位居新杜会政治阶层第二梯级的是农民阶级，即农民中的贫下中农。在战争年代，农民是当之无愧的革命的主力军，农民对中国共产革

命做出了最大贡献和牺牲，被广泛动员的农民不仅构成了革命军队的主体，而且在建国初党的队伍中占了绝大的比重。因而在革命胜利前夕和建国初的一个短时间内，中共宣布城市工人阶级和农村半无产阶级（贫农）是新国家的领导阶级，但是，由于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已被确定在城市，毛泽东很快修改了农民是半“无产阶级”的论断[[25]]，因此，农民只能处在革命阶级的第二阶位。毛泽东对农民的态度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毛高度评价农民的革命性，给农民很高的政治荣誉，在建国后的政治和思想领域，农民思维，农民习气一直都受到高度推崇，被赋予了纯正的无产阶级革命特质，而与城市相联系的知识份子等阶层，则因其出身和所受的教育被认定是旧阶级、旧思想的载体，被无休止地要求纯化思想；在另一方面是壁垒分明的城乡二元结构，毛不时批评农民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采用一切措施阻遏农民发家致富的愿望，全力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这样就使得 1949 年后中国农民的生存境遇呈规一种吊诡的状况：政治上有享很高的地位，而在经济和生活上长期陷于贫困，以致于 50 年代初，江南农民埋怨“毛主席有偏心”“工人是亲儿子，农民是干儿子”[[26]]。农民经济地位的低下，使得农村姑娘希望嫁到城里，山西农村女青年传唱的歌谣道：“农民，不嫁，放羊的没话”[[27]]。南京市郊区女青年甚至要和农民丈夫离婚，重找工人结婚。对此现象，江苏省委副秘书长周伯蕃认为：“就阶级观念来看这个问题，工人掌握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农村妇女要找工人结婚，这是自然现象，她们羡慕先进。”[[28]]

由工农子弟组成的兵——人民解放军，又称“工农子弟兵”，这是新政权的柱石。建国初党和国家曾动员和吸收一些知识青年参军，以满足部队急需的文化教育、医务、外语、技术人才的需要，以后又将其中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或未曾受过“抗美援期”战争或政治考验的一部分人陆续淘汰出去，使人民解放军成为了真正的无产阶级近卫军，在军队内绝不允许有“阶级异己份子”和异己思想，一经发现，马上清除。

商、学（知识份子）是面貌暧昧的阶层。从总体上讲这两个阶层不是执政党的依靠力量，但从革命策略的角度，还应尽量争取他们对新政权的支持，办法之一即是对这两个阶层进行政治上的“排队”——在他们之中划分左、中、右派，而判断左、中、右派的标志，不仅要看其现实对新政权的忠诚度，也要观察他们在 1949 年之前是支持、同情中共，抑或是在国共之间取中立立场，或者完全站在国民党一边，更细致的划分还要看他们在 1927年国共分裂后的政治表现：是曾经反共或从未反共。对於某些长期支持中共的民主人士，例如：宋庆龄、郭沫若、沈钧儒、史良等，尽管他们不是党员，执政党仍将他们看作是“自己人”，给予他们很高的政治地位和荣誉；而对某些在革命低潮时期脱离中共，以后又支持中共的民主人士；或在历史上一度反共，抗战后又重与中共合作的民主人士，党虽对他们十分客气，也吸收他们参加新政府的工作，给予他们很高的政府官位和很好的生活照顾，但却内外有别，把他们看成是“外人”。1949 年 11 月 15 日周恩来约见苏联大使罗申，在谈到中国新政府组成人员时说，已参加政府的沈钧儒、史良、李德全、傅作义是中共的亲密朋友；李济深、张澜所担任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只具象征意义，他们“仅在形式上是政府成员”；“而暂时受到我们的信任”，

仍参加各种会议的罗隆基则是民主领袖中的“极右份子”[[29]]，刘少奇也对罗甲说：李济深“这个人过去政治上十分摇摆，对共产党甚至右明显的敌意”，民主人士周围有的人甚至暗中帮助国民党和美国人，他表示：“我们正密切地观察他们，注意在实际中考察他们”[[30]]。

执政党对民主人士、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份子的要求是：解决“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这又是延安整风主题在新形势新环境下的重复。所谓“立场”就是在政治上旗帜鲜明的拥护中共和毛泽东的领导，站在中共和新政权的一边；反蒋、反美、拥护中苏友好；拥护和执行中共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所谓“观点”，就是接受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刘少奇的《论党》以及陈伯达、胡乔木、艾思奇等理论家的新论述，学习并初步接受“社会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基本概念。对于原先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人们，这些“新观点”是一套全新而陌生的叙述，包括对一系列重要概念，重要问题的重新认识，例如新的观点认为，在国民党统治时代，个人操守好，做官不贪污并不表明该人在政治上就是正确的。孔子第七十代谪系八府长孙孔令朋原任国民党天津市政府负责物资分配的官员，掌握大量面粉等紧缺物资，解放军进城后，孔令朋积极配合，向新政府移交了全部物资。1949 年 5 月，天津市军管会粮油部部长约孔谈话，针对孔令朋一再表白自己在国民党统治期间“从不贪污”，批评孔“有罪”。部长解释道：“国民党贪污腐败，尽失民心，才会失败得那么快，你想想看，国民党的官都像你这么做，革命何时才能成功，所以说，你有罪。”孔令朋说，当时听到的这番话，“真是前所未闻，意料不到”[[31]] 。所谓“方法”就是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学会自我批评。在所有新叙述中的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要他们自觉认识和接受“剥削阶级可耻论”。党站在道德制高点上，通过广泛密集的政治宣传，将阶级、阶级斗争的观念初步灌输到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份子的意识之中。

鉴于斯大林对中共的建议：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要改善同私人资本的关系[[32]]。中共在刚刚进入城市的 1949 年，出于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新政权对民族资产家采取了较温和的政策。刘少奇曾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在天津的小范围内发表了鼓励资本家加强经营，发展生产的“天津谈话”。刘少奇在谈话中甚至鼓吹“剥削越多越光荣”，但是刘的上述言论在当时就受到天津市委书记黄克诚的怀疑，也不为毛泽东所欣赏[[33]]。更重要的是“新民主主义”并非是一个稳定的社会形态，随着新秩序的建立，为了给大规模的社会改造创造必要的精神和思想条件，执政党开始强化意识形态中的反资本主义的叙述，而这个过程是伴随政治运动有序进行的。为了“教育”城市中的资产阶级促进他们改造“阶级立场”，党组织安排这两个阶层的“头面人物”参加土改运动，让他们接触“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的事实”，并根据他们对土改“镇反”的态度，对其作出“进步”、“中间”、“落后”、“反动”的政治划分。50 年代初，黄炎培对苏南地区的土改心存疑惧，为他的地主朋友“抱冤叫屈”。毛泽东虽然对黄炎培礼遇有加，黄也官拜政务院副总理的高位，但毛在党内讲话中却称黄是其“右派朋友”，毛并指示中共苏南区党委通过接待返乡考察的黄炎培，对其进行土改必要性的教育[[34]]。时任《人民中国》英文版副总编辑的萧乾对土改的态度比较积极，在参加土改后曾写过一篇《在

土地改革中学习》的文章，毛泽东予以表扬，下令为萧乾的文章出单行本，并在全国广播[[35]]。但由于萧乾在 40 年代后期曾被左翼文人郭沫若点名批判，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中的右翼，因此在建国后，萧乾长时期仍得不到信任，原已安排萧乾出访英国的计划最终还是被取消[[36]]。只是在 50 年代初期，由于实行"内外有别"的策略，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份子并不真正了解执政党对他们的真实态度，他们以为只要熟读领导人的讲话和《人民日报》的社论，就是解决了"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于是出现了许多满口新名词的"爱国资本家"和"进步知识份子"。但伴随几个大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土改""镇反""抗美援朝运动""思想改造运动""三反" "五反""审干运动"（也称"忠诚老实运动"）等，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份子才知道，即使满口新名词，也不会被党组织视为是"自己人"。著名翻译家杨宪益教授在 40 年代后期参加"民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9-1952 年又经常在南京市的党报上发表拥护党的政策的文章，1953 年还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但因杨宪益在建国前与英国人关系密切，故一直得不到党组织的信任[[37]]。因为领导只要从他的阶级出身或历史关系入手，就可以很容易判断出杨宪益等的"立场"仍然有问题，显而易见，党组织有关"立场"的认识与他们的认识完全是两回事。

金观涛、刘青峰的研究对这种现象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解释。金、刘认为"无产阶级的立场是通过批判，否定对立面而展开的"[[38]]。站在当时党的角度，"立场"不完全是一种政治姿态的展现，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无产阶级出立场是需要通过否定资产阶级来体现的，而最简洁的方法就是看这个人的阶级出身和他在 1949 年以前的政治历史关系。因此，阶级出身和过去的历史记录是第一位的，现实政治态度是第二位的。中国新闻学院教授刘乃元所回忆的建国初期他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的经历，就提供了这方面的一个典型的例证。刘乃元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精通英文，1949 年前曾受聘于"美国之音"中国部任记者，由于他的家庭背景和曾受聘外国机构的经历，刘乃元虽然渴望"进步"，但在华北革命大学仍经常处於被批判的地位。刘乃元羡慕一位吃饭蹲著的学员，这人虽然只有初小水平，却被领导安排做了"组长"；因为蹲着吃饭的习惯，标志着这人的家庭出身是属于"穷人"，也就是"后来学习中常说的阶级"，刘乃元说，从此，他明日了一条重要的道理：阶级成份比文化水平重要得多[[39]]。

所以给"立场"和"何为正确"下定义是一项重要的权力，掌握了这个权力，再把"立场"和"阶级出身"结合起来考察，就一劳永逸地掌握了改造知识份子的主动权。1950 年11 月 1 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写南京市欢迎苏联尤金博士学术演讲的报告会上提出新概念"美国没文化"，一时在南京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人对此持有异议[[40]]，但当执政党提出"立场"问题后，他们就噤口无言了。刘乃元在华北革大学习时不同意将人性一概视为阶级的产物。他提出的问题是，各种慈善事业、人道主义事业属于什么阶级？美国的人权运动属于什么阶级？学习讨论会的结论是：1、慈善事业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它比公然的压迫更为阴险。2、美国是阶级社会，人权运动是无产阶级的运动。不久后，刘乃元就因其持有的错误的观点受到学校领导的公开批评，但是对

刘乃元的批评并没有到此结束，因为还没有挖掘出他“错误的观点”的“阶级根源”於是在小组会上他被追问交待个人历史问题，对刘乃元的结论是“坚持反动资产阶级立场”[[41]]。

当执政党还在执行“新民主主义”建国方针的时候，在思想意识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份子就已被视为对立面，只是在这个时期，在落实“阶级出身论”的原则时，仍然表现出相当的弹性：各级政府都吸收了部分民主人士参政；在许多大、中城市，资本家的家属甚至担任了居民委员会负责人；非工农出身，“历史清白”的知识青年，即使不是党团员，也可参军、参干。

建国后的“阶级出身论”是通过 50 年代初的几个大的政治运动来体现和落实的。执政党重建社会的基本方法，就是不间断地推进政治运动，借助于政治运动将党深深扎根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对于政治运动的这种特殊功用，党的领导人并不讳言。1954 年党中央负责政法工作的领导人董必武、彭真都曾说过，共产党就是靠运动吃饭[[42]]。

这时期的政治运动有一个重要特点，这就是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较多并直接运用革命专政或革命专政的震慑力，带有明确的政治清算的色彩，即通过政治运动，检查、发现敌人——历史上有严重反共行为的份子、一般参与反共活动的份子、敌对阶级的社会基础——地主、“伪保甲长”等等，依据其罪行程度，分别采取镇压、监禁、管制等措施。

1951 年初，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全面推开，据董必武向苏联大使所通报的情况：到该年 7 月底，“反革命力量基本上被肃清。在华中和西南，肃清了在那里活动几十年的匪帮。被公安机关投入监狱的有 100 万人，枪毙了 50 万土匪、奸细、破坏份子和恶霸。在镇压反革命的过程中，城市没犯错误。农村出现了明显的过火行为。许多罪行不够死刑的犯罪份子也被枪毙了”。对于运动中的“过火”行为，毛泽东作出“纠偏”，在同年 5 月召开的公安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在某种程度上减轻惩治政策的指示”，即在可轻判和可重判情况下给予轻判的决定，部分被判处死刑的人可被缓刑 2 年执行，而且在两年期满之后还可改判他们劳改，只枪毙那些罪大恶极的犯罪份子。死刑不再像以往那样，由区或县政府批准，现在要由省和其他上级机关批准[[43]]。

1952 年开始的“三反”和“五反”运动都是重点打击资产阶级，1952 年 3 月，刘少奇向苏联驻华大使详情谈了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的意义和指导运动的策略，他说：在研究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得出了结论，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之下，暂时我们还不能彻底同民族资产阶级决裂和开始消灭它的运动。出于这一考虑，我们决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最上层，即最反动的那一部分实施打击。作为战术措施，党中央决定开展“五反” 运动。如果说“三反”运动涉及的仅是国家职工和地方行政机关里的职工，那么“五反” 运动是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是对它最反动的部分实施打击并将其消灭之。为了在实践中检验这一点，我们再次选择了北京和天津为试点。我们决定对属於资产阶级的所有工商企业进行检查，揭露他们的活动和滥用职权的行为，当我们在这两个城市取得经验之后，再在其他城市开展运动。已经查明，这样的工商企业，北京有 4.9 万家，天津有 5万家。所有它们都一一受到了审查。在开展这一运

动时，我们把最反动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份子同其中下阶层区别开来，只对其上层进行打击。臭名昭著的敌对份子，把我们同资产阶级的合作用于卑鄙目的的，是民族资产阶级中那些十分反动的份子。这些人干尽坏事，其中包括同美英间谍和其他组织合作，在我们研究了北京和天津所有这些工商界人士的情况，认真审查了所有材料之后，我们做出了以下决定：其余 1%最大和最恶劣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将被我们监禁和枪决，但我们首先得让他们交还所有的钱，迫使其交纳巨额罚金[[44]]。

在大规模经济建设即将全面开始的时候，对社会的全方位的改造已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其重要的一环就是摸清全国各阶级各阶层的“民情”。新政权高度重视对全国人民政治态度阶级出身的调查，尤其是城镇人口阶级成份的调查。将每个人的阶级出身视为是对新政权忠诚度的识别标志，其方法就是借助政治运动的巨大冲击力和震慑力，采取一系列具体细致的方法：动员本人交代、填写表格、写自传、检举揭发，审干人员外出调查等，检查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政治面貌（阶级出身），通过阶级成份的确定，在社会广大人群中排列区分出左、中、右，从此建立起可供查证的社会成员政治忠诚度的判断识别体系。

建国初期，执政党对农村和城市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在农村，党组织的中心工作之一就是用极大的精力来划分农村的阶级成份，加速建立党在农村的基层结构，执政党用于政治动员的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就是依靠自己人——依据阶级出身寻找自己人，以此来聚集社会基础，这主要表现在土改运动由通过严厉打击地主阶级，组织以贫雇农为核心的“阶级队伍”，划分敌、我、友，并迅速在此基础上建党（党支部、党小组）、建政（村委会）、建立民兵、妇联、治保小组，将党和政府的制度架构牢牢扎根在农村最底层，从而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中央政府通过各级机构对农村基层的垂直领导。

新政权在农村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的主要措施是“管制”，其基本方面就是强制规定被“管制”的对象：“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并随时接受群众的批斗。从理论上讲，“管制”是针对一小部分特定的人群，依照 1950 年颁布实施的《管制反革命暂行办法》，管制对象为：土匪、反动党团骨干份子、反动会道门头子、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等。一般地主、烟鬼、游民、懒汉、小偷、反革命份子和地主家属子女不属管制范围[[45]]。但在实际操作上，地方基层往往大大突破这项规定，在农村，一般都扩大所有“地主”及其家属和居家的子女。因为政治大气候一直强调要反对右倾麻痹思想，加强对敌专政，而是否符合“戴帽”和“管制”的条件，又无十分具体可供操作的标准，其解释权多掌握在基层干部手中。一些地区的县、乡领导为了表示站稳“阶级立场”，习惯性地采取“宁左勿右”的方针，大面积扩大被管制人群的范围，在 50 年代初还一度受到上级部门的批评，1953 年贵州省紫云县四区的德兴乡二村共有 330 户，人口 1627 人，却管制了 23 户（全家所有人均被管制），共 150 人，占全乡总人口的千分之九十二强，超过了中央规定的千分之三的 30 倍。贵定县都禄乡管制面竟达到该乡总人口的一半，独山县基长乡人口总数为8361 人，共管制了 456 人，经上级部门复查，只有 11 人符合管制条件[[46]]。四川省丰都县七区莲花乡七村被管制

者高达 250 人之，而真正符合管制条件的只有 3 人。灌县大观乡竟将缴不起公粮的农民及调皮的小孩也予以管制。“其他如管制反革命份子家属的现象亦很普遍”[[47]]。甘肃省武山县洛门区蓼阳乡将地主 50 户共 340 人，一律管制[[48]]。山东省历城县一区冷水沟乡符合管制条件的只有 23 人，但实际管制了 105 人。裴家营、梁王、三会人三个乡共有地主 82 户，连同地主家属子女共 394 人，也全部被管制。这些被戴“帽子”，受到“管制”的地主及其家属，都受到公开的歧视，生存境遇十分困难，某些地区的群众甚至公开命令地主和被遣送返乡的旧官吏称自己为“爹”和“爷”[[49]]。

相比较于城市，执政党对于农村的改造，更为得心应手，因为大体上只需将在 1949年以前在根据地执行的政策拿来用即可。城市的情况则较为复杂：共产党比较不熟悉城市；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受到《共同纲领》的制约，执政党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份子。但是，执政党一定要在城市建立起自己的阶级阵线，这就是一方面执行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另一方面又要在城市居民中区分敌、我、友。执政党的办法是：在城市开展较为和缓的民主改革。所谓“城市民主改革运动”发生在 1949-1953 年，就是配合几个大的政治运动，在城市各工厂、机关、学校、商店、街道，对所有人员进行“阶级摸底” 重点对旧人员进行细致的调查（家庭出身，1949 年以前的职业、经历），包括查历史、查社会关系、查生活。

50 年代初，在全国范围内的大中小城市和乡镇的各单位普遍进行了“阶级摸底”，这顶工作在的 50 年代的整整 10 年里一直持续进行，50 年代初只是这项工作的开始阶段。根据统一部署，华北直属第一工程公司在 1952 年底至 1953 年初，集中全体工作人员开展“冬训政治学习活动”，主要内容就是进行“忠诚老实学习”。在重点学习了刘澜涛、钱正英关于忠诚老实的讲话后，经过动员，在该公司的 152 人中，有 134 人交待了政治历史问题，仅据 1953 年 1 月 15 日一天的统计，就有 65 人交待了政治性问题，其中有：隐瞒国民党团长身份一人；隐瞒国民党排长身份一人；隐瞒“伪机关科长”一人；隐瞒国民党党员身份共 14 人；“国民党地下党员”一人，三青团员 4 人，军统、中统特务 5 人，一贯道 231人等等。公司领导对于上述人员，采取了“稳定情绪”的指施，一方面向他们承诺“保证不失业”，并及时和公安部门联系，部署对他们展开调查工作[[50]]。

西南财政经济委员会所属各中等技术学校学员的政治历史情况，经调查也基本摸清重庆第一土木建筑学校新生班共 115 人，其中参加过反动党派、反动军队、封建迷信组织的有 46 人；叛党政治变节份子共有 26 人；本人或家属被镇压或劳改者有 56 人（有些是一人兼几种）[[51]]。

1953 年，位於南京市的私营江南水泥厂开展了民主改革运动，经动员，该厂 1022 名职工中，有 997 人交待了个人历史，其中 753 人被认为“有问题”，占全厂职工总数的 76%强。工人中参加过三青团的有 54 人，参加过国民党的有 34 人，参加过国民党军队的 268人，当过国民党警察的有 81 人，曾是国民党特务的有 31 人[[52]]。上述自我交代人员中有严重问题的人，经调查核实后都予以了逮捕和管制，从而使党

组织进一步摸清并掌握了城市各单位人员的“政情”。

50 年代初的“城市民主改革”加速推动建立起执政党在城市的组织基础（党组织、团组织、工会、妇联），1953 年后，更建立起以户口制为中心的，单位、街道、派出所三位一体的综合治安保卫制度，将党在城市中的基层结构全面建立了起来。1953 年上半年西南民政局为配合人口普查，对重庆市三个派出所桂花街（商业区）、王爷石堡（居民区）、小龙坎（工厂区）所辖人口的政治面貌进行了调查。三个派出所共辖人口 64026 人，但“特种人口”高达 1 868 人，占人口总数的 3%，占 18 岁以上人口的 6%。所谓“特种人口” 是指被管制份子、“释放犯”、缓刑犯、在押犯、居住在城里的地主、登记自新未予管制者、“社会游荡份子”（小偷、暗娼、妓女、舞女）[[53]]。至此，所有城市居民的各种情况也被党和国家全面掌握。

执政党对于在党内贯彻“阶级路线”，表现出更加坚决的态度。这主要体现在严格入党条件和在党、军队、政府机关、人民团体、学校和企事业单位对干部进行频繁的政治审查和清理。建国之初，中共开始在产业工人中大量吸收党员，知识份子入党则要经过更加严格的挑选。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执政党在朝鲜战场上吸收了一批参军的知识青年入党。但是对于和平环境下要求入党的知识份子，则取决于他们在各项政治运动中的表现以及他们的家庭背景是否清白。如果阶级出身有问题，亲属中有被杀、关、管或有海外关系者即使在政治运动中表现十分积极，也不会被吸收入党。

1951 年由毛泽东亲自领导和部署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清理内层（党机关）、中层（政府机关）的运动。被清洗的对象大多是“阶级异己份子”，即出身于地富家庭、对地富家庭表示同情的共产党员。1952 年 4 月，在三反运动中，毛泽东又向全党发出指示，命令干部中“凡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地主阶级有关系者”，必须作出交代[[54]]。紧接着，全国各级党政干部向党组织普遍交代了各自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55]]。在这类运动中，交代阶级成份、本人历史和社会关系都是中心内容。

中共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下，从来就把清理内部，纯洁组织看成是一项事关革命成败、胜利果实能否保持的极为重要的问题，建国后，这又作为一项成功的经验加以继承与发展。事实上，建国后在党和军队国家机关的清理本身都是历次政治运动的重要内容。1952 年 3月刘少奇在向苏联大使通报情况时说：

审视出现的形势，党中来采取了清理党的队伍的坚决措施。所有犯有贪污、腐化、官僚主义罪行的人，都被我们清除出党。如果必要我们还不就此罢休。我们把所有这些人清除出党，用忠诚可靠的人加强党的队伍，用来自工人阶级、贫苦农民一方的积极份子和生产突击手补充党的队伍。我们把严重腐败份子、贪污盗窃份子送上法庭，关入劳改营，投入监狱，而查明的罪大恶极份子则被枪毙。随着这一运动同时还查明，解放战争时期投靠我们而很少经过考验的那部分党的工作者，在很大程度上同我们在思想上格格不入，他们当中有的是地主、富农、商人、国民党份子等人的子弟。这部分人在思想上同民族资产阶级接近，所以他们一同民族资产阶级接触便产生了共同语言，走上了同民族资产阶级完全合作的道路。[[56]]

另据董必武向苏联大使说，在清理过程中，尤其要对 1947 年以后入党，进入党政机关的所有人员重点进行审查，“清理非常慎重。那些过去有不大的反革命罪行而后来参加了革命的人员仍留在原来的岗位上工作。对有怀疑的人员进行隔离审查。查明的敌人将被逮捕”[[57]] 。

站在列宁主义党的角度和立场，特别是鉴于当时两大阵营冷战对峙的局面，执政党加强内部的清理是符合其革命逻辑的。但是进入 50 年代，国家毕竟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继续沿用战争年代的思维，将不可避免导致在“对敌斗争”的政策和实践上的“扩大化”。更重要的是，这种由对“敌情”过份估计而产生的极左的“纯化观”，它所造成的影响是全局性的，这尤其表现在 50 年代初对各地原中共地下党员的歧视性打击方面。中共广东地下党在 1947 年成立的“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拥有一万多人，内有大量的知识份子干部，这支部队为迎接解放军南下，作了大量工作，但在建国后其成员普遍被视为是“可疑份子”。中共华南分局领导人陶铸认为，“地方武装不纯”，“过去参加革命的人大多是地主、官僚资本家家庭出身的人”，其结果是，原广东地下党中的许多人都被清除出党，或被戴上“地主”的帽子，少数人甚至被枪毙[[58]]。而南方地区那些在革命胜利前夜参加迎接解放工作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更被普遍视为是“投机革命”、“混入革命的反动份子”而在镇反等运动中受到惩办。1949 年，湖南常宁有一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由在乡旧军官和士绅为首组成的“湘南游击队一纵一支队”，该民军结合其他几个进步组织，“不放一枪，未损一物”，在中共南下工作团和解放军尚未踏进常宁土地之前，就和平解放了常宁。但解放后，除“司令”一人暂时留用，参与起义的旧军官和士绅则基本上都被当成是“反革命”而遭到镇压， “直到改革开放后方被承认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得到平反，恢复名誉”[[59]]。

陆定一在 80 年代初回顾党对知识份子政策时，提到“农民进城”的概念，他说：“农民干部进城，同知识份子结合——互相推心置腹，亲密无间也是有困难的”[[60]]，一方面是上级领导部门的极左的“纯化观”和片面强调工农出身的组织路线，另一方面是大批文盲和半文盲的干部，两相交集，对国家的经济建设不可避免带来了消极影响。建国初期，全国县一级政权的领导干部基本来自军队转业干部和调入的老区干部，以及少数从当地运动中的积极份子选拔出的干部，这些干部的文化水平普遍很低，尽管当地都有一些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又曾积极参加迎接解放的进步学生，但一般都不会得到政治上的信任和重用，“个别大学生和多数中学生虽然一度被县委暂时任用，不久却又分化调离外地，剩下的又被相继清洗出党政部门。许多具体工作确实还要一点笔杆子，则借故清出党外，内部限制使用”[[61]]。

挟胜利之威进城的革命者，用高昂的理想主义精神和分类排队的方法管理社会，使得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份子的心理初步受挫，造成了知识份子心理上的某种“低气压”，一时有“中共各级组织重用庸才”的论调。对於这种情况，毛与中共中央都很清楚，在党内刊物中，不时有关于农村县区干部缺乏马列知识的报道。1950 年福建省委党校对 375 名县级干部和区委书记进行入学考试，60 分之下有 304 人，其中一半人成绩在 40 分以下，有一入学考试题目为“《资本论》作者是谁？”，不

少人答道："右倾机会主义者"、"唯心主义者"、"美国人写的"。另一题目为"事物发展原因是什么？"有人答道："是风吹日晒"[[62]]。为了提高干部文化素质，从 50 年代初开始，党和政府任各地兴办了许多干部速成中学，往一些大学开办了干部预科班，选拔了一些表现优异的工农兵和干部作为"调干生" 进入大学学习，毛承认"许多同志胸襟狭隘"[[63]]，"代表了农民的狭隘思想"；但毛又强调政治忠诚是第一的，"老实是首要条件"，其他可以学习改进[[64]]。不言而喻，有战争和革命经历的各级领导组织部门的负责干部都明白，在和平建设年代"政治忠诚"和"老实" 是难有具体衡量标准的，唯有依据阶级出身才可予以识别和判断。

三、强化革命专政和政治分层的细密化（1953 一 1956)

1953 年后，伴随国家快速进入社会主义，"阶级出身论"进一步转化为制度层面的措施。1953 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一年毛泽东废止了新民主主义的路线，宣布向社会主义过渡。在社会大环境方面，由于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在社会大众尤其是青年学生和工人中间，充满一种高昂的理想主义热情，全国上下有一种向上攀升的精神气氛；但是在另一方面，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控制日益加强，计划经济体制也初步确定，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各类批判运动接踵而至。其高潮是 1955 年的"反胡风运动"和继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肃反运动"，使得社会上某种压抑的氛围也在逐步聚集。所有这些转变及其批判运动，它的基本动力都是通过政治分层来实现社会动员。

新民主主义阶段的终结使党在国家政治和社会中所起的领导作用更加突出，加强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成了重中之重，换言之，在执政党内部实行了更为严格的"纯化"政策。1955-1956 年，全国党政机关、军队和学校又开展了一场"肃反"运动，在"内层"和"中层"中又清洗出一批"异己份子"，其中包括那些在建国初期，隐瞒自己的阶级出身，"混入"党内和政府机关内的"嫌疑"人员。仅 1955 年一年就对机关、军队、企业的 220 万人进行了审查，"查清了每一个人的过去，他的联系和情绪"，在这批人群中，有将近 的人被视为是"不可靠份子（国民党的侦察人员、外国间谍、反革命份子、流氓）[[65]]。

在新干部的任用提拨和选派留苏生工作中，家庭出身问题成为首要考察条件，从工、农、解放军中选拔优秀份子进入大专院校学习（调干生）、虽未达到像挑选留苏生那样极端重视家庭出身的程度但调干生的主体多为工农家庭出身。

1953 年后，决策层初步形成一个基本判断，这就是随着加速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敌对阶级的反抗、破坏一定加剧。1955 年 6 月，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许建国在政协上海市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讲话中提到，计划在 5 年内再镇压若干数目的反革命份子和各种犯罪分子，由于数目惊人，引起上海市工商界、知识界人士的异议[[66]]。对于当时是否在敌对阶级的大规模的反抗和破坏，现有资料无从证实，但根据各种资料反映，1953 年后推出的"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运动"、"反胡风运动"、"肃反运动"等确实造成了部分城乡人民和一部分知识界人士的强烈不满。

1953 年 11 月初，天津市实行面粉统销计划，立即"遭到天津市部

分资本家和反革命份子的讽刺和漫骂”，泰明鞋店资本家说“毛主席强，但全国没有粮食吃”“总路线一公布，和军事管制一样”[[67]] 。河北省的一些党员干部也为农民“抱不平”“喊冤”，说“政府对农民太苛刻了”“对农民又一次下手”[[68]]。1956 年，历史学家、全国人大代表剪伯赞回湖南省常德老家视察，家乡的父老向他哭诉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饭吃，只吃树皮、野菜、菜饼[[69]]。毛和领导层或许就是将这种不满言论视为是敌对阶级的反抗和破坏，所采取的反击措施还是强化阶级斗争，其具体方法就是将政治分层进一步细密化，把前一阶段出于策略考虑而暂时未于触动的人员也划入敌对阶级范畴。

1953 年后“敌对阶级”范围较前有了新的扩大，在原先的地主、反革命、反动会道门、土匪等之外，又增加了富农。1954 年江苏省一些农村吸收富农子弟入团，被批评为“阶级意识模糊”，“阶级立场不稳”[[70]]。“反革命”的种类也有了新的增加，历史上有一般的反共行为，和旧社会联系较多的人员，如中下级国民党军政人员、保甲长等，也被划入“历史反革命”之列。

此外，在知识份子人群中又划分了新的类别：1953 年后，在文教系统开始流行一种新的政治分类法，即“人民”与“国民”的区别。人民者，历史清白者；国民者，与旧社会联系密切，历史及社会关系复杂人群也[[71]]。

但是由於这种区分过于模糊，没能体现“阶级分析”的观点，不久就被弃置不用，而将知识份子总体归入“旧知识份子”的范畴，所谓“旧知识份子”具体指，1949 年前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大专学校培养出的知识份子，他们被整体视为“不纯”阶层，其主要依据是，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并曾为旧社会服务。在这群人中，“历史不清份子”和“不纯份子”占有相当的比例。

“历史不清份子”和“不纯份子”都是 50 年代初出现的指涉特定人群的概念，“历史不清份子”一般指“历史复杂”，参加过反动组织、或曾在旧政权重要机构服务，有一般的“反动”行为，或有“反动”嫌疑但查无明显证据者，例如：原国民党军公教系统人员，反革命份子的家属（称为“反属”），被镇压、被管制份子的家属等等。在阶级斗争激化时期，这个人群被视为是“反动阶级的社会基础”。所谓“不纯份子”是一个动态概念，随不同的历史时期而不断扩大，在 50 年代有相对的稳定性，所指多为和旧社会有较多联系的人员，即在“革命群众”和“敌人”之间比较靠近右边者，例如：原国民党一般党员，三青团员，旧军队士兵（统指为“兵痞”），资本家，有海外关系者或仍与海外有联系者，1949 年后去过港、澳又返回的人，散布“反动言论”的城市底层人民，例如沈阳市南市区三轮车夫胡某期盼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他说“来个痛快，换换空气也不错，再不然老百姓实在没活路了！”他被定性为“讲反动话的三轮车夫”[[72]] ，（因三轮车夫在 1949 前和三教九流熟识，故也“不纯”）。

在 50 年代社会改造的洪流中，1949 年前的市场就业方式已彻底改变，党政机关，重要的文教单位，大型国有企业都建立了严格的人事审查制度，在历次运动中受冲击被处分的那些和旧社会有较多联系的人员根本无法进入，“历史不清份子”“不纯份子”只能集中在社会的一些底层行业或以出卖劳动力为主的行业谋生，这些行业计有：

城市图书出租行业：1955 年国务院通令整顿 1949 年前出版的文字书籍，有关部门对天津从事个体图书出租的从业人员开展了调查，天津市共有 740 个图书出租户，其中出租小人书的 674 户，出租文字书的 66 户，后者拥有的旧书共 5 万 3 千册，而需清理淘汰的书籍共 4 万册。天津市该行业的“不纯”份子共 171 人，占该行业人数总数的 24%。1955年，沈阳市从业人员共有 551 户，其中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占从业人口的 24%[[73]]。

城市人力板车运输、骡马运输行业：1954 年，南京市搬运公司共有 4000 多工人，其中 4%为前国民党官兵，包括少校、连长、工兵[[74]]。

城市建筑行业：据不完全统计，1953 年广州市建筑工程系统 700 多干部中，有反动会道门份子 40 人，国民党员 81 人，三青团员 23 人。武汉市建筑工程局 980 个干部中，有四百多人有政治历史问题。湖南省建筑系统共有干部 1300 余人，但“阶级异己份子”占全部干部总数的 33%。郑州市 4300 建筑工人中，有一千多人有政治历史问题[[75]]。

城市废品收购行业、誊印社、和城市私人补习学校行业：这三个行业也相对集中了较多的“不纯份子”，50 年代中期后，国家实现了教育资源的全部国有化管理，私人补习学校全部取消，部分人员转入小学担任教师或勤杂人员，或转往城市中的煤炭店（煤球厂）砸煤基、送煤球。

由于政治分层决定了一个人及其家庭在社会上的政治地位，有“历史问题”的人都对“阶级敌人”的标签避之不及，在这些人群中，有一部分人极力想改换自身的政治面貌。1953 年为迎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各地开始选民登记工作，成都市的一些“敌对阶级”份子“千方百计想争夺选举权”：他们中的一些“大地主”，凡是直接或间接地与党在历史上发生过统战关系的，便以此一律自封为“开明人士”；中小地主则称自己为“小土地出租者”；曾任“伪县长”的“地主份子”周仲青“竟无耻地伪造列宁的话说‘县长是其他职业者’”，向政府要求选举权利；而当过“伪省田粮处处长”的地主胡连，竟说自己“当官也是劳动”，硬要选民证[[76]]。

为了贯彻落实“阶级路线”，“纯化”社会环境，执政者在 50 年代中期将几个大城市的“不纯份子”迁往西北等边远地区。1952 年，一些华东地区的“不纯份子”被迁往新疆。当年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共有 1161 名学员被调往新疆，其中一百四十多人为严重“不纯份子”，这批人在一年后仍未予以安置，主要原因是新疆各机关不愿接收。因为这批人中 90%以上为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其中 12 人曾分别担任过国民党政府内政部次长、国防部最高委员会参事、上海财政局副局长；有 9 人是省参议员和国民党集团军党部书记等；还有 37 人是荐任科长[[77]]。1955 年 10 月，北京市将“不纯份子”628 户，共 2 696 人迁往宁夏自治区各县。在这批人中，真正的“阶级敌人”只有 15 人，其余是“说书的”；“打花鼓的”；“旧职员”；“伪官吏及家属”；“钱庄老板”；“袁世凯的六姨太及孙辈”等[[78]]。

新政权在初建时期，高度重视对“旧知识份子” 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在开展了一系列针对知识份子的政治运动的同时，各地还创造出一

些专门针对知识份子和资本家的改造形式和新词汇，“思想剥皮”就是 1955 年内蒙创造的经验，即对知识份子和资本家的阶级背景和现实表现进行更深入的调查，“对重点人逐个全面分析，具体对待”[[79]]。1955年，对上海资方人员 335 人调查的结果是：“不纯”份子占百分之八十[[80]]。1954 年之前，上海城市基层组织居民委员会主任一职许多是由资本家的家属担任，但在这之后，已基本由工人家属担任。在这一时期，对于 1949 年后在校的大学生的态度总的来说是较为宽和的，认为他们虽然多为非无产阶级出身，但接受的是新社会的教育，历史经历清楚，经过长期的思想改造还是有可能转变世界观的。但是这并不能保证在执行“阶级路线”时各地不会出现极端化的情况。如四川大学团委组织了对“反动”、“落后”学生的孤立打击行动，从 1951 年 3 月“镇反运动”开始，被“孤立”的学生达 418 人，占全校学生总数的 14%以上。这些人大都曾参加过反动党团，社会关系和个人历史复杂。“孤立”的方法有：不让他们与其他同学接近，经常组织开他们的斗争会[[81]]。

对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分层，在 50 年代中期就己获得明显的效应，社会上普遍对资本家知识份子和“不纯份子”产生了警觉意识和否定性评价。资本家普遍认为自己是即将被消灭的阶级，言行格外小心。哈尔滨市某区在 1955 年 4 月连续发生私营企业工人“打资本家”的事情[[82]]。上海私营企业工人在公私合营前 “经常殴打资本家”。对资本家的称谓也改成了“臭资本家”。在新环境下，上海一些资本家为了表现自己的“政治觉悟”，甚至提出“应该肃反再肃反，搞第二次反动党团登记”[[83]]。

在“越左越革命”的氛围下，部分地区将工厂的技术人员视为“废物利用”，技术人员大多战战兢兢，生怕发生技术事故，因为一出事故，将被翻出过去的历史，被怀疑为进行“破坏”。许多技术人员自喻为“废品”，甚至不敢与其他知识份子来往，怕被说成是“反革命集团[[84]]”。有些单位甚至不让技术人员单独外出工作，“总派党团员同他们一起去”[[85]]。高级知识份子在政治上则普遍受到怀疑，山西省有些干部甚至列了一个简单公式：“高级知识份子等于地主、资产阶级和顽伪人员”[[86]]。

相比于城市，农村中的“左”的情绪更加严重，1953 年后，农村中小教师，尤其是小学教师，普遍得不到尊重，运动一来就成为批判斗争的对象。“一般干部都认为知识份子是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出身，历史复杂，不可信任”[[87]]。一些县区经常随意开中小学教师的斗争会，江苏省溧水县文教科长甚至随意下令将被斗争的教师“用镣铐起来”[[88]]。江苏省许多县“宁左勿右”，给中小学教师“排队”后发现有问题者高达教师总数的 40%—60%，远远超过中央规定的 5%的比例。个别人甚至认为一个人“只要识了字就坏了”[[89]]。江苏省赣榆县个别干部甚至斥骂：“小学教师，他们是什么东西！”江苏省邳县有二百多小学教师没有选举权。江苏省六合县一区委书记甚至不准小学教师进区政府大门。该省“有些地方谈到知识份子，先问成份，如是地主富农成份，等于罪加一等”[[90]]。

为了加速向社会主义过渡，实现“一化三改造”，执政党采取的是依靠工人阶级强化阶级斗争的方针，然而，这并不表明城市中的工人一概

都被视为是党的依靠对象，对工人也得进行“阶级分析”，换言之，作为个体的工人并不就是“工人阶级”，在工人中也需落实“阶级路线”。

50 年代初中期，开展了对全国职工状况调查，各级党组织对所属企业的工人的历史状况进行了普遍的“清理”以“摸清”工人的政治历史情况，具体办法是：1、让工人填写登记表；2、由单位党委与工人住地派出所配合，将派出所掌握的资料添入登记表；3、由单位进行进一步审查[[91]]，北京石景山钢铁厂 1952-1953 年新招工人 4857 人，有政治历史问题或成份复杂者 582 人[[92]]，据全国总工会 1953 年对上海私营工厂工人状况的调查，“过高的生活水平已使一些工人腐化起来。大隆机器厂工人不愿听共产主义的道理；大沪制铁厂百分之五十的工人嫖赌”，“有不少工人还讨了小老婆”，“有些厂的工人还和资本家结成‘统一战线’，欺骗政府”[[93]]。萍乡煤矿 1 万职工中有 1 200 人被认为“不纯”，其中工人有 903 人[[94]]；1955 年初，鞍山钢铁公司有 5 万职工，其中“不纯”份子有 5000人，占职工总数的 10%[[95]]。

“排队摸底”不仅限于调查工人中的“不纯份子”，它也也括对工人的思想状态进行分类排队，即区分出工人中的先进层，中间层和落后层。一般而言，“先进工人”多指老工人，对老工人也要根据他的阶级意识与现实表现来判断他是否“先进”。萍乡煤矿工人解放后娶的老婆，成份不好者达到 10%以上，这样的老工人一般就被认为是“落后”工人[[96]]。如果老工人注意奖金、工资一类，则会被认为是 “经济主义思想严重”，“思想觉悟不高”，也不会被划入“先进”工人行列[[97]]。“落后工人”则指青年工人，所谓“落后”是指青年工人受到“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怕苦怕累追求享受）的影响。1954 年，无锡市庆丰纱厂团员女青年毛某某执意要和资本家结婚，团组织加以劝阻，毛某某却说：“大家都不和资本家结婚，资本家怎么讨到老婆呢？”她被认为是“追求享乐”，“政治觉悟很低”[[98]]。对於工人中的政治历史和思想背景的差异，党的领导层十分了解，邓小平在 1957年的整风报告中说，占 65%的新工人中，农民、学生、城市贫民出身占一半以上，还有 3%新工人是地、富、资产阶级伪军警和游民份子，他提出，这些人的剥削阶级意识和坏习气尚未得到应有的改造[[99]]。

政治分层造成一种新的身份制度，它与经济收入之间并不一定存在着必然的连带关系。1953 年，城市中的资本家旧知识份子的中上层已被普遍视为是“不纯”份子，但他们的经济状况仍是比较优越的。但城市中的下层，“不纯”份子，如原国民党低级军政人员和中小学教师中的“不纯”份子，他们的经济状况则相对较差。青海省有些小学教师工资低于工友[[100]]。江苏省扬州中学老师的平均月工资是 30 元，江苏省阜宁县将 1949 年前毕业的小学老师一律降薪至 80%。有的人一个月只有几元工资。在徐州、盐城工作的一些原籍南方的教师，因工资低缺少路费，几年不能回家，以至於有人要求转业到政府机关食堂当炊事员[[101]]。

有关资料显示，50 年代中期，全国范围内的失业现象仍然存在，据调查，至 1955 年3 月底为止，北京市有 15 万青年没有职业[[102]]。上海市失业登记人员达 304977 人，其中“不纯”份子占很大比重[[103]]。广州市失业人数较少，仅为 4 万多[[104]]。其中一些为“不纯”份子。在集中“不纯份子”较多的行业中，除建筑部门的技术或重体力

工种外，一般从业人员的收入都较低。毛泽东用区别对待的方式，分化敌对阶级和“不纯”份子，用金钱来剥夺城市资本家和知识份子的政治地位，但对底层“不纯份子”则辅之以经济收入的限制。

正因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1955 年又搞出大批反革命，加之 1956 年“三大改造”取得胜利，毛泽东的信心大大增强，1955 年中共八大宣布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同年对知识份子的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其中重要一环是出身非无产阶级家庭的高级知识份子也可以入党。此举具有重大意义，由此，将具有命定论色彩的“阶级出身论”打开了一个缺口。1955 年 12 月，清华大学刘仙洲教授入党，为建国后著名高级知识份子入党第一人。而在这之前，党组织的大门对高级知识份子基本是关闭的。据统计，自 1949—1955 年，南京市九所高校，没有吸取一位教授入党[[105]]。陕西省八所高校共 308 名教授、副教授中，也没有发展一名党员[[106]]，云南大学的情况也是如此[[107]]。刘仙洲的入党在知识份子中带来很大的影响，因为现在转变阶级出身已有可能。刘仙洲入党后，全国高级知识份子中出现了踊跃申请入党的热潮。四川西南师范学院某教授甚至写了九万字的入党申请书，详尽地交代了自己的历史和思想。

概而言之，毛泽东在领导进行深刻的社会改造过程中，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阶级出身论”的制度化，但又在具体落实中注意掌握分寸，进行适时的调整，这种有张有弛，刚中有柔的情况在 1957 年“反右运动”后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四、追求全面“纯化”的新世界（1957-1965)

1957 年夏全面展开的反右派运动使党和国家的航路向极端的方向急速转变。毛泽东以“右派向党疯狂进攻”为由，废止八大路线，将阶级斗争的烈火重新燃起，并使之越烧越旺。

反右运动的重点打击对象是民主人士和知识份子，斗争的基本策略和方法仍是延续过去的经验，这就是结合知识份子和民主人士的现实言论和历史的背景，在新的阶级斗争激化的形势下，对他们进行新一轮的左、中、右，甚至是更深入、更细密化的“中左”“中中”“中右”、“极右”的政治划分，然后依据不同情况，对其中的“右派”加以严厉的惩治。

从此，对知识份子反复无穷的搞“排队”，已成为组织人事、政治保卫、意识形态部门的基本工作。例如广东省在 1957 年 2 月已对民主人士中作过一轮审查，到了 7 月又对该省民主人士和知识份子再次作出排队，其结论是：

在 245 名民主人士中，左派 69 人（28．2%）、中左 24 人（9．8%）、中中 79 人（32.3%）、中右 33 人（13．4%）、右派 40 人（16．3%）；

在 83 名工商界人中，左派 31 人（37． 3%）、中左 8 人（9．6%）、中中 22 人（26．6%）、中右 10 人（12%）、右派 12 人（14．5%）；

在 934 名大专院校讲师以上人士中，左派 156 人（16．6%）、中左 133 人(14．2%）、中中 477 人（51．1%）、中右 124（13.3%）、右派 45（4．8%）；此项还另有大学生右派53 人，职工右派 6 人

在 153 名文艺界人士中，左派 44 人（28．8%）、中左 28 人（18．3%）、中中 43 人（28．1%）、中右 30 人（19．6%）、右派 8 人（5．2%）；

在 81 名科学界人士中，左派 20 人（24．7%）、中左 19 人（23．5%）、中中 23 人（28．4%）、中右 14 人（17．3%）、右派 5 人(6．2%）。

在 58 名新闻界人士中，左派 9 人,（15.5%)，中左 9 人，（15.5%)，中中 19 人（32.8%)，中右 9 人（15.5%)，右派 12 人（20.7%)[[108]] 。

在全国被打成“右派”的数十万人群中，有一部分是工农出身的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这反映“阶级出身论”在反右运动后已有新的发展，这就是，仅仅血统纯正或革命历史经历雄厚，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对革命者的新的更高的要求，“成份好”还必须和思想正确相结合，在两者之间，前者是必要条件，而思想纯正则是充分条件，因为更多的事实证明，在判定“右派”时，家庭出身和历史背景仍起到重要的作用，许多“家庭出身不好”，历史经历复杂，或有“海外关系”，在历次审干运动中都受到怀疑而查无实据者，虽然本人在运动中没有任何“鸣放”言论，也被一劳永逸打成“永不翻身”的“右派”，例如原甘肃省干部石天爱，在运动中没有一句不当言论，就因为她是军阀、汉奸石友三的女儿，就被扣上“右派”的帽子，被遣送到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改农场劳教，类似石天爱的情况在当时是十分普遍的现象[[109]]。

反右运动使毛泽东更加意识到“保持社会生活高度紧张”的必要性，在 1958 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号召全党进一步提高政治警惕性，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他指出：

我们必须进行认真的研究和分析，为什么在 13 个省和自治区的党组织中会出现右派份子。这对全党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信号。“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还应该认真关注这样一个事实，最近已经查明在中小学教师中大约 15 万人有右倾情绪和观点。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为什么会让那些不值得信任的人来教育我们的青年？……最重要的是，要查明和揭露右倾情绪，对这些情绪进行无情的批判，向人民表明它们的危害性和危险性，在与右派份子斗争中提高人民的警惕性，我们不应该忽视在与右倾情绪斗争中出现的停顿，应该保持社会生活的高度紧张，这是查明可能生长在我们大地上的毒草的可靠保证[[110]]。

体现毛泽东意志的反右运动极大地加强了知识份子对毛和国家权威的体认，毛趁热打铁，1958 年又用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的方式推动大跃进，“阶级出身论”借助大跃进运动向社会各个角落渗透，以阶级出身为基准的政治分层实现了全面的制度化。

大跃进运动期间，北京对公安工作发出新的指示，要求把全国“每一个角落都打扫一下”[[111]]，其具体方法就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一步展开内部肃反和社会镇反运动[[112]]。根据中央的指示，江苏省委在党政机关内部就开展第二批审干工作作出部署。南京市玄武区对全区工业、手工业、财贸、文教、卫生、公安、中小学教员 3124 人进行了审查，经初审发现有 33．2%的人需要进一步弄清问题。为此玄武区委在 1958 年 2 月成立了新的审干办公室，各系统成立了审干小组[[113]]。

3 月 13 日，玄武区又成立审干委员会和肃反领导小组，由区委副书记兼任主任和组长。

1956-1957 年，全国已经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工厂进行了三次肃反运动，大跃进运动展开后，江苏省又在全省公私合营工矿企业、手工业合作社等其他基层单位共 141 万人口中进行第四次肃反。“这一次肃反任务比第一、二、三批的总和要大一倍以上”，任务非常繁重。但是，经过批判“肃反只能慢慢搞”的右倾保守思想，“促进了肃反运动的大跃进”。在这次肃反期间，全省共收到检举材料 40 余万件，对地富反坏份子普遍地开展了一次审查评议工作。1958 年 3 月，江苏省在镇江、常州召开了各地市县的肃反现场会议[[114]]。6 月下旬南京大学进行“肃反补课”。在大跃进的形势下，第四次肃反进展尤其顺利，江苏全省“搜出各种反动证件三万一千余件”给一些“翘尾巴”的地富反坏份子重新戴上帽子。在强大的国家威权的震慑下，全省有 2500O 名“反、坏份子”投案自首，或补充交代了问题。到了 1958 年 11 月，又在大跃进新建、扩建单位共 77 万人中继续开展肃反运动，直到1959 年第三季度才结束。经过这次肃反运动，实现了“三见底”：“反革命组织见底，外来人口、长期外出回归人员政治情况见底，现行破坏事故见底”[[115]]。

大跃进期间，公安部门作为国家权力重要组成部分，其地位和权威都得到明显的加强，1959 年，为了加强对城市基层的进一步领导，南京市各公安派出所的党支部与街道支部合并为街道党委，多数党委书记由原派出所长担任，街道党委作为城市基层党委的机关实现了“公安化”，派出所和街道党委的一体化运作，是地方政治体制的重大改变，使得国家控制力已全面渗入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1958 年在全国知识界和民主党派人士中还普遍展开了“交心”运动。江苏省及南京市各民主党派成员两千多人，分别于 3 月 9 日和 4 月 1 日先后两次举行了社会主义大跃进誓师大会，表示坚决接受党的领导，加速组织和个人的改造[[116]]。3 月 25 日，南京大学的民主党派、无党派教师以及南京林学院全体教师联合举行改造促进大会，他们抬着“大红心”的标志上街游行[[117]]，4 月 4 日，南京市各高校师生与科研机关的民主人士共三千余人，高举“把心交给党”、“把知识交给人民”的旗帜在南京举行大游行，之后，又举行了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4 月 21 日，南京市工商界三千多人召开大会，宣布“立即开展向党交心运动”，民建中央主席黄炎培亲临会场予以鼓励[[118]]。4 月 22 日，南京市工商界和民主党派提出向党“交心”要“快、透、深、真”的口号，表示要把“接受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三心二意，跃进到一心一意”。江苏省宗教界人士也开展了 “交心”运动，天王教界通过“自选”、“自圣”主教，“使全省天主教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119]]。在“交心”运动中，全省 11 个城市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人士 4106 人，共交心 47 万条。据当时的记载称，这次交心“大量暴露了他扪长期隐瞒的腐朽思想和反动行为”[[120]]。对于工商界和民主人士的“交心”，组织上规定的原则是“自梳自理求医会诊”。先让他们对照要求、自我批判，然后引导他们恳请党员和领导对他们的“坏思想”有针对性地进行批评，并鼓励他们打破庸俗的情面观，“比先进，比干劲”互相展开批评和思想斗争，以使“交心”落在实处，防止“交心”走过场。

由于有强大的国家力量作后盾，尽管大跃进造成空前的经济危机，但国家权力不仅没有受到削弱，反而利用大跃进得到扩张。在城市，党的领导进一步被强化，文教更加政治化，寺观教堂数量减少，私人出租房屋已被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户口制已经全面巩固，公安治保系统警惕地注视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四类份子（地、富、反、坏）定期向派出所汇报改造情况已成为一项被固定下来的制度。

如果说全民炼钢体现的国家权力主要表现为以国家为后盾，动员人民追逐某种空想乌托邦的计划，那么国家法权机关的大跃进则直接强化了国家权力，大跃进期间公安部门与其他部门一样，也展开了大跃进运动。公安部门除了修建小高炉，搞“土法炼钢”和为群众做好事以外，更搞实实在在的强化管理和肃反。1958 年 1 月，国务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明确规定由公安部门主管全国公民的户区登记工作。此条例的正式颁布，标志着建国后的户口管理制度正式完成。江苏省各级公安部门将加强户口管理列为大跃进的重要内容，迅速在全省范围内重新检查，审核住户户口，使全省居民的个个皆有户可查。公安部门还强化了和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农林基层单位的治安保卫系统的联系，基本达到了“无一死角”。

即便不在政治运动的高潮阶段，调查“社情”始终是公安部门的一项经常性的日常工作，在 1958 年铺天盖地的大跃进运动刚过去不久，1959 年，北京市东城区又从 69 个图书出租商中查出历史反革命、逃亡地主、一贯道坛主、军统特务、右派份子等共 37 人，占被查总人数的 53%。而南京市对夫子庙 18 个图书出租商的政治调查显示：过去是妓女的为 1 人，是妓院老板的为 2 人，是烟毒贩子的为 1 人，是旧军官的为 1 人，是流氓的为 1人，是旧职员的为 3 人，是家庭妇女的为 4 人，是小商业主的为 5 人。另据河北省唐山市调查，该市市区 26 个图书出租商的政治情况为：地主、富农、小资本家共 8 人，日伪特务、国民党军官、伪宪兵流氓共 11 人，两者合计占被调查总人数的 73%[[121]]。

1959 年庐山会议后，阶级斗争进入到党内，革命专政的对象随之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从过去单纯打击“旧社会基础”，演变到同时打击革命阵营中的“坏人”，在 “反右倾运动”中，各地都处理了一大批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抱怀疑、抵触的干部，其中，凡出身不好者，蒙受的打击更重。1959 年庐山会议后，山东省委“揭发出”一个以泰安县委书记、县长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其成员人部分为“阶级异己分子”，其罪名为“破坏公社”“恢复单干”[[122]]。凡此种种，都大大加深了干部和普通群众对出身问题的重视与敏感，特别严重的是，这种极左的出身歧视倾向已向中小学学生身上漫延。

在大跃进和“反右倾运动”期间，一些地区的教育部门别出心裁，在出身问题上自定“土政策”，公开在中小学中鼓动歧视、打击地富家庭出身的青少年，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届成立 10 年，在中小学就学的地富子女多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已不同于建国初期就读的大学生的历史背景，但是一些教育部门为了显示“宁左勿右”，就是有意为之。1958-1959 年，重庆市第一中学一个班主任提出：“依靠工农子弟，团结改造非工农子弟”。云南省有的学校提出：“依靠贫雇子弟，孤

立打击地富子弟”的口号。云南省盐兴中学把一个班上的工农学生和地富学生分成两个班上课，教师给地富子弟班上课讲得很简单，而给工农子弟班上课就讲得很详细。浙江省有的学校规定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包括党员）不允许领奖学金。上海、昆明、合肥等地有些学校把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共青团、少先队干部一律撤换[[123]]。上述现象以后受到了上级部门的批评。

1958 年后，在全民范围内，重视“阶级出身”的意识已完全扎根，它体现在城市和农村的一切领域，刺激各地创造出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经验。例如 1959 年陕西省乾县创造出一种对基层干部的审查办法，即审查对象为生产大队干部和生产小队正、副队长，采取“普遍摸底排队，逐个过滤，重点审查”的办法：“即不公开，不做动员报告，也不找干部谈话”，“背靠背”地审查干部的政治面目，最后建全起生产大队干部的档案[[124]]。

从 1959 年到 1961 年，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国出现了连续三年的大饥荒，导致农村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毛泽东在部署“救灾救荒”的同时，认定造成大灾荒的主要原因是阶级敌人破坏和“民主革命不彻底”在 1961 年初召开的党的六届九中全会上，毛指出：全国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中，出乱子的原因在于：民主革命不彻底，地富复辟，勾结坏干部，实行和平演变。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用扎根串联的办法，组织阶级队伍（贫协），开展对敌斗争[[125]]。阶级斗争的对象有两类：钻进党内的“阶级异已份子”和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五类份子。

八届九中全会后，各地开始贯彻毛泽东有关反击资本主义复辟，在农村整风整社整党的社教的指示。1961 年 1 月，保定市委书记下乡，搞扎根串联，组织贫下中农协会，调查的结果是，基层政权全为坏人当权，贫雇农出身的干部全被地富收买，其根本原因在于土改不彻底。天津的经验是：应对犯错误的干部进行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河北省的经验则认为，出现特大困难的原因之一乃是过去对地富反坏“摘帽”多了[[126]]。问题在于，即使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了“民主革命补课”，也无法遏止入量农民“非正常死亡”的现象，残酷的现实是：贫下中农和地富一起因绝粮而死，在这段非常时期里，由于特大饥荒，各地领导都忙于救灾，农村对地富的批斗基本停顿了下来。

1962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又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年初，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对前三年经济建设中的盲动倾向提出了批评，会后又接着对农业，工业交通，科技，文教，以及知识份子和统战等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在中央新政策的推动下，国民经济状况开始好转，国内紧张的阶级斗争的气氛也得到缓和。然而刘少奇的新方针并没有得到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的支持，反而被毛认为是企图“复辟资本主义”，在这年的 8-9 月，随著经济形势趋于好转，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和党出八届十中全会上，再次强调以阶级斗争治国。由此，执行半年多的宽松政策正式宣告结束。国家政治大气候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和生存状态，特别是对于那些被视为是 “阶级敌人”“五类份子”及其家属子女。被打成“右派”的文史学家何满子 1961 主从宁夏劳改地请假回上海治病，而到八届十中全会召开，何满子的感觉

是“一切都完了”。他甚至想过“逃出国境到国外”，但最后考虑到家小，才打消了这个念头[[127]]。

由于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阶级出身论”，在不断升温的阶级斗争火炉的烘烤下，被全面激活，从 1962 年下半年始，执政党原先在阶级出身问题上的正式表述：“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在实践中已完全倒向“唯成份论”。在所有涉及人和人群的领域，从事一切工作的前提，即是区分谁是自己人，谁是敌人，从而把社会人群正式分为“成份好”与“成份坏”的两大类别。

所谓“成份好”者，即革命血统纯正之谓也，1962 年后，国家政治形势虽然变化极大，“自己人”和“敌人”经常变换位置，但大体上还维持着建国之初所形成的政治分层的类别。所谓“成份坏”者，反动阶级、反动势力之代表也。1957 年后，在原有的反动势力四大部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之外，又加上了一个新部类：右派份子，通称“五类份子”。在所谓“右派份子””中，不乏出身工农阶级者，但依“阶级出身论”的新发展——思想不纯正，即等同于血统不纯正，所以工农出身的右派份子也一并被列入“阶级敌人”的序列。

在 60 年代前期复杂的政治环境下，由于阶级斗争的范围大大扩展，从中央到地方、军队，都“揭露”出一批“反党集团”，而依新形势下的政治标准：血统纯正还必须与思想纯正相匹配，这就带来了一个新问题：即如何对待 50 年代后期以来，各级党政机关清理出的“反党集团”成员？在当时省一级的 “反党集团”就有 13 个，此较著名的有：浙江的“沙文汉、陈修良反党集团”；河南的“潘复生反党集团”；安徽的“张凯帆反党集团”；山东的“赵健民反党集团”；辽宁的“杜省衡反党集团”；广东的“古大存、冯白驹”反党集团；新疆的“伊敏诺夫反党集团”等；在中央级则有“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谭政反党集团”等，对这些革命资历雄厚，但思想不纯正的干部及其家属子女，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时期，对这类人群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对那些被开除党籍或投入监狱的人，明确将其定性为“阶级敌人”，对其家属子女虽不搞株连，但不予重用，例如高岗之子高毅在 1939年就被送往苏联学习，当时年仅 9 岁，可谓“根正苗红”，1952 年高毅返国，后因受其父牵连，高毅“一生郁郁不得志”[[128]]，而对那些保留党籍的人，则暂时模糊他们的政治类别（其中潘复生等人在 1962 年上半年得到平反，1965 年秋，彭德怀、黄克诚等也被降级，暂时重新分配工作），若阶级斗争形势紧张，则将他们迅速划入“异己份子”、“阶级敌人”的行列。

依据 60 年代后对干部“纯化”的新的更高的要求，即使对于高级干部也要进行思想排队，对此当时就有高级干部公开表示了不满。1960 年夏，江苏省委常务书记刘顺元在北戴河会议小组会上发言，针对“有人在省委书记里排队，要把一些省委书记划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的事”提出了批评，他问道：“为什么在出生入死的战争年代，不排我们的队，现在胜利了，就要排队整我们了？”[[129]]然而，随看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和中苏论战的爆发，这种质疑的声音迅速消失，其代表人物很快受到党内批评或处理。

1963 年后，中苏两党关系日益紧张，中共开始全面掀起“反赫鲁晓

夫现代修正主义” 的斗争，在当时的语境下，“修正主义”的内涵是：同情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主张或支持“三自一包”和“三和一少”，反对阶级斗争，“鼓吹战争恐怖”，散播“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等。1962 年夏之后，继中央解除或调离了部分被指责犯有“右倾”、“修正主义”错误的领导干部的职务（邓子恢因主张‘三自一包”被免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职务，调任名誉性的全国政协副主席；王稼祥被指责鼓吹“三和一少”，被停止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一职；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也因在“对资产阶级态度上的右倾”被停止职务。地方各级党委也相应在所辖范围内将某些被怀疑思想不纯正的干部调离原工作岗位，刘顺元审时度势，主动向江苏省委提交要求退休返乡的报告，得到了批准。

1963 年，各级党政机关又进行了新一轮的清洗，清洗对象为两类人，“家庭出身不好”的一般工作人员和党员干部。这两类似都被陆续调出上级领导机关。1963 年下半年后，全国党政机构中的“肃反小组”改名为“五人领导小组”，性质和工作任务不变。而在这之前，在某些地区的领导机关内，甚至成立了“贯彻阶级路线办公室”[[130]]。1965 年，又在全国党政机关开展“机关革命化运动”，以精简为名，又清洗了一批成份欠佳的干部。在此前后，各级党政机关、厂矿企业、文教机构普遍成立了政治部。在基层，则创立“政治指导员制度”，又清理了一批“阶级异已份子”（“出身不好”的干部）和“蜕化变质份子”（工农出身的干部和党员），使纯化的空气更加炽烈。

以阶级斗争为纲，给 60 年代前期的社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过去在“成份好”与“成份坏”的两大政治分层外，还存在一个较荐宽阔的灰色地带，这些人群包括：旧知识份子、原工商业者、资方代理人、高级职员，一般海外关系者、旧艺人班主、原国民党起义人员、以及作为统战对象的民主人士等。他们一般被认为“成份不好”或“不纯”，对他们疏远、排斥有之，但在阶级斗争相对和缓时，尚未把这些人群明确视为“阶级敌人”。对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学生，至少在理论上还主张对他们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然而，一旦阶级斗争激化，他们马上被推向右边，1962 年后，灰色地带逐渐消失，不久就被完全溶进黑色地带。

从 1963 年开始“阶级出身论”已表现在对敌对阶级子女的各种歧视性的安排方面。黑色部类的子女在就业、升学、婚姻等方面处于严重不平等的地位，除个别情况外，入团已不可能。黑色部类子女在 1962 年尚有可能考入农林、地质、师范类大专院校，但在 1963年后，大学已基本停止招收黑色部类子女入学。这方面的歧视实际已发展到中小学，大城市的重点名牌中学，也开始拒收黑色部类子女入学。部分农村地区甚至规定，小学生升入中学的条件是：“出身占六十分，表现占二十分，学习成绩占五分，具它占十五分”[[131]]。

面对 1962 年后被主观虚幻的阶级斗争激化的新形势，领导层和各级政府忙于制定各项政策，将很大的精力投放在“组织阶级队伍”，重新“划分敌我”的极为复杂的社会分层工程。

1962 年后，在知识份子政治类别问题上曾经出现的缺口，即知识份子通过入党就转变为无产阶级，又被翻转过来，换言之，无论是否党

员，知识份子都被认为是属于资产阶级。这里原先有几个界限：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老知识份子，一入党就转变成了无产阶级；1949年后培养的工农出身出知识份子，一入党更是无产阶级。但是在 1962 年后，他们都被整体划入资产阶级，其理由是：1、旧知识份子即使入了党，也是不可能真正转变的，他们中的某些人，实际上是“老反共份子”（毛泽东对吴晗、翦伯赞等的看法，刘仙洲、梁思成皆属此类）。在这之后，清除或劝退了某些老艺术家出党，如在 1964 年开除了著名艺人小白玉霜的党籍。2、工农出身的知识份子党员，只要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就一定会受到资产阶级和苏联修正主义思想的影响而产生蜕变。

这种认识最早在 1957 年反右运动后出现，自那时起，社会上就弥漫一种鄙视、蔑视知识份子的浓厚的空气。湖南常宁的农民甚至称知识份子为“鸡屎份子”[[132]]。1958 年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是剥削阶级”的论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世界观上都属于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就是剥削阶级），首次把毛泽东对知识份子的更为苛刻的新观点以党的理论新概念的形式公之于众，在当时就受到某些知识份子的质疑。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朱东润说，高级知识份子普遍对刘少奇的论断“感到触目惊心”[[133]]，浙江省民盟有些人更是直接提出，“从意识上确定剥削阶级是不妥当的”[[134]]。即使在工人阶级中，也有人不赞成刘少奇的这个新论述，1958 年天津市部分职工就“对把知识份子划成剥削阶级感到接受不了”[[135]]。然而这些看法根本未被考虑，相反，对知识份子的整体性的否定评价已从过去的半公开，迅速演变为社会的公开的主导性意识。虽然在 1962 年初，因严重经济困难，刘少奇和中共中央一度调整了对知识份子和原工商业人士的政策，但在毛泽东的压力下，1962 年下半年后各项政策又全面转向“以阶级斗争为纲”，对知识份子的否定更上升一级，进而深入到对党员知识份子的否定。只是在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 1962-1965 年，各级党组织对已入党的知识份子的态度仍相对和缓，具体政策由党委在内部掌握。

在这一阶段，政治分层进一步深入到革命队伍内部。对原有的几个革命阶层：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也进行复杂的分层。与 60 年代初林彪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影响急速增长相适应，军人的政治地位直线上升，在四个革命阶级中，最高阶层为革命军人。在革命军人中，工农出身的军人、军中政工干部的地位又高于知识份子出身的干部和军中技术干部。产生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在于毛泽东在这个阶段对军队、对军中政治工作的极端重视以及对主持军队工作的林彪的信任。毛相信军队干部受到刘少奇的影响较小，工农出身的军队干部在抵拒国际共运修正主义思潮的态度上也更为坚决。1959 年后，江苏省委常务书记刘顺元因对大跃进态度消极，多次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军人出身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对其部下说，刘顺元“是党内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毛主席是相信我们军队干部的”[[136]]。

随看毛泽东对刘少奇和党机关不满的加剧，革命干部在原有的政治排行榜的地位已让位于革命军人，而处于第二层次。在革命干部中也划分出不同的梯级：军队出身转业到地方的干部，在政治地位上高于知识份子出身的干部，军人出身的干部一般都被安置在首脑机关和公安政法

等要害部门。去过解放区的知识份子干部又高于原地下党干部，这又反映了革命政权的性质与特色，即新政权的基础来源于军队与农村。在革命干部的最底层，是40 年代后期地下党出身的知识份子干部。因为 30 年代的白区干部许多人以后进入根据地工作，被认为经受过战争的考验和锻炼。40 年代后期已是革命胜利的前夜，在这个时期参加中共的知识份子干部既未经过延安整风审干运动，又未受过残酷的战争考验，因而无法与前几类干部并列。在单位类别上，党委系统、公安政法部门的干部蒙受党的信任度较高，政府、经济建设部门的干部次之，文教单位的干部蒙受的信任度最低。

在 60 年代特定的时代氛围下，伴随着“备战”的升温和“大三线”的建设，在产业工人中，军工企业的工人，无论在政治地位、经济收入方面，都高于一般大厂的工人。因为军工企业的职工都经过较为严格的“政审”，被认为政治上比较“可靠”，而民用大厂的职工，虽经多次清理，就是到了 60 年代前期，还是存在着“严重不纯”的现象。例如：1960 初的鞍钢无缝钢管厂，共有 2576 名职工，但“不纯份子”竟有 558 人，占到职工总数的 21 .6%强[[137]]。同样是工人，有产业工人与财贸职工的区别；有军工企业工人与一般大厂工人的区别；有国营工厂工人和集体工厂工人的区别；有地方国营工厂工人和直属中央大厂工人的区别等，在“成份好”的工人与“成份不好”的工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鸿沟。

在一些工厂，“出身不好的师傅不许带徒工，不许操作精密机床”[[138]]。党组识一般较少在集体工厂、街道工厂工人中吸收党员，概因后者多系城市贫民出身，被认为受旧社会影响较深，或社会关系复杂。即使一般工厂招工，也要找家庭成份好的[[139]]。

与城市相比，农村中的政治分层在 60 年代前期基本没有变化。位居政治身份第一层的仍是贫下中农，而军人家属、烈属，又优於一般的贫下中农。由于 60 年代初的大饥荒造成农业的巨大破坏，这几年农村工作集中于“恢复生产”，“对敌斗争”得到相对缓和，这种局面持续到 1963 年初，随着四清运动的推开，农村又被推入人为煽起的阶级斗争的狂热之中。

1963 年后，被人为激化的阶级斗争形势推动了社会整体环境的进一步“纯化”。为落实毛泽东提出的“备战”的指示，全国各厂矿企事业单位都办起武装基干民兵，选拔的标准就是“根正苗红”。这项措施再次将人群分开。同年，在城市中实施“四类份子”定期向当地派出所汇报，接受训话的制度。1964 年，各大学依据大学生的阶级出身和现实思想表现，例如：“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文艺的态度”，对肖洛霍夫的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丘赫拉依的电影《士兵之歌》的看法，在大学生中排列出 “反动学生”，由组织人事部门予以“内部控制”，情况严重者，如记有“反动日记”者，则移送公安部门。该年，全国各级党政机关又在内部对城乡人民中有台、港、海外关系者开展了一次调查活动[[140]]，使“阶级阵线”更加分明。1965 年，为了保证首都的“纯化”，还将一批成份不好的青年动员迁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四清”运动中，城市街道居委会第一次越过单位，开始经常组织对所辖范围黑色部类的群众批斗大会。

1964 年在全国范围内，特别在农村地区阶级斗争的野火已燃成一

片“燎原之势”。在刘少奇的指导下，全国 150 万干部下乡开展“四清运动”，到处寻找子虚乌有的“小台湾” （“资本主义复辟”的据点）。各中央局书记、省委第一书记、国务院部长、军队高级将领纷纷亲自“蹲点”，指导各地进行“民主革命补课”，进行所谓“第二次土改”和重新划分农村阶级成份，将一批批“隐藏的敌人”清查出来。仅以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四清的试点单位长安县为例，经过“四清运动”，共补划地富 3271 户，相当於原来的 1．2 倍，连同原地富户，共有 5992 户，占全县人口的 9．2%。运动中被重新戴上四类份子帽子的有 348 人，新查出的四类份子有 4305 人，被关、管、斗者 3275 人，被列入“反革命基础” 六种人的有 1931 人[[141]]。

在所有这类斗争中，农村中的地富及其家属子女作为一个群体，尽管早已是“死老虎”，但都被重点打击，成为引导运动开路，进行新一轮阶级斗争热身准备的牺牲品。在不断强化的对敌斗争教育的作用下，对地富及其家属子女采取了定期训话，集体罚跪，捆打等斗争三段。这种现象由来已久，自土改以后，只要阶级斗争形势尖锐，就会出现上述情况。山东省历城县部分农村地区在五十年代初就采用打骂的方法对地主进行“集训”同时规定，不准地主看戏，不准地主和群众讲话，地主在路上遇到任何人，都要低头让路，乡干部、民兵可以随时入地主家进行检查[[142]]。如果地富子女有任何细微的不顺从，都会被判定为“阶级报复”，而遭到严厉的惩罚[[143]]。为了确保在地富死亡后农村阶级斗争对象的继续存在，农村地区普遍实行起地富身份世袭制，将一大批 1949 后出生的地富子女也定性为地富份子。此种做法也是有其来源，即一些地区 50 年代土改运动后对地主全家进行管制的传统[[144]]。在铺天盖地追求“纯化”的大环境下，地富及其子女已彻底沦为新社会的贱民[[145]]，他们不仅毫无权力，甚至不能婚嫁，以致于地富女儿欲嫁单身老矿工，也被指责是“为反革命传宗接代”[[146]]。

在 60 年代前期的社会分层再确定的工程中，“阶级出身论”借助于意识形态传媒的鼓动，尤其通过“四清”运动得到不断强化，形成一种巨大的精神氛围，最终为文革期间“血统论”的大泛滥提供了充分的思想基础和传播的土壤。

从 1963 年开始，一场“阶级教育”运动在全国平地掀起，“阶级教育”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开展“三史教育”（家史、村史、厂史或厂史、社史、街道史），以激发广大干部群众对旧社会的仇恨和对新社会的热爱，此即所谓“忆苦思甜”。在“阶级教育”运动中，对“雷锋精神”提出了指导性的解释，这就是：“对待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像严冬般残酷无情。”这个概念其实产生于革命战争年代，谢觉哉在 1939 年 3 月给中央党校学员作报告时即提出，共产党员“对敌人应无情”，“对敌人饶恕即是对革命的摧残。同志间热哄哄，对敌人冷冰冰” [[147]]。为了配合“阶级教育”，从 1963 年 5 月起，全国各省、市、地、县普遍举办阶级斗争展览，烘托出资本主义复辟的恐怖气氛，其中最典型的是四川大邑县的“收租院展览”。在这些展览馆中，一般都收有地主残害农民的刑具和地富收藏的“变天账”。以后这类陈列大多改为永久性的展览馆，以提醒人们世世代代“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从 1963 至 1965 年，宣传媒介不遗余力地向社会各阶层人民密集

灌输阶级斗争的观念，不断推出一个个面目狰狞，时刻梦想复辟资本主义的“阶级敌人”形象。在林林总总的新老反革命图谱中，既有老反革命、老地主和地主婆，也有被敌人腐蚀拉拢、蜕化变质的“新生反革命份子”，更有形形色色的资本家和小业主。所有这些“敌人”都有下列的共同特点：1、时刻准备复辟资本主义，向工农革命干部进行阶级报复；2、时刻与革命力量争夺下一代。60 年代初中期推出的电影：《千万不要忘记》、《夺印》、《青年一代》、《箭杆河边》等，都具有上述类型化的特点，当时，这些电影在全国城乡被反复上映。为调动普通群众的阶级斗争意识，还兴起了“大讲革命故事、大唱革命歌曲、大演革命现代戏”的热潮，其目的都是为了教育群众“站稳阶级立场”，“提高阶级觉悟”，“激发阶级仇恨”，使得“阶级出身论”的意识几乎燃到沸点。

1964 年“四清运动”全面开展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各级党组织向包括黑色部类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宣讲了几个有关社教的中央文件（《前＋条》、《后十条》、《二十三条》），其宣讲范围甚至扩大到初中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根据阶级斗争的观念，为了体现“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的原则，对於黑色部类也划了不同的杠杠，做了详细的区分：

1、将被杀、关、管家属与一般五类份子家属区别开来，对前者实行更严厉的监督与防范。

2、将戴“帽”的敌人与不戴“帽”的嫌疑人群划分开来，对于不戴“帽”的内控对象和摘帽右派，采取相对温和的态度，使他们获得某种优越感，从而更严厉地震撼戴“帽” 份子。

3、将反革命份子与坏份子、地主与富农再区别开来，重点打击反革命份子和地主份子。

而落实这些精神的具体途径,就是通过开展“新旧社会对比”的“忆苦思甜”的运动。一年后，各省又纷纷召开 “贫下中农代表大会”，成立各级“贫下中农协会”，出席贫协会议的代表在各地进行巡回演讲，大作“忆苦思甜”的报告，以帮助人们“狠挖修正主义根子”。

在推行“阶级教育”的持久运动中，1964 年冬，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报告，布署在全国中小学开展“阶级斗争教育”，加速“培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而成为接班人的首要条件就是“成份好”、“出身好”[[148]]。《中国青年报》宣称，中小学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正在与党争夺接班人，工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子弟在学校遭受歧视[[149]]，使“阶级出身论”空气迅速弥漫於各类学校。至此在各级学校内正式又划出了两类群体：“根正苗红”的工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子弟（“自来红”），和身上烙有反动阶级烙印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弟（“自来黑”）。伴随着红色血统崇拜的不断升温，高干子弟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群体已显现于各类学校。

60 年代的“高干子弟”概念，是从 50 年代的“干部子弟”概念而来的，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了照顾在前线的军队领导同志，使之摆脱后顾之忧，专门设立了干部子弟学校。建国初，这个传统延续了下来，各地都办有不同的干部子弟学校。1956 年，有读者投书《人民日报》（未发表），批评“首长子弟学校”的特殊化问题，信中说：“这些学校和托儿所的物质生活条件，大大超过了一般人民生活条件，如原来的八一小学，学生可个个着呢服……首长子弟托儿所到了例假日，小汽车成队地

来回接送”[[150]]。干部子弟的“特殊化”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以后干部子弟学校陆续被撤消。但在某些地区，直至 60 年代初中期，一些中学仍设有“干部子第班”[[151]]。在一些大城市，某些重点中学事实上具有“干部子弟学校”的性质，例如：北京市的男四中，101 中学等，就集中了一大批中央和军队领导的子弟。50—60 年代初，“干部子弟”的分层尚未明显，革命军人、高级干部、上级干部子弟统属“干部子弟”的范畴。然而到了 1963 年后，随着对革命血统纯正性的不断强调，中央领导干部的子弟和军队领导干部的子弟迅速从一般干部子弟中脱颖而出。在这些高干子弟中，中央一级领导干部的子弟和军队领导干部子弟的地位最为显赫，因为他们父母所担任的职务足以证明他们在血统上和思想上更为纯正。这类青年一般都被视为是“革命接班人”，较早被吸收入党，在学校担任团支部书记和学生会主席等职务。

60 年代前期，不断强化的阶级斗争的攻势，是由毛泽东和刘少奇共同领导和部署的。从 1962 年下半年始，毛泽东频频发出有关加强阶级斗争的大量指示，对刘少奇等施加极大的精神影响，迫使他们接受、贯彻自己的各项指示，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等，对于毛的有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并无真正的抵触，他们唯一希望的仅是将阶级斗争的野火阻隔于党的高层领导圈之外，而不反对在党的中下层和社会上大搞阶级斗争。刘少奇等也不反对在干部人事领域突出军人，贬抑知识份子，尽管他们不是军人出身，但历史上都曾长期在根据地担负党政军领导工作，因而，“军人至上”不会对他们及其家属构成危胁。刘少奇等实际上是组织领域内 “纯化政策”的具体实施者。1964 年 9 月，经中共中央批转全国的《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即《桃园经验》），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在河北省农村“蹲点”的经验总结，该文经刘少奇多次修改，体现了刘少奇的基本思想，全篇渗透着对阶级出身问题的强调，充满浓厚的“纯化”精神。刘少奇、王光美的观点在中央领导层有广泛的代表性，负责中央宣传、教育工作的陆定一也有类似“纯化”的观点。60 年代后，农村中的地富子弟入中学已较为困难，但中央政治局侯补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却先虚构出一个地富子弟“翘尾巴”的假问题，陆指示可以用“半工半读，半农半读这个方式来改造地富子弟”，其前提是，地富子弟应在政治上表现积极，“如果他们的尾巴翘得老高，贫下中农说我就不吸收你，你要请求，我才收，那也可以”[[152]]。

当空气中已四处弥漫阶级斗争的火药味，一根火柴就可燃起冲天的烈焰，就在陆定一说出那些话后不久，“四清运动”尚未结束之际，一场更大规模的，追求“纯化”更高境界的政治运动，——以揪斗“地富反坏右”，“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国民党残渣余孽”为先导的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到来，刘少奇，陆定一等未曾想到，自发很快也成为“阶级敌人”，甚至是千夫所指的全国最大的“阶级敌人”，其家属子女也遭到株连和残酷的迫害。

结论：

“阶级出身论”在新中国的兴起与发展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的，它的思想背景是马列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但是“阶级出身论”并不是一套完整系统的理论，甚至不符合原典马

克思主义，事实上它更接近于中国历史上的“父债子还”、“株连九族”的传统。原典马克思主义认为，应根据人们所处的经济地位，即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寡来考察阶级关系，家庭出身和思想状况不能成为确定阶级属性的标准。原典马克思主义也不主张根据人们的阶级出身来有差别地给予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待遇。正因为原典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中“阶级出身论”现象存在着矛盾，从瑞金——延安时代起，中共的意识形态从未正面论述过“阶级出身论”的合理性问题，它只是依存在阶级斗争理论的范畴下被宣传和普及。在争取中国共产革命胜利的阶段，它是一种动员手段，其目的是建立共产党的阶级和社会基础。革命成功后，执政党又以此意识和原则对敌对阶级进行政治清算，改造和重建社会。但在和平建设时期，继续沿用甚至强化“革命”时期的这套意识与原则，迟迟未能建立起体现人道、平等、公正等普世价值的现代法律框架，这就不可避免地给社会和广大民众的身心造成严重的伤害。毛泽东之所以长期坚持这套原则和意识，除了它曾经是一种行必有效的革命新传统，而且也与他的“纯化观”有关，因为推行这套原则及意识，可使党内和社会保持长期紧张，有助于建成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国家结构，而这种结构就是毛泽东所理想的实现了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新社会。

“阶级出身论”与苏共的关系也需具体分析，早期中共虽受到苏共“唯工农阶级至上” 的影响，但中国国内的因素更为关键，1928 年毛泽东在江西井岗山就开始了“洗党”，当时苏共经验还未传来，在选用苏共经验时，毛泽东一切以实用为前提。1953 年后苏联开始“解冻”，毛泽东反而加紧阶级斗争，因为阶级出身，政治分层有利于维护专政秩序。但毛泽东始终没有走到柬埔寨红色高棉极端主义的地步，在他那里，所有的理论和政策都以利害关系为出发点，一旦可能危及他的政治上的战略部署，毛泽东就会修改和调整政策。

毛泽东的“纯化观”与斯大林的“肃反”有着明显的差异，斯大林对其认为的反对力量或潜在的反对力量全部或大多施以肉体消灭；毛泽东则主张镇压一批，而用“阶级出身论”动员群众，分化敌人，将敌对阶级份子分散于群众之中，以分而治之，并通过对他们出不断打击，把他们“作为反面教员”来“锻炼教育人民”。斯大林“清洗”的借口简单（“叛国”、“间谍”、“反动富农”），毛泽东则有较丰富的理论，在阶级出身的基础上又发展到“立场”、“思想正确”、“过关”（革命关、土改关、社会主义关、文化大革命关等等）等一系列概念，即使血统纯正，但思想不纯正，也仍然会成为被斗争和镇压的对象。

以红色恐怖形式出现的阶级歧视，在文革初期发展到登峰造极，完全取消了“革命对象”的基本权利，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压迫，“阶级出身论”至此完成了向“阶级血统论” 的转换。“阶级出身论”和“阶级血统”论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只是“阶级血统论”更具暴力性和命定论的色彩。尽管如此，“阶级出身论”和“阶级血统论”与种性制度仍有所区别，这不仅表现为，在长达数十年间，主流意识形态始终未对此意识和原则作出正面肯定的论述，也在于每当“阶级出身论”和“阶级血统论”趋于沸点时，毛泽东都会予以一定的降温，在不断追求 “纯化”的大前题下，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化消极力量为积极力量”，每隔若干年，都会小幅舒缓一下由极端强调阶级出身问题而造成的社会紧张，从

而避免走向完全的极端主义。1966 年 9 月后，红卫兵在“红八月”下旬针对“黑五类” 的乱打乱杀的现象在北京市得到遏制，随着运动方向的转移，北京市中学高干子弟组成的红卫兵组织“联动”和“西纠”对“中央文革”执行的毛泽东“批判党内走资派”路线产生抵触，由此，江青、陈伯达等对“联动”、“西纠”和“血统论”提出了温和的批评，在此背景下，才有出身不好者组成的群众组识的产生。1972 年后“阶级血统论”趋于缓和，毛泽东提出“可教育好的子女”的概念，其重点是改善在“文革”由受冲击的干部子女的境遇，在此政策下，一批老干部的子女进入部队、大学，对非革命血统家庭的子女，虽在就业、升学、升迁等问题上继续歧视，但比“九一三”事件前有所缓和。

70 年代中后期“阶级出身论”——“阶级血统论”已走到尽头，由于“文革”中阶级斗争的打击面不断扩大，国人很少不被直接或间接打击，尤其是原先血统和思想都纯正的领导干部及其家属、子女，在暗涛汹涌的 “文革”中也整体沉没，在瞬间成为了新的“阶级敌人”遭遇到和过去的地主反革命一样的凌辱、歧视，至此，“阶级出身论”和“阶级血统论”的荒谬性已充分暴露。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宣布停止“阶级斗争为纲”，实现全党工作中心的转移，“四化”、经济建设已成为动员和组织原则，“阶级出身论”遭到全民的厌恶，与阶级斗争相随相依的“阶级出身论”最终走向终结。

注释

[1]转引自余伯流、夏道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 124 页。

[2]赵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52 页。

[3]陆定一：《大文学家茅盾》，《陆定一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第 867页。

[4]参见陈修良：《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陈修良文集》（上海：上海社会科学晓出版社 1999 年）第 251-252 页；另参见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年）第 38-39 页。

[5]陆定一：《回忆海陆丰斗争》1988 年 1 月 21 日《陆定一文集》第 853-854 页刘克犹：《回忆宁冈县的党组织》；朱开卷：《宁冈区乡政权和党的建设情况》载余伯流、夏道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308、 307页。

[7]《成仿吾传》编写组编：《成仿吾传》（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 年）第111 页；黄火青《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126 页

[8]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前委通告第一号》（1930 年 2 月16 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 年）中册，第 173 页。

[9]参见高华：《肃 AB 团事件的历史考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二十一世记》，1999 年 8 月号，第 60-71 页。

[10]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第 390 页。

[11]徐特立：《论党的性质与社会性质》，《徐特立文存》（广

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 187、 184 页。

[12]徐特立：《论党的性质与社会性质》，《徐特立文存》（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 187、 184 页。

[13]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 295 页。

[14]《谢觉哉日记》（上）第 524 页；另参见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第 423-436 页。

[15]龚子荣（原中共晋绥分局委员）：《1947 年晋绥的土改整党》，《中共党史资料》（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6 年）第 58 辑，第 21 页；另参见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238-239 页

[16] 1950 年 8 月 26 日《罗申关于整风等问题与刘少奇的会谈记录》，俄国档案复印件存沈志华处，编号 SD09855。

[17]李新（原晋冀鲁豫根据地河北永年县县委书记）：《百年之才》，《回望流年——李新回忆录续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 34-36、41-44、55-56 页

[18]龚子荣：《1947 年晋绥的土改整党》，《中共党史资料》（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6 年）第 58 辑，第 23，26 页；

[19]转引自傅锺（原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常务副主任 1947-1949年）：《新式整军运动的回顾》，《中共党史资料》（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3 年）第 46 辑第 28-29 页。

[20]胡开明（原晋察冀根据地四地委副书记）：《在晋察冀的日子里》（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3 年）第 46 辑第 83 页。

[21]杨宪益：《漏船载酒忆当年》（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 年）第 161 页。

[22]赵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第 236、243 页。

[23]奥·鲍·鲍里索夫（罗满宁）、鲍?特?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1945-1980》北京：三联出版社，1982 年）第 110 页；

[24] 1949 年 10 月 25 日《罗申与刘少奇谈话备忘录》，俄国档案复印件存沈志华处，编号 SD09926。

[25]毛泽东：《关于改正“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提法问题的批语和修改》，1951年 11 月 18 日，12 月 15 日、23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 2 册，第 509-510 页，及注释 3 第，第 511 页。

[26]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1953 年 5 月 23 日，第 166 号，第 350 页。

[27]《内部参考》1953 年 4 月 23 日，第 92 号，第 350 页，第 481 页。

[28]《内部参考》1953 年 5 月 23 日，第 116 号，第 351-353 页。

[29] 1949 年 11 月 15 日《罗申关于中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状况问题与周恩来的谈话纪录》，俄国档案复印件存沈志华处，编号 SD09845。

[30] 1951 年 4 月 25 日《罗申关于整风等问题与刘少奇的会谈纪录》，俄国档案复印件存沈志华处，编号 SD09855。

[31]孔令朋：《风雨人生》（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7 年），第 237-238 页，转引自高华：《阶级身份和差异：1949-1965 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见《在历史的风陵渡口》

[32] 1950 年 8 月 26 日《罗申关于整风等问题与刘少奇的会谈纪录》，俄国档案复印件存沈志华处，编号 SD09855。

[33]《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216-217 页。

[34]顾复生：《红旗十月满天飞》，载《江苏文史资料》第 100 辑（南京：《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7 年）第 175 页 ；薛建华：《毛泽东和他的“右派”朋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年）引言第 1 页。

[35]毛泽东《给胡乔木的信》（1951 年 3 月 2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2 册第154 页

[36]萧乾：《风而人生：萧乾口述自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237 页。

[37]杨宪益：《漏船载酒忆当年》第 152-153，163 页。另参见萧乾：《风而人生：萧乾口述自传》第 214、233、237-239 页。

[38]参见金观涛、刘青峰：《反右运动与延安整风》，《二十一世记》，1997 年 4 月号。

[39]刘乃元：《历劫不悔》（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46 页。

[40]《内部参考》1950 年 11 月 23 日，第 276 号，第 107-108 页。

[41]刘乃元：《历劫不悔》第 53-54、61、65 页。

[42]周鲸文：《风暴十年》（香港：时代批评社，1962），第 158 页。

[43] 1951 年 7 月 25 日《罗申关于镇压反革命问题与董必武的会谈备忘录》，俄国档案复印件存沈志华处，编号 SD09868。

[44] 1952 年 3 月 18 日《罗申与刘少奇谈话备忘录》，俄国档案复印件存沈志华处，编号 SD09870。

[45]《内部参考》1953 年 7 月 15 日，第 163 号，第 247 页。

[46]《内部参考》1953 年 4 月 13 日，第 83 号，第 2262 页。

[47]《内部参考》1953 年 5 月 13 日，第 107 号，第 167 页。

[48]《内部参考》1953 年 5 月 27 日，第 119 号，第 413 页。

[49]《内部参考》1953 年 6 月 25 日，第 144 号，第 425 页。

[50]《内部参考》1953 年 1 月 27 日，第 21 号，第 443-444 页。

[51]《内部参考》1953 年 4 月 8 日，第 79 号，第 171 页。

[52]《内部参考》1953 年 7 月 21 日，第 168 号，第 317-318 页。

[53]《内部参考》1953 年 4 月 27 日，第 95 号，第 538-541 页。

[5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2 册，第 383-384 页。

[5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2 册，第 416-417 页。

[56] 1952 年 3 月 18 日《罗申与刘少奇谈话备忘录》，俄国档案复印件存沈志华处，编号 SD09870。

[57] 1951 年 7 月 25 日《罗申关于镇压反革命问题与董必武的会谈备忘录》，俄国档案复印件存沈志华处，编号 SD09868。

[58]牧惠：《松仔岭事件真相?前言》，五柳村网（htt：／／www．Taos1.net／dirl／muhui001.htm）

[59]萧一湘：《干部变迁五十年》载《南风窗》2002 年 8 月号（上）第 26-27 页，总219 期，2002 年 8 月 1 日出版。

[60]《陆定一文集》第 822 页。

[61]萧一湘：《干部变迁五十年》载《南风窗》2002 年 8 月号（上）第 26-27 页，总219 期，2002 年 8 月 1 日出版。

[62]《内部参考》1956 年 4 月 21 日，第 82 期，第 267-268 页。

[6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2 册，第 576 页。

[6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第 505、506-507 页，注释 2、3、4。

[65] 1955 年 11 月 15 日《费德林与刘晓关于中共第六次全体会议的谈话备忘录》，俄国档案复印件存沈志华处，编号 SD09832。

[66]《内部参考》1956 年 6 月 30 日，第 150 期，第 504-507 页。

[67]《内部参考》1953 年 11 月 5 日，第 259 号，第 55 页。

[68]《内部参考》1953 年 11 月 10 日，第 263 号，第 129 页。

[69]《内部参考》1956 年 6 月 19 日，第 1911 号，第 429 页。

[70]《内部参考》1954 年 9 月 25 日，第 218 号，第 379-380 页。

[71]萧乾：《标尺单一化》，《这一年》（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年）第 147 页。

[72]《内部参考》1955 年 8 月 22 日，第 191 期，第 173 页。

[73]《内部参考》1955 年 9 月 13 日，第 205 期，第 199-200 页；1955 年 12 月 29 日，第 253 期，第 296 页。

[74]《内部参考》1954 年 10 月 6 日，第 226 号，第 64 页。

[75]《内部参考》1953 年 4 月 23 日，第 92 号，第 485-486 页。

[76]《内部参考》1953 年 7 月 1 日，第 149 号，第 9 页。

[77]《内部参考》1953 年 4 月 22 日，第 91 号，第 469 页。

[78]《内部参考》1955 年 10 月 15 日，第 220 期，第 70 页。

[79]《内部参考》1955 年 8 月 22 日，第 191 期，第 429 页。

[80]《内部参考》1955 年 8 月 2 日，第 178 期，第 14 页。

[81]《内部参考》1953 年 3 月 24 日，第 66 号，第 573-574 页；《内部参考》1953 年4 月 30 日，第 98 号，第 590-591 页。

[82]《内部参考》1955 年 4 月 26 日，第 95 期，第 381 页。

[83]《内部参考》1955 年 6 月 30 日，第 150 期，第 504 页。

[84]《内部参考》1955 年 10 月 19 日，第 222 期，第 86-90 页。

[85]《内部参考》1956 年 1 月 16 日，第 3 期，第 38-39 页。

[86]《内部参考》1956 年 1 月 11 日，第 3 期，第 42 页

[87]《内部参考》1955 年 12 月 29 日，第 253 期，第 285 页。

[88]《内部参考》1955 年 12 月 29 日，第 253 期，第 287 页。
[89]《内部参考》1955 年 12 月 29 日，第 253 期，第 288-289 页。
[90]《内部参考》1955 年 12 月 29 日，第 253 期，第 286 页。
[91]《内部参考》1953 年 7 月 2 日，第 150 号，第 29 页。
[92]《内部参考》1953 年 7 月 2 日，第 253 号，第 28 页。
[93]《内部参考》1953 年 4 月 25 日，第 94 号，第 508-509 页。
[94]《内部参考》1955 年 1 月 15 日，第 12 期，第 237 页。
[95]《内部参考》1955 年 1 月 15 日，第 12 期，第 237 页。
[96]《内部参考》1953 年 2 月 12 日，第 35 号，第 54 页。
[97]《内部参考》1953 年 4 月 7 日，第 78 号，第 134-135 页。
[98]《内部参考》1954 年 9 月 25 日，第 218 号，第 377-378 页。
[99]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人民日报》1957 年 10 月 19 日
[100]《内部参考》1956 年 1 月 11 日，第 3 期，第 50 页。
[101]《内部参考》1955 年 10 月 15 日，第 220 期，第 70 页。
[102]《内部参考》1955 年 3 月 30 日，第 72 期，第 467 页。
[103]《内部参考》1955 年 4 月 29 日，第 98 期，第 444-445 页。
[104]《内部参考》1955 年 10 月 15 日，第 220 期，第 720 页。
[105]《内部参考》1956 年 1 月 16 日，第 3 期，第 39 页。
[106]《内部参考》1956 年 1 月 11 日，第 3 期，第 44 页。
[107]《内部参考》1956 年 1 月 11 日，第 3 期，第 46 页。
[108]一听：《57 年广东反右运动始末》（故乡网(http：//www．Guxiang.com）.2001，7，8。
[109]和凤鸣：《经历：我的 1957 年》（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 年第 42、523页
[110] 1958 年 7 月 26 日《安东诺夫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报告》，俄国档案复印件存沈志华处，编号 SD09901。
[111]中国科学院江苏分院历史研究所：《江苏十年史》（1949-1959）年》（草稿）年（南京：1959 年 11 月）第 167 页
[112]中国科学院江苏分院历史研究所：《江苏十年史》（1949-1959）年》（草稿）年（南京：1959 年 11 月）第 166 页
[113]南京市玄武区委党史办公室，南京市玄武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南京市玄武区历史大事记（1949．4-1987．12）》（苏宁出准字第 0381 号，1992），第 70 页。
[114]中国科学院江苏分院历史研究所：《江苏十年史》（1949-1959）年》（草稿）年（南京：1959 年 11 月）第 167 页
[115]中国科学院江苏分院历史研究所：《江苏十年史》（1949-1959）年》（草稿）年（南京：1959 年 11 月）第 167-168 页
[116]南京市档案馆：《南京市大事记（1949-1984）》（南京：无出版时间），第 102 页。
[117]中国科学院江苏分院历史研究所：《江苏十年史》

（1949-1959）年》（草稿）年（南京：1959 年 11 月）第 179 页

[118]南京市档案馆：《南京市大事记（1949-1984）》（南京：无出版时间），第 104 页。

[119]《当代出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江苏》，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出版社，1989）第 315 页

[120]中国科学院江苏分院历史研究所：《江苏十年史》（1949-1959）年》（草稿）年（南京：1959 年 11 月）第 179 页

[121]《内部参考》1959 年 7 月 15 日，第 2822 期，第 11 页。

[122]《内部参考》1959 年 12 月 13 日，第 2934 期，第 17-20 页。

[123]《内部参考》1959 年 5 月 13 日，第 2760 期，第 13 页。

[124]《内部参考》1959 年 12 月 31 日，第 2949 期，第 11 页。

[125]参见高华《大饥荒与四清运动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二十一世纪》，2000 年 8 月号，第 59 页。

[126]《内部参考》1961 年 1 月 13 日，第 3162 期，第 9-12 页；1961 年 1 月 18 日，第 3164 期，第 9-14 页；1961 年 2 月 1 日，第 3170 期，第 10-11 页；1961 年 2 月 8 日，第 3174 期，第 13-16 页。

[127]何满子口述、吴仲华整理：《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第 124-126 页。

[128]杜魏华主编：《在苏联长大的红色后代》（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年）第374 页。

[129]丁群《刘顺元传》（南京：江苏人民出版仕 1999 年），第 319 页

[130]《内部参考》1960 年 12 月 5 日，第 3144 期，第 12 页。

[131]徐晓、丁冬、徐友渔编：《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第 18 页注 1。

[132]萧一湘：《干部变迁五十年》载《南风窗》2002 年 8 月号（上）第 26-27 页，总219 期，2002 年 8 月 1 日出版。

[133]《内部参考》1958 年 6 月 3 日，第 2496 期，第 17 页。

[134]《内部参考》1958 年 6 月 11 日，第 2503 期，第 15 页。

[135]《内部参考》1958 年 6 月 2 日，第 2495 期，第 22-23 页。

[136]丁群《刘顺元传》（南京：江苏人民出版仕 1999 年），第 290 页

[137]《内部参考》1960 年 5 月 24 日，第 3065 期，第 11-12 页。

[138]《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年）第 17 页。

[139]徐城北：《有家难回》（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2 页。

[140]《中国共产党南京市玄武区历史大事记（1949．4-1987．12）》（南京市玄武区委党史办，玄武档案局编 1992 年），第 137 页。

[141]张馨、高光厚：《陕西省长安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调查》

《党史通讯》1987 年第六期第 34 页。

[142]《内部参考》1953 年 6 月 25 日，第 144 期，第 426-427 页。

[143]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 年）第125-126、128 页。

[144]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第 124 页。

[145]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第 125、149 页。

[146]《内部参考》1964 年 8 月 28 日，第 3654 期，第 10-11 页。

[147]《谢觉哉日记》，上册，第 298 页。

[148]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44 页。

[149]《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年）第 16-17 页。

[150]《内部参考》1959 年 11 月 26 日，第 2061 期，第 591 页。

[151]参见李南央：《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忆北京第十女子中学干部子弟班的生活》，载李南央等著：《我有这样一位母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 23 页。

[152]陆定一：《关于半工半读问题的报告》，《陆定一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2年） 第 680 页。

第十八篇 在历史中求真实

最近，外交部档案馆对外开放了一批建国初的外交档案，总数达 1 万余件，这是我国在信息公开化方面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的一项重要举措，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尤其是学界的充分肯定和欢迎。其实，早在 1987 年 9 月 5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规定：从 1988 年 1 月 1 日起，开放 1949 年以后的三类档案：清代档案、民国档案和中共档案。同时规定，1949 年以后的档案从形成之日起，满 30 年分期分批开放。在这之后，有关部门整理、出版了一些党和国家历史的档案资料集和专题文献集，这些公布的历史资料都受到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众所周知，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档案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最为宝贵和重要。在强调档案重要性的时候，也要对其作具体分析。因为有关当代史档案的背景较为特殊，前 30 年不间断的政治运动对档案的形成、档案的内容都有很大的影响。例如：许多档案中的干部的交代、反省，并非完全出自自愿。《顾准自述》一书是根据类似于档案的原始文件而编辑出版的，均为顾准在文革期间的交代材料，许多为自诬之词，如果以此来判断顾准在文革中的思想状况，可能就会有较大的出入甚至偏谬。所以，应该重视档案，同时也应对档案进行鉴别和分析，因为任何资料，都离不开研究者的消化和分析，如果档案一切皆可信，只需把档案资料排例一下就可以了，但那不是历史学，充其量只是历史资料汇编。所以，档案是极其重要的，但鉴别、分析更为重要。我觉得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讲的一段话，对如何鉴别、运用档案也是有用的，这就是“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是正确的思维和研究方法。

新近出版的《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则是另一类档案资料，该书由历史原件、整理者的说明及与当事人的对谈等组成，因此它已不是简单的资料排序，而是一部带有研究性质的档案资料。和一般档案集有所不同的是，它所反映的不是某一领导人或某一领域某一地区领导层的决策过程，而是一部特殊的个人档案集。该书通过杜高这个被莫须有扣上“小家族分子”的交代、反省、思想汇报和围绕他和别人的检举揭发材料，有关部门对论、处理决定等展现了极左肆虐的年代知识分子艰难生存的复杂图像。费尔巴哈说过： “经常受到世界史浪潮冲击的往往是那些最普通的人，”杜高是原中国剧协的一个普通创作人员，他不是声名显赫的大人物，如果从狭义的角度看，《杜高档案》一书只能称作

是杜高个人几十年的政治生活史，但是从中折射的又是带有普遍性的那个时代众多知识分子的精神和生存状态。历史学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人者，自然包括英雄豪杰和平民百姓，研究者把目光集中在那些引领时代的政治家思想家的身上无疑是正确的，同样，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经验感受也是不容忽略的，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生存状态，应永远在我们研究者的关怀的视野之内，因为他们构成了我们社会的绝大多数，他们所处的地位、环境更能反映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的多重面相，《杜高档案》及类似的民间档案资料的意义就在于此。

我们在运用中国的档案研究当代史时，还应重视外国有关中国当代史的档案。20 世纪中国历史有一个新的重要现象，这就是中国被广泛、深刻的卷入到世界进程。上世纪 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开始大量解密前苏联档案，中国的历史学者在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下，也几下莫斯科，收集翻译了一批极为珍贵的前苏联档案。中国学者利用前苏联解密档案和中国方面的资料纂写的有关论著，对我们认识许多重大历史问题有重要的帮助。

当代史的档案和资料有它的特殊性，一方面一些关键性的资料十分缺少；另一方面，相关资料既多又杂。对当代史的资料需要小心鉴别和判断，因为许多资料可能存有错讹之处，需要研究者更注重资料的考证和彼此的切磋，所有目的都是一个：在历史中求真实，从历史中获取前进的养份和教益。

附录1：有关毛泽东研究的几个问题

本文整理自高华教授于 2002.10.18 在华东师范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的演讲实录

毛泽东研究的“来龙去脉”

其实我们大家知道，在我们国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真正学术意义上的对毛泽东的研究几乎是没有的。个别的像李锐同志，在50年代初，他曾经做过毛泽东早年活动的研究，也出了一本书，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当时就受到海内外的普遍重视。可是李锐同志在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后，这本书就没再发行。从50年代到70年代，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满怀虔诚，满怀崇敬的心情来研究毛泽东的人，往往也会遭遇到不测。做毛的研究在那个时代是一个高危险性的事情，这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基本常识。

1979年以前，国外对毛的研究，是和当时的世界潮流以及冷战格局有关。咱们国内基本上是意识形态化的宣传，国外一些研究也有意识形态化的问题。到了50年代后期，60年代，情况发生变化了，反共原教旨主义逐渐式微，自由主义学派成为主流，他们主要关注毛主义和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差异性的问题。1969年以后，从西方研究毛的自由派中间分化出新左派，他们对“文革”，对毛泽东晚年的举措，都是给予非常高的评价。例如日本著名的井上清教授这样的一些教授的研究，对当时西方青年的反越战、反西方主流体制的运动都有很大的影响。那么自由派的研究呢？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美两国的互相接近。这个所谓自由派就是哈佛大学以费正清为代表的那个流派。

前苏联在1979年以前，他们也从自己的角度和需要对毛泽东进行研究，前苏联的毛研究是完全意识形态化的。中苏关系破裂后，苏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决定成立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实际上是由苏共中央政治局领导的，远东研究所根据政治的需要出版过一些出版物，其中不少作品都涉及到中苏两党两国交往的历史，反映的是当时苏联的解释和看法。他们在60年代对毛泽东的看法是，认为毛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农民革命家”，或者叫“半托洛茨基分子”。这是当时苏联对毛的基本看法。

我想1979年后，咱们国内兴起对毛泽东的讨论，主要是和反对“两个凡是”，思想解放运动相联系的，主要集中探究毛主席晚年的错误，特别是“文革”和五十年代后期的一些错误，它的导向是支持邓小平的改革

开放政策。其中最有影响的，也是我们很多老师和同学都看过的是李锐写的那本《庐山会议实录》。这虽然不是一个研究成果，但是包含了大量的丰富的珍贵的史料。比较有深度的具有学理性的研究，应该是在80年代中后期才产生。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李锐的《毛泽东的早年和晚年》和《毛泽东的晚年悲剧》，厦门大学汪澍白教授的《毛泽东与中国文化传统》，人民大学萧延中编的《晚年毛泽东》等。

80年代中后期之所以能够出现较有深度的研究成果，是和当时大环境有关系，第一：就是当时的官方已经出版了一些有关毛的早期的文献和文稿，其中重要的有毛泽东早年文稿，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等等；第二：就是80年代中后期，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第三：是研究者慢慢走出了1979年、80年代初心情较为激动的那种情绪状态，从而以较为冷静和客观的态度来思考某些重大的问题。90年代初以后，国际和国内环境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反映在毛泽东研究领域，气氛已经和80年代中后期完全不一样了。也就是说“颂扬”式的叙述重新成为主流。某些在80年代还可以讨论的问题，例如：毛泽东和“文革”，毛泽东和“大跃进”，毛泽东和“反右”，像这样的话题都被回避了。但是我认为在这一时期和其后，也出了一些很好的书，这就是我们的官方机构出版了一些有重要价值的有关毛泽东的文献，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研究的材料。比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了《毛泽东年谱（1893-1949）》，虽然在资料的选择上有取舍，但基本上是根据档案编写的。中央文献研究室也出版了，包含大量珍贵资料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一共十三卷，其中大部分是第一次的发表。还有近年来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等。

中央文献研究室有很多专家学者，他们在文献整理方面，具有相当高的专业水平。

90年代中后期以后，有关毛的研究和叙述重新活跃起来，这可能和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们社会生活的多样化的发展，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经济转型带来的社会分化等情况有密切的关系。这里又可分成几种情况：在某些人那里，毛泽东又被重新赋予各种意义，成为某种符号象征。比如我们都听说过的《切·格瓦拉》，在这部剧中，毛泽东重新被描绘成为体现社会正义的价值符号。在另一方面，最近几年对毛思想的研究，当然也有一些，只是学理性比较强的这样的研究不太多。第三个方面，我们可见的是一些秉持民间立场和角度的叙述，这是一些和具体的历史事件，或与某些专题研究相联系，又涉及到毛的叙述，其中有一些是个人的回忆。

这样的作品在90年代中后期就陆续出现了，而这些个人的回忆，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叙述大概的特点是，都不同程度地触及到毛作为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他所具有的多重面相的问题。我们过去可能只看到毛的某一个面相，可是他还有其他的面相。这些叙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开始重视研究或反映毛和由毛主导的那个时代所发生的剧烈变动对普通人生活和命运的影响，这是我认为特别应予以注意的，或者是我个人比较欣赏的一种研究趋向。

这种叙述不单纯是研究毛思想，诸如毛思想有三个特点五个要素，不是这样的，而是谈他主导的那个时代对普通人生存的重大影响的问题。这是过去我们在研究毛的时候很少注意的问题。以前人们只研究毛

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的一面，可是对在他主导下亿万人民的生活，亿万人民的生存状态，都没给予特别的注意。90年代中后期以后，人们开始注意了，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近几年，对毛的研究比较重要的有人民大学单少杰教授的《毛泽东执政春秋》，这本书主要写的是1949到1976的毛，实际上叙述的是从1949到今天，就是毛的执政年代和后毛时代，作者研究毛的思想及其背景，以及和中国社会变化的相互关系。另一本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杨奎松教授在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也是一本很重要的书。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的陈永发教授也出版了一本书，不是专门谈毛的，但广泛涉及到毛，叫《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毛是这本书的一个主要叙述对象。直于非学术性的，比较重要的有韦君宜的回忆录《思痛录》。还有前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宋云彬先生在1949以后的30年的日记，出版社给它起了个比较通俗的名字，叫《红尘冷眼》，宋云彬先生是浙江省的一个著名的知识分子，也是中国民主同盟过去的一个高级领导人，1957年被打成右派。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学者，他的日记提供了一份对那个时代很宝贵的个人的叙述，其实就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在毛时代的心灵史。

90年代以后，和中国的情况相对照，从整体上看，西方对毛的研究兴趣，已经大减弱。应该说，对毛的研究，现在在西方早已不是热点。当然在总结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提到毛，但是今天西方学术界对他已经没有兴趣。（许纪霖：对毛的研究是冷战的产物，现在冷战结束了。）可能和这有关系，西方人的研究有强烈的现实功利的导向，这是没问题的。虽然对毛的研究已不热了，但还是有的。美国前两年出版了两本书，《纽约时报书评杂志》作了报导，一本书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的耶鲁大学的史景迁教授写的，他的很多书都翻译成中文了，这本书还没翻译，名字就是《毛》。最近我们国内出版了他的《上帝的儿子洪秀全》。还有一本是美国的一位资深新闻记者菲利浦，利用大量的材料写的《毛的一生》。这是最新的体现西方对毛看法的两本书，但是我翻了一下，觉得这两本书信息量都不是很大。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关毛的研究的概况。

毛泽东研究中的五个重点

下面我要谈五个涉及到毛的重要观点，这主要是在我们国内和华裔的一些知识分子之间讨论的，西人现在的兴趣不是很大。

第一，是毛的民粹主义的问题，其实我们都知道，80年代在我们国内学术界已经开始讨论。这个讨论在1988年1989年初曾经一度升温，我印象中，当时的中央党史研究室还出过一个讨论的专刊，有一个专门的报道。但是这个讨论在1989年以后马上停止了。（许纪霖：这里插一句，关于毛的民粹主义最早是谁提的呢？是华东师大的一个学生，叫王申酉，他在1976年的时候就讲毛是农业社会主义，那时候不叫民粹主义，四人帮粉碎后王被枪毙了。）这个名字我知道，我看过以后发表的他的文章，他是非常非常不幸的，四人帮倒台以后被枪毙了。80年代初期，我们南京大学学报当时的主编蒋广学写了一篇谈毛的农业社会主义问题的文章，受到中宣部的严厉批评。这个讨论在

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曾经一度提出来，以后又重新讨论，再被停

止，这和当时的大的背景环境有关系。到了1998年，中国社科院的前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胡绳同志在一篇长文中又重新谈这个问题。胡绳是党在社会科学战线的重要的领导人，当然他也是一个学者。他的这篇文章出来后引起非常大的争议，有人很严厉地批评胡绳是背叛马列主义，背叛毛泽东思想，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等等。但是由于胡绳的重要影响，在这以后，民粹主义多少可以谈一点了。

第二，是毛泽东的“反智主义”的问题。许多人认为，反知识、反智，鄙视，打击知识分子是毛时代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对这个问题从历史和思想的层面谈的比较早的人，还是海外的华裔学者余英时教授。余英时教授早在80年代就提到这个问题。与此相联系，余教授在90年代初又提到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和边缘人占据政治中心的这样一个话题。当时这个讨论集中在海外和国内的知识分子研究的议题中。当然毛的反智主义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谈论这个问题可能还需要从中国共产革命的历史背景来谈。中国共产革命的主体是农民，革命的主要方式是军事斗争，这对

1949年以后中国的发展有支配性的影响。从学理层面，从当代人的体会等来谈，当然都是一个角度，可是联系到共产革命的这个历史背景来谈，可能会更深入一些。我们都知道中国共产革命成功的经验是“农村包围城市”等等，今天一些数字公开了，比如说1949年中国共产党员大概有320万人，其中69%是文盲，这是正式的历史资料披露的。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当然会出现一系列的矛盾、紧张、冲突。老一代的革命家陆定一同志，他曾经很形象地说过这样一个问题，他在90年代初中顾委的一次座谈会上发言，他说1949年中共面临一个“农民进城”的问题，农民进城肯定会带来一系列很复杂的问题。毛泽东早年50年代初也注意到这个情况，那时有很多关于军代表、工农干部和城市知识分子关系紧张的报告送到毛泽东那里，毛非常清楚这种情况。他作了明确的批示，他说农民出身的同志是有狭隘、保守的特点，但忠诚老实是最重要的，其他不足可以学。我的意思是谈反智主义，如果结合这些具体历史事实谈，也许会更深入一点。

第三，毛的乌托邦主义的问题。我们在总结50年代后期以来的历史，特别是在谈“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人们都会用这样一个概念，例如：毛泽东的乌托邦，毛泽东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天堂等。现在不少学者都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不完全是权力斗争，毛主席要用他自己的思想和意识来改变这个社会等等。这就提到了乌托邦主义的问题，在这种言说中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林毓生教授提出来的观点。林毓生是美籍华人学者，威斯康辛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林教授1995年提出一个看法，我这里稍微介绍一下。

林毓生认为，毛的乌托邦主义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和政治化的特点。这种主观性和政治化在政治上的表现形式就是全权主义，也就是我们今天通常说的全能主义，这是政治学的一个概念。毛的全能主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新现象，大大超过了中国过去的传统政治，它的任意性和强制性都超过了前者，“尤其过之”。具体的特点是：第一，毛的乌托邦主义具有强悍性，这种强悍性用林毓生的解释叫做“自行其是，不受约束”。第二，是“千年福音式”的，他解释是，认定自己占据了道德制高

点，比你在道德上更优越，更神圣，具有一种高度的道德自信心。第三，是政治性很强，毛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动员舆论、组织群众运动，谋求当下实现他所理想的共产主义天堂。他说毛泽东的乌托邦主义和其它乌托邦主义在性质上和内容上都是不一样的。

正因为许多其它类型的乌托邦主义理想过高，不知道如何在当下落实。什么理想国了、太阳城，不知道如何在当下落实。而毛的乌托邦是强悍的和非常政治化的。他相信自己有一种巨大的的历史使命来解救人民，他又确实知道如何运用政治在当下落实他的崇高理想。如果没有这个政治性，它永远只是一个高高的理想。毛则有一切政治化的手段，可以使它在人间落实，使人间变成乐土。

我认为林的观点是很重要的。我们过去谈乌托邦主义的时候，一般不谈毛的那个强烈政治性这一方面，就是人民公社平均主义，什么张鲁，五斗米教一类，就这个而谈这个。毛肯定是一个大政治家，一个掌握无限权力的人，没有政治上的这种优势地位，没有他的绝对的支配性权力，他怎么实现他的乌托邦呢？这两者之间关系到底怎么样呢？林教授的这种看法提供了一个观察的重要的视角。

第四个方面，是毛泽东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趋势的问题。这是一个最近几年才谈的问题，这个讨论，可能是从去年从哈佛大学开始的。哈佛大学柯伟林教授，原来是历史系主任，现在是文学院院长，他写了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文章就是《认识二十世纪中国》。还有一篇文章是今年刚写的，就是《中国与50年代的社会主义世界的经济关系》。在这两篇文章中，已经把这样一些话题基本都谈出来了。所谓二十世纪的历史趋势，柯伟林教授认为，在二十世纪中国，不管出现任何的政权更迭，慈禧还是袁世凯啊，还是以后的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还是今天的中国领导人，都要面对这样一些基本的历史趋势，二十世纪中国的基本历史趋势始终是存在的。他认为这些基本趋势大概有几点：

第一，中国与世界的广泛，密切，日益加强的联系，这是二十世纪的一个新现象，就是外国对中国的全面的影响的问题。他认为这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现象。在他看来，最近这一百年，有三个国家对中国的影响最大：俄国、美国、日本，他认为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基本上是负面的，美国的影响比较好。关于俄国的影响，八十年代以前，中外学者一般注意的是中国的情况和俄国情况的差异的问题。现在潮流变了，到了二十世纪末和今天，人们更多的关注中国和俄国在体制上的相似性的问题。原来是研究差异性，现在研究相似性。当然这里有更复杂的背景。

第二个趋势，是中国的工业化。

第三个趋势，就是中国的统一，疆土的完整和国家安全。

柯说，二十世纪中国还有一个趋势，就是虽然受到一些阻碍，但是始终是存在的，这就是中国人的公民化程度的提高问题。柯伟林教授从这样的背景出发，来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上的几个主要形态。他的基本的看法是，对毛泽东的三十年的评价比较低，他对80年代以后到今天中国的领导核心，或者用他的话叫“领导集团”，给予最高程度的评价。他说今天的中国领导集团是“二十世纪最具领导能力的”。而毛的三十年，他用了一句话，叫“糟糕的不能再糟糕的记录”，为什么说“糟糕的不能再糟糕”呢？

柯说主要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二十世纪的中国的历史趋势。他有几个指标，他认为毛的体制是中国历史类型和斯大林模式的混和物，而斯大林模式他是否定的，他说这是被证明是完全失败的模式。而最近二十年，中国的领导集团是顺应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趋势的，这是柯教授的一个看法。

柯教授谈这些问题时有一个特点，他评论毛的三十年是结合历史来谈的，不再专门论述毛的思想有三个特点五个要素，现在不谈这个东西了，都是结合当时的历史来谈。上次许教授和我都见过的那个日本很有名的东京大学的近藤邦康教授，这是日本研究毛思想的权威。这个老先生对毛思想当然很有研究。可是他概念先行，他不太管历史事实。他有两个概念，一个叫毛的理想主义，一个叫毛的现实主义，然后他一网打尽。当然这也是一种叙述，可是我觉得由于他很少结合到中国的历史来谈，因而他的一些看法就缺少历史感了。

我想柯教授对毛时代的看法有一些还是有问题的，有的地方不完全客观。比如说毛忽视技术水平的提高，这可能太笼统了。因为毛时代并不是在所有时候都忽视技术水平的提高的。50年代初，大规模工业化，扫除文盲、妇女受教育、汉字改良、汉语拼音等等，都是直接间接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有关系的。毛是不是完全背离中国工业化的趋势？我想毛并不是不要中国的工业化，他是要他的那套工业化，也就是"鞍钢宪法"那样的那种工业化，是思想领先，政治挂帅的工业化。

第五个方面，也是我们国内这两年大家谈的比较多的，这就是毛泽东的"文革"、"大跃进"，是否体现了后现代的价值？"文革"的大民主和反官僚主义的意义等问题。我们知道，现在很多人从今天的角度重新肯定毛泽东的大民主和反官僚主义的思想和实践，我觉得这些问题确实值得好好研究。我们检讨一下历史就可以看出来，毛对官僚主义的不满是在60年代初期集中表达的。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如果哪个人对支部书记提出意见，就会被认为是"反党反毛主席"，当时的说法是，毛主席的领导不是凭空的，而是由各级党委来体现的，所以反对支部书记就是反党，就是反对毛主席。而毛并没有出来纠正这个情况。60年代初，毛提出很多重要的看法，如"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大官和小官的矛盾"等等。这正是毛和刘少奇矛盾逐渐激化的时期。再一个就是"文革"中的大民主，这个大民主究竟是什么回事？我想还是"奉旨造反"，群众性造反，都是在毛泽东的划的框架下面进行的，离开这个框架，立即会受到制裁。这都是很值得研究的。今天那种离开当时历史条件，全面肯定文革和毛在那个阶段的反官僚主义的思想，我认为是很有问题的。

研究毛，应考虑到普通民众在那个时代的经验和感受

最后，我讲一些个人的看法。我非常同意刚才许教授讲的毛泽东是中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人物。毛确实是如此地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历史，影响了我们中国人，影响了我们的思想，影响着我们的性格，影响了我们的生活，他对我们中国人可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毛泽东本人又是一个性格极具冲突的人，他的思想，他的一生的事功，是如此具有张力。他的思想遗产的清理和研究，对今天的中国和将来的中国一定是非常需要的。

问题是"毛泽东的思想遗产能否转化为未来中国建立民主社会的正面

价值？”这是台湾的韦政通教授提出来的，韦政通先生原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但是这些年改行研究毛泽东了，出了两本书：《无限风光在险峰：毛泽东的性格与命运》和《一声风雷惊世界：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老先生现在是一边喝着白酒一边写文章，每天写五六百个字，他最后要通过研究毛泽东，对中国思想史作出他的总结。韦教授认为，中国人付出那么多牺牲，应该可以从毛泽东的思想遗产中寻找出正面价值。他的看法是，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为了追求社会正义，建立一个理想社会，这反映了人类的崇高理想，因而具有永恒价值。但是他同时也感到毛的几十年时间，特别是“文革”，又使无数的中国人受到伤害，这两者是如此紧密的纠缠在一起。

韦教授自己说过，他80年代后期第一次回大陆来探亲，从北京到张家口坐的是火车，车轮滚滚，使他的内心激起强烈的大震动，他告诉我，他当时的感觉是毛时代的无数冤魂在哭号。他是很真诚的，对毛很尊敬，把毛看成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是他也感到毛时代的另一个大问题，即广大人民的牺牲的问题。2000年12月在台北，林毓生教授和我聊天时也提到，他说有无数志士仁人为之奋斗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投身其中，创建了一个新社会，可是为什么到了5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文革”，又是如此的伤害人，压迫人呢？他心里感到非常难过，不得其解。韦正通先生认为毛的一生是用他的生命来彰显了中国传统思想的缺陷，这个缺陷是中国的“性善论”和权力的关系问题。他说毛的一生是个悲剧，毛的悲剧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反映出中国传统的严重缺陷。

我个人是学历史的，还是喜欢从一些基本事实的了解开始，在此基础上再来讨论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我这几年有这种感觉，我们研究毛的时候，应该考虑到普通民众在那个时代的经验和感受的问题。民众感受的这个方面我们过去是忽略的，不重视的。费尔巴哈说过：“经常受到世界史浪潮冲击的往往是那些最普通的人，而绝不是那些高官显爵，因为他们高高在上，太显赫了。”我想普通人的生活经验和感受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仅要重视知识分子的感受和经验，也要重视普罗大众的感受。历史学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而毛的研究是跨学科的，当然可以，而且也应当首先从历史学的这个方面进入。在研究毛时，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生存状态，应在我们研究者的关怀的视野之内。也许这样，我们才可以对毛、对毛的事功，可能比过去有一个新的角度，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

附录2：纪念高华特辑-中文大学出版社

有時候偉大的人碰巧在我們身邊
我們能夠認出他，已是生之幸運

“书比人长寿”——悼念高华先生

林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编辑部主任）
林骁（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编辑）

2000年，高華先生將花費近十年心血寫成的巨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交由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編輯製作，此後經由中文大學出版社 出版，出版社也因此有幸與高華先生結緣。高華先生是我們尊敬的作者。我們對他的敬意， 來自於他勇敢地在缺失真相的世界裏尋找真相，並尋找歷史真相背後的話語真相。他在這場 孤獨的遠征中表現出驚人的智慧、勇氣和毅力。他對於真相的熱愛，超越了恐懼、媚俗、名 利，成就了他作為一個“純粹”學者的獨立價值。這種純粹帶著樸實和智慧，散發著獨特的 個人魅力，在我們身處的時代，尤有一種動人的力量。

2009 年，出版社前任編輯黎耀強為香港書展編輯特刊，向高華先生約稿。先生欣然撰寫 了長文〈《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出版十年感言——為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閱讀歷史，認識 中國》而作〉。文中他對十年間收到的讀者意見，特別是不同的批評意見做了六點回應，並清 楚說明修訂此書的意願和思路。在這些回應中，他重申了始終未曾改變的對五四價值的基本 認同，解釋了《紅太陽》選擇與眾不同的切入點的原因，也坦誠地分享了十年間對於書中所 顯現的思想矛盾及遺留問題的持續思索。他說：“在這十年，我讀了更多的書，……我讀它們 都圍繞一個主題，那就是思考『革命』、『解放』、『自由』、『人性』的意義。我想說的是，這 場思考持久、艱辛、充滿困惑。”他清楚自己在做什麼，爲什麼要做，以及如何做，在對自己 的研究充滿自信的同時，又保持著思考的深度開放性。這樣清晰的思維和洞察，十年後仍然 具有穿透力。

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對於異見——哪怕是言辭頗為激烈的異見——的態度。曾有學者直接 質疑《紅太陽》的觀點，並認為“延安整風”儘管相當殘酷、極左，但是相當有必要：“說到 殘酷，現世政治有過不殘酷的嗎？所謂『極左』，不左還算共產黨？”對此，高華先生用他一 貫樸實的行文，甚至帶有某種哀傷地寫道：“（這樣的）質疑，可能永遠難以回答，因為它涉 及的是更深邃的歷史哲學層面下的人性、革命、政治、暴力、毀滅的道德基礎的問題。”一如 對於學術的態度，他的回應客觀冷靜，對歷史懷有深遠的悲劇感。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即使 他並不認同批評者的批評，但也數次肯定了批評者的出發點和終極關懷，顯示出一種成熟的 交往理性。如此開放的討論姿態和誠意，令人肅然起敬。

在這篇〈感言〉的文末，原本有一段話，但在最後定稿時，他請編輯刪去了。他覺得在 當時有些話還是不說為好。但是我們相信，這些話其實是他非常想說的，因此摘錄於此。在 感謝朋友和讀者對他個人處境的關心之後，先生寫道：“當然，思想啟蒙的八十年代早已遠去， 在新舊轉型的過渡時期，幾十年來盛行的舊觀念和舊方式還有相當的生命力，但中國畢竟進 步了，現在不是文革時代，也不是50–60年代了，我

相信未來……”

在這篇〈感言〉裏，高華先生列出了他對於《紅太陽》詳細的五點修訂計劃。事實上，從 2002 年該書重印的時候，他就開始有修訂的打算，此後曾多次表達修訂的想法。2009 年 寫作〈感言〉的時候，他已在病中，可對十年前的舊作，仍是“萬千心事難寄”，修訂的構想 也更加清晰明確。他深信這本書的觀點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同時仍熱切地期望有機會將自己 的新資料、新研究和新感悟融入到修訂版中。他說：“總之，我希望我能把修訂的工作做得更 好一些，使得本書可以更充實一些，完全地復原歷史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通過進一步發掘 資料和細緻的研究，盡可能地去接近歷史事實，這是十年前出版本書時我的心願，現在仍然 是我的目標，我會繼續努力。”

高華先生這種嚴謹的治學態度，不僅體現在他自己治史撰書一絲不苟的風格中，在為出 版社多次的書稿評審中也有始終如一的呈現。作為近現代史研究的大家，他不僅能一針見血 地看出書稿資料的齊缺、研究的廣度深度、創新或襲舊等等，還特別注重研究的反思性和批 評性，在每部書稿中找尋“思想的閃光”。他還多次提到了書稿的學術規範問題，在他看來， 這是研究者的基本道德和素質。而這些，都一脈相承了他對於自己研究的預設和要求；《紅太陽》在這些方面的傑出表現，就是最有說服力的例證。

中文大學出版社在中國現當代史領域的書籍出版，也一直得到高華先生的鼓勵、肯定和 富有見地的建議。每次向高華先生請教，無論有關單部書稿的學術品質，還是現當代史出版 上的未來方向，他總是仔細詳實地回覆。他鼓勵我們堅持以出版研究性質的著作為立身之本， 堅守學術書籍的高品質，並且認為“出版社也應培養讀者有這種眼光和態度”。我們驚歎於一 位學者，居然會具有如此高明的出版人的眼光。先生熱心學術，患病後還幾次為出版社審稿。 評審書稿實際上是非常累人的工作，同事怕他辛苦，可他說他喜歡看書稿，又總說評一下也 不累。感動之外，我們也更加珍惜這樣一種相敬相惜的關係。先生為出版社所做的最後一次 匿名評審，是在今年春天。先生在對書稿提出明確的否定意見後，不忘誠懇地表達對作者努 力的敬意。先生之寬容仁厚，足見一斑。可惜這份評審報告因出版社匿名評審制度要求而無 法公開，它將永遠安靜地保存在出版社檔案中。

知道先生愛書，每逢出版社有他可能感興趣的新書出版，同事總是儘快給他寄去。先生 生病後，一直在讀我們的新書，並不時發表零星的評論。上個月熊景明老師提醒我們先生的 身體狀況又一次下落，剛好新書《陳獨秀全傳》印出，同事立刻連同另外三本書空郵了過去。 印戳日期是 2011 年 11 月 25 日。雖然再不能收到先生的回應，我們希望這些書在先生最後的 日子裏能給他帶去些許安慰。

高華先生正值史學研究者的黃金時期，同對《紅太陽》的修訂計劃一樣，他還有許多對 於未來研究的構想。如今，這一切只能永遠留在他終於停止了工作的清醒頭腦裡。但借用費 正清先生的話：“書比人長壽。”因此我們仍算幸運的，高華先生的生命將以另一種形式繼續 存在下去。

2011 年 12 月 30 日於香港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出版十年感言

——為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閱讀歷史，認識中國》而作

高华

編者按：本文是高華先生 2009 年為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的特刊《閱讀歷史，認識中國》專門撰寫的。現將原文與大家分享， 以共同紀念高華先生。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以下簡稱為《紅太陽》）一書出版 後，承蒙讀者的厚愛，這十年來我收到許多讀者來信，有來自大陸各地的，也有港、台的， 還有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日本、澳大利亞，甚至來自遙遠的希臘克里特島。這些來信 大多查詢怎麼購書或表示讚許、鼓勵。李銳、王元化、楊振寧、汪澍白、陳方正、馮蘭瑞、 吳敬璉、劉賓雁、王年一、林毓生、張灝、韋政通、張玉法、董健、魏良弢等老先生對我的 書都給予很高的評價。在學界，這本書也受到普遍的關注和好評，用一位評論者的話說，“知 識界讀過此書的，均對此書懷有極為深刻的印象”。

外界對本書的意見 一些學者特別強調了本書的“歷史－現實”意義，蕭功秦教授說：“這本史學專著是一部凝聚著中國新一代知識分子對自己生活於其中的時代進行理性反思與心靈體驗的傳世之作。它深刻地揭示了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並通過這一揭示回答了一系列發人深思的問題。”

謝泳教授稱本書“雖然是一本嚴謹的史學著作，但其思想啟蒙意義不可低估”。 中國人民大學的蕭延中教授則從思想性和歷史敘述創新的視角論述了本書的價值，他認為九十年代以來，中國存在著“官方”的、“新左派”的和“自由派”的有關毛的敘述，而本

書作者則被他列入毛研究的“歷史主義學派”。蕭延中寫道：“僅對毛澤東研究的學術突破而 言，高華的這本著作，不僅在於史料的細膩整理，更重要的是修正、擺脫，甚至顛覆了自四 十年代陳伯達、胡喬木以來官方意識形態固定的解釋框架和話語表達，而獨創了一套嶄新的 歷史敘述模式。在一定意義上，它成為中共黨史『新史學』的重要範本之一。”

法國華裔學者陳彥博士說：“此書雖然是一部嚴肅的史學專著，但卻具相當的可讀性。僅 以人物為例，作者善於通過特定的事例，以簡練的筆法勾畫出歷史人物的鮮明個性：項英的 剛直不阿、周恩來的忍讓練達、任弼時的圓通持重、王明的書生幼稚、張聞天的正直謙讓、 康生的奸滑陰毒、彭德懷的耿直豁達等等，一代共產黨先驅人物形象躍然紙上。毛澤東自然 是此書的中心，高華筆下的毛澤東老辣跋扈、縱橫捭闔、收放自如，具有鮮明的個性。他相 信權力，相信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力量。與毛相比，王明雖然是斯大林的學生，他學而且信； 毛澤東也學斯大林，但學而不信。信的最終鬥不過不信的。”

美國西雅圖大學梁侃教授說：“從現在起，任何人不首先讀《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 ，都無法進行有關整風運動的論述與交談。”

對於西人來說，理解毛有他們的角度，站在西方看東方，更多的是看到毛的革命家的一 面，毛基本被定義為革命家、東方羅賓漢，游擊戰的英雄，幾十年都如此，從政界到學界， 崇拜毛的不計其數。不管中國的反右運動、大躍進、文革的災難有多深重，也不會影響他們 對毛的先驗看法。如此，也是有理由的，毛有讓西人著迷的地方，諸如詩人氣質、底層情結、 反官僚體制、反世俗主義等等。

在另一方面，近三十年來，隨著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西方學者較多的關注研 究中國最新的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毛和中國革命的話題總體上已淡出那些中國問題專家的視 野。即使如此，在多元化的美國中國學界，仍然有人關注中國歷史學界對這些議題的新的研 究。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周錫瑞教授（Joseph W. Esherick）認為，“高華論述整風運 動”，以及其他學者的專題研究，“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們所有的著作皆影響了中國當代諸多 知識分子的政治關懷”。“高華嚴謹的學風與持平的判斷為當下 PRC（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出 色的黨史研究樹立了極佳的典範。”

在聽到大量稱許的同時，對本書也有若干批評的意見，有一種看法認為我的書“傾向性”較強，對毛的“權力鬥爭”寫得多了，而對毛的理想層面較少著墨。也有學者從另一個角度

關注作者的“倾向”，陳彥博士寫書評稱，作者有思想矛盾，從本書的思想邏輯演進應得出否 定中共革命的結論，但作者卻對中共革命深表同情；蕭功秦也認為，本書隱隱透露出作者的 某種思想矛盾：在作者看來，基於反抗社會壓迫的一切革命都有其歷史合理性，然而，另一 方面，作者似乎又對革命的悲劇性一面持有強烈的人文主義情懷。

遇資州教授（某著名學者的化名）在對本書的書評中寫道：“延安整風”儘管相當殘酷、 極左、陰謀，其實相當必要。毛澤東不愧為真正的政治領袖，……從黨的生命和使命來看， 毛搞整風奪取黨的最高領導權，可謂歷史危難中的當仁不讓。說到殘酷，現世政治有過不殘 酷的嗎？所謂“極左”，不左還算共產黨？“整風”是黨的運動，黨搞運動，我等黨外人沒有 置喙餘地。“整風”如果只整黨人和熱愛黨的人，就沒有什麼不正當。共產黨不是自由黨或社 會民主黨，向共產黨要求“民主、自由、獨立、社會正義和人道主義”，可能一開始就找錯了 人。“整風”中所迫害的知識人，誰不熱愛共產黨？受迫害為什麼不逃離延安（書中僅提到兩 例逃出）？經過運動後，受迫害者不大都變成了以後“運動”中整人的人？

對批評者的六點回應 一本書出版後，有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在幽幽歷史迷宮中上下求索，本來就是一場智力探險。對《紅太陽》作者的探險結果，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以公正和客觀的態度對本書出評價，包括指證該書存在的不足或缺點，對於作者都是教益。對於前述的批評意見，我是 這樣看的：

（一）在談論和研究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上一些深刻影響人民生活和命運的重大歷史事件 時，一個學者不可能沒有他的價值傾向，十年前，我在本書的“後記”中說，我認同五四的 基本價值，那時是這樣，現在還是如此。問題是，作者的價值觀不能妨害他作為學者的客觀 性和公正性，我相信自己做到了這點。反觀有些中國近現代史的著述不僅順從“長

官意志”，還想方設法用學術的包裝，為“大人”或“聖人”的明顯錯誤辯護，卻沒有人批評他們的“傾向性”，這是很奇怪的。

（二）毛的“君師合一”地位奠定於延安整風，這是《紅太陽》一書敘述的重點。將《紅太陽》有關毛澤東敘述解釋為“是搞『權謀政治』”，則未免誤解本人的觀點。在前言中，我寫得很清楚，毛發動整風運動有其思想追求，“延安整風運動是……重建以毛為絕對主宰的上層權力再分配的過程。同時，延安整風運動又是毛澤東以自己的理念和思想，徹底轉換中共的『俄化』氣質，將中共改造成為毛澤東的中共的過程”。至於毛看重權力，這沒有什麼可諱言的，政治家欲成就大事業，當然離不開對權力的追求。1972 年春，周恩來在毛被搶救蘇醒後對他說的第一句話就是：主席，大權還在您手裡。過去人們只關注毛的“義理”層面，而完全不知道或忽視、迴避他的“權力操作”層面，這對於了解毛和他主導的歷史過程，顯然是不夠的。我自認為在書中對毛的描述是客觀的，也講了他的“理想”層面，也許比重不多，但研究毛之“理想”的論著早已汗牛充棟，對一個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和世界，一直掌權到生命最後一息的大政治家，不僅要研究他的“思想”，還應研究他的“權力操作”層面，在那些“深掘義理”的書之外，我的書就作為一家之言，聊備一格，僅供參考吧。

（三）對於我的“思想矛盾”的問題，我同意蕭功秦的看法，他認為我書中所顯現的思想矛盾正是歷史事件本身的內在矛盾的一種映射。在這十年，我讀了更多的書，在這林林總總的讀物中既有歷史檔案文集、政治家的回憶錄，還有文學家的雜感、詩歌，新聞記者的報告等等。隨著互聯網的發展，我還閱讀了許多民間“小人物”的歷史。我讀它們都圍繞一個主題，那就是思考“革命”、“解放”、“自由”、“人性”的意義。我想說的是，這場思考持久、艱辛、充滿困惑。我的基本觀點沒有改變，我仍然認為，二十世紀上半葉開展的中共革命和國民黨領導的國家近代化過程，都對中國的民族獨立和社會進步作出了重要貢獻，而其間產生的左、右極端主義既和兩黨的領袖及領導層的認識水平、知識結構、文化素養有關，更是他們及國家所面臨的內外環境和歷史條件的產物，作為後人，我們應在新的起點上總結歷史，吸取教訓，將前人的成就、犧牲和失敗轉化為今天推動社會進步的有價值的思想遺產。

（四）遇資州說，延安整風的成功關係到中共革命的勝利，他說得不錯，我在書的“後記”中說過，“從中共革命奪權、推翻國民黨統治的角度觀之，延安整風運動對於中共革命成功助力巨大，但是延安整風運動中的某些概念、範式以後又對中國的發展和進步產生若干消極作用，極左思想、權謀政治匯溪成流，終至釀成建國後思想領域一系列過左的政治運動直至文革慘禍”，如果不是因為這一切與老百姓有著密切的關係，我是不應加以置評的，即如遇資州所說，共產黨“整風”如果只整黨內，“干卿何事？”問題是，“整風”因有效而形成範式，建國後馬上就整到黨外，從“思想改造”，到“審幹肅反”，……最後到“文革”，一直整到普通百姓，都要強制接受“規訓”，那就不對了。

（五）遇資州提到，為什麼當年在延安挨整的人以後又整人？在毛時代，這確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很值得研究，我自己曾長時間思考這個問題。我的看法是經過延安整風，那些革命知識分子獲得了雙重身

份：一方面，他們是革命者，是戰士，是毛話語的宣傳者，他們 擔負著鼓動、教育群眾的重任；另一方面，他們又是帶有“舊階級和舊意識的烙印”，“思想 需要不斷改造”的群體。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心悅誠服地接受了自己的這種新身份，並從中 獲得了歸屬感。新中國成立後，延安知識分子成了全國宣傳、文化、教育領域的領導者，作 為解放者，他們自豪而自信，多數人當了官，從原先的兩重身份回到一種身份，成了監督別 人進行改造的領導者和整人者，很多人在這個轉變過程中，沒有任何道德和心理障礙，就把 當年他們所蒙受的那套方式，再施加給原國統區的人們，直到革命深化，他們被更革命的人 打倒。

（六）遇資州說，共產黨當然左，或者“極左”，可以指望有不左的共產黨嗎？應該說， 他的這些話頗有震撼性。在那個革命的年代，共產黨當然是激進的，可是黨的文宣同時也吶 喊民主和自由。今天的人們或許知道政治是複雜和殘酷的，然而在當年，對於許多人來說， 在人間建立一個烏托邦的理想國，還是有強烈的吸引力的。依照他提供的那套的邏輯，我們 沒有任何理由期待革命有崇高的人性價值，更不能對革命領袖的個人品格抱任何期望，我們 只能圍著篝火跳舞，慶賀那些黨內鬥爭的失敗者、被冤死者升天，因為一革命就必然“極左”， 而搞“權謀”也是正當的。可是如此這般，最後是什麼結果呢？只能是遇資州說的：“無論怎 麼選，我們都是輸家，都會為虛無的現身埋下伏筆。”遇資州的質疑，可能永遠難以回答，因 為它涉及的更深邃的歷史哲學層面下的人性、革命、政治、暴力、毀滅的道德基礎的問題。

眾所周知，思想的駁詰、學術的爭論有賴於一個場域，這就是存在著一個公平、開放的 學術平台，其前提是學術書籍的自由流通。雖然本書所談論的歷史事件已過去六七十年，但 還被認為是涉及“敏感”，及至內地某些著名圖書館也是有我書的收藏，而不提供外借和館內 閱讀。儘管如此，國內外、境內外一些高校的一些學科將我的書列為教學參考書，網絡上也 經常有我書的片斷的轉載，甚至還出現了幾種電子版。在中外出版的一些學術書籍、論文中， 也有許多對我書的引用。

由於本書不能進入內地，2003 年有讀者帶入被海關沒收，還打了一場官司。前幾年內地 出現了我書的大量的盜版，遍佈全國各地，有讀者寫信或電話告訴我，在北京和西部的寶雞 都見到我書的盜版，我自己在上海街頭也多次發現。對於這種侵權行為，我自然不滿，但無 能為力，非常無奈。

對《紅太陽》的修訂構想有關修訂，我的基本想法是這樣：

（一）將保留書的原來的結構。

（二）我的基本觀點沒有變化，個別地方可能會有一些調整。

（三）將會修訂一些錯訛之處，包括個別史實和文字方面的錯誤。

（四）主要是補充一些新的資料，使之融入到有關敘述中。這十年來新出現的資料不僅 沒有推翻我書的觀點，反而從不同角度印證了我書中的看法。2003 年俄羅斯解密的有關共產 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的檔案，內含大量的電報原件，其中多數為首次公開。這些電報反映 了 1931–1937 年中共中央、臨時中央政治局、蘇區中央局，博古、毛澤東、周恩來的關係和 矛盾，在相當程度上印證了我書的判斷。1986 年楊尚昆的一次談話，涉及上海臨時中央、中 央蘇區以及延安時期的許多

重大事件，其精神和我的書不謀而合，完全印證了我書的觀點。 另外，博古後人的新著涉及上海臨時中央、中央蘇區、長征時期的毛澤東、周恩來、博古、 張聞天等的關係，其中某些內容也印證了我書的判斷。對於這些新材料，我都會進行整理， 將其吸取到修訂本中。

（五）我在修訂本中，還將使用一些經歷延安整風運動的老同志及他們的後代贈送給我 的資料，例如：西安的張宣的回憶錄、鄭州郭曉棠家屬保存的有關郭曉棠與河南“紅旗黨” 冤案的材料，以及李新回憶北方局整風的資料等。總之，我會對近十年披露的各種資料進行 認真考辨，並吸取到本書的修訂本中。

以上只是修訂的初步計劃，重拾十年前舊作，“萬千心事難寄”，在下一步的修訂過程中， 我會把對那些歷史上的人和事的新研究、新感悟融入書中。總之，我希望我能把修訂的工作 做得更好一些，使得本書可以更充實一些，完全地復原歷史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通過進一 步發掘資料和細緻的研究，盡可能地去接近歷史事實，這是十年前出版本書時我的心願，現 在仍然是我的目標，我會繼續努力。

2009 年 5 月 25 日於南京

高华走了

熊景明

聖誕假日最後一天早晨，窗外海天一色。打開郵箱，竟然有五封郵件帶來同一噩耗：高華走了。他的學生傳來記錄他最後幾天的日記，“高老師今天精神很好，頭髮也整整齊齊，也許是便血之後，高熱退掉了，肚子也沒有原來疼了，人反而精神。我在高老師旁邊，輕聲讀 聖嚴法師《智慧100》中解法句經的一小則文字，經文曰：無樂小樂、小辯小慧，觀求大者， 乃獲大安。我對高老師說，高老師一直是持大歷史觀，注意歷史的延續性，從大處著眼看透 歷史，難怪內心比一般的人要安靜堅强的多，是有大智慧的人，正所謂『乃獲大安』。高老師 躺在那裏笑了”。

高華在這個與他的研究極爲相關的日子，12 月 26 號去世。《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是對 現在中國歷史和政治文化的最佳解讀。這部書 2000 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至今已經 八次印刷，今年並出了簡體字版。他的研究完全取材於公開出版的資料。衆多學者公認，這是“近年來中國思想界、史學界對中國近代歷史，尤其是中國共産主義革命史反思的一項重 大成果”。“此書是一部研究延安整風的歷史專著，……書主旨在於回答中國革命的領袖毛澤 東及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是如何在……中國共産黨內獲得認可和確立的這樣一個關乎中國 歷史命運的全局性問題。正如該書封底的提要所指出的：『延安整風運動是深刻影響二十世紀中國歷史進程的重大歷史事件，這是由毛澤東親自領導的中共黨內第一次大規模政治運動，也是建國後歷次政治運動的濫觴。』”（註一）

這是名副其實的十年磨一劍之作，“他用了十多年的時間來收集、考辨各種殘缺不全的檔 案材料和零散的個人回憶。他善於從大量點滴事實中捕捉其間的內在聯繫，他的每一重要論 據都有來源引證。此書志在於『拂去歷史的塵埃，將延安整風運動的真貌顯現出來，在官修 的歷史之外，提供另一種歷史敘述和解釋』。這種嚴肅、實證的學風爲此書奠定了信史的基礎， 而這也正是其力量所在”。（註二）

高華沒有獲得一分錢的研究經費。他白天看書、構思，晚上寫。爲了不影響睡去的妻兒， 坐在廚房裏一張小桌子前“奮筆疾書”，一件軍用棉大衣，抵禦不了南京冬夜的寒風。小小一 張枱已足够，高華寫作時，桌上不放參考資料或筆記。“這樣避免抄任何人的思想或文字”。 沒暖氣，窗不嚴。深深進入寫作狀態的人，就像舞台上進入角色，凜冽寒意被排在感官之外， 身體則吃不消。幾個冬天，高華均感冒不癒，之後心臟受損，之後肝臟受損。

他的書出版前，受邀請到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來，順便做最後校對。要不是 約他周末去行山，他說爬高坡走遠路不行，誰也看不出他的健康有問題。正值茂年，雖早生 華髮，却面色紅潤，神采奕奕，衣裝搭配得體，總是笑臉迎人。幾年前，他已經病入膏肓， 香港一位治療肝癌的醫生見到他說，旁人看到我們倆，一定以爲我是病人，你

是醫生。

高華太不像病人了。肝癌病人平均壽命 6 個月。高華對待疾病冷靜鎮定，就像對他的歷 史研究。這個歷程艱難的“項目”延續了將近五年，令所有醫生驚訝讚嘆。到最後的日子， 周圍的醫護人員都被他感動、感染，全力以赴將他從生命的邊緣上一次次拉回來，似乎相信 奇蹟可以延續下去。

打電話時如果聊到病情，治療方案，講到末了，他經常會問，“你看，我是不是很平靜？” “對，你完全像是和我討論學術問題。”有一陣，他的病似乎穩定了，準備到外地開會。祝賀 他，答道：此病是不聲不響的，鬼子進村靜悄悄。去世前一周，高華開始便血，他調侃地對 太太小劉講史，敘述孫中山抵北京後，在醫院連續出血好幾天，然後突然不出血了。孫的部 下很高興，其實乃大崩潰的前兆，6 天之後，又大出血，溘然逝世。一貫與他駁嘴的小劉說， “你怎麼讀歷史其他不好好看，却記住這一段呢？”“我也不是特意看的，不過順便眼睛掃到了。”學生日記裏說，“很是佩服高老師的鎮定和超然，雖然便血不止，到晚上第 6 次的時候， 還是和高欣、我開玩笑：『又來了，又來了，還來勢洶洶……呵呵！』他從容面對，精神很好， 一邊在床上便血，還一邊就新播的《新亮劍》和高欣、我討論東北戰役國軍的失敗、陳辭修 的清廉和迂腐”。

兩周前，高華家屬幾次接到病危通知，他特意不讓告訴朋友。我心裏明白，打電話講講 八卦新聞，說起《看歷史》雜志舉辦的評獎活動。他問我，去年是竹葉青酒贊助，今年他們 找到哪裏資助了。“我的天，高華，你怎麼所有事都記得那麼清楚！”知道他的日子不多，但 怎能接受如此清醒的頭腦將停止工作。

“小劉批評我疏懶了，我沒有呵”，“當然，你一直勤奮”。 2010 年深秋，高華在上海做 手術，切除近一半肝臟。 回到南京，寫成一萬六千字的長文，〈六十年來家國，萬千心事誰 訴〉，且評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且談歷史。 “十月下旬，我在上海醫院的病榻上，手術後 的傷口疼痛，沒有使我流一滴眼泪，但是當我讀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最後一段，我的 眼睛充盈著淚水”。“龍應台不迴避，不遮掩，以赤子之心，將她對公平正義的立場和態度， 完全無保留地展現在公衆面前，分量之重，超過了任何宏篇大論”。（註三）這其實是高華自 己做學問的態度，他從來帶著感情走進歷史，懷著對公平正義的追求揭示史實真相。

過去兩年中，高華接受了幾次訪問，最後一次是《新世紀》記者靈子就教於他，關於革命話語的長談。高華以革命話語爲綫索，將紛雜、生動的歷史事實串起來，清晰地展現了中國近代史的一個重要側面。他分析了黨派之爭中，武力與計謀之外，决定勝負的民心歸依後 面的可悲的簡單事實，即渴望變革的知識分子如何掉進烏托邦的陷阱，然後不由自主地充當 了欺騙大衆的角色。當然，也因爲出現一位集高層政治鬥爭計謀和底層地痞流氓的手法一身 的關鍵人物。他將無數歷史細節信手拈來，將觀點分解在冷靜客觀的學術論證之中，思維如 此精妙，哪有一點病人的影子。（註四）

和高華聊天就像和歷史對話，不明白他如何可以將當代中國每個歷

史事件的來龍去脈弄　得清清楚楚，將每個歷史人物還原得活靈活現。2006 年高華到中大歷史系任訪問教授期間， 參加了中心頻頻舉辦的午餐研討會。如果題目涉及民國以還的歷史，坐在聽衆席上的高華提 出問題和評論，知識不亞於台上講者，見解則往往更勝一籌。可貴之處在於，他十分照顧講 者的自尊，態度謙卑，善於肯定別人。有一次，一位研究福建文革時期農民造反派的學者來 演講，高華與她對話，順便列舉福建幾個農民“戰鬥隊”，指出，其實農民造反不成氣候。他 在我書架上看到一位朋友父親的詩集，說，此人在山東某縣做官時，給共産黨捐了多少多少 大洋，後來如何如何。這些情節，此書並無記載，都是高華儲存在大腦中用之不竭的歷史素 材。

高華認爲，如果只把握了歷史細節，最多只是個史料專家，而探索歷史後面的思想，建 立歷史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是更有意義的追求。但顯而易見，作爲一位傑出的歷史學家， 他對資料的把握，對歷史運行的邏輯和因果的通達，他的天賦和努力，缺一不可。那年，海 外出版了一本講述一位領導人物最後幾年的書。我請教他對此人的看法，他答道，此人臣服 於他的上司。如果上司認爲某人好到 70 分，他按 80 分來利用；上司覺得壞到 70 分，他會以

100分壞來對待。對歷史人物做出別具一格剖析，是高華的特長。聽他暢談，沉醉其中，可惜沒有記下他無數妙言妙語。

能將研究和演說能力集一身，相當於會寫劇本也會演戲。高華在南大十分“賣座”還因 爲他是出色的講者。 開夜課，“本校的政治、哲學、法律等系的學生，外校的理工文科、從 學飛機設計到學服裝設計的各色人物，受到高老師魅力的感召，都有來南大串堂聽高華課　的，”。我最後一次聽高華演講，是 2009 年在香港中文大學，兩岸三地歷史學家聚一堂。高華　沒有半點病容，一貫地抑揚頓挫有節，時間把握得恰到好處。大概由於多年教學的習慣，重 要的字句會重複一次。會後，台灣學者陳永發感嘆道：大家就是大家。

打電話到醫院，高華身邊常常有他的學生，許多專程從外地回到南京來陪伴他。高華對 我最後的囑託，是替他的一個剛從美國拿到學博士學位的學生留意工作。“圍繞”在他身邊的 學生，有的十多二十年前就畢業了。他的學生周孜正在日記提到：“一個月之前他（另外一位　學生）來電問我情況，聲音哽咽，並取消了以前冬天不回國的慣例，聖誕一放假，就從愛荷 華轉機洛杉磯飛回來了。見到他之前，心裏面不由一陣難過，每年他回來，我們總是約好， 一起從揚州和無錫去看高老師，大家聊天吃飯，多少快樂時光，仿佛一家人。”高華去世前一 天：“聊天到 6 時許，高華催我們回去，我已經訂了晚 8 點回無錫的車票。只能依依惜別，高 老師還是躺在床上向我們揮揮他的大手，提醒我們帶好錢包鑰匙等。在南京—無錫的火車上， 我總是在想著這 18 年來那些往事，和高老師一起去買書、看電影、聽講座，歷歷在目，心情　　沉重，不能平復”。

有人預言：高華離去，未來一年，對他的思想的整理必然形成氣候。這件事，只能指望 這些多年追隨他的學生去完成。有人致敬：高華是一個孜孜不倦的歷史真相的追求者，他的 精神永存！在海外中國學術研究的網上平台 C-Pol 上，有教授發布消息說：中國最偉大的一 位社會

科學家高華逝世。

高華的人格魅力在於他是個普普通通的人，孝順父母，關心身邊人，尤其是他的學生。所有高尚的理想、理念都須由個人的具體行爲，對人對事的點點滴滴去檢驗，去分辨真僞。 高華不是完人。他性急，爲人與行文有時過於謹慎（其他缺點得由他太太補充）。有朋友道， 高華的學術成就可謂立言立功，而他對待疾病的超强意志和冷靜，立大德也。

一位對現代中國歷史和政治瞭解最深，梳理最精妙的學者，正當英年，沒來得及將他的 研究和見解完全留下來，就走了。高華離去，令我們如此不捨，因爲他帶走太多，因爲他是 獨一無二的。

高華做手術後，胡傑和我明白他來日無多，計劃組織一系列訪談。首次訪談，由美國加 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博士候選人常成就《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請教他。此事才開頭就受 到干擾，沒有能系統地進行。萬幸的是，高華在病床上，回答寫作初衷時，留下幾段獨白。 今日讀來，好像壯士從容就義前的臨別贈言：

“我記得我真正動筆的那天，是俄國 1991 年的 8.19 事變，8.19 事變的第一天。我家裏 還有個老式的收音機，我在聽緊急委員會的臨時通告，一會兒蘇聯國歌，一會兒蘇聯愛國歌 曲，一會緊急委員會通告，我在聽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開始寫紅太陽第一章。而且，我感覺 到我應該寫！

寫作是個很長的過程，我並沒有立即想到出版的事。我當時有一個想法，就是你應該寫， 要擺脫自己內心的恐懼，擺脫內心各種各樣的禁忌。”

“《革命年代》裏，我講的是五零年代，我成長的這個長期，受到主流思想相當大的影響， 自己在寫作過程中，在審視它，在重新觀察它，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和它說再見。”

註一 陳彥：〈理想是怎樣失去的？——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讀後〉，《二十 一世紀》2001 年 6 月號。

註二 同上。

註三 高華：〈六十年來家國，萬千心事誰訴——讀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札記〉，

《領導者》總第 34 期（2010 年 6 月）。

註四 靈子：〈高華：在革命詞語的高地上〉。

（作者為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助理主任。原文名為《拂去歷史的塵埃》，載 於財新《新世紀》週刊 2012 年第 1 期。經作者修訂，刊發於此。）

悼念高华

杨奎松

一

最早知道高華病危的消息，是讀到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的黃凱平 12 月 2 日夜裏的來信。 信稱：高老師現在每週需換三次血，他家人說，他已是到了病危之時，時日不多了。想到高 老師正是學術成熟期，很多思考都未付諸文字，和高老師的學生商量後，希望能有一兩位同 輩學人與他長聊幾次，每次都錄下聲音，既為高華老師留下他的思考，也為學界少些遺憾。 因此，他們分別聯繫了秦暉和我，秦暉老師已經答應儘快前去南京，想知道我近期是否方便來做這件事情。

凱平的來信讓我很吃驚。因為不久前我還和高華通過電話，一兩周前他還表示想要我幫 他在華東師大再招一位他認為很不錯的博士考生。因此，我有些疑惑地答覆凱平說，我很願 意來做這件事，但一、我要弄清楚這個消息是否準確。二我要知道這是不是他和他家人的想法。

我所以沒有馬上承諾去做凱平他們希望的這件事情，不是懷疑高華病危的消息有假，而 是內心裏不願意接受這樣一個現實。我曾經兩度照顧過病危的患者，我非常清楚身為家屬在 親人病危時的心情。越是危重的病人，就越是需要休息和避免交叉感染的危險，太多外人的 探視，特別是長時間的交談，只會給病人帶來更大的危險。做家屬的，總是希望會有奇跡出 現，事實上我也親歷過這樣的奇跡。因此，當凱平第二天來信表示同意我的意見時，我在回 信中特別寫了這樣一句話希望他瞭解。我說：“說到底，高華固然是我們大家的，但最主要還 是他的親人的。”的確，這是我由衷的想法，而且我真的不覺得他會這樣快離去。

二

接到凱平的來信後，我就開始聯繫去南京探視的事情。高華在電話裏的聲音依舊很洪亮， 他還在關心那個準備跟他讀學位的學生，“你來，我正好可以和你說說那個同學的情況”。

由於華東師大這邊的幾位高華的老朋友也都想去看他，因此必須要協調時間，而大家的 時間一直湊不到一起，最後拖到 12 月 16 日才成行，還是我們前次探視時的幾位：沈志華、 李丹慧、張濟順和我，仍有一兩位教授因事當天無法同往。

病床上的高華同我們上次探視時幾乎沒有兩樣，雖因黃疸面色略黃，人稍顯削瘦，卻仍 舊談笑風生，兩眼炯炯有神。據他和太太講，癌症的控制一直非常好，至今都沒有發現有轉 移的情況，這次住進來主要是肝的功能出了問題，出現了黃疸，連輸了三次血之後，黃疸已 經明顯消退了，目前的治療主要是保肝，即設法使肝功能恢復正常。

25 年前我因感染急性肝炎不僅住過院，出過黃疸，而且一度還發展到病危的程度，當時 渾身上下像是塗了厚厚一層黃色粉末，一碰都會往下掉似的，因此看到高華當時黃疸的情況， 真的覺得他已經度過了最危險的階段。

因為兩年前我們在香港開會時，太太曾給高華拍過幾張很不錯的照

片，這次來的時候， 太太特別要求過來再拍幾張，為高華做一個相冊送給他。但看到半躺在床上的高華，我還是 多少有點猶豫，因此小聲問高華的太太小劉：“能和高華合個影嗎？”

沒想到高華聽到了，大聲說：“可以。”說著，便側身要坐起來。我連忙問：“行不行？” 高華笑得很開心，說：“沒問題。”他接著指揮小劉把床頭搖起來，後面塞上枕頭，挺直身子 坐起來，並且一邊叫小劉幫他把頭髮梳好，一邊對小劉介紹我太太說：“她技術很好的，非常 專業。”開始拍照時，他還特別叮囑道：“不要把被子照進去，只照上半身就好。”

每拍一張，太太都會拿相機的顯示框顯示給他看，他總是讚不絕口地給予肯定。他特別 叮囑我太太，記得把香港會上的照片一塊發給他看。小劉也再三說：你們回去從電腦上把照 片發過來就可以了。

臨走的時候，我最後一個和高華握手道別。我說的最後一句話是：“一定要好起來，我們 還等著你一起來做當代史呢！”

離開病房的時候，大家的心情比來時都多少有些興奮。以至於小劉送我們到電梯口的路 上，我們沒有一個人問小劉大夫私下裏是怎麼說的。因為大家都覺得還有下次……

三

16 日去探視過高華後，我 17 日就去了北京，18 日晚上在參加《看歷史》的一個頒獎晚 會上，見到了高華的老朋友、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原負責人熊景明。景明也多時 沒有見到過高華了，因此她向我仔細地詢問了我高華的情況，並為我們看到的情況感到寬慰 和高興。然而，她不經意間講出的一句話卻讓我非常吃驚。她說：這次高華住院後大夫曾估 計說，高華最多只有一個月的時間了！

聽到這句話，我才意識到凱平月初來信所言並非高華學生的猜測，而是有大夫講過這樣 的話。想到當年住肝病醫院時，同病房和隔壁病房先後去世的兩位病友，前兩天還好好的， 過兩天人就不在了，不禁又開始擔心起來。尤其是想到高華夫婦很想要看到那些照片，就更 是有點不安。

19 日，我和太太按計劃去了香港，24 日晚上回到上海。第二天我就叫太太趕快加工沖印 高華的照片並訂做相冊。太太忙了一天，到傍晚才弄好。26 日一早，我們就叫了快遞員上門， 準備抓緊把相冊發出去。

上午 9 點剛過，快遞員按響了門鈴，而我書房裏的電話也幾乎同時響了起來。我叫太太 去開門，自己進書房接電話。電話那頭是一個陌生的聲音，說：“我是高華的學生，高華老師…… 去……”我的頭“嗡”了一下，沒有聽清對方說的是什麼意思，直到聽到裏面說：“30 日上 午舉辦告別儀式……”我這才明白是怎麼回事。

當時的我，一邊聽著電話，一邊想起太太正在把相冊交給快遞員，一時間變得不知所措。 放下電話，我在書桌前悶坐了好長一段時間，腦海中總是會浮現出高華那俊逸方正、微微帶笑的面孔，更總是覺得自己做錯了些什麼：沒有把他未發表的思考錄下來；沒有讓他看到他特別想要看到的照片……

說到高華的病，我內心裏最感糾結，甚至會感到愧疚的，還不是這

些，而是高華的工作 調動問題。

四

我是 2003 年到華東師大來做特聘的。來後，我一直很注意為華師引介人才。第一個引介 的是沈志華，第二個就是高華。

對於沈志華來華師，我做的具體工作不多。但對高華，我一直在兩邊做聯繫和推動的工 作。

因為我多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參加民國史研究較多，和南京大學歷 史系研究民國史的人比較熟悉，知道他們內部人事關係較複雜。高華在南大取得博士學位後， 也算是民國史研究隊伍中人，卻始終融不進南大民國史研究的圈子，正高職稱的問題解決得 也不順利。尤其是他的《紅太陽》一書在香港出版後，各種意見紛紛攘攘，一時爭議不斷， 在重視民國史研究的南大歷史系，他的處境就更顯尷尬。

鑒於我初來華東師大時，現當代史研究力量薄弱，高華的能力、學問和聲望，肯定極有 助於華東師大現當代史研究地位的提升，因此我便主動聯繫高華，嘗試動員他轉來華師。對 於高華當時面臨的種種困難，我則一一設法向校方探詢可能的解決辦法。在當時任黨委書記 的張濟順教授的全力支持下，這件事很快就順利運行起來。記得當時為他孩子的問題、太太 工作的問題，包括他來上海臨時住所的問題，我每件事都直接請示張書記和學校的有關部門 領導，然後挨個部門去跑。光是他的臨時住房，從最初房管處提供的一室，換成他所希望的 兩室，我就跑過好幾次。就是房子確定後內部設置、水電煤氣的具體情況，我也專門去房子裏一一檢查過。

還記得一切談妥後高華夫婦一起到華東師大來的那一次，我領著他們去看了在華師二村 定好的臨時住房，兩口子當時可以說是發自內心地感到高興。我也以為一切都不成問題了。

為了最後落實高華夫婦調來華東師大工作的事情，那一年我推遲了去日本的訪學。事情 辦妥後，我即前往日本，並且停留了半年時間。這期間，我得知小劉已經在華東師大正式上 班；南京大學也同意高華調來上海了；在學校幫助下，高華已在新校區附近買好了新的房 子……

然而，當我再從日本回到上海，卻意外得知，由於“不可抗拒的原因”，高華無法調入上 海，他的工作調動被迫停止了。

我這裏不想複述我所得知的導致“不可抗拒的原因”的理由是否成立，我只想說的是， 這個消息對華東師大、對我來說，再難接受，也不致造成怎樣的創傷，而對高華來說，這一 消息則不啻一種沉重的精神打擊。無論我們再做多少補救的工作，如保留他在華東師大的教 職、招生及相關待遇等等，都無法挽回此次挫折對高華身心所造成的傷害。

我所以這樣說，是因為高華原來就患有慢性肝炎，並有過部分肝硬化的情況。同時，高 華雖然性格剛毅耿直，對名利地位乃至生死看得很開，但如許紀霖所言，他個人及家庭過去 的經歷，決定了他仍舊會對一些事情看得較重，甚至會感到緊張。儘管事情發生後，他當面 還會開解我們說“沒關係”，他的一些表現還是讓我清楚地感覺到了他內心承受的壓力實際很 大。這不僅因為這件事證明了他在政治上的處境，而且因為他的工作調動早就成了一些人熱 炒的話題，個別人甚至在網上對他冷嘲

熱諷，進行人身攻擊。如今調動不成，自然更容易被 人風言風語，這對他本來就有病灶的身體顯然極為不利。

果然，就在他重回南大上班不久，他就被查出可能患上了早期肝癌！ 誰能說我在這件事情上不是幫了高華的倒忙呢？！

五 在中國，成了爭議人物，有時會莫名地引來意想不到的麻煩，即使是在象牙塔裏做學問的人也不例外。高華之成為爭議人物，包括他的工作調動也會被一些人拿來“誅心”，就是一

個典型的例子。

高華成為爭議人物，源於他那本《紅太陽》的書。其實，中國歷史研究中許多看起來敏 感的事情，多半都是有時間性的。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討論陳獨秀“右傾”是“投降主義”，還 是“機會主義”的文章，都不能公開發表，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後，即使是為陳獨秀做翻案 文章，否認陳獨秀“右傾”，也不再有敏感問題了。

我和高華都是七○屆畢業生，都在工廠幹過 8 年，都是在“文革”後的 1977 年第一批考 入大學讀書；我們有著大致相似的家庭背景和生長環境；他本來是學歷史出身，又是在歷史 學界中工作，卻轉來做中共黨史研究，我是學黨史出身，轉到歷史學界工作，卻仍舊堅持做 中共黨史研究，我們兩人不論在歷史學界，還是在黨史學界，都屬於邊緣人，因此，我們之 成為好朋友，多少有那麼點兒“惺惺相惜”的味道。

但是，細心的讀者能夠發現，我和高華其實在毛澤東研究或中共黨史研究上，也並不就 是完全一致，看法相同的。我的《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書出在他的《紅太陽》一 書的前面，一直到高華再版他的書，他都很少直接提到我的書，也沒有針對我書中內容相同 但敘述不同的史實進行過討論。我們不是沒有交換過意見，其中在香港中大那一次我們在中 大圖書館下面的咖啡館裏足足討論了兩個小時之久。注意到他修訂後的版本仍舊沒有多少改變，我很直率地說明了我的看法，即我不認為他對當年中共黨內高層之間的權力鬥爭，以及個人動機、情結和心計所作的許多“深描”，有足夠的實證依據。他也一一解釋了他的思路和 邏輯。以後，圍繞著和他書中個別史實有關的資料問題，我們還有過幾度討論。

高華的書無論有多少可以或值得商榷之處，它都是一本嚴肅的學術研究著作。我們可以 同意，甚或稱讚他的敍述與觀點；也可以不同意，甚或批評他的敍述與觀點；同樣也可以部 分欣賞、部分否定他書中的研究，但是，這都不應該妨礙我們這個國家、這個社會，把他的 觀點和他的書放在學術研究的範圍裏評價和看待，不應該把這樣一種學術研究上的分歧簡單 地和所謂左右問題扯在一起。

六 上個世紀末，我才剛剛開始對新中國建國史研究發生興趣，對建國以後黨史、國史的許多情況都不熟悉。國內這時研究建國以後黨史、國史的機構和一般研究人員，也多不做實證研究，更鮮有微觀史研究。哪怕是當時已經出版了大量回憶史料，國內，國外認真閱讀、考 證和研究者，也寥寥無幾。不用說，國內外歷史學界，那個時候更沒有人會來研究這種當代 史問題了。

在這樣一種情況下，高華可以稱得上是領風氣之先和國史研究的開拓者。我最早讀到他 的一篇論文，是 1998 年發表在《二十一世紀》上

的釋讀前江蘇省委書記江謂清回憶錄的文章， 題為〈北京政爭與地方———釋讀《江渭清回憶錄》〉。這篇文章做得非常漂亮。他結合江渭清回憶所涉時段的各種文獻史料與史實，把江的回憶與其他相關領導人的回憶資料詳加比照 考辨，用他最擅長的悟性與敏感，把一個個看似不起眼的小故事、小問題串聯起來，進而把 中央政爭與地方大員之間的複雜關係梳理得清清楚楚，讓人歎為觀止。

我時常在想，以高華的研究經歷和出色的研究能力，他原本決不應該只留我們《紅太陽》 和《革命年代》這樣兩本著作和二三十篇研究論文。他所以成果如此之少，除了他做學問態 度嚴謹和對自己文字的要求太高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恐怕也是因為他選擇的這個中共黨 史，材料的獲取和成果的發表都太過困難的緣故。甚至於，他的國史、亦即他研究中國當代 史的論文，絕大多數也都是依靠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所藏的資料，發表也大都只 能選擇在海外的學術刊物上。

改革開放、上大學、讀歷史、留校做教學研究工作，最終為高華打開了這扇可能通向歷 史真實的大門。只是，即使是在後毛澤東時代，即使歷史已經發展到今天，對於像高華這種 堅持要用自己的方法思考歷史的學人來說，這條道路依舊坎坷難行，甚至隨時都有因一本書， 甚或一篇文章遭遇更大困難和災難的危險。

高華走了，帶著他的困惑和遺憾。 中國會有年青一代的高華跟上來嗎？

（作者為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本文原載於 2011 年 12 月 30 日的《南方都市報》， 經作者同意，刊發於此。）